

#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 目 錄

《历史的先声》遭遇封杀令 海内外学者强势声援

邵 明：共产党五十年前的民主承诺——读大陆新书《历史的先声》	16
杨 渡：鼓吹民主中国 《历史的先声》被封杀	19
李 怡：《历史的先声》为什么遭封杀	23
郑连根：承诺是需要兑现的	24
郭树荣：何等惨痛的教训	28
包遵信：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读《历史的先声》	29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55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55
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57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58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	59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60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61
民主第一	63
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65
我们要看货色	66
是不是代用品呢？	67
不是空喊民主	68
民主与诚实	70
强大而民主	71
民主与国情	72
团结与民主	74
诸葛亮与阿斗	76
民主的真义	77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79
战时必须实行民主	82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节选）	84
民主精神	88
民主原则	89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96
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	98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100
建立宪政规模	102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103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	106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107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109

中国需要“变”——摘某报社论	111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112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116
让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	116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120
为民主拚命	122
工程师和民主	123
关心政治·改良政治——一位工程师的话	124
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124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124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127
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128
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131
祝贺美国国庆	133
纪念杰斐逊先生	136
真实的民主战士	138
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140
为了人类	141
“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142
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144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145
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147
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	149
东西不同论（二则）	151
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	152
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153
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155
让思想冲破牢笼	159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160
驳“灌输”理论	162
奴隶的语言	164
读书与自由	166
论“天真无邪”	167
沙漠化的愿望	168
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障创作自由	172
言论自由与民主	173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174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179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181
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183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184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187
要为真理而斗争	191
民主主义的剑	193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193
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195
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196

论学术自由	198
奖励自由研究	200
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203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208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	212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213
论选举权	215
竞选	218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219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220
斥“人格教育”	222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225
民主和自由新论	227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世界学生日献辞	229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232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234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238
为死难学生呼吁	239
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240
人民是骗不了的	241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242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242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243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251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253
重视青年	254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255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256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259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260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262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269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272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272
保障人权	274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275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277
自由不是专卖品	279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279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281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论张君勱先生的建议案	283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285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288
快释放政治犯	289
法治与人权	290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294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294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296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297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299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301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304
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308
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312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313
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316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317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319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323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324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325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329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332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333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335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335
合法的罪恶	338
民不畏死	341
人权和观瞻	343
论无耻主义	344
风气·秩序·容忍	346
“黑名单”	347
希特勒的“民意”	348
“守法精神不够”论	349
奴才见解	350
今与昔	353
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355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355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357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358

## 《历史的先声》网上冲击波

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没有食言	362
我看当年的新华日报——与数学先生商榷	365
再谈当年新华日报之事	366
与数学先生谈《历史的先声》的常识问题	370
跳出中国国情的局限——读《历史的先声》有感	370
从《历史的先声》看互联网文化	374
戴晴：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376
民主的声音永恒——读《历史的先声》有感	382

毕竟是政客！——读《历史的心声》有感 385  
勇敢的知识分子 幼稚的知识分子 387  
佚名：收获的，不仅是感动 393

## 《歷史的先聲》遭遇封殺令 海內外學者強勢聲援

邵 明：共產黨五十年前的民主承諾——讀大陸新書《歷史的先聲》

[按：大陸新書《歷史的先聲》將五十幾年前國共內戰時毛澤東的演講和中共機關報的社論編輯發表，披露共產黨當年如何以民主和自由的高調，配合蘇聯在國際上贏得了西方媒體的好感，把對手國民政府塑造成一個腐敗獨裁的形象。中共的這些苦心宣傳最終使美國錯誤地以為共產黨是一個進步的力量，起碼可以和國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這些在野黨的空頭支票也爭取了許多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人心，幫中共獲勝上臺。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美麗的謊言畢竟是 100% 的謊言。現在的問題是，大陸人民還有沒有權利要求中共現政權履行其五十年前的承諾呢？——編者]

“十一”五十周年前夕，官方宣傳一波接一波，各方均予配合。個別紀念頗有創意。

日前逛小書店，見有九月才出版的歷史文集《〈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

文章選自共產黨機關報社論。從所選輯的抗戰末期、內戰前夕共產黨機關報社論（其中不少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親自執筆）看來，共產黨與國民黨爭權時，對國人作出了很多進步的承諾，絕不亞于今天民運奮鬥的目標。

全書分為九章，章名和內容依次為《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抨擊國民黨獨裁無法團結全民一致抗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呼籲各界爭民主；《民主主義的利刃》，高度讚揚美國的民主，《讓思想衝破牢籠》，提倡言論自由，抗議國民黨壓制；《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學校要作民主的堡壘》呼籲大學生搞民運；《天賦人權，不可侵犯》、《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引用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文章和講詞，包括毛 1941 年 11 月 22 日所講的“共產黨只有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一切壟斷一切的權利”；《誰使中國不能安定？》。章名相信是編者“笑蜀”根據該章所選各文的中心思想而擬的。

毛澤東說民主統一才是真統一

全書最具震撼性的也許是第一篇毛澤東 1944 年 8 月 12 日對中外記者團的發言《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原載次日的《解放日報》。其時國共內戰呼之欲出。毛澤東以在野革命黨黨魁的身分闡釋對統一的立場，表示共產黨“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從各方面實行民主……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如果不說明這是毛澤東的話，恐怕會以為出自李登輝或魏京生的口。

周恩來說有言論自由才是真民國

第二篇是周恩來 1944 年 3 月 12 日在延安紀念孫中山逝世 19 周年的演說《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周基本上重複毛將抗戰成敗系於國民黨是否搞民主的論點，但作為實踐者，相比

於搞理論的毛，用詞具體得多，指“國民黨執政已經 18 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接著引用毛的話說“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而“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地從人民湧現出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但目前人民的住宅隨時可被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只要把“抗戰”改成“改革開放”，國民黨改成共產黨，今天的民運言論幾乎可以照抄周恩來。

最有趣的一章是《民主主義的利刃》。共產黨當時面對軍力強大得多的國民黨，爲了爭取美國的支援，至少使美國在中國內戰中中立，大捧美國的民主。毛 1944 年對美國駐華官員謝偉思 (John Service) 等人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 至 21 期）但六年後就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戰爭。

封底摘錄的編者序言也很有意思：

“重讀五十年前的文字，還使我們看出，中國人民不僅能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能將這一改革的成果深入更深刻、更爲艱巨的管理體制：這是因爲早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作出了莊嚴的承諾，並爲今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資源。這些精神資源將是下一個世紀中國人民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寶庫。

“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爲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來。

——謹以此書紀念五十年前民主與獨裁的歷史性決戰；謹以此書紀念所有爲此決戰前仆後繼的中華英烈！”

這裏的“管理體制”或可視爲政治體制的別稱。若此，以一句話總結全書，也就是中國知識界有人意圖以中共當年的承諾作爲今後政治訴求的依據。這本書的出版別具匠心，似乎令人想到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有希望。

——香港《開放》雜誌 1999 年第 10 期

楊 渡：鼓吹民主中國 《歷史的先聲》被封殺

新政府與民進黨都應該看一本書。一本剛剛在北京被“封殺”的書，名叫：《歷史的先聲》。

這本書是一個異數，對陷入僵局的兩岸關係，尤其是還不知道如何使用大陸語言與中共打交道的新政府與民進黨，具有百分之百的參考價值。

只要看看它的目錄，就知道它的思路，所使用的語言，與當年民進黨在對抗國民黨的時候，有多麼接近。“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爲民主拚命”；“只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主嗎？”“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尺規”“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至於內容，那就更精彩了。

談到統一問題，這書的第一篇寫道：“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立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同一篇：“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

誰也無法想象的是，這篇題為“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文章，不是出自現在，也不是大陸異議人士的筆下，而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的《解放日報》所刊登的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問。沒有錯，這正是毛澤東說過的話。

這一本書所選的文字，全部選自五十幾年前的，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辦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的《解放日報》。主要是當時發表的兩報社論和評論，其中還有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與黃炎培的談話，標題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

這真是非常吊詭的事。吊詭之一：被民進黨所批判的中國共產黨，竟曾經使用過這麼相似的語言，來批判國民黨。吊詭之二：為什麼大陸的出版社會選擇二〇〇〇年的這個時候，來出這本五十幾年前的文章選集？原因何在？吊詭之三：既然是中共元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社論選，政治正確毫無疑問，為什麼會被封殺？什麼叫封殺？

從後面倒回去說吧。這本書的編選者在序文中，只是說：“重讀五十年前的文字，使我們看出，當今境外對我黨、我國的謾罵污蔑是毫無根據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歷史舞臺前，我黨前輩革命家、理論家就已經是卓越的民主、人權鬥士，在冷戰風雲初起之際，就已經以他們對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見，在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人權與鎮壓之間，作出他們的選擇，並為此殊死戰鬥！”

話是這麼說沒錯，但仔細一看，五十幾年前卓越的政治家所批判國民黨的話，竟有如是對大陸現狀的批判。而在人權與鎮壓之間，五十年來又進步多少呢？這恐怕是編輯者質疑的所在吧？

套用一個大陸學者的話：“為什麼當年批判國民黨的語言，現在都可以用來批判共產黨？”

這才是中共當局要封殺這一本書的原因。為什麼是封殺而不是公開查禁？原因很簡單，整本書，從編者按語到內容，都沒有脫離中共當前的尺度。內容又是共產黨元老的言論，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政治上再正確不過。誰也無法找碴。然而，整個內容合起來看，竟是如此鮮明的指向當前的缺失，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民主、人權的缺乏、言論自由的不足。有些地方，甚至是用中共元老的話來暗批當前的問題。

例如在中國能不能實行民主的問題上，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新華日報就寫過這樣的社論：“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來批判國民黨不實施民主。文章中指出：“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

這些言論，像不像八〇年代初黨外時期，為了拖延全面改選，國民黨對黨外所作的辯解？而新華日報的社論，像不像當年黨外雜誌的社論？這些言論，在當代，竟也可以用來批判中共不實施民主的藉口。

有趣的是，這樣的一本書，正是因為它的政治正確，所以有關當局雖然正在追查編者，但卻無法公開查禁，只能用“打招呼”的方式，要出版社的領導不要再出，等於就讓它絕版，同時要書局儘量收起來。

對民進黨的執政者而言，這一本書因而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事實上，民進黨對中國大陸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以致於雙方只能陷入在“一中各表”或“各表一中”的文字遊戲裏，或為了語言態度而反復琢磨，卻忘了如何進入中共的思維方式之中，尋找最脆弱的突破出口。

而這一本書的被查禁，正顯露出中共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最脆弱的部分不在“一個中國”，而是“一個民主的中國”。質言之，如果民進黨仍以無聊的文字遊戲，想突破“一個中國”的底限，不僅無法得到美國的支援，中共也不可能同意。但反過來說，如果民進黨把“一個中國”解釋為：兩岸的統一，那就得是“一個民主中國”；臺灣願意同意一個民主中國的統一，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則中共根本沒有反駁的餘地。而這一點，恰恰是民進黨對付國民黨以來，最擅長的部分。

更明確的說吧，如果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真正意圖是“拖”，是“以拖待變”，是維持現狀，至少也要拖得漂亮，拖得理由充足，拖得讓中共沒話說。但僅僅是文字遊戲根本無法應付未來的變化與中共的壓力。

民進黨真正應該思考的是，反過來以中共最脆弱，而民進黨最擅長的部分，作主動的出擊。而“民主中國”既曾是毛澤東對付國民黨的武器，為什麼不要轉借一下，把“一個中國”解釋為“民主中國”，並表明，兩岸的統一，應該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等待中國大陸徹底實施民主制度，臺灣將不會有反對統一的聲浪。如此，中共也沒話說，臺灣也可以用民主制度確保兩岸和平。

被中共暗中查禁的這一本《歷史的先聲》是五十年前的言論，但民進黨卻可以從中得到歷史的教訓，找到中共都無法反駁的語言，實在值得參考。

——臺灣《中國時報》2000年8月31日

李 怡：《歷史的先聲》為什麼遭封殺

上星期六，筆者在本欄提到，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對社會主義真理、對民主理想的信念，已在這一代的領導人中消失。這說法有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幾個月前中國出版的一本書，被當局私下封殺了。

書名叫《歷史的先聲》。為甚是私下封殺而不是公開查禁？因為這本書所選的文章，全部都是五十多年前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辦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辦的《解放日報》中刊登過的。內容全是老一輩革命家當年的言論，和當年那兩大黨報的社論。從政權的法統傳承來說，是不能否定，因此也不可能公開查禁的。但是，從對於當今政權的主旋律來說，卻又是那麼不協調，而且簡直像出自大陸異議人士筆下的論調。因此，有關當局只好用“打招呼”的辦法，要出版社的領導不要再出，等於讓它絕版，同時要求書店儘量把書收起來。因此，它雖不是禁書，但在書店卻已買不到。

光看書的目錄，就可以看到它與當今中國政權的主旋律有多麼不協調。“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主嗎？”“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尺規”、“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主嗎？》這篇文章，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的社論。文章說：“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

寫這社論的人，當時當然是真誠的。但他絕不會想到，五十年後，這樣的文字，竟成為可用來批判他當年努力要建立的政權的文字。

鄭連根：承諾是需要兌現的

買這本書是因為一位朋友的推薦，一讀之後發現這確實是一本好書。這本書的30多萬字大多選自4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兩家報紙：周恩來在國統區領導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更可貴的是，其中的文章多是兩報的社論，有的直接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我黨領導人物筆下，還有的則出自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吳晗等著名學者的談話和論文，有較高的文獻價值。需要說明的是，《歷史的先聲》還有一個副標題：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正是受這個副標題的影響，我才給自己的這篇書評起了這樣一個名字，算是對該書的一個回應和引申。

40年代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前後面臨著兩個重大的歷史任務：一、抗日救國；二、為中國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和國民黨獨裁統治鬥爭，以爭取民主和自由之權利。《歷史的先聲》一書生動地反映了當年中共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透過這些半個世紀前的文字，



我們不難發現，當年中共迫切要求國民黨給人民以民主，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要求國民黨對人民的人身權利給予切實的保障。應該說，這些言論標誌著中共對民主自由精神的一次集中徹底的闡釋。對於這些文字重新出版的現實意義，編者作出了這樣的概括：“……早在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作出了莊嚴的歷史承諾，並為今後的改革積累了豐厚的精神資源。這些精神資源將是下個世紀中國人民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理論寶庫。”通讀全書，並對照中國現實，我覺得這話一點不假。

不妨先看看其中一些文章的標題：《“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的嗎？》、《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只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中國共產黨只有與黨外各民主黨派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一切壟斷一切的權利”》、《“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一黨專制是反民主的，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制》、《政黨本身不是權力機關，不能凌駕於群眾和政府之上》、《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列舉書中一些文章的標題，是因為我一直有個判斷：對政論和雜文一類的文章，標題就是主題的精煉概括，就是畫龍後的那一筆精彩的點睛，通過標題往往就可以“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比如，20多年前的那篇呼籲思想解放的宏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這樣，甚至若干年後，人們記住的往往是這篇文章的標題。《歷史的先聲》中的一些文章標題本身就是今天還很令人振奮的思想資源。

事實也正是這樣。今天我們圍繞民主自由精神的不少爭論，其實當年就進行過，而且中共已經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只不過，現在的好多情況並沒有超越當年，這些問題不得不再次提出。《歷史的先聲》開篇就是毛澤東於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第一句話就很振奮人心：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多麼意氣風發，多麼直接了當，全沒有當下一些領導對著公眾光打哈哈，顧左右而言它的油滑。也許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倡導下，好多人在談民主和自由的時候都談得很到位，對國民黨的獨裁也批得入木三分。1946年，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新華日報》向社會知名人士公開徵答，主題是怎樣才能使人民獲得自由權利，實現民主政治化。茅盾在應答中寫道：“……20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所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人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漢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

當時，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的民主黨派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還老百姓以真正民主選舉的權利，而國民黨方面稱：中國人民文化水平低，尚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條件。針對國民黨的論調，《新華日報》早在1939年就發表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提出：“不能因國民程度不搞得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的觀點。毛澤東1944年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中更以延安民主政權建設的經驗再次反駁國民黨的論調。他說：“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聯繫到現實，我國的《村民選舉法》才剛剛頒佈幾年？可就是這樣一部法律，在實施的過程中不還是阻力重重嗎？一些人阻止《村民選舉法》順利實施的理由和當年國民黨提出的理由是何等相似：農民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給農民以民主權利。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真的不錯。

當然，中共對國民黨的新聞檢查也是深惡痛絕的，為了爭取言論自由，中國共產黨人在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新聞自由理論。這樣僅舉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一篇文章為證，題為《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在這篇文章中，陸定一除批駁國民黨的專制制度對新聞事業的壓制外，還有理論性的發揮，他說：“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

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害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情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這樣的文字，我看是有著哲學高度的，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誰會說它對今天失去了意義？

不用再舉例，我們就可以對《歷史的先聲》這本書予以如下的概括：所謂歷史的先聲，是中國共產黨在未奪取全國政權前就民主自由精神所進行的先期闡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對全國人民的一次莊嚴承諾。承諾是需要兌現的，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承諾到底兌現了沒有？兌現了多少？相信讀過本書的人自會有自己的判斷，不必我在這裏饒舌。我要說的是，既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筆“豐厚的精神資源”，我們就不應該輕易地丟棄，過去不應該，現在更不應該。尤其是在我黨提出了要大力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更應對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備加珍視。

郭樹榮：何等慘痛的教訓

在書店的新書架上，偶然看到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承諾”而且“莊嚴”，還是“先聲”，單就這幾個不凡的詞，便吸引了我，尤其是封面上那幅著名的有歷史意義的照片，更給了我以時代的滄桑感。

這是一本什麼書呢？

書前的“編者的話”，道出了原委：“本書大多選自 40 年代周恩來在國統區領導的《新華日報》，部分選自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當時發表時多為兩報社論和評論，有些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我黨領袖人物筆下……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50 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國共決戰，是兩種前途，兩種命運之爭：中國是走民主光明之路還是走獨裁的黑暗之路？”

總之，此書內容，可用四個字概括：民主自由。正如此書《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一文開宗明義寫的：“從來的革命運動，都是人民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衆，給不給民衆以民主自由。”這本書的內容豐富，論述精闢，涉及面廣，舉凡與民主自由有關的問題，皆有論述，都能從中找到答案，放射著真理的光輝，因而便有了永恒的價值，值得人們認真讀一讀，好好想一想。因為偉人有言：“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值得注意到了什麼呢？筆者讀後“注意”到了兩點：

一、在中國歷史的緊要關頭的 40 年代，中共領袖們高舉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向中國人民做出了莊嚴的承諾，乃是順乎時代潮流，合乎人心所向之舉，因而獲得了人民的擁護，贏得了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國民黨反動派，也正因為他們的專制獨裁而敗亡。

二、事實已經證明的是，建國後，隨著這些主張和承諾的淡化，便犯起了錯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直至發生了連黨內也沒有民主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給黨和人民都帶來了空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這教訓是何等的慘痛！值得慶倖的是，這些抨擊當時不民主、不自由的文章，都能夠自由地發表。不但當時人們能讀到，也給後人留下了這些光輝奪目的篇章。

——選自《雜文報》

包遵信：步履艱難的中國民主運動——讀《歷史的先聲》

歷史有時真像一個萬花筒，讓人眼花繚亂。特別是當權的執政者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讓人們瞭解歷史真相的時候。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場歷時數年、波瀾疊起的民主運動，據說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給自己評功擺好代替歷史研究的中共當局，近年來對此卻三緘其口，好象壓根兒就沒有這件事似的。例如一本最具“權威”的，1991年7月出版，為紀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沒有提及這件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每個有天良的中國人，都有權瞭解這段歷史，歷史的真相理應公諸於衆。這倒不是為了“揭老底”，更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著認識中國民主運動的艱辛歷程，總結有益的經驗教訓，從而有助於推進當前的中國民主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覺得不久前出版的這本《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以下簡稱《先聲》），值得每個關心中國命運與中國前途的人認真一讀。

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實際是與抗戰同時起步的。還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講了三個問題：（一）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二）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三）我們的領導責任。關於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兩項具體的奮鬥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五六—二五七頁）。通讀這個報告，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毛是把抗日的任務歸結為“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的。毛的這一說法和戰略部署，連中共內部都有人不贊成（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二七二頁），一般人更難理解。

毛澤東這麼說這麼做也有他的理由，正象他所說的：“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對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團講的。《歷史的先聲》開卷第一篇收錄的，就是這個講話的摘錄。當時已到了抗日戰爭的後期，在毛看來，中國的頭等大事不是發展國民經濟，不是穩定後方大局，甚而也不是軍事戰略部署，而是實現民主，惟有實現民主才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前提。“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從毛在抗戰開始前夕，就強調為民主與自由而鬥爭，這時又把民主視為抗戰勝利的前提，可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一直高舉著兩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可以這麼說，把民主的旗幟舉得最高的，口號喊得最起勁，步驟設想得最具體的，就數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了。這本《歷史的先聲》就是最好的說明。它收錄了一九四零到一九四六年《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總共九十餘篇。內容都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諸如民主的目標與原則，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與保障，實現民主的條件與方法……方方面面，都有極其精彩的論述。對於健忘的中國人，如果有機會讀一讀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解放日報》有篇題為《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的社論，以摘引邊區施政綱領的內容，說明了邊區人民享受到“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並向世人宣佈：“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先聲》第二五二頁）那時的邊區人民是否享受到了這些權利，我沒有考察沒有發言權；我們只知道在當今中國大地，當年那些美好語言已隨革命風暴吹得無影無蹤。《先聲》的編者說：“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國共決戰，是兩種前途、兩種命運之爭；中國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還是走獨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中國並沒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歷史不無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中共揭露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種種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還

有了發展。難怪《先聲》編者只能這樣告誡我們：“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爲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來。”可是今天呢？我們如何面對今天？聯繫今天的現實，人們不能不懷疑，當年那些豪言壯語，究竟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抗日乎？民主乎？

當然，說它是“承諾”固然無法自圓其說，但要說它就是“謊言”也未免流於情緒化，重要的是對它進行具體分析。既然毛澤東把實現民主與自由作爲抗日的重要任務提出來，那我們就從抗日與民主的關係說起。

說實在的，毛在抗戰一開始時，就提出民主與自由，把它們的實現作爲抗日的前提與目標，這從策略上講，不能不算是一著險棋，而且還是一個極具機心的謀略，按照通常的慣例，當一個國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時期，總要實行全國總動員，結束黨爭，民主問題則要低調處理，人民甚而還要犧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以利政府集中權力，提高決策效率。適應抵抗侵略的戰爭需要。就在這樣的時刻，毛卻把民主與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作抗日時期的主要任務，真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覺得這樣做太不合時宜。其實他這麼說這麼做，是極其高明的，不愧爲天才的謀略家。

毛這麼提出問題是於典有據的，那就是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一次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爲國內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一論斷就被公認爲無比正確。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像我們這些人，中學時對它就耳熟能詳，毛在抗戰初期斷定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蘇德交戰後有改變），是順理成章的。這時分析形勢也只能搬用這個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講什麼變抗日戰爭爲國內革命，那將是什麼樣情景？不難想象他一定會成爲全國聲討的頭號敵人。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個公式中的“革命”轉換成“民主與自由”，並把它與抗日連在一起，這樣他就成了堅持抗日，高舉民主大旗的英雄了。這時要講“革命”，可能嚇跑了許多人，也給蔣介石的鎮壓製造了口實；可是講民主，講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樣了。儘管有人覺得不合時宜，也無法正面去反對；即便蔣介石國民黨也不敢公然說它們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撥一撥的民主攻勢面前，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至於一般民衆，苦於被壓迫被束縛的處境，民主自由對他們就意味一種得救，一種解放。儘管他們對民主自由並不一定有深切的瞭解，卻不妨礙對鼓吹民主自由的共產黨感恩戴德。就連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也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共產黨的盟軍。這樣在中共周圍就會聚攏一批又一批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群眾，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廣泛統一戰線。因此，毛在抗日時期扛起民主的大旗，與其說是爲著抗日，還不如說是爲擴大中共影響，壯大中共力量，取得對國民黨鬥爭最有利地位。

本來，爭取群眾，壯大自己，這是政黨鬥爭中常見現象，別人沒有理由對它說三道四。問題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已是同一戰壕的友軍，蔣介石又是中共承認的統帥，在那樣一個大敵當前時刻，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現在卻用這種辦法對付盟友，豈不是在挖自家人的牆角？所以我說它是包藏機心的謀略，不能說是沒有根據。

問題還不止這些。如果中共真的爲了實現民主與自由，那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還會爲自己能夠實現領受到民主與自由而感到慶倖，豈料事實卻讓人感到被欺騙被愚弄了。我們也用不著一味抱怨，因爲真相雖然是以後才暴露的，問題卻早在當初就已潛伏在倡導者的宣傳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對民主的熱誠，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簡直就是一位“民主發燒友”，逮著機會就要說一遍。他把民主問題從黨內講到黨外，特別是對那些延安不多見的中外記者，講得更起勁。“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先聲》第三、五頁）既然對民主需要這麼廣泛，那麼抗日呢？如何處理抗日與民主的關係，這可同樣是一個極爲敏感的話題啊！對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對外講的那麼堂皇，那麼穩重，那麼嚴密，而是簡單利索。讓我們看一看毛與彭德懷之間的一場爭論。一九四三年四月，彭德懷作了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毛在讀了彭的談話記錄以後，大爲惱火，給彭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複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等規定，亦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二六頁）。

這是一篇難得的文獻。它讓我們較為準確地瞭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的是民主。為什麼要民主？民主的價值何在？按照毛的說法，是因為民主可以幫助抗日，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它能滿足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當時抗日是個大題目，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強調不要脫離抗日來談民主確有充分的理由，但這只能是就民主實施的範圍與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實施，哪些應當暫時緩行，絕不能夠把民主的作用與價值歸結為僅僅是能適應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連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說成與抗日不相容，這樣的民主豈不墮落成爲權謀家手中的工具？成了黨派鬥爭的一種玩物！試想連反封建都不准提，還會有民主嗎？爲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將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這樣的抗日又能成爲民族解放的鬥爭嗎？

說到抗日戰爭，作爲一個未能身臨其境的當代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慚愧，因爲對它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較為客觀、公正的讀物，來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長期以來，官方的教科書總是說，那時的國民黨只是“消極抗戰”，甚而是“假抗戰”。什麼“台兒莊會戰”、“昆崙關大捷”、“衡陽保衛戰”統統消失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多位抗日將領都白白犧牲了。我們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奮戰的歷史畫卷，竟被一幫禦用史家塗毀得面目全非，這是對我們民族公然的貶損，是對那些抗日英烈肆意褻瀆。讀到這樣的歷史書，能不感到無限的憤慨！

當然，我們同樣不能說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當年國民黨指責中共“遊而不擊”。只是由於抗戰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要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蔣介石是全國的統帥，邊區政府改爲特區政府，工農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同時又要堅持對邊區絕對控制，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階級路線，這就難免產生許多摩擦，使自己處在不顧大局的地位，無法做到“與中央保持一致”。這樣的摩擦與內鬥，用民主的旗幟也是掩蓋不了的。不過，中共喊得最響的還是抗日，民族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讓我先說件事實罷。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與日本簽定了《蘇日中立條約》，竟然有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就等於公開支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暴露了史達林一夥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當然遭到中國人的強烈抗議。可是一向以發動群眾、支援群眾標榜的中共對此卻緘口不言，反倒說那些對蘇聯抗議的中國人“是在狹隘的民族情緒之下的”“衝動表現”（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三三三頁）。民族主義大旗這時沒了旗幟，只剩下一根旗杆，用來橫掃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見在民族利益與黨派利益之間，也絕不像中共講的那樣完全一致，以至在堅持抗戰的同時，往往要把自己黨派的發展與壯大放在了實際的抗戰之上。所謂“一分抗戰，兩分敷衍，七分擴張”，這個還沒有完全得到證實的中共策略，也能多少說明問題。不然就無法解釋，到抗戰結束時，中共黨員由抗戰開始的兩萬多人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軍隊也由三萬擴大到一百二十多萬，還有二百多萬的民兵。

我無意沈陷於這筆一時無法扯清的爛帳，更不想評判國共兩黨之間的是非。我只是想說明，即使在抗日戰爭民族情緒高漲時期，把民主納入民族主義的軌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甚至連民主理念的正確闡述也會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是群體本位，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雖然在實際運行中，它們並不總是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適當的歷史機緣也可以使它們相互促進，民族主義可以成爲推進民主的先導。例如美國歷史上的獨立戰爭已是公認的事實，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這樣的作用。但這樣的機緣並不常見，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們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篤信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的共產

黨人那裏，指望他們用民族主義來推進民主，豈非緣木求魚？實實在在的則是，民族主義是他們通向集權的一種手段，一種護符，五十年前的事實與五十年後的教訓，說明的就正是這麼回事。

聯合政府真的能取代“一黨專制”？

五十年後的教訓是什麼？是中國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卻並沒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依然是中國人難於擺脫的枷鎖。

國民黨從它一九二七年掌握了政權以後，推行所謂“訓政”，實際就是“以黨治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到了抗戰時期，這種“一黨專制”進而發展成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成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專制。所以，四十年代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響亮、最動人、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就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它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爲之奮鬥。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適爲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明確提出反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一黨專制”。只有到了這時，由於中共的領導與號召，才使這個反對“一黨專制”的鬥爭，成為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和當時那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不同，還在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要用“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去代替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這個“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後來逐漸系統化，成為體現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它一直貫穿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民主運動中，是中共主要奮鬥目標。

比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聯合政府”的主張確實相當迷人，它在當時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構成一種挑戰，曾被不少人用來作為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思想武器，甚而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加入到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的行列，“民盟”就是典型。毛澤東說：“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三零六頁）那麼，這個“聯合政府”的主張，或者準確地說毛所主張的“聯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種與“一黨專政”相對立的“民主政體”呢？

“聯合政府”既然是各黨派各階級的聯合，那它們各占比例是多少？這個比例是按什麼標準確定的？它們彼此又是什麼樣的關係？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執政黨執政階級，還是有主有從，有執政黨與參政黨之分？如果不深究這些問題，只是從字面上講，那當時作為戰時體制的國民參政會就與它非常相似。它既有國民黨，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非執政黨，它對政府不但有建議權、詢問權、調查權，還有決議權：“政府對內外之重要施政方針于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可見這個國民參政會比時下的政協還要強一些，那時的民主黨派還不完全是只花瓶，難怪有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戰時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項重要措施。

長期以來我們有種誤解，總是以“多數”還是“少數”來區分是否民主，以爲多數就一定民主，反之則不能算。既然國民黨搞的是“一黨專政”，毛現在要搞一個多黨參加的“聯合政府”，那當然就是“民主政體”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是不是民主政體，關鍵不在是多黨執政還是一黨執政，而是執政黨的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如果是經過議會競選，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投票支援，才最終取得執政地位。這就是現代通行的政黨政治。可是，毛所設想的“聯合政府”不是根據這樣的民主原則，而是新民主主義原則，根據這個新民主主義原則，“聯合政府”有兩條是規定好了，動搖不得的：（一）它必須是由中共領導的；（二）它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必須”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這是什麼意思？一個號稱“民主政體”的政府，究竟由哪個政黨來領導，不是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卻由一個參選黨領袖事先規定了，這倒很有中國特色。當然，毛澤東也講過要搞選舉，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個選舉未必是走過場，但從毛的一貫思想來推斷，中共“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是無須通過選民的歷史選擇來決定，而是要由武力來爭得的，所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當然，經過選民選舉出來的政府，只能說它產生的程式符合民主，並不保證它在實際施政的運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這個政府沒有制約，沒有監督，同樣會滑向專制走向獨裁。所以，當年孫中山設計施政的步驟，是“軍政”、“訓政”與“憲政”，是有相當的道理的。只有憲政才可以消解專制獨裁的頑症。三十年代初期胡適等人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也是主張推行“憲政”。可是毛

卻只對“聯合政府”情有獨鍾。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通過《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形成抗日時期第一次憲政運動高潮，延安也成立了憲政促進會。毛在它的成立會上講了話，把“憲政”與“聯合政府”捆到了一起，說：“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

（《先聲》第二七五頁）說憲政就是民主政治，雖然不精確但還沒有太離譜；說憲政是幾個階級聯合對反動派專政，那就不著邊際，擰著神兒了。幸虧他在這個憲政前加了限定，說是“新民主主義憲政”，不過新民主主義與憲政也沾不上邊呀，倒不如叫“新民主主義專政”非常貼題。毛指斥別人講憲政是“挂羊頭賣狗肉”的“假憲政”，但何謂真憲政呢？毛講的一套也不是呀，他連憲政最基本的內容都沒有提，（一）尊重和保護公民個人的權利；（二）規定和限制政府的職能和行施權利的範圍；（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決公民與公民、政府與政府之間糾紛，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憲政這一基本精神，六、七年前“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胡適等人就講過。毛跟本就不理睬這一大套，他把憲政裝到“聯合政府”的模子裏，天馬行空說了一通，要點還在強調它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明確了這一點，才能肯定共產黨的領導。“聯合政府”不論有多少黨派參加，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能動搖，誰也代替不了的。難怪有個國民參政會，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卻總是覺得不過癮，因為那雖名為“參政”，實際只是屈居末座，離他設想的“聯合政府”差得遠呢。既然共產黨已經在“聯合政府”中居於領導地位，照理應該心滿意足了。不，單有這一點還不夠，這只是組織上保證了黨的領導。如果哪個“兄弟黨”小夥計不懂事，不知趣，鬧起獨立性來怎麼辦？所以還要保證實際執政運作中黨的領導，這就必須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本來是共產黨自身的組織原則，毛把它搬到政府中來，用心可謂良苦。有了這個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聯合政府”中那些小夥計鬧脾氣，他們再怎麼折騰，也跳不出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聯合政府”中的各黨派政見上的歧異，經過討論最後表決，當然要少數服從多數。但它還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就保證了共產黨的最後決定權。共產黨從來沒有保護少數，更不允許存在反對派。民主形式經過運作中這麼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集權，最終“聯合政府”和它所反對的“一黨專政”就殊途同歸了。如果說“聯合政府”因為有各黨派各階級的參加，形式上還有一層民主色彩，那麼一旦把這層色彩抹去了，同樣是赤裸裸的“一黨專政”。毛澤東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論聯合政府》）說得相當動聽，可是實際呢？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在所謂“聯合政府”中，“聯合”只是它的形式，集權專制才是它實在的內容。這就是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兩位同樣搞專制獨裁的人物，毛的政治權術要比蔣棋高一著的地方。

新民主主義“新”在哪里？

我對“聯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據相關文獻和日後的經驗事實，當時人沒有這個條件，不一定能認清“聯合政府”與“一黨專政”之間這一瓜葛。不過，當時人們並非沒有擔心與疑問，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會不會和國民黨一樣，搞“一黨專政”？上引毛澤東的講話，就說明了人們普遍有這樣的擔心，不然用不著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在政治報告中，鄭重其事作這樣的說明。不過他只說暫時（所謂新民主主義時期）不搞，將來還是要搞的，所以毛的這個說明。也可以理解為對人們擔心的一種確認。

其實，還在毛作《論聯合政府》報告之前，劉少奇就針對人們這一疑慮，明白無誤地昭告世人：

“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先聲》第二九二頁）

然而，事實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說服力。今天我們回顧歷史，說明那時人們的擔心絕非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當然，我也不懷疑，劉少奇講的不是他真實思想，劉似乎沒有毛那種



老謀深算。我甚而相信，許多老一輩共產黨人，他們確確實實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同時也不贊成共產黨搞“一黨專政”。但是，歷史的詭譎在於，你以為自己邁出的一步，跨進的是民主的門檻，結果卻偏偏邁入了專制的黑門。原來起步時方位就錯了，這就是至今還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一九四零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說法，中國抗日時期的民主運動，是屬於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沒有完成，所以還只能是民主革命。這個民主既不是過了時的英美式的舊民主，也不是蘇式社會主義民主，那是中國未來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論》·參見《先聲》第二八四——二八六頁）。

中國的事就是怪。從來未曾實行過民主，甚而不知民主為何物，現在卻突然被告知，那已是過了時的舊式民主，絕對要不得；民主運動唯一正確的方向是爭取新民主。這個“新民主”與舊民主有什麼區別呢？（一）舊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這是它的虛偽性；（二）舊民主制度下，廣大民衆享受不到民主，這是它的狹隘性；（三）最重要的還是新民主與舊民主不同的階級性質，一個是無產階級民主，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既然如此，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實現之時，應該普遍推行真民主。在這個“新民主”的光輪之下，不但無產階級能夠領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領導下的廣大民衆同樣也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可惜我的這番演繹純是書生之見。實際情況則是，新民主主義並沒有包容舊民主主義而有所擴展與深化，它完全擯棄了舊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所以，一旦新民主主義確立了，那現代社會的議會制度，司法獨立，政黨政治，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這些民主的基本制度，統統被當成資產階級破爛；至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人普遍的價值原則，更被標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它們的存在之地。

根據毛的論述，所謂新民主主義，實際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它還要邁向蘇式社會主義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這不就等於明白地告訴人們，新民主主義是通向蘇式無產階級專政之路嗎？蘇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黨專政”的模式。這已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事實，用不著再為之饒舌，毛對此也直言不諱。只是對時間的預計，要比毛設想的短得多，新民主主義實現之日，就是“一黨專政”實行之時。所以指望從新民主主義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門。豈不是南轅北轍？

我們不贊成毛的結論，但不能不歎服他作為政治領袖的雄辯天才，他能從歷史與理論的高度，從世界宏觀形勢的發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由來與發展，講得頭頭是道。不但讓許多共產黨人心悅誠服，就連那些學貫中西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不曾有什麼異議，是沒有見到還是有意沈默？只有原來是中共黨員，後來脫黨成了託派的葉青，寫了一篇商榷批評的文章：《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載《抗戰與文化》）。我為知識界這種冷漠與麻木感到悲哀。但是，卻有一位當時身居窮鄉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從認識蘇聯現實入手，就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講了一通和毛的觀點完全相反的意見。這位老人就是中共創始人陳獨秀。

就在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一九四零年，陳獨秀和託派圍繞著如何認識蘇聯史達林模式和二次大戰展開了一場爭論。託派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提出“保衛蘇聯”，反對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陳獨秀認為，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更為廣泛的民主，可是從蘇聯的實際看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史達林統治的格柏烏制度（即 KGB 克格勃），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陳獨秀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在實施的範圍上有廣狹不同，並非在實質內容上另有一套什麼無產階級民主。“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就是從十三世紀文藝復興以來，廣大民衆以鮮血鬥爭七百年，才得到今天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標誌。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前語而已。”這就是把民主強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並把兩者對立起來的實踐後果。陳獨秀還批駁了託派“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個人心術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



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確立，即便史大林沒有了，換了誰也逃脫不了變成‘專制魔王’”！（以上引文見《陳獨秀書信集》第四八九——五零七頁）。

陳獨秀曾是現代中國的啓蒙大師。“五·四”高揚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認為它已過時，只有社會主義有真正的民主。這是一九二零年的事。經過了二十年的曲折歷程，特別是蘇聯肅反的慘痛事實的教訓，到了一九四零年，也就是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年，陳獨秀卻扯去了蒙在民主旗幟上的社會主義花布，讓它以自身的鮮豔色彩飄揚在中國上空。難怪胡適在讀到了這些文字以後，感到非常欣喜，說陳獨秀又回到了啓蒙的位置了。

##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論自由

講到陳獨秀，我就想到他在“五四”時期講的一句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這是對什麼是言論自由一種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解釋。根據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就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定是最黑暗最殘暴的專制政權。反對專制集權總是要從爭取言論自由開始，保障言論自由是實現民主所應當最先跨出的一步。

爭取言論自由，是反對專制統治的重要內容，貫穿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當然也不會例外。《先聲》一書收錄了不少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文章。它們批判國民黨統治愚民政策，申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與可行，指出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覺悟了的公民，應以堅毅不舍的精神去爭取言論自由，爭取言論自由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重要的還在於行動。特別是那些新聞從業人員，他們的職業道德要求他們要發揚威武不屈、秉筆直書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覺為自由民主事業獻身。許多妙語警言，今天讀來都會令人怦然心動。真難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烽火壓境的重慶，思想文化界還有這樣富於生機、能不時閃現出思想異彩的文字，怎能不讓我們這些後輩心儀神往？

四十年代民主運動把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作為重要內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實際的運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與前提，從此入手最容易推進民主運動的擴展與深入。（二）現代民主運動的主力是知識精英，以文議政、以言報國又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以言論自由推進民主運動，便於那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參與。或者毋寧說，正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成了當時爭取言論自由的主體。（三）當時國民黨的統治，雖然政治上獨裁專制，但在思想文化上卻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間。因此，爭取言論自由在當時是擴展既有言論空間，完全是合法鬥爭，容易取得實際效果。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主要陣地是報紙，主要地區則是在重慶。那時，重慶是國民黨的老巢。過去我們只是從教科書上知道，那是一座黑暗的魔窟，特務橫行，憲警遍地。白公館、渣滓洞，幾乎成了刻印在我們腦海中的重慶象徵。當我讀了《先聲》以後，感到非常驚訝，抗戰時期這兒還能有這麼多民主自由的呼聲。這固然說明了它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樣說明它還有相對的自由，不象我們身處其境統得那麼嚴密，那麼專橫。事實也正是這樣，當時的重慶就有不少民辦的報紙、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辦的報刊，《新華日報》就是代表中共的機關報（先是南方局，後屬四川省委），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特別是象《大公報》這份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的報紙，從新記公司算起，到它“新生”以後，前後二十四年，正好與國民黨統治大陸相終始。它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報方針，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充分體現了“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特色。反對思想統制，崇信言論自由，則是《大公報》堅持一貫的。所以，言論自由與其說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一部分，還不如說是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很久以來堅守的使命。

現代媒體為資訊傳遞提供了越來越方便的條件，可是如果沒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法律保障，那媒體的作用就會走向它的反面，變成謊言與詭辯的製造機與擴散器。現代的獨裁者是深知媒體這一特點的，希特勒當年就曾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解放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引述了希特勒這句話，目的是揭露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政策，指出國民黨“統治輿論，壟斷輿論，使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先聲》第一七三頁），的確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也具有普遍的意義，適用於一切獨裁統治者。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思想那麼清醒，如今卻這麼害怕言論自由，

仇視言論自由。爲了控制輿論，統治思想，政策出臺了一台又一台，方法想了一個又一個。這些政策與方法，沒有哪一個不是違憲的，是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什麼“堅持主旋律”，“正確輿論導向”，“與中央高度保持一致”……這些讓人聽了都會笑掉大牙的陳腐觀念、笨拙方法，竟然還堂而皇之出現在我們的電視中，廣播中，報紙上，書刊上，讓人覺得這些都是星外之聲。

其實，我們也用不著這麼大驚小怪，今天中共採取的這些方針、政策，從基本原則上說，是早就確定了的，只怪我們自己太沒記性。還在一九二八年，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就提出，任何報紙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參見劉家林《中國新聞通史》下冊），後來向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這一“工具論”，卻一直是中共新聞事業恪守不渝的信條。重慶時期他們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談得這麼起勁，不是他們背棄了既定的信條，而是因爲地位不同，這時怎麼談，炮口都是沖著國民黨的；即使在延安談，也是打的隔山炮，這也就不難理解，這本《先聲》收錄了九十一篇文獻，《解放日報》的只有十四篇。難道是延安有了充分的言論自由？非也。這裏沒有一份民辦報紙，只有黨報，黨報上是沒有言論自由馳騁天地的。紙上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還是有的，只是千萬不要將它們付諸行動，如果不明事理，衝破了禁忌，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當年延安整風，那些從北京、上海來到延安的知識人不知深淺，辦壁報，寫雜文，一時紅紅火火。不曾想到許多人竟因此獲罪，遭批判、受審查，王實味最後把性命都搭進去了。難怪儲安平當年就這樣說過：“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可謂洞若觀火，一針見血。

## 內戰既起，民主泡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的勝利，爲中國民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結束內戰，和平建國，這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國共兩黨也難於公開違拗。國際上蘇美英等盟國，也都要求中國能和平統一，不再內戰。但是，最終內戰還是打起來了，內戰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湯。

究竟是誰挑起內戰的？國共兩方面各有說詞，它對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並不重要。從當前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意義考慮，就中共的政策方針談點看法還是必要的。這是因爲：（一）當年那場民主運動，儘管有各方面人士參加了，特別是自由知識份子，可以說是運動實際主力，但是中共卻處於運動的領導地位，它的策略方針影響著整個運動的走向與成敗；（二）更重要的是中共目前獨領政權，對中國的民主化有著難於推卸的責任。甚而可以說，中國民主化的遲與早、成與敗，是與中共現行的方針政策連在一起的。

回顧抗戰以後的歷史，如果中共放棄武裝革命，把與國民黨的鬥爭從戰場轉移到會場，走議會鬥爭的道路，那今天將會怎樣？別的我不敢說，至少後來不會有反右，不會有文革浩劫，不會到了世紀末還是一黨獨大的集權專制，民主對中國人來說，還只是理想中的美景。當然，歷史並沒有像我假設的那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假設沒有根據，抗戰勝利後中共放棄武裝鬥爭，走議會鬥爭的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全國人民，無論是淪陷區，還是大後方的普通民衆，都要求和平，反對內戰。這從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中就能看出。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還沒有宣佈投降，毛曾向黨內作了一次題爲《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未雨綢繆，先聲奪人，大講了一通蔣介石要發動內戰，我們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之間，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還有許多人怕打內戰。怕，是有理由的，因爲過去打了十年，抗戰又打了八年，再打，怎麼得了。”由這個講話，可以看出，毛對當時的民聲輿情還是瞭解的，只是他沒有採納順應而已。

二・自由知識份子中不少人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當時還在美國的胡適，考慮再三，給毛髮了一封電報，希望“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爲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另一位自由知識份子儲安平在他主編的《客觀》雜誌上，更是就這一問題反復陳述。“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究竟是走的憲政的的路線或是革命的路線？易言之，經由軍事的途徑抑或經由政治的途徑？”儲安平說了自

己的想法，也是對中共的希望：“共產黨應當努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民主，主張軍隊國家化，由種種合法的秩序來限制軍隊為國民黨所利用，提高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才是根本的做法。”（《儲安平文集》下冊第二三頁）

三・最不應當忽視的，是蘇共與史達林明確向毛澤東提出：中共應放棄武裝鬥爭，走議會鬥爭的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史達林給毛髮來一封電報，要毛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到重慶去談判，說中國如果發生內戰，將是民族的災難。中共雖然不能說是由蘇共支配的，但蘇共對中共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中共的決策一旦獲得了蘇共的支援，就有很大的權威性。

四・中共內部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統一的傾向，總是被時下的黨史給忽略了或掩蓋了。實際上，儘管毛在黨內的權威地位，使他的意見總是處於支配地位，但不同意見依然存在，只要毛的控制稍有鬆動，就會有充分的表露。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就是典型的事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因勞累過度住進了醫院，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這個時期內，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談判雙方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以毛的名義發表了向全國全軍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遊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均須切實嚴格遵行”。到了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鄭重宣佈：“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命令”。可以設想，這個協定要是能夠執行，中共的部署要是實現，那將會是什麼情形？可是因為毛的反對，這個“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最終沒有到來，但它卻說明在中共內部主張和平，反對內戰的傾向不但存在，而且還有相當的力量。

五・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早就搖動了和平統一的風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和二十日，蔣介石兩次給毛澤東發出電報，邀請他到重慶共商國是：“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是亟待解決的，希望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計”。這就是有名的重慶談判的契機。關於重慶談判，時下的中共黨史往往說成是蔣的“騙局”，相反，“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這一行動，有力地向外宣告：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謀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一場決定歷史命運的談判竟成了鴻門宴，毛澤東也成了單刀赴會的孤膽英雄，歷史如此編造，還有什麼真實可言！事實則是毛在收到這兩封電報以後，根本就不打算去重慶。他一面回電報敷衍，一面抓緊調兵遣將，以利擴大地盤，壯大實力。還在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毛就以朱總司令的名義，先後向“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佈了七道命令，要他們向其附近日、偽軍送出通牒，限這些日、偽軍投降繳械，宣佈日、偽軍佔領的城鎮要塞，由八路軍、新四軍實行軍事管制。這些急如星火的命令，是在盟國還沒有拿出投降辦法，也沒有向當時的國民政府（這可是中共承認的合法中央政府啊！）請示，因此在程式上是不合法的，它的意圖與效果也是明擺著的。

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收到蔣的第三封電報的那天，他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九個團，連同原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的兵力，限期開赴東北；同時一日數電華中局，要他們火速發動寧、滬、津、唐等城市的起義，以配合八路軍佔領這些城市（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澤東口口聲聲說要防止蔣介石挑起內戰，我們看到的卻是他正在緊密佈置從南到北的軍事行動。可以設想，一旦這些部署付諸實際，那將是什麼局面？只能是內戰！

謝天謝地，這樣的局面終於沒有出現。就在這時史達林的電報來了，明確要他到重慶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毛接到這份電報，儘管非常反感，十二萬分不情願，但史達林的話就是“聖旨”，不敢不聽。正好蔣介石又來了第三封電報，再次盛情相約，並告之已經備好飛機，去延安迎接。經過這樣三請四邀，毛終於在八月二十八日到了重慶。國共兩方面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最後簽定了《雙十協定》。《協定》明確宣佈，雙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到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有關於“解放區民主政權”和“人民軍隊”兩個問題，沒能達成最終協定，有待繼續談判（參見《重慶談判紀實》）。

《雙十協定》的簽字，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各方面代表、許多團體都紛紛發表聲明，歡呼《協定》，期盼和平統一的局面即將來臨。可惜這幅宏偉壯麗的民主畫圖，最終還是被撕碎了，留給歷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我們只能說《協定》未能兌現，國共雙方都有責任，但國民黨要承擔主要的責任。因為它處在執政的地位，對推進中國民主運動，擁有相對優越的資源，可是它卻未能承擔這份歷史責任。它沒有容納異己的雅量，更沒有善待異己的正確策略；它總是用擠壓異己的生存空間，迷信武力鎮壓，特務暗算，輿論統治這套法西斯手段。結果民主運動固然被打殺了，他們自己也被從大陸上趕跑了。這倒真正應了毛澤東那句名言：凡是鎮壓人民的絕沒有好下場！

那麼毛澤東本人呢？他太迷戀暴力，太鍾情於鬥爭，而且是武裝鬥爭，所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成了他無法逃脫的宿命。不然的話，在抗戰勝利以後，他能審時度勢，領導中共走議會鬥爭的路，那今天中國政治將是什麼樣的局面？當然，歷史沒有假設，歷史也沒有輪回，但歷史可以重演。今天我們後悔中共沒有走上議會鬥爭的路，已無實際的意義。毛澤東逝世已經二十多年，對他崇尚暴力、傾心鬥爭的“革命”癖性，毛後的中共領導人，乃至我們整個民族，是否應有切實的反省？我以為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 中國民主化的厄運：拒斥主流文明

中國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對世界文明一直採取拒斥的方針。所謂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說就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原則和制度規範。

我這樣概括世界主流文明，並非“自由化”的爛言。早在半個世紀多以前，中共就是這麼說的。《先聲》一書中，有關論述英美自由與民主的文字，就有十三篇之多。讀一讀它們，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華日報》在一篇題為《論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論中說：“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人類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社論最後說：“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先聲》第一二三頁）。這不是明白無誤地說：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國一定要彙入這一潮流嗎？

和以後的仇美辱美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和《新華日報》對美國和美國的民主讚頌備至。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和羅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戰士”的桂冠，哈密爾頓、霍布金、潘恩……這些傑出思想家貢獻於人類的，是“真實的民主精神”，他們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戰士”（《先聲》第一零九——一一零頁）。一點也沒有錯，這些人確是“民主戰士”，他們為人類也確實貢獻了“民主精神”。只是對他們的這些誇讚出現在中共的文獻中，總讓人感到是個異數。這可不是《新華日報》的自作聰明，他們秉承的是毛澤東的旨意。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和英美的參戰，毛就開始對英美“帝國主義”的論斷有了變化，甚而斷言“資本主義時代過去了”。這種變化到了一九四四年飆升到了頂點。這年七月，美軍觀察組到了延安。毛曾發表文章，說這“是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稱羅斯福總統是“英明的領導者”，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最親密的朋友”（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還對這些美國“戰友們”說，中國人“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希望“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先聲》第一零一 棗 一零七頁）。

美國民主不單是對美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有普遍的意義。在《新華日報》一篇慶祝美國國慶的社論中，作者指出：“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的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以羅斯福、華萊士（時任美國副總統）“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與歷史上美國民主不同的是，“如果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是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

的鬥爭不可須臾分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參見《先聲》第一三零頁）這就是不啻是說，美國有義務也有責任領導世界潮流，奔向民主的目標嗎？

最耐人尋味的，還是毛對《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講的一席話。他說：“中共‘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奇怪，既然不要達到共產主義，又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何必要叫共產黨呢？難怪福爾曼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毛的回答則是，共產黨這個名字只是沿襲過去，“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先聲》第二八五——二八六頁）。

我們千萬不用擔心，毛澤東會背棄共產主義信念，投入民主主義的懷抱。有人把毛這段時間與美的熱乎稱之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結束的時候。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在“七大”所作“結論”中就強調蘇聯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領袖”，美國已出現了危機，“美國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三八三頁）。並且斷言美國要把中國變成它的“半殖民地”。毛在這時說的還半遮半掩，留有餘地。再過一年則完全決絕了，那就是他提出有名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美國已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不可救藥的反動派了。這時中共與美國（當然還有英國）就已經壁壘森嚴，劃然兩分了。

毛與美國交惡的具體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的，責任也未必完全在毛。從毛的信念與中共歷史看，選擇倒向蘇聯是自然又是必然的，他也有權這麼做。重要的是他不該將黨派的利益與世界主流文明對立起來，用自己黨派的原則截斷中國人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以後由於美國政府做了錯誤的選擇，才把毛與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場。這意思很清楚，中國的閉關鎖國，中國與世界主流文明的隔絕，責任統統在美國。作這樣的論斷，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毛曾向世界宣佈“一邊倒”，並且武斷地說什麼“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這種遇事就把責任推給別人，自己總是“常有理”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共產黨的蠻橫作風。就算事實果真如此，是美國封鎖了中國，那也只能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封鎖，政治上封鎖，自由民主的精神，主流文明的價值，是它封鎖不了的呀！何況按照當權者的說法，這些恰恰是帝國主義向我們“滲透”，“腐蝕”我們的精神原子彈。能夠封鎖這些世界主流文明的，只能是我們自己，是我們那些當權集團的既定政策。直到今天對外開放，國門雖已大開，它們依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依然沒有改變被封殺的地位。目前中國的當權集團，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在強調要和國際接軌，趕上先進，加入世界一體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卻疏離主流文明，對抗主流文明，甚而挑戰主流文明，這不是太不協調了嗎？

今年正好是“五四”啓蒙運動八十周年。“五四”兩面大旗，一面是民主，一面是科學，終究未能在中國飄揚起來。中國現在是獨立國家，經濟與科技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五四”時期相比，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呢？還是毛澤東五十多年前那個論斷：“中國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讓我們感到無法理解的是，時間過去已經八十年了，中國政治民主化還沒有起色，現在的僵化政治制度還被宣佈要它永葆青春。這不是從“五四”倒退到洋務運動時代嗎？“人惟求新，器惟求舊”，這是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這種保守哲學、倒退哲學不破除，長此以往，中國將以什麼樣的姿態矗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歷史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有種說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我一直鬧不清楚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是自信？自大？還是自狂？不論它屬於哪一種，都讓我感到不寒而慄。這使我想起到看到過的一份材料。美國《新聞周刊》一九九七年作過一次民意調查：二十一世紀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何方？回答的結果是：國際恐怖主義（32%），國際犯罪和販毒組織（26%），種族仇恨（15%），第四位就是中國，位居民族國家之首（13%），其次是俄羅斯（4%）和朝鮮（1%）。

（參見《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七年第五期）。我希望這個統計數位反映的是美國人的偏見或無知，不過希望終究代替不了歷史的趨勢。如果中國還是要堅守現在的集權專制的政治體制，那確是未來世界可怕的事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完稿

二〇〇〇年一月六日修改完畢  
北京 雪夜

——原載《北京之春》總第 82 期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

爲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爲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爲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爲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復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解放日報》1944 年 6 月 13 日

中國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會廣泛地組織起來。我所代表的工會聯盟，是在今天由各邊區工會聯盟產生，有著近百萬的會員。在工會大會上，廣大的工人群眾，第一次選舉自己的官吏，並且學習了如何在自己的社會中活動。

因此這些解放區就成爲一條新道路的例證，說明一個新的民主的中國，是能夠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今天並不要求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甚至也不要求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

中國人民僅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種權利。

這就是說，中共要結束中國的封建時代，以及寄生在這種基礎上的獨裁、官僚政治。

由於這種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國的廣大人民說話。但是卻遭到反動派猛烈的反對，正象克倫威爾、華盛頓、羅斯福所遭受的那樣。

今天，中國共產黨要求停止進攻民主解放區的內戰，停止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同時要求一個民選的國民大會來解決中國未來的機構。它熱切期望這一中國臨時政府，將是一個各黨各派組成的政府，並包括共產黨在內，以便毫不猶疑、毫不遲延地實施這些步驟。

.....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日

注：本文為鄧發在英共大會上一段演說詞

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衆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衆的參加抗戰動員，民衆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衆。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中國正開始向著民主政治的道路前進，這是抗戰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雖還不大，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進步。今後的努力方針在於：第一，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把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和各省正籌備中的參議會，逐漸變為真正代表人民的機關；第二，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提高民衆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實現民主政治，加強民衆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重要任務。

——摘自《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

• H • 福爾曼 •

福爾曼先生認為這些共產黨員是優秀的中國人。……這些共產黨員並不在“實行共產主義”。他們並不實行集體化。他們倒是在鼓勵私人企業、合作主義以及國營事業。他們實行著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認非共產黨和別的政治集團，並限止每一機構中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們的最基本的目標是農業改良、教育衛生和工業的進步，這些和俄國的共產主義實在沒有相同之處。

.....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吳中民先生：

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不是一句空話，是敵後解放區的事實證明了的。軍隊能否打仗，頂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幫助。在敵後解放區有一句流行的話：“軍隊是魚，老百姓是水。”魚離了水，是寸步難行的，更不用說和敵人作戰了。要老百姓和軍隊合作，當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實行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而且，我們還得當心，有人會用好東西去做壞事情的呵！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 答讀者問

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

羅斯福總統在這一次再度當選後，發表聲明說：“我們已在戰爭中舉行大選，這是八十年來的第一次。”他這樣說，是因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國有過一次在戰爭中舉行大選的先例。

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繼續了三年多。正在戰事十分緊張的時候，舉行了總統的改選。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選的結果是林肯大總統再度當選。林肯在那時是美國人民的民主力量團結的中心，他所領導的戰爭是為保衛民主制度的一個戰爭，所以在戰時的大選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擁戴。

這相距八十年的前後兩次大選交相輝映，其意義，正如羅斯福總統所說的，“是向舉世證明民主主義是生命的活力”，而這種偉大的活力是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的。

在八十年前，美國的民主主義正在風雨飄搖之中，林肯大總統在那時未嘗不可以用戰爭的名義，憑藉他政治上的既成勢力來拒絕或者拖延改選。但他不這樣做。他知道他不該這樣做，因為戰爭和國家是否還需要他領導應該由人民公意來決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這樣做，因為他對於民主和進步的事業的忠誠和貢獻，已經為大多數人民所公認了。由不拒絕改選這一件事上，也就證明了林肯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對民主主義的忠誠了。試設想一下，假如那時林肯竟拒絕改選，其結果會如何呢？那麼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縱然還想戀棧不去，但人民是一定會遠遠地背離開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輝地照耀著美國民主政治的歷史。在八十年後的這又一次戰時大選中，不僅總統要重新選舉，又不僅參眾議院中都有許多議席要改選，而且在四十八個州中間有三十二個州的州長要改選。像這樣的大事大更動發生在戰時，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為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為基礎的，所以整個改選過程是非常順利迅速地進行著。四五千萬人同時靜靜地寫下了他們的選舉票，決定把整個國事交給為他們所信賴的人。

由這樣的改選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不僅沒有擾亂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活，妨礙反法西斯戰爭的進行，恰恰相反，是更加鞏固了國內的民主的團結，使戰爭的勝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當選所發生的作用一樣，使民主進步力量在戰爭中的最後勝利加速地來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絕不能適用於戰時的先生應該虛心看看這種事實！在這次戰爭中，各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議會中照常有著公開的辯論和對政府的責問，輿論上照常有著各種對於政府的人事機構政策尖銳的批評，人民照常有集會結社、選舉罷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響一國元首的那樣的大選也



仍照常舉行。這一切都說明了，民主制度不僅是在戰時完全可以適用，而且在戰時運用得更加靈活，範圍更加擴大了。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援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於民主制度，堅決地依靠著民主主義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夠在民主制度下繼續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離了這偉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終於會陷於死亡的絕境！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 民主第一

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這首先就必須徹底消滅法西斯機構，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完全肅清法西斯分子。華萊士說：“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標是：盡速消滅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軍進入柏林和東京時，才能提出和平條件；國際壟斷專家不許在和平會議中出現；孤立主義必須繼續被攻擊”。這就是說，不僅要擊潰現有的法西斯陣線，而且要消滅一切的法西斯殘餘；（遵檢）。只要是法西斯病菌還存在，則比會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謂“民主第一”的口號，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實現。

其次，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那就必須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這口號。因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號，自己負有首先忠實履行的義務。（遵檢）。另一方面，“民主”是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拋棄這武器，則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上，便沒有絕對勝利的保障。即使幸而勝利，也將被認為是“以暴易暴”，不能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而戰敗國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會時時作報復的打算。歷史上，所以有迴圈不斷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義大利崩潰了，納粹德國也面臨著崩潰的危機，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陣線各國必須堅定地把握著“民主”這一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自己認真檢討，究竟已否實行民主政治？實行得夠不夠？沒有實行，就應該立刻實行；實行得不夠，就該力求其夠。（遵檢）。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這是應該十分戒懼，十分警惕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 茅 盾 •

對於貴報所提出的問題，我只能這樣答復：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受盡了欺騙。如果將來其他文獻統統失傳，只剩下堂皇的官報，則無話可說。如其不然，那末，我們的後代一定會不懂，為什麼我們這樣容易受欺騙？我們不能再忍受那種欺騙了。現在既然連政府也口口聲聲說“民主”，那麼，我們就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我們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實現，則貴報所提的那些問題，我覺得都不難解決；否則，半個也解決不了。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注：《新華日報》所提問題，系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開徵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個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人民獲得自由權利、怎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樣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的茅盾是應徵者之一。

我們要看貨色

國民黨市黨部負責人方治先生<sup>①</sup>，在市府招待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啊呀呀！中國原來“已經”是“民主”國家了，而且還是“世界第一”咧，你說我們糊塗不糊塗，竟連這點國家的體面都還不曉得，還要這裏那裏，嚷著實現民主，不是有點“庸人自擾”麼？

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話雖是這麼說，而為了“謹防假冒”起見，我們倒不妨來看一看貨色。不看貨色則可，一看貨色可就糟糕了。原來，下令查禁《自由導報》的就是方治先生。說法和貨色竟是這樣的不同！照這種說法 and 做法，所謂“民主”也者，豈不就是“官主”！所謂“世界第一”也者，豈不就是黨治“世界第一”！

說漂亮話的人，倒是應該提防，不要拿出貨色來，見不得人！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27日短評

① 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國民黨重要的黨務活動家、CC系把守宣傳口的主將。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總裁室秘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要職。1949年退居臺灣。時為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

是不是代用品呢？

• 友 谷 •

朝鮮義勇軍的宣傳員用電話向敵人堡壘裏做政治宣傳，指出日本國內的貧窮的時候，敵兵很神氣地說：他身上穿著的正是前天剛發下的新軍衣。義勇軍同志馬上不客氣地追問：“那麼細細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一問就把敵兵問得啞口無言（見二月六日本報三版，《朝鮮義勇軍》）。

這的確是非常厲害的追問，這樣的問題在別の場合，在別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為在這世界上的確有很多騙子在活動，所以我們必須這樣一步緊一步地追問。光是口頭說說空話，我們不能相信，必須追問：事實到底如何呢？縱然儼乎其然地拿出事實來，我們也還不能馬上相信，必須再追問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這樣追問下去，才能揭破騙子的勾當，才能達到貨真價實的目的。

假如你遇見假充風雅的市儈，拿出周鼎漢器、唐宋真迹來給你鑒賞，而你存心掃一掃他的興的話，那麼你不妨追問：“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貨認成了真的往往不過是受騙上當的人，這些假貨是從古董商手裏買來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間裏偷偷摸摸地偽裝假造，明天就拿出來炫示給人，說這是如何名貴的古物，對於這種騙子，我們應該嚴詞斥責：

不要拿代用品來騙人！

但假造古貨，不過是騙術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

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 不是空喊民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說空話是不行的。有人說，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麼結果。這種批評自然是對的。

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

歐洲戰爭快要到結束的時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動了，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結果，而是認認真真打仗的結果。蘇聯在戰爭中本有一句口號，是“一切為了前線”。他們喊了這個口號，也就認認真真照這個口號做了，一切的人力為了前線，一切的生產為了前線，沒有一個人把存款放在國外，在後方逍遙享受。現在他們又喊出了“一切為了柏林”的口號，而他們也確是在面向柏林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而不是背對著柏林空喊。

在我們這裏也有“軍事第一”的口號，而且似乎也還有人在寫著、在喊著“到東京去”的壯烈的口號。既然有著這口號，就該認真想想怎樣來實現這些口號。

美軍在呂宋登陸作戰，準備著在中國登陸，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東京去的路。但在我們這裏專制貪污因循拖遲、缺乏效率，三萬匹的襪布，三萬萬的美金存款，這些決不是到東京去的路。

當蘇聯已經歡欣地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後一段路的時候，當美國已經一步步迫近東京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從頭來掃清引向勝利去的障礙，雖然似乎晚了，然而趕快做去，還不太遲。

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張民主的人也的確不是空喊民主的時候。如何實現民主，再切實不過的一步一步的辦法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了（見本報二十五日發表周恩來同志抵渝談話。及二十六日發表的民主同盟宣言）。

要使打仗不是空話，勝利不是空話，就要趕快實現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話，就要實現這一步步的辦法。反對空喊民主的人，為什麼不快快照這套辦法做呢？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 民主與誠實

• 李 勃 •

在任何社會裏，誠實總是被看成一種美德；而在民主社會裏，尤其是非看重誠實的態度不可。

誠實的內容包含著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語的一致，言語和行為的一致，思想、言語和客觀事實的一致等等。

心裏怎麼想，口裏也怎麼說；嘴裏怎樣說，手裏也怎樣做，這叫做誠實。想什麼，做什麼，決不瞞人，老老實實說出來，與天下人共見，不另外說一套，以圖掩蔽天下人耳目，誠實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語思想都是為了解釋和說明客觀的現實，行動也是為了應付現實。但對於現實的真象，固然未必個個人都能完全知道，但總不能不以與現實完全一致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對現實的完全瞭解，卻不能故意掩蔽現實，反乎現實而行。假如指鹿為馬，若真以為這是鹿，那還不過是無知；但若明明心知為馬，而偏偏說這是鹿，那就是胡賴了。

誠實是對人的態度，但也是律己的準則。假如故意說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為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藥。用不誠實的態度對人，固然是對人的侮辱，其實又是對自己的侮辱。

我們相信，倘大家沒有這樣誠實的態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講究討論商量。但假如開會時大家說了一大套，卻不全是心裏所想的，會後各人仍舊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麼民主的世界豈不成欺騙的世界了嗎？

要發揚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誠實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並不是舶來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說一是一，這原是民間向來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3年7月16日

## 強大而民主

• 鬱 敏 •

以國土和人口來說，中國都是一個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強國。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就因為不是一個強國而吃了很大的虧，雖然我們也因為是大國而占了很多的便宜。

由於抗戰的刺激，使人們深感到中國必須努力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有人主張中國建設的方針是“富國強兵”。有人提倡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國防文化”。

但這樣主張的人常常忘記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本來都是世界強國，然而結果怎樣呢？義大利已經一敗塗地了，德國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臺了。這些法西斯國家未嘗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國防上，然而富國強兵對於他們，到頭來仍只是一個幻夢。

問題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倫敦援華大會上說：“中國在最短期間內應當成為遠東的強大民主國家”。——這話，我們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國朋友對中國的企望，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要求。

這就是說，中國不僅要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要成為民主的國家。這要求是從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長出來的，也是抗戰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阿Q，才會一夢醒來，說中國是一個最民主的國家，想根本掩沒人民的要求。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和那不民主的強大是必須嚴格地區別開來的。這就因為：不民主是會把抗戰弄垮、國家弄糟的，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採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沒法強大。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 民主與國情

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提倡洋務運動很堅決的薛福成在當時就曾如此說過：

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這個道理。到了現在看來，自然更誰也不能發生疑問的了。

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科學，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科學。外國的水是氫二氧一，中國的水也還是氫二氧一；外國的大炮是那樣造成的，中國的大炮也同樣是那樣造成的；外國在“聲光化電”之學上已經研究出了許多道理，這些道理移到中國來也還是有用。——既然外國已經先發展了這些科學，而中國還沒有，那就沒有辦法，只好“用夷變夏”一下，從頭學起來。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所以，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原標題《民主即科學》

## 團結與民主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這是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合併了七個關於鞏固團結集中人材增強抗戰力量的提案，加以審查後，曾經過相當劇烈的爭辯，可見全國憂時之士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與關切。

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華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那麼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這條治標辦法的重大意義，也就在這裏。

無論什麼條文，它的價值要看它的實行程度怎樣，否則它的作用將等於廢紙。全體參政員是懷著無限的忠忱與熱誠，全國人民是那樣焦急地渴望著這一個足以轉移我們祖國命運的辦法能夠快些實現，過去一切足以妨礙團結與民主的設施應早日絕迹。我們的政府不應漠視廣大人民的要求與

希望，也只有依靠著精誠的團結與廣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夠強大進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偉大任務。

爲了實行“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應該在嚴重的民族壓迫橫加在我們身上的今天，消滅內部妨礙團結的現象，因爲一個對內不能團結的民族，就不能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勝利。波蘭亡國的慘痛教訓，就是擺在眼前的明顯的事實，雖然它軍事慘敗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壓迫政策，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民族自衛的革命戰爭中，脫離了廣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是對抗戰不利的。僅是在消極方面停止對抗日的人民、團體、黨派的各種限制、取締是不夠的，雖然切實做到這一步已經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努力，政府要更進一步的造成全國人民能夠在法律上獲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條件，才能真正保證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什麼是“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體內容呢？

這就是說，全國抗日的人民要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的自由，召集動員民衆來抗日的各種會議的自由，研究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種政治理想並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的自由。全國抗日人民要有參加抗戰工作的權利，保持自己職業獨立的權利，督促政府幫助政府的權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們的權利不能被剝奪。除了有真實證據證實了是犯了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藉口來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權利，是違反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黨派應有合法存在活動的權利，共同發展互相幫助的權利。抗日的各黨派可以發表他們關於抗戰建國的言論，公佈他們的政綱，出版他們的報紙雜誌，招收他們的黨員。一切抗日黨派及它的黨員同樣可以參加抗戰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虛心研究別人所信仰的東西，選舉自己的代表到各級的民意機關中去。因此如果組織對於任何抗日黨派的陰謀破壞、暗殺、囚禁、逮捕抗日黨派的人員，暗中限制取締抗日黨派的活動，不僅在政治上是決不應有的行爲，而且應受到全國人民嚴厲的制裁。

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軍隊和地方政府都是我們整個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們應該一樣的被珍視愛護，受著同樣的待遇。不能夠因爲某些歷史的原因，而對一些抗日的軍隊與地方政府加以歧視，或給予許多困難和牽制。這種情形今後是不應該存在的。

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夠團結一切的抗日力量，準備著在適當時機來到時對敵反攻，爭取最後的勝利。團結與民主，這是我們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戰勝強大敵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華日報》1939年10月5日

諸葛亮與阿斗

• 魯 山 •

現在和古代封建專制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從未敢做夢當皇帝，雖然孟軻先生曾經說過“民爲貴、君爲輕”一類話，但小百姓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高過皇帝，而且歷史上也從來就沒有過這樣一回事。然而現在確實不同了，我們居然成了皇帝了，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要封我們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們很謙虛地自稱爲諸葛亮，不然怎麼能叫做“民主”呢？不過，太“民主”了也不成，因爲咱們做阿斗的沒有本事，還得萬能的諸葛亮老爺來加以管束。說來也可憐，阿斗這稱呼固然很榮耀，但是我們常常還要被諸葛亮打屁股，有時又被拉去砍頭示衆，或被踢進集中營，或被綁去當壯丁，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對外國人說：他們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訓”我們一下，因國家“法統”要求這樣做，阿斗真要當政，那不是自亂“法統”了麼？

自稱爲諸葛亮的法西斯獨裁者，是什麼人呢？正是那些賣國求榮的秦檜張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禍國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輩！他們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們曾假“聖”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災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國民黨反動派又以一黨訓政的所謂“約法”，企圖推翻政協決議，

繼續做他們專制獨裁的諸葛亮，把餓得饑黃面瘦的老百姓仍舊當做他們的阿斗。算盤打得雖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麼容易受愚弄！

先生們，你們的“法統”還是趁早收起吧，人民並非阿斗，你們的諸葛亮終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況你們本來並非諸葛亮，硬裝面子，騙哪些呢？豈不是自欺欺人？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8日

## 民主的真義

• 項 軼 •

翻讀《中山全書》，在《中國革命史》中讀到這樣的話：“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在這段話裏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因為夠得上說是民主制度的，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這本是常識，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說明的。在封建專制政治的壓迫下面，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因而產生某些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統的民主政治的理論也還是找不出來的。這種民主思想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也有時會發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根本上改變了專制政治，而只是使專制政治的表現溫和一點而已。所以過去的專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絕對不是民主政治。“愛民如子”是過去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衆看成了兒子，那還有什麼民主的氣味！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現在有些人把中國的舊思想都解釋成民主思想，甚至以為中國過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實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國歷史去學習好了。這實在是違背中山先生的遺訓的。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妨背誦一下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 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祝第二屆聯合國日

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去年宣佈以六月十四日為聯合國日以來，到現在已經一年。去年有二十八個國家慶祝這一個節日。紐約曾有五十萬人的空前大遊行。今年聯合國勝利在望，全世界對於這個節日的慶祝，必定更加熱烈，更加盛大。

人類的命運，現在處在決定的時機。決定人類的命運的，乃是此次大戰的結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此次全世界人類反對法西斯野蠻侵略者的神聖戰爭中，我們中國進行了對日抗戰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勢武器在敵後堅持至今的遊擊戰爭，乃是我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偉大奇蹟。我國六年的抗戰，誠如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樣，一改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由於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把持國柄，勾結軸心，對外屈辱，對內反共，我中華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無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經過了六年的團結抗戰，我國卻已經被列入世界四大強國之林了。這種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起就主張的對日抗戰乃是完全正確的，也證明了

當時主張屈辱投降的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是何等可恥。我們慶祝聯合國日，我們慶祝聯合國的勝利，慶祝人類正義之勝利，也慶祝中華民族的強盛，慶祝抗戰的勝利。

反對法西斯，不僅爲了人類的現在，而且也是爲著人類的將來。現在所進行著的世界戰爭，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者贊成最廣大的民主，這是無庸多說的了。而此次世界戰爭爆發後美總統與英首相共同擬的大西洋憲章，也規定了人類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聯合國日發起人羅斯福總統在去年今日的演說中，再一次強調了維護人類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說：“信仰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與敵人之主要分野。”又說：“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類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氣、日光、麵包與食鹽之不可須臾或離，剝奪人類所有此等自由，則彼等必將無法生存，剝奪其一部分自由，則其另一部分必將枯萎。”我們慶祝聯合國日，就要維護民主。我們慶祝聯合國日，乃是爲了擁護民主，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原則，它對外則主張“亞利安種族至上”或“八一”字的併吞，對內則主張“盲從領袖”、“全民政治”、“全民經濟”的獨裁，反對共產黨，壓迫人民大眾，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毀無遺。不剿滅法西斯主義，不確立民主主義於全世界上，即使這次戰爭勝利，還不能奠定人類永久和平。現在與將來不能分離，抗戰與民主亦不能分離，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民一樣，完全贊成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在他的黨員所參加的地方政權中，遵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並把民主政治的原則具體化，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中國共產黨並堅決主張：民主的政治原則應在全國實現，這不僅對於現在的抗戰有很大好處，而且對於全人類也有很大好處，因爲我們中華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爲我國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我國的一切設施會對全人類發生極大的影響，對於將來的世界和平發生極大的影響。

可是，正在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時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臺的時候，在我抗戰陣營之內居然有人提倡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怪論，這豈不是奇怪之極麼？

這些人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以“中國文化至上”來代替希特勒的“亞利安種族至上”。對中國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衛的“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說。對中國國內，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全民戰爭”和“盲從領袖”的濫調。這個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義一樣，公開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它也同希特勒主義採用同樣的排外手法，自稱“繼承民族傳統，排斥一切外來思想。”在實際上，它對於中國的傳統，只繼承了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等奸賊之特務政策的傳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反對太平天國媚事反動清朝的反革命之傳統，繼承了一切唯心論的反動學術傳統，它所拋棄的，卻是民主精神的傳統，卻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傳統，以及中國五千年來學術史上唯物論的優良傳統。對於“外來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等進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面具之下，偷運進來的，乃是大量最醜惡的法西斯主義的私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貨。中國法西斯主義者之所謂“繼承民族傳統，排斥外來思想”，實際上就是繼承中外文化中一切醜惡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優良的成分。這就是現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代表們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之內容。這種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居然自稱爲“三民主義”，實在可笑之至，實在是誣衊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學說的民主精神，實在是誣衊了中華民族。

我們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我們心中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憧憬，對人類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心中也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掃清這個毒素，當然也決不容許它在中國猖獗起來，以致將來再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的政治代表們企圖提倡法西斯主義以毒害我民族的時候，爲了使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我國文化界就有一個極其嚴重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要加緊進行反法西斯的教育。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樣設想，以爲當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爲著反封建，就會走上另一極端，犯另一種錯誤。當前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乃是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時一刻忽視或忘卻了這個現實，就是不對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民主教育，乃是具體的、適合中國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今後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需要的那種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瞭解爲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應知這種民主教育，不應成爲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



應爲了抗日的目的成爲一般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特殊地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否則，我們的教育就脫離現實，脫離當前的戰鬥任務。其次，應該把這種教育，安放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應把這種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詞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愛、文化與科學的發展等）的基礎上。在這裏，我們也應緊緊地記著：民主與抗戰是不可分離的，將來與現在是不可分離的。

正確的進行抗戰與民主的教育，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這就會大大的增強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這就會促進人類正義的勝利，促進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就會幫助奠定將來的世界和平，和獨立的新中國之建成，這才會更加提高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對全人類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貢獻。

——《解放日報》社論 1943 年 3 月 14 日

### 戰時必須實行民主

中國抗戰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和動員全民族的人民，參加抗戰是不可分離的。這就是說，它決定了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民主權利，就失去了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抗戰的必要條件，就使這全民族全面的抗戰，失去了偌大的力量。總括一句話，人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武裝抗敵的權利，就不能動員全國的人民參加抗戰，就不能使民主政治逐步的全部實現。

抗戰以來，我國政治生活已向民主制度進了一步，國民參政會的成立顯然是其初步的開端。但是，我們如果問，在這一初步開端之後，繼續進展的程度怎樣？全國上下一定會不自隱諱地說：在某些地方，顯然沒有繼續努力將政治生活推向進一步的民主的道路上去。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事。

毛澤東陳紹禹等七同志，在“我們對於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的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務，中心目的，正在於實行戰時民主。從這一意見中，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根本主張，是一貫的堅決的把全國政治生活逐步的推向民主政治。共產黨反對一切政治上向後倒退的言行。因爲這是對抗戰有害的，對民族不利的。同時，我們必須瞭解，共產黨在抗戰這一個歷史時期，所主張所堅持的民主政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完滿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戰爭中所必須的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全民族的命運，決定於全民族的每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與力量集中，又必須以發動和堅強每個人的堅持抗戰的意志、培養和組織每個人的堅決抗戰的力量爲前提的。而這些一切，都以民主權利爲起點、民主政治爲歸宿。

有些人以爲：抗戰時期，民主是不必要的，並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政府爲例。這是根本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戰爭，亦即爲人民所反對的戰爭時，它們是不願意有民主的，是要大大的限制民主的。而在中國進行全民族的反侵略的戰爭，這一戰爭爲全民所擁護，更非有全民參加，不能獲得勝利，因此，在抗戰時期我們就應該實施民主政治。

有些人以爲：抗戰時期，無談民主憲政的必要，盡有約法可遵循，有抗戰建國綱領可遵循。但是，抗戰所需要的民主，應隨抗戰之堅持而充實其內容，在保障民權（就是這一項，也還需要最大的努力去切實實行）外，還要注意到整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使政治有認真的進步，才能適應抗戰的發展。

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在於“加強戰時政府，統一軍政領導，容納各黨各派人才，提高戰時行政機構效能”；在於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的保證。

在抗戰的現階段，敵寇正盡全力進行政治誘降，挑撥離間，破壞我國抗戰。我們一定要加緊團結，加強抗戰力量，爲了這個目的，舍實施民主政治，力求政治進步，反對一切倒退，別無他徑可循！汪逆精衛正在高喊“虛偽的民主政治”，“在日寇刺刀下的民主政治”，我們正要實現戰時的民主以揭破汪逆的虛偽面孔。這時候，既不是空談無民主政治之必要所可逃避，也不是斤斤於參加政府所可解決。唯一的道路，就是集中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將政治認真的推向民主。

——《新華日報》社論 1939 年 9 月 16 日  
標題爲編者所加。

## 民主國家的武器——民主（節選）

目前，太平洋戰爭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而希特勒又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春季攻勢。在此形勢下，民主國家用什麼力量去抵抗敵人的進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民主國家偉大的物質力量，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充分發揮和儘量利用這些力量呢？

“政治重於軍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指導戰爭的是政治，發動戰爭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戰爭是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與反侵略的民主主義兩大陣線間的鬥爭。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後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進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發動戰爭力量的推進機，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民主國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根據在哪里呢？

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上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與民主政治不可分離的。因爲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業，如果不動員全民族就不能抗戰，更不用說勝利；而要動員全民族就非給民衆以民主權利不可，所謂“民主動員”就是這個意思。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各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須以啓發和堅定每個人的戰鬥意志與發動和組織每個人的戰鬥力量爲前提的。而要做到這些，卻是以民主權利爲起點，以民主政治爲推動機，而最後則以民主政治爲歸宿。

其次，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世界政治發展史而言，正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與進步的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陣線與民主爭先早已壁壘分明，尖銳對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明白指示：“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的戰爭。”（見〈民權主義〉第一第二講）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戰爭之進行及其勝利，必須以民族團結爲最基本的條件，而民族團結又必須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以我國抗戰，而言團結與民主的關係，正如林伯渠先生所雲：

“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國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都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

就國際的反權利的團結而言，也以民主政治爲它的基礎和前提。今日反權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不管其民主的內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顯明的。

然而最複雜和最困難的還是宗主國與屬領地間的團結問題。無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下，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可以而且應當團結。但是另一方面因爲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發展雙方的團結，就必須以減輕和適當調整這些矛盾爲前提。而要作到這點，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宗主國必須改善其舊的殖民地政策，採取開明的新政策，就是說給殖民地以民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羅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條是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而民族自決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戰爭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只有經過民主的動員才有可能。所以民主與動員，民主與加強戰爭力量是分不開的。去年我國國民參政會通過之重要決議案“促進民治加強抗戰力量”，就清楚地說明了民主政治與動員和加強抗戰力量的有機聯繫。大家知道，我國抗戰的基本方針是“自力更生”，然而什麼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實意義和內容是什麼呢？“中國抗戰，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談話）“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

有人以為國家在對外抗戰之際就要縮小民主（被略），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這不僅從理論上言，正如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而且在事實上，我們還可找到許多實例來加以證明的。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說，遠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專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正是因為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最急進的民主派，給予了民衆以民主自由，因而發動了廣大民衆參加革命鬥爭，所以獲得了勝利與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列強的武裝干涉，這也是因為俄國的革命領導者與革命政府真正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因而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民衆積極參加革命運動與戰爭，所以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實來說，當太平洋戰局形勢嚴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軍事失利，於是在英國國會中和輿論方面引起了英國政府關於遠東戰時措置的種種疑慮和責難，特別對於英政府某部分閣員及遠東負責者表示了極大不滿。英下院一場舌戰，因而展開。在一部分人看來，英下院這種民主的對於戰爭問題的公開辯論是不適當的，或將因而引起英國內政上的軒然大波，渙散了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減輕了戰時內閣的威信。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邱吉爾首相以英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坦白地發表了辯論演說，並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於邱吉爾公開地指出了過去的錯誤——如雲“此等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災禍非錯誤與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責任——如雲“苟餘對處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處，則負咎最大者為餘個人。苟吾人未遣派大軍至緬甸或遠東其他地點，亦應由餘負責”；積極地要求國會公開辯論並作信任投票——如雲“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之投票，則下院即系怠忽職務”等等。正由於邱吉爾首相這種尊重民主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負責態度，於是獲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說是的到了全體的擁護。（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這一生動的現實，充分說明了民主政治的偉大意義與作用。

——《新華日報》1943年3月6日

## 民主精神

戰時能夠實行民主，民主才能團結，團結才能爭取勝利，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實證明了的。單以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來說，最近就有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說遠一點，在美國，羅斯福三度當選大總統後，就以政治家的風度，發揮美國的民主傳統，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親密合作。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威爾基曾代表美國訪問英國，最近更決定以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訪問近東、蘇聯及中國。而且，為了動員及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加強反法西斯力量，釋放了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同志。在英國，三年前被禁閉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亦已解禁。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執政政黨，從來沒有因為他們的地位，就排斥別人、壓制別人，稱他人為“異類”，相反的，他們為了戰爭的勝利、民族的安全，總儘量集思廣益，使人人有為國效勞的機

會、珍貴別的黨派及各個階層的努力。好的，有成績的，就讚揚；壞的，不妥當的，就批評。譬如，英國自由黨的《曼哲斯特導報》就讚揚“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並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實使我等爲之慚愧。”同時，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

各個政黨派別的存在，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已經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種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之下努力，更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這樣，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斷增強。這是英美當局及一切呼籲民主團結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標之下，不論黨派間，以至於個人間，都會有關於具體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張和辦法。但是，這是能夠獲得一致的。這裏，主要的就要靠前所舉例的民主精神了。這裏，就要靠相互間的經常接觸商討、互忍互讓（被略一段）。真能做到這點，就能夠互泯猜嫌，和衷共濟，而不會手足自殘了。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爲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社論

民主原則

• 張申府 •

差不多很象桃樂娣·湯普孫女史新近所說“有一種絕對的邏輯在歷史上”，幾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爲堯存，不爲舜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當然在這些道理是什麼，有多少。一切學問，自哲學以致科學，所從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這些道理發掘出來，而且弄個清楚，說個明白。

同樣，也象尤裏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說的“達爾文拿他不多的幾條原理把人與所有別的生物都聯絡在一個必然與變化的共同之綱中”一樣，世界隨時都有個大勢所趨，爲任誰所不能逃。

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

這些年來，對於民主雖然有種種看法，種種論調，但現在聯合國方面卻公認爲這次之戰爭是爭自由與民主之戰。所謂法西斯，前前後後，裏裏外外，都是與自由民主整整敵對的，都是與自由與民主勢不兩立的。而且凡是壓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講理性的東西，不管有多少樣的方式，都可歸入法西斯的疇類。

法西斯不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同時是極端封建的、落後的、倒退的。這也是今日所有進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認。

但是現在還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麼？

這也不是的。

現在所求的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進步，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發展。

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了：要想安全，必須進步；要想穩定，必須向前發展。

叮衡全局，觀察世論，很可以看出，有好幾點是現在世界許多人都同意的了，或認爲無可如何的了：

第一．現在是正過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人民的革命的時代。或者甚至說，這種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個階級的。

第二．民主必須擴張，必須由僅僅政治民主擴張到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如經濟上社會上不民主，所謂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說，非整個民主即無民主。民主決不等於代議制或放任主義的經濟。

第三．“經濟人”要代以“社會人”，經濟人的時代要繼以社會人的時代。社會必須是有機的；必須不是各自爲富，而是共同謀福的。因此有人還說，今日的民主必須是“有機的民主”。如

果孔子曾以仁爲人類關係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爲界說，那麼，道路不管還要怎樣曲折遼遠崎嶇，人類社會究已在向之而趨。這一層是與前層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種情形。

第四．社會各方面，特別象經濟方面，科學方面，設計或計劃化 *Pranuing* 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這也可說是與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設計或計劃化其實並不違反自由民主，寧可說是自由民主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或更好說，設計或計劃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圓滿地具體實現。當然，要圓滿作到民主的設計或計劃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條件。

第五．戰後必要有一種國際組織。有的且說，最好即以今日的聯合國爲基礎。關於戰後永久和平的計劃，近年真是甚囂塵上。連帶地，爲從一種根本克服過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傳統間的精神連鎖的國際大學，也正爲世人所注意。只是關於那種國際組織的如何構成，如何產生，尚是衆說紛紜，難衷一是。與我最同心而非開玩笑的羅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邏輯切實周到的大文〈戰後世界的若干問題〉裏曾鄭重地說：“開始的國際權力機關應由合衆國，大英共和國，蘇聯，與中國而成。它們四國應結成一個隨時可以邀請別的國家加入的聯盟。”讀來最足令人興奮。總之，仍沿舊日的此疆彼界，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爲戰。各自爲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須兼是國際的。

凡此種種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勢所趨的一種意義的根本方面。

本來，縱然今日全世界真覺悟的人還不太多，就是許多覺悟的人覺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數人都已覺悟到了幾千年前已經揭穿的一種情實。那就是：人與人差不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長的高一些，看得遠一點，早一點。有的看得早一點，也就說得早一點，因此常會招出橫禍來。有的則有知也有養，雖看到了也不說。

現在許多人都覺悟到了：將相本無種，舜時任，予也是人。在這種情形下你還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許“由”不許“知”麼？

而且人與人雖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國的古調，尤其具有現代科學的事實根據。在這種情形下誰竟還要我智自雄、唯我獨尊？致落得枉費心機，徒勞無補。

法西斯的種族論固久已被世界的人類學者與生物學者駁得體無完膚了。

舉一個絕重大的東西，當然是衆擎易舉。對著一個明非個力所能勝任的東西，也一定不會有人偏偏要獨力支撐，而不虞舉鼎折肱……

衆力成城，衆口鑠金；耕常問“奴”，織當問“婢”，本也是流傳至今猶可記取的中國古訓。

說到中國，民主幾乎成了今日的萬應方。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致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中國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會別的許多方面，實在無一不需要民主，無一樣沒有民主能夠解決其困難。

國家有困難，當然應有全體國民來擔當。但如使其與聞一旦有關情形，使其對一切有關事情都有置喙之機遇，都有盡力之機會，縱令擔當困難，忍受痛苦，也當可以心甘情願。

人總是對於自己有權過問的事才最起勁。而況是本來應該屬於自己的事。

民主決不會就妨礙集中領導。反過來說，也一樣。

在大多數人的內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應實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緣由，本是爲的民族，本是爲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難。本是爲的實現最圓滿的民族統一。而具體言之，實在尤在爲的動員，尤在爲的發動一切人力以及物力。

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對症藥，也就是主要因爲這個。

實際上，今日國內有些地方試行民主，傳說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戰上、經濟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會關係、人民生活上，據傳都有不少的成績，至少大部分也當是由於這個。

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動員了民力；弄機會使大多數人民都自覺了的緣故。

去年十一月英倫名流、學算習律出身的經濟學家、牛津大學院長貝維裏治・威廉爵士提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安全計劃，所謂關於社會保險的報告。他本認爲應該祛除或攻擊的巨惡共有五項：窮、病、愚、憐、閑。這五惡在中國豈不更要用大力來掃除。

以貝維裏治博士特認爲根本的末項，閑，而論，試問在中國今日這樣需要人力的時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當，以致許多時間精神，都白費了！

汰太（或汰汰）與廢費（或說廢廢），實在同屬人類最最重要的問題。

不要閒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經濟！

但這決不是一般所謂做官或出仕的問題，且也不僅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問題。實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發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

使一切人潛藏的才幹可能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實現——這就是今日所謂民主的根本精義之所在。

用另一個說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兩字）。

假使，根本上，沒有言論自由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講習的自由，是必說不上民主的。

但所謂自由並不只是讓人人隨便，解脫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貝維裏治的五巨惡，以及憂愁，危險，或如羅斯福所說的匱乏與恐懼，等等。而且更要給人人以機會，使得人人都能儘量地發展發揮發皇其才其力其業。——推到極處，兩層本也並無二致。

也可以說，民主的出發點就是集體，就是與人為善，也就是認人人都可以為善，也使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養，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於身，一貨委棄於地，一賢一能不見選，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

那麼，在今日中國，誰，什麼黨派，怎樣作法，在原則上，最有使中國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備三個根本的條件。

第一．必須是中國的。——這些年來，許多方面都有“中國化”的呼聲。似乎直到今日為止，在這方面並沒有很走上軌道。但是如果在中國，對中國事，而不由中國人以中國為第一位；所採取的辦法不紮根在中國的本土，對於大多數中國人必不免多少隔閡。如此，要想把中國整好？究竟是事實上難以置信的事。文明猶如釀得好的酒，文化則如多年的陳釀。一種文明幾千年蘊集下來的氣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殺。不過，中國的優良處究竟是些什麼？雖還不無有待於理董，有待於表揚，但關根本總目，倘有雖流行而實不倫不類、不合中國真正傳統與時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矯而正之。消納世界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屬絕對的必要而分當。

第二．必須是獨立的。要想國家（民族）獨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與全世界進步的人類攜手而作自己應作的獨立貢獻，那就中國三四百年來先有異族竊國繼有帝國主義侵略所強迫鑄成一切奴性或依賴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的，都須立即廓而清之。中國的民主必須以中國為本位而行之；中國的民主也必須不依賴它國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罷）。

第三．必須是民主的。——這就是說，號召民主的必須在自己可能範圍之內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辦法。庶幾可收以身作則，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縱然不是教猱生木，卻等於緣木求魚，等於抱薪救火。

中國今日是處處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關人都得過問有關事，人人都有貢獻其知識能力的機會，並有看見其貢獻被採納實行的自由；也不得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以為一種進行事情的途術。但是，當然，在一個意義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國，也可以說，尤為根本。必須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徑，然後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後的情形，才有肅清的希望。

不過，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嘗不需要別的方面配合。如必由別的區處多培養些有益民主的精神習慣，也未嘗不可以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進行。

這，特別就在哲學與科學上。

哲學是講可能的學問，是根本原則的學問，本以體與辯為方法，而以通為歸宿。因此，哲學對於人生特別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處遠處，使人養成大量的習慣，而不拘於狹隘的小圈，強作物我之別。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夠有理性：能夠由前提推到結論，由結論回溯前提；能分別，有分寸，重分明，於異見同，更於同察異；能夠作面面觀，如實觀，平等觀，也能容納多方面，重視種種不同的它方面。這都是充實民主所必需。

至於科學，更是實在的學問，是樸實實驗踏實認真的學問，更可以幫著人養成踏實認真、實事求是、正視事實、注重證據的習慣。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貨真價實，冒充一定不行。尤其

型式科學中的算學，常弄乃可以培養人的謹嚴精審周密不苟的作風。有了這種風氣，實也大有助於真實民主的實踐。

今日要想實踐民主，發展民主，是必須變得有了理性，是必須與哲學的大量精神，與科學的踏實習慣，與算學的謹嚴精審的作風，密切結合的。

是的，實踐民主，發展民主，使民主進步，實現社會一切方面的民主設計，以便全人類適應生物進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實著實的坦蕩大道，這乃是今日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任何人不能違抗之，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辦法，如是因此大勢而利導之，必會成功，不這樣子，必都失敗。以上所說，不過原則。至那有關今日全世界的、進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體的辦法，那就尤願合全世界有心有腦的人共同商討，分別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實現。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8

### 蔣夫人論民主精神

根據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定，憲政將在抗戰勝利一年以後再實施。也就是說，至少今後數年中，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人民還是時時刻刻關切和需要民主的。

蔣夫人前晚在蔣主席招待國民參政員的宴會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國的民主精神，帶給了國民參政員，並且也提到中國需要的民主精神。報紙上登載的雖然很簡單，但是，已經很值得注意了。

的確“今日世界有兩種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思想，一種是軸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這兩種制度和思想是對立的，尖銳地在鬥爭著，而且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二者之間是沒有中間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會逐漸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戲，是對法西斯的掩飾，是對民主共和的諷刺，那還是法西斯，同盟國也是一樣反對它的。我們中國既然列入民主國家的陣線，就要認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我們反對軸心，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

關於民主精神，要說和可說的話很多。我們在這裏，只是簡單的講幾點意思。蔣夫人在報告中說到“民主國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後，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時，她還提到對政府事務要常加批評，這種批評，要負責任，也就是說，“必須於批評之後附以改正的具體意見”，

“使政府接受意見而有所遵循”。這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要這樣，就須關聯到幾個問題：首先，人民要有意見。這是不必多加討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政府事務的各個方面，因此總是有意見的。好的，它們也會稱讚和鼓勵，壞的，它們也會批評和指責，而且，也會提出意見來。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這點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要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意思來，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沒有地方說，或者沒有辦法說，那就誰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無從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見，不管他說得出說不出，還要政府中人願意知道才行，否則雖然人民的意思到處都是，應知道的人卻還是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於說話，政府鼓勵人民說話，熱誠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後，人民敢說，政府願聽之後，還要政府積極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實現蔣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見，這些問題，是應予注意和解決的。總括以上各點，我們再著重的提出以前曾經提過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從善如流，過勿憚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對政府事務的批評和具體建議，同時，也要願意不摻雜些毫成見的容許別人發表他們的意見，不應該固執錯誤的措置。應該勇於改過，不能一誤再誤。而正確與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後的依據。

蔣夫人提倡負責的批評和負責的接受批評，確是切中時弊的意見。我們願和全國輿論界一道，歡迎和支援這個意見，並盡力協助政府採取具體步驟，使之實現，培養起民主的馮起來。

——《新華日報》社論 1943年9月22日

## 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七七誕辰。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他奮鬥一生，都是爲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義，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的人民能夠過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國父是最能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夠根據實際的情形，不斷的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這種充實和發展，都有一條明顯的線索可尋，那就是一切爲了人民，並決定於人民。

國父爲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堅決的反對過陳廉伯的法西斯黨和一切叛逆，反對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反對過一切軍閥專橫，也反對過段祺瑞做了執政後召開的善後會議，因爲這個會議不是他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軍隊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民主的選舉出來的。

國父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斷的採取了很好的政策，從對內到對外，從國民黨的改組和與人民特別是勞動大眾的結合，以及與革命政黨的聯合，到確立對外政策，著重中、蘇親密邦交。國父爲了他的這些主張曾經以他的偉大辯才折服那些懷疑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認識不清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鬥爭精神，責斥了一部分反對的人。國父的主張終於是勝利了！事實也證明了國父是完全正確的。

國父是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是中國認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燈。現在，我們應再對國父的遺教，作進一步的研究。

國父對人民在中華民國的地位，曾經不憚煩的說了又說，解釋了又解釋。他問：“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爲基礎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爲基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副其實，必要這個國家是以人民爲主。”這就是說，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不談建設則已，要談建設，就一定要“以人民爲基礎”。尤其是在政治上，國父曾經這樣尖銳的提出人民爲主的問題：

“共和與自由，全爲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爲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

（見國父演講《釋自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樣的民主思想，是貫徹在國父的每次演講和手擬的每個文件中的。解釋什麼是政治時是如此，闡明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爲一切平民所公有時，也是如此。所以，國父對民主政治總說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總千叮萬囑的說：“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實。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銘記和求其實現的。

國父對民主政治有這樣明確的定義，所以他對人民參加中華民國的建設具有莫大的熱烈的希望。國父不怕人民，不疏遠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動員人民。而國父在對政黨問題上，也有其民主的獨到的見解。國父說：“政黨之作用在提攜國民，求進步也。甲黨執政，則甲黨所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時，則立於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國父主張多黨並存，並確定了在野黨的監督地位和糾正的義務，協助的責任。同時，更對什麼是“良政治”“良政黨”有這樣的指示：“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者乃爲良政治。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之政黨乃爲良政黨”。而國父對政黨間的競爭，是非常重視的。當然，這裏說的競爭又是以謀國家之進步國民之幸福爲唯一中心。國父說：“謀以國家進步國民幸福而生之主張，是謂黨見。”其他則爲私見，“因此而生之競爭，是謂黨爭。”其他則爲私爭。“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以上均見國父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國父在這裏，用極簡單的話，把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運用，闡述得很具體而深刻了。在這個原則之下，國父還曾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這樣具體的問題，提出了指示。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體系之不同時很明白的。然而兩者對今天中國的任務是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認識，又是一致的。國父看到了這點，才肯定的說，共產主義對三民主義是“一個好朋友”。這些問題，在今天來重新恭讀國父遺教，是更有實際意義了。



我們的抗戰，正處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局勢中，同時卻也還有一段極艱苦的路要走。只有團結，才能渡過這段路程，在紀念國父七七誕辰的日子，全國一致來重讀國父關於民主團結的遺教，並努力實行，實為加強團結，克服困難，走上勝利的頂好的辦法。

——《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2日

原題《國父誕辰紀念》

##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

現在如果再問民主國家同盟和法西斯主義集團的不同處在哪里？簡直是一個笑話。可是，原則容易談，道理容易說，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現出民主國家是在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戰，是在為消滅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戰。

最近報紙上登載的兩條新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條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西西里居民的廣播。他說：“……但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以肅清佔領區內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法西斯宣傳將被禁止”。“盟方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中止西西里島一切歧視種族與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則將維持，在無礙於軍事行動範圍內，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將恢復，盟國又將採取步驟，以迅速釋放政治犯。”另一條是法國議會議員龐德氏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略）“壓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國人民黨’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號，這顯著的在人民之中樹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衆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肅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

為什麼盟國要採取上述各項辦法？艾森豪威爾將軍回答說：“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明證。這些原則都是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

很顯然的，法西斯主義集團是反對自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同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制度和思想）的，是堅持自由主義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既然這樣，就要在行動上以此為準繩。凡是民主國家，都要以最堅決徹底的抗戰，來消滅侵略，消滅淪陷區內法西斯制度和宣傳，並從根本上消滅法西斯主義，都要團結國內反法西斯的團體和個人，徹底消滅敵人的第五縱隊，肅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傳。

蔣委員長常說我國要精誠團結，他又曾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主持的廣播中，說到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正是發揮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不同。

（被略）

我們應時刻記住“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原則，時刻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認真實現而鬥爭！

——《新華日報》1943年7月26日

## 建立憲政規模

這一次國民參政會的偉大收穫，除了更堅決的確定抗戰到底的國策，粉碎敵人汪派漢奸的鬼蜮陰謀之外，對於抗戰建國最具有意義的，莫過於實行憲政之決議。這一問題，在本屆大會中，受到大部分參政員的關心注意。我們可以看出全國民衆的提高民權加強國本的要求，是如何熱烈地在第四次參政會中反映出來了。因此，詳加討論之結果，便有“（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有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的決議，而在大會的閉幕詞中，更正確地指出：“敵閥正百計進攻，我自不絲毫自滿。一切力量，皆鬚髮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本會同人詳加審議之結果，以為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為最要之務。用是決議，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

二年來的抗戰，處處證明要打退敵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個國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為國家來貢獻。”更具體地說，只有容納個黨各派人材，提高戰時行政機構的效能；只有嚴令禁止對共產黨及其他抗戰黨派之歧視壓迫行為；只有走上這條實行戰時民主的道路，中國的廣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動員起來。中國共產黨一向就為著這種主張而努力，在這一屆參政會閉幕前夕，毛陳等七參政員，就在他們的意見書中，歷歷提出這幾端了。

誠如論者所說，憲政之性質，不在乎條文，而是在乎事實。但是，我們要曉得：有利於抗戰建國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規定起來，則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種種名義，進行破壞。

張一 參政員在其對議長的答詞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黨政軍各級人員，對於民衆運動，往往有所歧視。道路傳聞，尚有假借取締與指導名義，摧殘合法組織，鉗制正當言論，拘捕熱血青年”的事實，是使人不得不懍然的。制定憲法的目的就是要使這種現象能夠根本消滅。但是為著召集國民大會來制定憲法，必須在現在就給各黨派合法保證，以便在國民大會前各種黨派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

有一些人，以為戰時軍事高於一切，不應有民主；以為戰時全國上下之經歷，應完全集中於對外，而不當轉移其目標於制憲問題，這些意見，通通被這一次參政會的決議，打得粉碎了。實施憲政可以發揚一切力量；可以加強軍事之勝利，可以提高對外的力量。上面所舉的一些說法，都不以發揮抗戰力量為出發點的。

我們誠懇地擁護國民參政會這一決議，但同時，我們更希望政府要切實地執行參政會這一決議，要不然，決議只成為紙上的東西，對於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大業，是不能有實際的貢獻的。

——《新華日報》1939年9月21日

##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義是克裏米亞會議決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它解決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的矛盾。

本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應當是一致的，因為國家一切的法都應當是經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議決的，所謂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決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經由民主所決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義少數獨裁者所決定的時候，民主主義與合法主義才會發生矛盾。波蘭問題就是一個明白的例子。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拼命詆毀今天真正在國內領導波蘭人民抗戰、真正由人民選出得到人民擁護的臨時政府為不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蘭人民及各同盟國應當承認與支援的合法政府。但是波蘭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據的一九三五年的憲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少數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的“法”。是人民大眾所堅決不能承認的法。而流亡政府過去一貫的政策是消極抗戰、積極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蘭人民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犧牲與損失。他對於波蘭國家民族沒有功勞，只有罪惡，所以他被波蘭人民遺棄了，同時也不能不被同盟國家遺棄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擊詆毀的在波蘭國內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從事實上證明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動搖的政府；所以克裏米亞會議上也不能不承認這個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蘭合法的政府了。

克裏米亞會議對解決這個爭論問題的原則，是將“法”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使“法”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決不是只問合乎舊法統或不合乎舊法統，而不問這個舊法統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為，戰爭目的是為了民主主義，戰爭勝利依靠民主主義，戰後和平的建立，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這是從戰爭勝利、從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解決問題。

克裏米亞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說：“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迹，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式來達成”。這正是以民主主義來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堅持的“合法”主義。而且用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有權利參與解決。和敵人用各種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協合作的反民主的人們，是應該被摒棄的。《宣言》

中說：“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中，也說到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應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建議，則說：“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和敵人合作妥協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議會的議員。”這正是羅邱斯三巨頭對準法西斯分子所叫囂的“合法”主義的回答。他們決沒有不顧人民的要求和戰爭的需要，離開人民、脫離戰爭，而無原則的支援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使戰爭受到損害。他們堅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團結爲基礎，用民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的最高原則。這的確是賢明的決定。倫敦的南國政府同意了克裏米亞會議的建議，倫敦的波蘭人士如前總理米洛拉茲柯和農民黨、大多數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和半數社會黨黨員，都不贊成流亡政府反對克裏米亞會議決定的頑固聲明。證明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頑固的“合法”主義已受到廣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的摒棄，只有自趨滅亡的一條路了。

我們完全同意克裏米亞會議不支援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而確立民主主義爲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的決定。今天中國內部的統一問題，如何動員與統一全國人民抗戰力量的問題，也只有實行民主主義、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徑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比如：有些人極力詆毀敵後解放區人民抗日武裝及民選抗日政府爲不合法的，他們曾努力想法取消這些抗日力量。然而這是鞏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著廣大人民擁護的敵後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產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違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爲。克裏米亞會議的決定顯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內部統一問題，也必須循民主途徑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決。希望國民政府與全國人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7日 社論

## 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報的第五版，刊登了一個工業問題的特輯。在這裏，談到鋼鐵和機器，談到後方和敵後，談到了廠家的意見，亦談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斷。我們的能力是有限，我們的條件很困難，因之，我們所能告訴讀者的，真不及真相的萬分之一。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這一個小小的報導，就足夠大家吟味了。

看看國際大勢，德國法西斯很快就會倒下去的；中國抗戰的勝利亦是一定屬於我們的，然而，經濟的困難，卻沈重地壓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物價是怎樣一種狀況？產業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只要平常留意報上的新聞，是用不著看詳細的數位就可知道的。

爲什麼有這種困難呢？有些人把它解釋爲“充分就業”的結果。如果從形式去瞭解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說吧！就業既然充分，過了充分的一定界限，產業便就會像杯中的清水一般，從邊緣溢出來。那末，溢出來的東西是不足惜的。因爲杯中所盛的，已經夠量了；亦就是說，我們的產業之發展，已是達到飽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並不如此。形式邏輯的結論與事實的真正內容，並不能一致。說一句乾脆的話，我們的產業是可憐的很的，我們的工業生產還遠遠落在需要之後，更遠遠的落在我們的盟邦之後，只有不夠，哪里談得到過剩？

然而，事實上，卻顯得我們的生產，在鬧過剩的危機了。這是本質上的生產不夠與現象上的生產過剩之矛盾。解釋這個問題的途徑，應當全面地去尋找矛盾的癥結，而不是在現象的面前愣住，把縮小生產作爲辦法。還有些人，認爲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能力不夠的產業單位之沒落，乃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則。讓他們沒落，不但沒有壞處，而且有促進大生產發展的功用。因此，面對目前這種形勢，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們的重點主義將會在中小生產的廢墟上長大起來！其實，這亦是不合事實的想頭。阻礙著工業生產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則伴著中小工業衰落的，將不是大工業的發展，而是囤積居奇的商業資本和充滿著寄生性腐爛性的特種資本之發展。

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事。中國的工業必須大大的加以發展，它並沒有飽和，它並沒有滿到邊緣，目前溢出來的那些水，乃是由於杯中投下一些石塊。投下石塊，不但水會溢出來，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險。我們很同意一位工業家的談話：“民主和科學不可分，工業本身就是科學的體現。離

開了民主政治，科學成了法西斯的禦用工具；離開了民主，工業亦只是爲了絕少的人的利益而耗盡了工人的勞力”（見元旦本報第五版）。我們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話：“工人與生產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結合起來，生產的積極性固然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無法改進；如果工業生產者和政府管理機構，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濟以求進步，工業生產亦無由改善”（同上）。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經濟上的民主是解決當前這個紐結最基本的途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上述的種種困難，才能使提高生產再不至遇到種種制約，才能逐漸克服這一個本質是生產不足而現象是生產過剩的矛盾。

——《新華日報》1944年1月4日 社論

“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 周恩來 •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十九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七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瞭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那反攻的準備，才能真正進行。

.....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爲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爲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制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

.....

關於時間問題，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爲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科學、民主，繼續前進——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

距今四十幾年之前，一個青年的海軍學生跑到日本去改習醫學。在當時“科學救國”和“富國強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當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見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劊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臺的是中國人，圍著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憬然有感，覺得改革“已經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醫學更重要的事了。從此之後，他“常常提筆”，“在寂寞和艱難中”，“喊幾聲助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國新文化奠基者，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戰士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窮畢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從事著的工作，擇要地說，是在為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因為他確信“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要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的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他所祈求著的新生命是什麼？用他畢生的言行來說明，也正就是孫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來爭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而要使這樣的一個新中國能夠誕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樣熱心，同樣執拗地主張著：中國要有科學、民主！

科學與民主，已經不是新的口號了，但，半世紀來，賽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國，正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樣，“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這種阻礙新中國誕生的主要障礙了，他自己選擇了的正是在沙漠為肥田的工作，開荒、疏濬，做“革命的馬前卒”。槍斃中國人民心裏的阿 Q，肅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文明。——也許，中山先生不曾和魯迅謀面，但是從真實的意義上說，魯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協力者，最有力的發言人。

到今天，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經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擊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經繼續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國的團結，由於千萬健兒的英勇抗戰，由於國際情勢的不變，中國已經走上了否泰交替的關頭；科學與民主，又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了。但，在這黎明將要到來的時機，我們需要更大的戒慎與恐懼！在國際形勢日見好轉的時候，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精神勝利法”，不又在我們民族裏的少數人心頭開始蠢動了嗎？用魯迅的戰鬥精神來徹底的肅清“中國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最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式的阿 Q 性格，我們在今天更應該迎頭趕上，更響亮地提出：中國要的是科學與民主！

——《新華日報》1942 年 10 月 19 日 社論

#### 中國需要“變”——摘某報社論

“‘現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為之縮小’，這是羅斯福總統自克裏米亞會議返歸美國時的名言之一。我們要知道正為了‘世界為之縮小’，世界才在那裏急劇地轉變。”

“世界縮小了，時代轉變了。政治、經濟、制度、習俗、藝術，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轉變了。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裏急劇的轉變，若有人焉，偏要固執己見，堅持所故而不變，試想這個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後果的悲慘，是否還可以想象？”

“因為如此，我們敢明白主張要‘應變’。要隨著歷史的法輪去即時轉變。因為固執而不變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必要的。唯有應茲時所需以轉變，方不失為俊傑，才能在今後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勞績可稱述的人物。”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及政策，是應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義，是針對問題的，如果問題改了，世界變了，那麼，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隨之改變了。”“所以世界上的聰明人，沒有不因著時代轉變而轉變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都是傻子，所以現在我們敢明白主張要‘轉變’。”

——《新華日報》1945 年 4 月 8 日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 李 普 •

有人說：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議論紛紛，所以必然會減低行政效率，甚至毫無效率可言；因此，特別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之中，民主是絕對不適宜的。

解放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胡說。

共產黨員對民主作風的學習中，黨的領導機關的堅決的領導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同時，民主作風本身所發揮的驚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它本身的那種驚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風的普遍風行便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同時，如果實行民主反而必然減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對民主卻又不得不偽裝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襲一套刀筆吏“欲抑先揚”的惡劣手法嗎？

我們還是來談點實際的事情。首先，讓我們介紹河北臨城西峪村村長、共產黨員郭秋根轉變作風的故事。

郭秋根轉變作風以前，這個村莊事事沒有生氣，抗敵工作做不好，生產運動搞不起來，全村仍舊過著貧窮的生活，年年不夠吃的。以後，由於他“使喚了民主”，才動員和組織了全村的力量，領導了全村從貧窮走到了富足。縣上開勞動英雄大會時，這個村子被選為生產模範村，他自己也被選為模範村長。下面是他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們看他怎樣一點一滴，慢慢地嘗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戰以來的老村長，自己過去的作風是‘下馬三聲炮’，叫別人幹什麼，不幹就不沾。我常常說，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裏裝著，我啥事情不能夠做主？去年麥收前上級調我到縣裏受訓，講的全是‘樹立群眾觀念、克服行政命令’，並讓我們反省。我當時發言說：

‘如果和群眾商量，啥事也辦不成。老百姓是奴隸性，不壓迫就不沾’。上級又給我解釋三次，我說：‘就比如我們村幹部吧，區裏不硬逼還不幹哩。老百姓不逼還能沾？’後來上級又說：‘光強迫在群眾間樹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級對你光強迫，你心裏能高興嗎？如果你能好好說服群眾，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樣群眾一定很滿意，你在群眾中，就有威信了’。這句話把我提醒了，我發覺就是這樣，如果上級光強迫我，我也是不高興。如果我光強迫群眾，同樣群眾會不信仰我。這樣子對上對下都不落好，何苦來？在心裏總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和群眾商量說服，到底沾不沾還不保險。一個是自己命令勁頭已形成了老習慣，還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來才行。”

“受訓回來以後，我心裏的想法是試試吧，看到底哪樣辦法沾。後來我就開始試驗了，起初我想先和群眾商量商量，如打開腦筋就算了，打不開還是強迫。試驗了一下沒試成功，我就逐漸不信上級所說的話了。”

“到冬天，上級佈置了擴兵工作，全村幹部都忙起來。這個去說服，那個去動員，總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參軍，但是誰也怕走後家裏沒人照管。幹部說保證優待，他們不信。我那時候沒有學會民主，在群眾當中毫沒有威信哩，這事情可真是假哩。‘後來我們想出個辦法，就是讓群眾大家討論，大家動員，大家保證優抗。這樣一試驗，就弄成了。我一想：原來是人多話大，大家保證優抗，就使想參軍的人安了心。這就使我感到群眾還是沾，動員大家做，比光是幹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級號召打洞備戰。幹部夥看了一個地方，群眾都說：幹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頭。打了一下，果然被石頭擋住了，群眾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這又給我一個經驗，就是群眾大家的辦法比我們的辦法沾。”

從此之後，他就遇事採取了和群眾商量的辦法，比如，全村割麥時幹部會計劃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緊七慢八），又派群眾討論了一頓，大家都說四天保險能完，可是幹了兩天半就收割、打場、藏糧都鬧好了，這說明群眾自己討論決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幹’。再如動員群眾打蝗、開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為和群眾商量討論所以鬧的很好。”

這給我們說明了一個真理：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當然，這首先必須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十分明白，無用乎多加解釋。唯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才利於實行民主，反對人民的人誰敢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願意讓自己壓迫之下的人民起來談話、願意把自己壓迫和剝削人民的企圖和設施給人民來討論，天下沒有這樣的傻瓜。

山東沂蒙區在幾年以前開始推行民主文化運動的時候，個別的幹部唧咕說：“實行民主就壞了，辦公不好辦，不大離兒硬一點才行”。有的說：“民主，還不是叫咱下臺”！因此，比如某莊莊東頭的老百姓要向莊長提意見，莊長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還有啥壞處？”

但是現在，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們已在普遍地歌頌民主了。

讓我們再引一個行政村主任的話：

“這幾天的會，開的我腦筋有了些開化，越想越不對。象年冬時，要集軍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給我村計劃跟老百姓自動一千塊，我回去就按戶每家攤了五十元。款是集起來了，可是下層有了反映，說我主任辦事不公道，‘棗圪桃一類數’，為什麼不論窮富一律五十塊？我那時心裏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見多”。

“所以，過年時，要慰勞部隊和抗屬，我沒有動員，又怕下層反映，就自己訂了個數目，都給上層的攤開。好面、菜飯雖然也都起齊了，可是上層又有了反映，藉口說為什麼我不讓人家下層撫軍，說我壓迫。我心裏還是不舒意”。

“這一次開會，我可想開了。前天隊伍打開方山圪洞，我想我應該發動勞軍，這次我再沒用攤派的辦法。我民主了一下，讓衆人們自動，想不動人家都自動的嘩嘩報上來，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擔蘿蔔，不論窮富都出的乾脆，比上回還慰勞的多。比我心裏事先估的也多。”

“你們看，不民主，群眾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發揚民主，事情就辦的比你想象的還好”。

“咳，我索性徹底吧。我做工作，老實說，什麼都是應付。給老百姓謀利益，我不往那上頭想。過去我一點也不積極”(這時有人發問，以後你是還要應付，還是要積極?)。“以後我當然要積極。你看，方山圪洞都打開了，我們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有了民主什事還怕鬧不好？”

對於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主帶給他以無比的信心！

勞動英雄溫象栓說得好：

“我們要把壞思想丟到河灘裏，明年開春，解了凍，給水推走，裝上好思想好作風去工作，大家翻身發財……。”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 (英)普裏斯萊 •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衆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明白了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瞭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衆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裏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為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衆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什麼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麼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裏糊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著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為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臺上一具可憐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著：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楣，權柄必定為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衆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效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佔吧，而他們必定憑藉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為然，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他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著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竟是民衆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衆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

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為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產生效力的意志是群眾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摘，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什麼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產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為他們組織精密。

.....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為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為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末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男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女人為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 文字略有改動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於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為民主拚命

黃炎培先生<sup>①</sup>在復旦大學關於憲政與民主的一篇泛談，讀來使人擊節興奮。這是黃先生最熱烈坦白的一次言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足見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高潮，激蕩著人心。

黃先生說得好：“民主是不成問題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說：“我們是為民主而戰，為自由而戰，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別人是不是有誠意實行憲政，”“我

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憲政的禮物送上門。”所以他主張“爲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點，是黃先生痛切地大聲疾呼：“民族的苦難日益嚴重，希望我們大家以後做人要改革作風。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難怕阻礙，今後要說就說，要幹就幹，良心以爲該做的便做，認爲不當做的便不做，絕對不做。要做民主國家的人民，這是起碼的條件。”

這是完全正確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爭取民主的作風。要爭取民主，就是要從改變這種怕困難怕阻礙的作風做起，要取於拼命。

黃先生的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日 短評

①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建國後曾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

工程師和民主

• 韋 華 •

離開大學我便在黔桂鐵路服務，到這一次狼狽逃難止，恰恰三年半。在這三年半中，我測量過路線，監造過橋涵隧道，最後我主管一個軍用車站，赤著腳在水田裏看經緯機，修了馬路，建了站臺，造了好幾所房子。可是曾幾何時，這些都崩塌了，破壞了。

修這條鐵路爲的什麼呢？爲的運輸物資、軍隊，爲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廠機器運不出來，而只是替特殊階級運輸桌椅沙發，那麼又何必修它呢？！假如……

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這鐵路多保存幾時，能使橋涵隧道車站多保存幾日，爲什麼不去做呢？！工程師就專爲的是修路和破壞路嗎？多少人都認爲科學技術與政治無關，工程師不必去管政治，現在應該看出關係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這鐵路，去保護這些鐵路上的員工，要是軍民關係搞好了，民衆組織起來了，軍隊生活改善了，鐵路員工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我相信我們的鐵路是可以多用幾日的，我們的工作意義當更大些，要做到上面這幾點，單單局部改革沒有用……；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關心政治・改良政治——一位工程師的話

我們機關裏新近來了一個同事，是工程師，我們是個文化機關，和他所學的風馬牛不相及。再打聽一下，他在國內大學畢業，又在日本、德國留學多年，專攻航空工程，因爲不善逢迎，先後被幾家工廠和某機關趕跑了。有一次，他對我們發感慨道：

“我過去以爲切切實實學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著關心什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來影響你。一種不良的政治，它到處會排擠你，壓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報效談不上，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爲人家講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著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什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後決心跟隨大家多多研究政治。”

沒有良好的政治，學什麼技術，也還是沒有保障。

——《新華日報》1945年3月7日  
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

## 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昨前兩天有兩件新聞一定會引起我們中國人民的興趣和重視，也值得我們借鏡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見報的王雲五先生<sup>①</sup>訪英回國後關於《實施憲政先決條件》的演講中對英國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加以闡揚；一件是讀見報的美國國務卿赫爾的關於言論自由的聲明，他駁複了紐約州長杜威百分之百的誤解之後，鄭重表示“有生以來，不僅倡導言論自由，而且為著這個目標而鬥爭。”

王雲五先生說，英國憲政基礎的鞏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有自治權力，“英國的城市自治遠在實施憲政前，在撒克遜時代，倫敦已具有一種獨立的地位，迄於今日”。這說明了民主國家的民主基礎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權參與政事然後鞏固起來的。因此可知，離開人民的民權，不從下做起，是不能造出鞏固的憲政基礎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過是造些空中樓閣而已。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講的第二第三兩點。這兩點把民主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自由與平等的含義說得很明白。關於“平等”，他說：“一則武斷的權力絕對不允許存在。換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續、經普通法院的審判後，不得受罰。二則……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無論以私人資格或執行公務之資格，苟有違法越權的行為，將一律與人民受同樣的普通法院之管轄，與同樣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關於“自由”，王雲五先生說：“人民的基本自由極受尊重。英國人的普遍見解，以為民治的憲政能否達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權選舉其欲選舉之人以組織政府，並得以和平手段變更其所反對的政府。然欲達上述之目的，則人民須能自由批評其政府，自由集會討論政治，並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與拘禁。因此他們視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為憲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沒有這些自由，民治的憲政是不能成功的。”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如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麼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演講）。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我們從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中可以更清楚瞭解，如果英美人在法律之前沒有平等，若是與王雲五先生所說英國人民的見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權利，所以永遠不能成為民主國家。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們想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人類的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應該決沒有一個人會把這些精華連根毀損而加以唾棄的。

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王雲五（1888—1979）生於上海。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1949年赴臺灣。編著有《萬有文庫》、《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大辭典》等。

##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于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惻隱，傑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徵。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瑪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裏，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位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著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著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裏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 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弗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佈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於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務，同時還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傑弗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了美國為什麼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民主世界的雙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這些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對於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從來都是給予高度的評價的。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鬥爭中完成的。列寧說，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正因為如此，美國的民主派領袖傑弗遜和傑克遜，美國民主黨的這兩個創造者，在他們鬥爭中甚至被他們的政敵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美國窮木工的兒子林肯，他所領導的黑奴解放戰爭被馬克思稱為“開始了勞動階級興起的新時期”。而在實際上，他與馬克思所領導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和歐洲共產主義者也是合作的，他

曾委任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擔任他的軍官。這樣，他就更有理由被當時的反動派指為“共產主義”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後這些頑固分子竟然暗殺了他。

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毫無疑問的，今天美國以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盡人皆知，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在國際關係上是竭力主張迅速開闢第二戰場、堅決打擊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聯合蘇聯、援助中國，要求中國團結民主，把大西洋憲章的自由民主原則推行於全世界的；在國內關係上是竭力主張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與士兵權利、反對大資本家的壟斷的。因此，和他們的先驅者一樣，他們也受到國內的反動派、孤立派、頑固派及其國際應聲蟲所攻擊。但是也因此，他們卻得到了美國從開明資產階級直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押護，得到了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當然，今天的時代異於華盛頓、林肯的時代，但是恰是這一點，格外加重了美國民主主義的意義和使命。如果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在這一次全人類的英勇戰鬥中，美國在作為民主世界的兵工廠上，在作為第二戰場的主要擔負者和太平洋戰爭的最大擔負者上，已經建立了不朽的偉績。而在戰後，為了確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國顯然也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後團結，是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政策，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於美國利益、也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

今天中國為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鬥爭，正和 1776 年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戰鬥民主派的已故領袖、就是美國人民所熟悉的孫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號就是林肯的口號：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國民黨今天的一部分統治人士竟十分厭惡這個口號，如同他們在抗日戰爭的事業上怠工一樣，他們直到美國民主共和國出現的一百六十八年後，還拒絕實行民主制度，並且學著希特勒的腔調，指斥這是已經落伍了的“十八世紀的學說。”他們的民族理論也是希特勒式的，他們否認中國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們的術語，美國不但是英國的一個“宗族”，簡直也可以是德國的一個“宗族”。這些都使中國各階層各民族團結受到嚴重的妨害。這種情況，使中國的“獨立戰爭”，遇到遠過於美國的困難。美國的獨立戰爭在第八年上勝利了，而今天的中國，雖然得到了美國寶貴的援助，卻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反對民主，在抗戰第八年的前夜還失去了幾乎整個河南和大半個湖南，並且更大的危機還在前面。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我們一定能團結中國一切抗日與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 年 7 月 4 日社論

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徵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著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著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國家之一。

“七月四日”，這日子代表著一個什麼意義，包含著一種什麼內容，美國人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正在以血肉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來說，也同樣是值得體驗、值得認識而且學習的。因為不管時代是怎樣的的不同，不管情形是怎樣的相異，人類的任何進步事業和改革運動，尤其是人民的解放鬥爭，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是有其共通性的，那就是經過艱難困苦的鬥爭，迂回曲折的進展，以底于成功。其中發展的規律差不多總是一樣的。

七月四日，在美國有雙重的紀念意義：一是一七七六年的七月四日，是北美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正式宣佈獨立的日子；另一是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費城舉行大遊行，慶祝接受新政府形式，準備次年春季新政府的成立。從獨立宣言的公佈到美國聯邦共和國政府的成立，其間經過的時間達十二年之久，這十二年的時間，是美國人民與殖民政府以血肉相搏鬥的時間，華盛頓率領了一批“衣衫襤褸而生蟲”的烏合之衆，屢進屢退，艱苦掙扎，瀕於崩潰的有多少次。然而華盛頓終於勝利了，勝利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在於華盛頓的部隊是爭取人民解放的部隊，是人民的部隊。華盛頓所進行的戰爭是一種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爭是不可抗拒的。美國的革命軍當時雖也得到法國的援助和鼓勵，但是主要的勝利仍舊是革命軍的，仍舊是美國人民的。

美國的革命軍不過是些“古怪的農民軍”，然而他們勝利了，打退了殖民政府在數量上和武器上都占絕對優勢的軍隊，理由很簡單，只是在他們是一支要求解放要求獨立的軍隊，是代表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違背的，人民的要求是一定要達到的。當時的殖民政府不瞭解這一點，以為這不過是少數人的“叛亂”，是可以武力撲滅的。當一六七六年柏康領導的第一次反殖民政府的暴動失敗以後，總督柏加利向他捉來的俘虜鞠了一躬，譏諷道：“杜魯門先生，我很歡迎你，在半小時之內，你就要被縊死了。”可是他雖然得意洋洋的縊死了一個俘虜，而曾幾何時，美國人民卻起來縊殺了整個殖民政府。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違背的，這兩點在美國的獨立革命歷史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美國人民也應該永遠相信這個真理。就因為這個基本的真理，產生出一個獨立自由而民主強大的美國，這國家，直到今天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國家之一。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社論 1945年7月4日

## 祝賀美國國慶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日——獨立紀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國人民發表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文獻——《獨立宣言》，從此展開了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獨立戰爭。

為《獨立宣言》中“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國人民，曆盡困難挫折，奮戰八年，終於贏得了民族革命戰爭，如列寧所說的，是“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獨立宣言並昭示我們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不可分離的真理。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獨立宣言》、消滅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遜，黑奴解放者、窮木工的兒子林肯，領導美國反法西斯戰爭、倡導四大自由的羅斯福，就是代表這一獨立宣言歷史傳統的美國人民的領袖。

中國人民歆羨美國人民的光榮歷史傳統。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不折不撓地爲自己的獨立民主自由英勇奮鬥，並經歷了自己的“獨立戰爭”——抗日戰爭。由於今天中國的環境與一百七十年前美國的環境不同，在中國人前面，不僅有封建勢力，而且還有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中國人民在百年艱苦鬥爭和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沒有能夠向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之後，迅速實現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今天大半個中國的人民正在呻吟與國民黨獨裁政府的虐政之下。這個政府，正如美時代雜誌記者所稱呼的，是一個“惡政府”。引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它“一貫地追求同一目標的一連串的虐政和篡竊，證明有把人民置於絕對專制之下的陰謀。”《獨立宣言》中說：“推翻這樣的惡政府，並爲人民的日後安全設立新的保障，就成爲人民的權利和天職。”可是我們中國人民向來是最寬大的。今天中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惡政府”，並不運用美國獨立宣言所說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權利和天職”，而只是要求它放棄“絕對專制”，經過和平的政治協商方式，把現政府改組爲民主的聯合政府。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人民這樣仁至義盡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採取了什麼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發動大規模內戰，就是加強特務恐怖，就是血腥鎮壓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運動，就是不惜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利益來維持它的“絕對專制”。

對於中國這樣也“惡政府”，美國當局方面採取了什麼政策呢？誰都知道，美國當局今天的政策，是無條件地以強力支援蔣介石政府，使它有恃無恐地堅持獨裁內戰，陷中國於內戰、恐怖和貧困的慘境。美國當局，除了已經進行的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如以大量物資供給、裝備、訓練、運輸蔣軍，替蔣軍護路、築路、保護港口、長期在華駐軍等方式助蔣內戰）以外，還向美國國會提出軍事援蔣法案。這個法案，不僅將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而且將使蔣軍完全成爲外國的附庸，將使中國變爲菲律賓第二。這就是說，美國帝國主義分子，通過中國的獨裁者蔣介石，企圖使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還要嘗受殖民地奴隸的滋味。這是中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美國人民是不難瞭解中國人民這一正義的立場的。他們一定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還要受另外一個外國的統治，繼續殖民地的生活，那麼美國人民能不能忍受呢？顯而易見的，美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幾不願做奴隸，也不願當做奴隸主。”但是在今天美國，卻有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正在妄圖做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奴隸主”。無疑的，曾經飽嘗過殖民地壓迫並從這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美國人民，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對於中國人民的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的鬥爭，是一向具有熱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惡政府”所統治，那麼中國不會有和平，世界也不會有和平，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災難，也是對美國人民的災難。因此，美國人民對於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想做“奴隸主”的企圖是痛恨的。美國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對當局干涉中國內政的運動正在增長；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宣言、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紐約分會的反對使美國陸軍訓練中國軍隊的決議和德拉西議員在衆議院的發言僅僅是幾個例子而已。際茲美國國慶，我們除向美國人民致熱烈的慶賀外，並號召他們發揚獨立宣言的光榮傳統，一致起來制止當局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軍火，要求當局立即撤回在中國領土上的海路空軍，要求政府和國會撤銷軍事援華法案，迅速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這樣使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能夠不斷增進，中國兩國的經濟文化關係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日益發展。

我們中國人民堅信：我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鬥爭，必然獲得美國人民及其他各國人民的有力的聲援，正如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獲得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戰爭中獲得歐洲大陸各國人民特別是英國人民的聲援而阻止了英國當局的干涉一樣。中國人民一定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國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國人民運動的聲援下，不管還有許多巨大的困難和阻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們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7 月 4 日

紀念傑斐遜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國開國元勳傑斐遜先生的誕生二百零二年的紀念日。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他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他畢生為平民的利益而奮鬥，特別是堅信著農民是美國文化的基礎，所以他就畢生為農民生活的改善與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他堅信著人類不分膚色、宗教、國籍、男女，都應該平等自由，所以他在有名的給馬迪遜的信劄中，強調地指出了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法案明確地列入美國憲章裏面。很明白，因為人民沒有這種權利，就不足以“明確規定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與不受威脅。”“上帝給我人以生命，同時即給我人以自由”，這是他早年就懷抱了的思想。這種思想發展而成為《獨立宣言》，而成為《權利法案》，而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洶湧奔流的時候，也就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民主是不可分割的，這正和和平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一樣的真实。我們要在戰後創造一個普遍的世界和平，我們就必須根絕世界上任何一地任何一國的干涉人民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思想與體制，忽略乃至縱容法西斯殘餘及其變形擬態，是有害而有罪的。傑斐遜先生寫過：“權利法案為人民所有，可以對待全世界上任何政府（不論其為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政府），公正的政府不應拒絕或加以干涉。”在戰後和平方案正要在舊金山會議中籌議的今天，我們認為重新提出傑斐遜先生的這句名言是有它重大的意義的。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在戰爭沒有波及美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說過：“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且為此權利而奮鬥，”現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全體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蘭宣言）

——《新華日報》社論 1945 年 4 月 13 日

## 真實的民主戰士

• 羅 泊 •

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民主國家，但是要從美國開國史中去找尋關於民主主義的完全的理論，我們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為民主主義的經典的《獨立宣言》，內容是何等單純，所謂“天賦人權”的說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會覺得太幼稚了。

但是我們若真正的用歷史的眼光，把自己也好像置身於十八世紀中葉的時代中間，那麼我們一定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的罷？我們可以看到一批真實的民主戰士，他們是何等堅決，何等勇敢！他們的信念雖然單純，但他們是何等頑強地堅守著他們的信念，而且大聲地說出他們的信念，毫不含糊，毫無顧忌，而且在行動中貫徹他們的信念，再不掉頭回顧一下。他們雖然說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論，但一切學究的理論在他們的偉大作為之前豈不都是蒼白可憐的存在了麼？

假如歷史的運行究竟不是在紙面上，而是在實踐中；假如民主主義並不只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的信念、硬是非這樣幹不可的生活態度，那麼我們不能不景仰這些在一百六十年前的從新大陸的“賤民”中站起來的民主戰士。他們建造了新的天地，開創了新的歷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類為反對法西斯、保衛民主而戰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從他們所言所行中得到無限的鼓舞。美國的開國英雄共同持有一個信念，就是：人與人是生來平等的。關於這點，他們並沒有引經據典，寫出有系統的理論，而或許在他們看來也不必要做什麼理論的說明，因為他們覺得這本是自明的道



理。他們演講，就講這個信念；他們寫小冊子，寫論文，就寫這個信念；他們行動，就要在行動中貫徹這個信念；他們流血戰鬥，仍只是爲了實現這個信念。脫離這個信念而生活，那就是說，不把旁人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或者忍受旁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和他平等的人的待遇，——對於他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試摘錄點當時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雄的話來，就可看出他們的信念是何等單純而又何等執著。像年青的哈密爾頓(A·Hamilton)說：“人的神聖權利，絕不是從陳舊的字紙堆裏找得出來的，而是用神聖的大手筆，好象用太陽的光輝一樣，寫錄在人類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遠不能被人間的權威所塗抹或者遮蔽掉的”。這是何等的堅信啊！霍布金(S·Hopkins)又說：“一個人倘若有服從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隸！他有個惡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隸；他的主人，縱然善良，他也仍舊還是個奴隸”。這又是何等鮮明的昭告啊！美國革命時代的民主戰士們就是這樣地尊重著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這樣地判然劃分奴隸與自由人的道路，絕沒有徘徊中間的餘地。因此，當時還有一個人說：“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執役作卑賤的奴隸的時候，誰又能不去拿起卜魯特斯(Brutus)的無情的刀，克林威爾(Cromwell)的鮮紅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亨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於是當時的十三州的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遲疑地拿起他們的刀斧，打了七年仗，爭得了他們不做奴隸、而做自由人的地位。

這一切看來真是再平易不過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誠意地承認並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權利，那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國獨立戰爭發動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發表了一本宣揚民主觀念最有力量、對革命的發生有直接影響的小書，這本書的題目不過是《常識》二字(Common Sense)。歐洲的王公貴族所視爲毒蛇猛獸的民主主義，對他們不過是常識，因爲那已浸透在他們的全部生命中了。在這小冊中有這樣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裏，一個誠實真摯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著冠冕的惡漢，對於社會還有價值些。”真正的民主戰士，就不過是最誠實最真摯的人。獨立戰爭的領袖，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小學教科書上的祈櫻桃的故事是已經使我們知道的了。

解放黑奴隸固然還是在獨立戰爭後數十年的事，但獨立戰爭中的人物如華盛頓和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是已反對奴隸制度的了。因爲這種制度顯然和他們的信念不和。領導反對奴隸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據了獨立宣言的精神而說：“方今是一個交換的世界，凡不願給旁人做奴隸的人，就應當不願以旁人做奴隸。凡拒絕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應該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這樣的人縱然有了自由也絕無久享之理”。這正是說，壓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這是何等輝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于木匠的職業，和華盛頓同樣是最“真誠懇”不過的人。

就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真實的民主精神和真實的民主的戰士。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 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從華盛頓總統直到林肯總統，美國歷次的戰爭，都是爲民主而打的；美國目前所參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爲民主，應當是爲民主。

這原因一半是美國的立國是由於人民要求民主而來(獨立戰爭)；一半是從這個立國基礎，使美國人得到一種體念，就是羅斯福總統對傑斐遜所下的評語：“傑斐遜對於人類之所相信者與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與吾人同信人類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這信念是美國兩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結論，不但是教訓著美國人民，而且應當是全世界人類的教訓。

“任何帝王暴君與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旨哉斯言，這正是打破一切法西斯侵略統治者任何藉口的一把利刃，一個鋼錘。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短評

爲了人類

• 史 綱 •

爲了人類！爲了人類！  
於是年輕的美國，升起了旗，  
吹起了號角，擊響了戰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結集了世界愛自由的人，  
開始實驗著新政體，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歐洲，  
早他六年就說了“自由、平等、博愛”，  
年輕的美國卻從出世嬰兒  
那時就實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沒有高高的巴斯蒂爾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種歷史——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結合——不是分離——的歷史，  
年輕的美國一章又一章的寫  
喬治·華盛頓寫，傑弗遜寫，  
林肯寫，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羅斯福在爐旁著述。  
我們該如何羨慕年輕的美國，  
像一個圓球的民主國家，  
能平滑地滾動，富於彈性的蹦跳，  
不象多邊多角的法西斯統治。  
年輕的美國沒有對人類失望，  
將來人要知道世界本是個圓球。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sup>①</sup>等人的談話

美國已經干涉了有它的軍隊和物資運入的每一個國家。這種干涉不一定是有意，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國的影響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因爲它使國民黨有可能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澤東指出，他對這個詞是有異議的，因爲這個詞用在下面這種情況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將爲中國廣大群眾所歡迎，因爲他們需要民主，只有國民黨才反對它。

美國現在的地位完全不同於珍珠港事變剛發生的時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撫慰蔣介石。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爲戰爭計，他應當做些什麼。美國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幫助他。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的其他方法是多談論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在美國，每一個美國官員和任何中國官員談話時，可以談論民主。類似華萊士的訪問就提供了良好的機會，這種機會應當更多一些，不要錯過孔祥熙在美國的機會。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象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於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於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分佈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製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美國刊物對國民黨提出批評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馬上就看得出來。甚至看來常常會暫時地產生不良反應。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話，國民黨就會辨別出來），就會引起國民黨猶豫考慮，因為國民黨需要美國的支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謝偉思（1909—）美國人，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1944年7月陪同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主張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因而在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職。本文選自謝偉思訪問延安後給美國政府寫的一篇報告。

中美兩國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相互同情、彼此瞭解和利害相關的緊密聯繫。雙方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本質上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麼低，不能採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

美中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她不希望在高級的特製產品上與美國競爭。而美國爲了它的重工業和這一類產品，需要出口市場，它同時還需要爲投資尋找出路。

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並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最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產品。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農產品，可以作爲外貿和外國投資的補償。

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

由於上述原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產生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即使對國民黨來說，事實也很清楚，中國的政治潮流是傾向於我們的。我們堅持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個真正偉大而又民主的文獻。孫中山不是共產黨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會很快過時。即使國民黨崩潰，我們也會堅持這個宣言，因為它的總政策是好的和適用於中國的。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綱領的每一項條款，都可以從這個文獻中找到。

當然，我們並不假裝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我們也面臨著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問題。但是，我們正視它們，我們正在克服它們。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監督和批評。我們經常自我批評和修訂政策，朝著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象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裏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沈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

[我對他強調美國的重要性而忽視蘇聯，提出了疑問。]

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戰後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於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忙於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

（我開玩笑地說，“共產主義者”的名稱可能使某些美國實業家不放心。毛澤東笑起來，他說他們考慮過換一換名稱，但是如果人們瞭解他們，就不會感到害怕。）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是沒有偏見的。我們的減租是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據未付實施的一項國民黨法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使這樣，我們也不過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為我們不需要趕走地主。我們對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慮到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並不是絕對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實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我們既沒有只吸收西方機械技術的天真想法，也不對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感興趣。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請看我們這兒以有限的資源已經做了些什麼）。其次，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象蔣介石在他《中國之命運》中所談論的。我們將關心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瞭解你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華萊士先生的偉論：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華萊士副總統到重慶，今天是第五天。這去幾天裏，他發表了三次演說，一次和中外記者談話。他的言論，有其一貫的精神：堅決消滅法西斯，國際國內的民主主義，對中國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並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對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堅持抗戰，真是讚揚不止的。他也曾叫學生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又說學生“都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力的人……這偉大的力量，用去打擊和消滅法西斯……法西斯是人類的禍根！法西斯不能鏟草除根，人類是沒有和平幸福的”。他認為勝利和平，安定幸福，決定於科學和民主。這又“實以教育理工方面之專門訓練，及民主主義之自治為最善方法”。有人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他卻認為中國人民早就有了這個準備了。他更強調的說，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對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華萊士副總統說這些話，我們確信決不是“捧場”，這正是既賦有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又深刻瞭解“人民的世紀”的意義和中國人民實際情況的政治家的衷心話。

這是“人民的世紀”，這是人民的戰爭，看到並信任人民的人們，都會得出同一的結論。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的話，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羅斯福總統年初致國會咨文中所說的擴大民主的含義，和華萊士副總統常常說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義。

中國人民處在“人民的世紀”和人民的戰爭中，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更提高自信心和責任心，應該怎樣加倍努力呢？

華萊士副總統說，美國援華物資，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緬路打通之後，會增加得更多。這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希望這些援助能夠達到前線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同時，我們也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句直率話，不管美國運多少物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們相信這句話只有象華萊士副總統這樣瞭解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這樣坦白地說出來。這句話決不是表示美國不願意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困難，更不表示中國經濟困難沒法解決，而只是說中國有力量解決這種問題，這種力量在中國國內，在中國人民。其實，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莫不如此。

我們聽到華萊士副總統的一番話，就很容易瞭解為什麼美國全國團結得那樣好，為什麼艾森豪威爾將軍統率的盟軍能在法北勝利；為什麼尼米茲海軍上將統率的海軍，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馬里亞納和菲島之間，獲得海陸空三方面的大勝；為什麼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能夠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進展；為什麼史迪威將軍在緬北，陳納德將軍在中國上空能夠發揮這樣大的陸空威力；為什麼美國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我們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擴大民主。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固然是為了收集情報，供給羅斯福總統，我們卻不能放過機會，從他那裏獲取可供借鏡的東西。中美兩國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紀”，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並肩作戰，應該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勵相互規勸，相互學習，攜手向著民主、更民主的勝利大道走去！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6 月 24 日

羅斯福的廣播演說：四大自由

一個強有力的攻勢，正在全世界展開。

這是同盟國在軍事攻勢之外的一個政治攻勢，向法西斯主義進擊的民主主義的攻勢！

這是雪球般的運動，越滾越快，越滾越大，越滾越有力。任你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它。這又象狂瀾決堤，無往不屈。任你是什麼妖魔鬼怪，也經不住它，終歸是沖刷一空。

野獸橫行的世界，需要它；烏煙瘴氣的世界，需要它。它帶給人類以自由和平及幸福。它給人類帶來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終於要爆發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義大利這座火山，終於給法西斯主義第一個爆炸。人民的呼聲，終於是人民的。邱吉爾在大西洋對岸一聲怒吼，太平洋上也發出了羅斯福的又一聲巨響。民主自由，震天地響遍幾大洋。

民主是呼聲，是力量，是勝利的保障。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國所一致崇奉的，讓我們試引一點他的話：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于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義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擔任這工作的，就是義大利民衆，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遵循墨索里尼希特勒待遇它所佔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擄掠和饑饉的方式。”

“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佔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決心為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的尊嚴，使為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和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我們已開始履行這一諾言了。”

只有徹底反法西斯的，堅決擁護民主的人物，才能這樣自信的提出這樣的民主主張。羅斯福說這些話，更可見其偉大處。

羅斯福的民主主張，正是義大利和一切法西斯國家內人民的主張。眼前的事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血”的口號嗎？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懲罰法西

斯的組織和領袖嗎？是的！“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義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毀法西斯黨嗎？（被略）是的，義大利的人民是在為四大自由而鬥爭，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而做本身命運的主宰！

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應該受尊敬的，因為他們能夠代表民主主義的精神。

我們聽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民主呼聲，真是興奮。因為這是勝利的保障。我們聽到義大利人民的呼聲，也非常興奮，因為義大利就要見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曙光了。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被略）

我們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來，參加到謳歌四大自由的大隊人群中去。

勝利在招手。（被略）讓我們大踏步的（被略）迎接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3 年 7 月 31 日

## 東西不同論（二則）

1 渥太華雜誌說：“英國人民對於反對黨的討論、辯論和評論，非常重視，所以由國庫撥款成立反對黨，使之評論政府。”

看了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驚。理由不辨自明：讓人民來評論，這種辦法是不合於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習慣的。東西文化的不同之點，恐怕這倒是一例。

——《新華日報》短評 1944 年 10 月 25 日

2 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

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

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短評 1944 年 10 月 3 日

延安印象記：共產黨對美國的友誼是真誠的

〔美〕·白修德·

共產黨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傾向美國的，因為他們認識了我們（美國）將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認識了我們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實行這個政策中，他們一切的宣言現在是向美國說明三種意見。第一是說明他的黨在抗日戰爭中擁有龐大的力量，一個可以直接配合美國作戰的力量。第二是說他們黨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軍隊，是以有作為的民主的制度為根據的。第三是說該黨願永遠和美國作朋友。

關於共產黨所能調遣的軍事力量，那是沒有問題的，其範圍，可以從日軍及其附庸軍隊在那些地區的配置上反映出來。

關於民主的辦法，現在也沒有問題。共產黨現在實行民主，是因為民主有利。你可以請一個曾經被踢打被欺負、而其父親傳給他過去受壓迫的記憶的農民來，然後，你拿他當人看待，徵求他的意見，讓他選舉當地的政府和治安機關，讓他自己去表決減租，讓他自己去選舉軍隊和民軍，假如你做了這些，你就給了他以社會的權利；這樣，他就願意為社會和給予他們權利的黨二者而戰。附和或者選舉另外任何人與另外任何黨，對於他將視為可笑的了。

這種共產黨的民主領導，是否可能在戰後，在那政治可能腐敗的大城市裏以及有著完整組織的富裕的善辯的反對黨派的地方實現，還得等將來決定。共產黨覺得，如果一切階級裏的成人都能有選舉

權，那麼，黨就能夠掌握群眾；因此，民主便確實地成為中國本身、共產黨和群眾三者同時發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共產黨所宣佈的對美國的友誼，現在是真誠的，而如果他們的友誼能夠得到相同的友誼的話，可能成為一種長久的友誼。抗日戰爭是如此的艱苦，使共產主義者，成了民族主義者；而同時，日本的任何敵人，都變成了他們的知心好友。作為日本主要的敵人的美國，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更覺得美國能夠在產生和平與將來中國有秩序的發展中有最大的幫助。他們說中國經歷戰爭太多了，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來，這個國家一直在流血、破壞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夠受了。

中國共產黨由經驗中獲得理論，從其早年的鬥爭時起，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程了。現在，為將來的中國，它需要美國的友誼，比需要其他單獨的有條件的強國的友誼更多。雖然，它需要這種友誼，卻不象一個乞丐求乞，而是如一個朋友在進行一個共同的事業中求援。無論有沒有這種友誼，他們的抗日戰爭必將繼續勝利而後已。……

——《新華日報》1945年5月14日

## 加強中美人民的合作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在反對法西斯黑暗勢力的共同鬥爭中，是更加增進了，鞏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已經在戰爭中用血來凝固了。

從前的飛虎隊，現在的第十四航空隊，他們在中國的上空作戰，勳功卓著，已博得兩國人民同聲的讚美。他們的血流在中國的大地上，已與我國人民的血膠固在一起。在中印緬戰區，我國遠征軍，從美國那裏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國軍事專家的訓練，已經變成了一支新的勁旅。現在，中美軍隊在印緬邊境並肩作戰，在野人山的叢林裏，在胡康河邊，獲到了不斷的勝利，他們的血流在了一起。

中國人民特別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這幾年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從美國那裏不斷得到軍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貸款。美國還派了許多技術專家來幫助我們，也派了許多學者來華講學。最近中美又合組東南訓練團，由美國軍事專家來訓練我國軍官，幫助我們編練新軍。我們的苦難和不幸，在美國引起了共鳴。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作戰努力，在美國引起了興趣和討論。所有這些，無疑的，都是貫注著美國人民的那種民主思想和進步行動的崇高的信念。

事實證明著：中美兩國友誼合作的增進，是關係著兩國人民的生存攸關的利益，是關係著他們的力量的增長、他們的生活的幸福與繁榮的獲得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理由要求美國援助我國一切抗日部隊；我們歡迎尼米茲將軍的戰略，也贊成史迪威將軍的聲明；我們重視美國朋友對我們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我們這樣做，是從加強中美兩國人民在各方面作戰努力上的配合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認為沒有援助，就不能作戰，就不能改進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就不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中國人民是擁有無限的潛在力量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能夠發掘出來的。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華北敵後軍民，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打擊敵人，收復廣大的地區，從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的建設，就是一個雄辯的明證。我們應該在自己戰場上主動出擊，來在戰略範疇內取得廣泛的合作，爭取更多的幫助。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同樣，我們批評孤立主義，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的疑懼，認為我們有排外的傾向，而只有被美國人民所歡迎。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接著不僅適用於人與人之間，也適用於國家民族之間。

中美是太平洋的兩個大國，兩國人民的親密合作，並肩作戰，對擊潰日寇，有著極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團結得更堅固，合作得更緊密，抗戰得更積極！

## 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鍾 穎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裏時常成為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莫洛亞

三百年以前，當英國的歷史還充滿著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權的時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帶著憂鬱的心情，懷著自己的信念，渡過大西洋，流徙到這塊沒有開墾過的荒地上來了，幸福的陽光和暖地照射著他們，他們在這裏坦開胸懷，盡情地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貞的墾荒者啊，你們的樹不盡的血汗辛勞，已給自由民主的理想開闢了一條廣袤的道路來了。

他們為了完全擺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鐵枷，1776年的獨立戰爭爆發了，獨立宣言淋漓地發揮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類生而平等”的誓言，永遠地鐫刻在每一個美國人的心上，他們堅決地認為創造者給了他們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了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為了自己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犧牲無數人的生命來進行獨立戰爭；為了別人也能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從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當作牛馬的黑奴，這就是美國追求人類自由人類幸福的可佩的精神。

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全國人民又挺身進到戰爭中來了，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許多火線上，都已有了美國健兒的身影，當你向他們發問對於戰爭的感想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一句：“該死的戰爭！”但他們為什麼又是那麼急切地爭著降低年齡而參加戰爭呢？這正是美國人的自由理想和羅斯福總統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著他們，正如傑弗遜總統所說的一樣：“一百年或數百年之間，喪失幾條生命，又有什麼關係呢？自由的樹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戰爭的黑手已暫時地掩隱了紐約港口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殘嗎？

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他們認為：“政府皆由人民組織而成，從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他們的公正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變成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棄它。”傑弗遜告訴美國人，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於制止政府的壓迫，林肯更告訴美國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沒有一個人善良得足以統治另一個人。”

因此，統治美國人的政府必須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政府或政黨要想存在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權益。

美國人民當然更有對於（政府）進行批評的權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關係及國家防禦等問題的發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面或反面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面吧”（傑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為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對於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產生很遲，但當決定產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

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

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於行政措施，但政府對於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採取行動的時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的。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外交問題，國務院也



要聽取報紙評論及新聞、雜誌記事及無線電廣播等的個人意見或團體意見。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採納。

爲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瞭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 1933 年又恢復了招待新聞記者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復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用是在爲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

美國還是充沛著青春力的國家，青年人正在毫無阻攔掘發著對於民主的將來，實驗著自己將來的民主生活。這些青年政治家們還在 1934 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蒙脫查馬學校舉行了一次“美國理想青年會議，”隨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 年 4 月他們更聯合教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開過一次憲法會議，此後曾一年舉行兩次立法會議。

在大學校園裏的美國青年，他們對於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著同樣的訓練。一個社會觀察家，某次隨意的選擇了幾個學生，問他們美國的民主主義已有了什麼成就和具有怎樣的潛在力，一個學生回答這一個問題說：“美國的民主主義已在世界歷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無畏精神給與他的人民了。”另一個學生說：“學校的訓導使我們開了眼界，使我們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樣具有不可數計的價值，使我們對這種制度發生了最深的信念。並鼓勵了我們在探討怎樣才是保持和擴充這種制度的最好方法。”這些回答，不過是許多答案中的兩個例子罷了。

美國還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他們不怕困難，他們更不怕新的事物，須要和平的時候，他們會在和平中努力於開拓幸福的生活；須要戰爭的時候，他們也會談笑自若的從三十層的高樓，從千百的小城鎮上夾在丁香叢裏的大街，從草原上的褐色磚房中走出來，回頭向自己的家門說聲“再會”，走上千萬哩以外的炮火連天的戰場，獻身於保衛民主的戰爭。他們相互間有著最純潔的友愛，他們見面時互相親切的招呼著“老兄”，他們的友愛不僅及於所有的美國人，而是如林肯所說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著，他自己死去，  
他愛，他恨，他傳種接代，  
無庸一個政府計劃的監察，  
這就是一個美國人！

——（英）P. BENTMEY

“愛好自由，在今日的國內依舊洶湧而穩定”。  
（羅斯福 1940 年 6 月演說）

——《新華日報》1943 年 9 月 12 日

讓思想衝破牢籠

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 李大釗 •

思想本身，沒有絲毫危險的性質。只有愚暗與虛偽，是頂危險的東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爲。

近來——自古已然——有許多人聽見幾個未曾聽過、未能瞭解的名辭，便大驚小怪起來，說是危險思想。問他們這些思想有什麼危險，爲什麼危險，他們認爲危險思想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他們都不能說出。象這樣的人，我們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險萬分。

我且舉一個近例，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不曉得他們也是和我們同在一個世界上‘一樣生存’而且比我們進化的人類細胞，卻說他們是“鬼子”，是“夷狄”。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一場義和拳的大禍。由此看來，到底是知識思想危險呢？還是愚暗無知危險？

聽說日本有個議長，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行托爾斯泰的學說，彼邦有識的人驚為奇談。現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說我國人鼓吹愛國是無政府主義。他自己果然是這樣愚暗無知，這更是可憐可笑的話。有人說他這話不過是利用我們政府的愚暗無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來開玩笑。唉呀！那更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原來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關係，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邊走路，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為都不含著危險的性質。若是“盲人瞎馬，夜半深池”，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見危險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來的，都是黑暗造出來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實，什麼東西什麼境界都不危險。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愚暗是達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障礙，也就是人生發展的障礙。

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麼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而沒有矯揉造作的儘量髮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說某種主義學說是異端邪說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義學說是什麼東西，然後把這種主義學說的真相儘量傳波使人人都能認識他是異端學說，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於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認清，只是強行禁止，就犯了泯沒真實的罪惡。假使一種學說確與情理相合，我們硬要禁止他，不許公然傳步，那是絕對無效。因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滅，這種學說也終不滅。假使一種學說確與情理相背，我以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為大背情理的學說，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隱藏起來，很有容易被人誤信的危險。

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益也終不滅。世間本來沒有“天經地義”與“異端邪說”這種東西。就說是有，也要聽人去自由知識，自由信仰。就是錯知識了、錯信仰了所謂邪說異端，只要他的知識與信仰，是本於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實，一則得了自信，二則免了欺人，都是有益於人生的，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還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們，超越他們。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有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

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然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我奉勸禁扼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藉口危險思想來吝止言論自由。

——1919年6月1日《每周評論》第24號

## 駁“灌輸”理論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託在青年身上。這是不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著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遊擊區裏，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捨身為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著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為求其穩固起見，

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爲求其普遍起見，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氣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氣圈；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著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前一種主張認爲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曆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爲，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啓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覺的自願的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衆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系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定對於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經過說服、引導，只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衆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於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徵逐、聲色狗馬，占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純潔身心。於是讀死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結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脫了節。於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繫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產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爲人民大眾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相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於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的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裏面，關起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餵養得出來的，而是在複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正象棟梁之材不是在暖室裏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社論

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

奴隸的語言

• 蘆 蕪 •

在暴君的眼裏，奴隸們不過是“能夠說話的工具”。然而，說話畢竟是危險的事情，憑著說話，奴隸們不僅會傾訴出對暴君的憤恨，而且會使同命運的奴隸們由散沙變成凝聚的力量。於是，依賴著皮鞭和槍刺，暴君更使奴隸們變成了無聲的羊群。……

錘打著堅強的石塊，一定會迸裂出火花；敲鑽著結實的木頭，一定會騰冒起煙氣。除非是擊打著散沙碎石，才會迎刃而碎，無聲無臭。皮鞭、槍刺下雖然會產生一些歌頌“主上天威、天王聖明”的大小奴才們；但更重要的是奴隸們必定生長出憎惡和憤恨。皮鞭可以敲擊得奴隸們無聲，但它決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長。淫虐使得大多數奴隸們學會了“哀悲而疾視”。皮鞭、槍刺暫時鞏固了暴君的統治，但它又得到“教聰明了奴隸們”的結果。

雖然是“工具”，奴隸們畢竟還能夠言語；槍刺下固然不允許大聲疾呼，但奴隸們卻學會了囁嚅而道。雖然，聲音是那樣的低沈，那樣的微弱，但奴隸們畢竟不甘於忍受無聲的恥辱了。這聲音將會慰藉著受難者的創傷，吐露出對喝血者的嫉惡，激勵起復仇的願望的。

正象岩石下的種籽，雖然被阻塞，被壓抑，但它終於彎彎曲曲，從石縫裏成長起來，從岩石的重壓、荊棘的軋斫中間，讓幼芽迎向陽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會盤根錯節地生長得更結實，更茁壯，能夠忍耐嚴霜，承受風雨，儘管它沒有溫室裏的花草那樣豔麗引人、逗人憐愛，然而它是值得誇耀的，因為它曾經和岩石和荊棘戰鬥過來。岩石雖然帶著要壓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潰和風化的將不是盤根錯節的樹枝，而是專橫頑固的岩石。

雖然是彎彎曲曲，樹木終於會從岩石的重壓下生長起來；雖然是微弱、低沈，奴隸們終於吐出了心中的憤恨；當奴隸們由囁嚅而出變成了大聲疾呼，由低徊的估傾到群眾的呼嘯，槍刺將阻止不住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們的命運也就是終結的時候了。

征高盧、滅龐培，愷撒該就算嗚呼叱吒的“英雄”吧！但獨夫之旁畢竟還有勃魯脫司那樣的人物；梟雄如愷撒，始終還繼續不了他的統治，在他的屍體旁邊，奴隸們早已就發出過鋼鐵的巨響了：

“我們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耽誤，趕快把這公佈到全羅馬的各處！”

——《新華日報》1944年2月1日

## 讀書與自由

幾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無須說明這是一個純潔的熱血青年，他對現在的某些不大開明的學校，很發了一陣感慨（我不敢名之為牢騷），原因是他們的生活越過越難了。青年的路子越過越窄了，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這且不說，青年人吃點苦原算不得什麼；但最苦惱的是：住在學校裏沒有讀書的自由，懷著一腔熱血，滿心想愛國，希望替國家民族真正做點事情，然而卻又無行動的自由，到這裏青年們似乎實在失去了最後的忍耐力了。可是現在正是抗戰呀，不忍一口氣又能怎麼樣呢？於是乎苦悶，苦悶之餘，便覺感慨橫生了。

說到這裏，似乎應該發點議論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們，素以“讀書救國”論者自居的，竟不准學生有讀書的自由，某某報看不得呀，某某書包含著“危險思想”呀，學生應該坐在教室裏老老實實呀，真囉嗦得夠噲。試問學生在學校裏不能夠自由讀書，他還來進學校幹嗎？難道單是曉得了課本上的那點知識就夠了嗎？學生進學校不是為了來求知的麼？

不特此也。尤甚於此者的，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固然不能讀；即使連看文藝小說也覺有些“不穩”了。真是白晝見鬼，豈不令人笑掉牙齒！

讀書固可貴，自由尤為可貴。我們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學校裏有自由讀書的自由。難道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嗎（所謂讀書，當然要把漢奸書報除外，凡系抗戰書報均有自由閱讀的權利）？噫歟！今之世，難矣哉！

——《新華日報》1940年4月7日

## 論“天真無邪”

• 李 普 •

有人這樣說：“據說蒼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都戰慄了。”蒼頡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單說現在吧。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這倒是確確實實的；否則，不會有人這樣害怕。

但是，據說“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是最自由國家之一”。這句話卻很費解。幸而隨即就發現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給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據說，有一個軍營，“他們的言論是很自由的。”何以見得呢？“在壁報上，他們和軍官開玩笑，互相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好了，秘密就在這裏。

“天真無邪”是好字眼，年紀大的人常用這幾個字來稱讚無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於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就帶了開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輕人對於長者，下屬對於上司，那就更不能用了。有哪個奴才敢對他的主子說“你的言論是天真無邪的”嗎？沒有，沒有這樣大膽的奴才。由此可見，這四個字和“言論自由”或“批評政府”之類連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無邪”者於我無損也。惟其幼稚，所以於我無礙，那麼你說吧，我給你這個自由。

這位先生恐怕我們不相信，特地從那些壁報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資證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覺，其腳臭氣熏天。連床者問曰：為何老不洗腳？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現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腳？”

事實上上面並沒有這種命令，用這位先生的話來說，“這是對軍營命令服從之類的輕微嘲諷，並非真正三月一洗腳。”於是某先生贊曰：“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為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發都不准碰；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鴨！

嗚呼，這真是“最自由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 沙漠化的願望

• 田家英① •

法蘭西滅亡以後，我們曾讀到 I·愛倫堡的幾篇通訊。去年《文摘》轉載過《法國怎樣滅亡的》，其中有一段記述著戰後法國文化統制的情形：國際作家協會會刊《和平與自由》被禁止了；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由於作品缺乏而停止審評；報章文藝副刊均明令取消；書店多停了業，剩下的只能出幾冊《歷史》之類的東西；“法國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這末後兩句，真說著了歷來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幹”。聖君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看來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著的了。最適於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是必須使下民們存在在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幾年來努力實現著的“沙漠化”的願望，也已經有了它的政績。今年一月八號的《新蜀報》，記載著重慶書業的情形：

……新書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著原來的形象之外，其餘的都改變了面目，原是充滿了有關於抗戰的讀物的書架，而今卻都是《家》，《春》，《戀愛三部曲》，《胡適文存》等戰前的文學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數偵探小說、恐怖小說了，明顯地含著抗戰意義的刊物或成本的書籍，則寥寥無幾……至於舊書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書，出租的舊書……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等舊小說……（志淵：《文化的墮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見的了。荒涼，冷落，這說明大後方的文化界還剩了些什麼。

不過，中國的官家比之法國，卻也有些不同，不那樣直率，講方式，多奇謀，所以同樣是沙漠化的願望，同一是焚圖書，禁刊物，封書店，逼作者，但我們這裏就還有許多排場，言行也極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過“建設文化”，宣佈要改善作家生活。雖然提高了稿費，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則根本沒有寫處；加給小學教員幾元津貼，偏要說得和人類文化前進如何有關。拆穿看來，這終於不免是一場笑話。

也還有移屍詐騙的方法。對於文化荒涼，我們還不時能夠聽到一點“憤憤不平”的聲音。譬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來，據說：“國家養‘士’，而‘士’何曾對得住國家？……戰前作家們叫過‘國防文學’，民族戰爭，抗戰後那裏去了……唉，哀莫大於心死！”這真令人拍案

叫絕的。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汗，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歎裏，注定了“心死”的候補者。

但奚落的物件，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蟲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鶴的君子，還做定可以飛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們就還有不少指定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這些人之成為名流，並非有文，大多是因為開會。文協有他，文化界動員大會有他，一切文化活動莫不有他。人們也就不能不公認此文人也，實則多是挂了招牌，並無貨色，不過出賣人頭的探子而已。當然也有幾個能文的貴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時發一點匡時之論。這是一種偷進花園和小姐相會的，化為小生的醜腳，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裝接吻，看久了，不過使人連真接吻也厭惡罷了。此外，那些說今天是“戰國時代”，寫著藝術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們，也都還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作品是談“夢的現象”，既不包藏政治陰謀，也無關於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其實是連毛孔裏都滿藏毒箭，正在向凌遲之際而尚未氣絕的人放射過去。

自然不易射死，於是還需要嘩啦一番。種種專事造謠的小報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蘇”；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魯迅陳年老帳；或罵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聞》的一篇《周末閒談》。作者說：“提起那些自命為‘前進’的文人，就使我們咬定牙根。”從這些中間真使我們聽到了切齒的聲音。

然而，咬牙並非解決問題。“自命為‘前進’的文人”還擁有大量讀者，壓迫到不能用筆，也還是留著一張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務日報》上就發表過《籌設中國文化銀行計劃書》，說是要“放款”了，只要來是不愁豐衣足食的，但以後就不再聽到了下落。這是很自然的，簞食壺漿弗得即死，而“嗟來”與之猶且不受，何況恩威並濟，盛氣凌人，去領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勞而獲的寒士。證據是：去年“文化獎助金”據稱已經發了，但我們至今沒有讀到受獎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獵犬的狺狺，並不為看客歡迎。書刊已經不少，指定派訂也已經用盡方法。有教授作文，黨部推銷，照理可以風行天下了吧，但事實並不如此。人語是被抑殺了，而魍魎的嗥嘯也不見得就能夠傳播開去。

一方面沒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壇的凋萎這就成了必然。有骨氣的出版家多停了業，存在的則無書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戰前的作品。官辦的書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義文學體系”，但就連這一類作品也沒有寫出來。這使得一種以介紹新書為主的《讀書通訊》，到今年就不能不變為談英語、論詩詞的刊物。因為文壇乾淨到幾乎一本新書都沒有了，無從評起。

這真是沈重的沙……

但卻絕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麼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曾經被“戰國”派教授們讚賞過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詩”，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國就還有用結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戰的作品在，這些作品為大量青年所愛戴，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從吞吐含蓄中間傳達著中國人民正如何受難、如何掙扎又如何成長——這就是反沙漠化的願望。

儘管迫害，儘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去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時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員。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楊晦教授在中大演講：文藝必須爭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障創作自由

（中大通訊）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國文學系請楊晦教授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民主》。來聽講的同學相當多。楊先生先解釋了這個題目的意義和講的動機後接著說：“文藝本來便是民主的。在人類的童年原始時代，沒有個別的藝術家，大家都可以參加藝術活動，人人都有表現藝術才能的機會，這段時間的藝術作品極豐富，和近代的藝術水準比起來，毫無遜色，這為什麼？因為這時的藝術是完全在民主的條件下產生的”。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縱然有，也是病態的東西。“一般認為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文藝活動特別高漲；但其實，以中國面積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這點文學成果和俄國法國短期間比較起來，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時唐朝是個開明的時代，情形就會更好些了。”文藝不只是民主的產物，並且應該民主。這裏楊先生從表現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說明：“文藝注重形象、注重表現的本領，然而，不民主的社會環境偏偏處處破壞人的表現才幹，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藝應該爭取民主，爭取人人有創作的權利”。楊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藝象一面鏡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藝也是爭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最近報紙上載著救濟院內虐殺幼童的事實，這是想象不到的殘酷；如果這些黑暗的現象，用文藝寫出來，或者到舞臺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聞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國文學能夠這樣普及的原因就由於它不是茶餘飯後的閒談，緊緊地接連著生活中的悲慘事件，所以文藝應該爭取美好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要爭取民主”。最後楊先生更特別強調人人都必須知道和瞭解民主的關係，他引述了希臘盜火者普羅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聲調說：“普羅米修士的意義就是‘預先知道’，這位英雄預先知道了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敢於做盜火的舉動。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毀滅人類，其次他知道人類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曉得了偷了火之後一定要遭受殘酷的懲罰。然而單是這三點還不夠，他敢於這樣做，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楊晦教授的講演，就在這裏結束。同學們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覺興奮。星光從天空灑下來，沙坪壩的沈悶環境是不會再長久地維持下去了。

——《新華日報》1944年6月12日

## 言論自由與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注）的報紙，因為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版發行被干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遊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制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 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佈的兩種。除明令公佈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凋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



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道。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道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

####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爲；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剷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 陸定一 •

一位元新民報記者問我：“有人以爲，中國記者不如英美記者，你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我不以爲然。中國記者是並不遜于別國記者的。英美記者固然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記者，能在重重壓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實消息透露給人民，這種經驗，這種本領，則遠非英美記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樹，生在平坦的地上，長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頭縫裏彎彎曲曲生長起來，雖然樣子矮小，卻確是不容易。”我這裏所說的中國記者，是指大後方的大多數記者而言的。

世界上爲什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爲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啓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爲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爲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爲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爲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爲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戰爭中，人民是誰？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以及一切愛國分子。他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主人。專制主義者，則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使人民求生無路。

《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

八年過去了。今後怎樣辦？

這樣辦：（一）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二）力求真實，絲毫不苟。

我希望《新華日報》這樣做，希望大後方一切爲民主而奮鬥的記者這樣做，並且希望給《新華日報》以經常的指教批評，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聞界裏創造出一種新的作風，就是爲人民服務的作風，力求真實的作風。以此作風，來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創刊八周年紀念文章

爲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對於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志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爲這種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

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姦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歐美報章報道抨擊中國檢查制度的文章，不絕於書，而我們卻受之坦然，怡然自稱我們是爭自由的“民主”強國！

戰爭結束了，英美可不必說，連法西斯的阿根廷、戰敗了的日本都已經取消檢查制度了，大家說阿根廷和日本在偽裝民主，而我們呢，好象連這一點偽裝的勇氣也沒有，“即將”取消、“決定”取消，話也聽得很久了，實施何日？好象這個“國情不同”的地方，對於這把扣緊人民咽喉的枷鎖還不勝其眷戀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麼日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已經在播音機前面死掉了？

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新華日報》時評 1945 年 9 月 1 日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護），一面無時或忘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致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元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的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瞭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在羅斯福親自出席參加之下，曾通過議案，已預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起草提議，以便日後或由美國政府主持與其他列強談商，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國際間的言論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又通過決議，認為全世界新聞和通訊自由對避免未來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請由國際協定形式，保障此項自由。《聖彼得堡時報》的編輯鮑恩特，且提議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宣佈美國的國策，“拒絕承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任何政府和個人。”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

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9月1日社論 原題《祝記者節》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怕首先就應舉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於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也不只是垂諸竹帛，留諸後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並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個光榮的稱號，就得象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檢討一下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松過乃至放棄過？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於抗戰事業既忠既勇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後方，都曾為之報道消息、發揚光輝；對於抗戰不利的事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於真理、忠於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得糾正空氣”一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此種於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正的觀念，即對於宣傳一詞的瞭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衆宣傳，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聽到象“這是宣傳，盡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誌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記事不實來瞭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個絕大危機。

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誇不實。要知道，“墨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於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你的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汙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只表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們願意在今天紀念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  
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

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今天是第十屆記者節。回溯這個節日誕生的歷史，這個節日適合全國人民餘輿論界爭取抗日自由、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分離不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繼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激起了洶湧澎湃的全國救亡怒潮；當時各地新聞記者亦都爭先恐後，捲入這一怒潮，並紛紛向國民黨當局要求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壓制輿論、保障記者抗日權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國民黨當局乃發佈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此表示（雖然在這一命令發佈後，國民黨當局仍繼續壓迫和摧殘抗日的記者和輿論機關，如史量才的被暗殺、杜重遠的被判處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個抗日刊物的橫遭封閉等），這乃是全國抗日人民和輿論界艱苦鬥爭的初步結果。嗣後“九一”這個日子，便由全國新聞界定為記者節。每年此日，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的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因此“九一”不僅是記者的節日，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節日。

在抗戰初期，政治比較進步，國民黨當局對於輿論界的壓制曾一時減輕；各地新聞事業，特別是在武漢，曾呈現了一番蓬勃的氣象，對於發揚民意、動員民衆，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幾何時，在武漢失守以後，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隨之而來。幾年來國民黨內反動派鉗制輿論、摧殘民意的行爲，日甚一日。到了現在，大後方輿論界已經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氣消沈、邪氣高漲的可痛現象。在今年紀念九一節的時候，我國的新聞事業正經歷著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制政策，口口聲聲強調“戰士統制”之必要，又把這種統制描寫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在“戰時”，是在抗戰的進程中，而抗戰正是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照國民黨的說法，它的新聞統制，似乎應當符合於抗戰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然而事實上怎樣呢？

孫龐等逆率部投敵，吳逆開先奉日寇之命回渝進行誘降活動，逆迹昭彰，鐵證如山，國民黨宣傳機關卻不特隱匿其賣國罪行，反而曲加辯護，稱之為“剛強堅貞”、“矢忠矢勇”。第五縱隊托匪張滌非等九個人開會十分鐘，假借名義，狂吠反共，挑撥內戰，破壞抗戰，為全國正義人士所不齒，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竟將張逆通電廣為傳播，勒令各報照樣登載。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後，抗擊在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偽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的戰報是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領樂聞的，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顯而易見的，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種新聞統制的方針，倒很像是為了準備投降日寇哩！

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義以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據民國廿六年政府統計，當時全國報館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大後方報紙獲得核准者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尤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務混入新聞界胡作妄為，另一方面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起使他們俯首帖耳，供其驅使。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後方的新聞事業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這種現象，又正是實行獨裁、摧殘民主的標誌。這樣的新聞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

就民生問題而言，讓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河南災荒，來再次說明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是怎樣執行的。河南災況的嚴重為近百年來所未有；凡有人心，聞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當局正應督促各報據實披露，向海內外大聲呼籲，庶幾可以籌集鉅款，救濟三千萬災黎的生命，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氣。奈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粉飾太平和掩蓋其救災不力的責任，竟令國民黨報之拒絕登載輿在的消息，同時卻大吹大擂，發表宋美齡宋子文等在美國和英倫不負責任的言論，說“中國沒有災荒”，一直欲蓋彌彰，騰笑中外。而國內報紙竟有因發表為豫省難胞呼籲的文字而遭處罰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報發表這樣的社論而被處罰停刊三天）。這樣的蔑視難胞痛苦，喪民族元氣的行爲，誠不知國民黨反動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積居奇的頭子不准揭發，貪贓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革命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於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還有抗戰力量，所以亟亟于惡化民生、摧殘民力呢！

綜上以後，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之點，這種反動的新聞統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行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制輿論，壟斷輿論，是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的藍本。

和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完全相反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正確新聞政策。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漢奸和法西斯第五縱隊則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遭受嚴厲的鎮壓。各種報章雜誌及其他宣傳品，只登載有利於抗戰、有利於民主、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論，而破壞抗戰、破壞民主、擁護法西斯的文字則絕對不准發表。報紙和人民大眾維持著密切的聯繫；除了職業的新聞記者深入民間採訪以外，還有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紙投稿；記者們在前線一面工作，一面戰鬥（如何雲同志即為其中英勇犧牲者之一），在後方則於業務之暇，積極參加生產。這樣的新聞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聞政策。在大後方，亦應當實行這樣的新聞政策，但是這有什麼希望呢？

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其手段之毒，為害之烈，有過於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袁張等屠殺少數異己記者，已經鬧得全國騷動，而國民黨反動派則更進一步，企圖室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此種政策，若讓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則不特全國新聞事業有毀滅之危險，而且民族正氣將被喪盡，抗戰大業亦將遭受不堪設想的損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大後方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提出紛紛抗議！在今年紀念九一記者節的時候，全國熱心抗日、愛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

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臨了！墨索里尼已經倒臺，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讓我們加倍努力，為抗戰和民主而奮鬥吧！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解放日報》社論 1943 年 9 月 1 日

要為真理而鬥爭

• 小 亞 •

人民喉舌須尊重

我輩頭顱要看清

——王鰲溪遺詩

今天是記者節。

讓我首先為言論自由而犧牲在屠刀下的前輩同業致哀！

據我個人所知的，有：

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斃的邵飄萍。

一二八後在南京雨花臺黑夜槍斃的王龜溪。

就在那前後，在鎮江被顧祝同槍斃的王××（姓名一時想不起）。

抗戰後在成都被槍斃的朱亞帆。

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獄中的羊棗，在南通被特務挖眼割鼻、沈屍江底的孫平天。

但，這只限於在報紙上公開過的，其餘暗中被害者，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

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為記者職業而犧牲則一。個人敬致衰心的哀悼和紀念！

記者被稱為“自由職業”，甚至有人尊為“無冕之王”，而有些從事新聞工作者，也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認為自己“超然”。其實這完全是與事實不符的。

在現社會中，從事新聞工作，首先你就得確定自己真正為人民服務、抑是為統治者服務。所謂“喉舌”，本質上就有兩種：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統治者的喉舌。

作人民的喉舌，當然你就沒有自由可言，隨時可以被打、入集中營、上斷頭臺，或者“失蹤”！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換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準備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換。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論說得好：“關於一連串的打、殺，誰的心裏也明白，就是辯護者的心裏也明白，不過奉命不得不辯護”。……

選擇是項“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選擇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於人民喉舌的記者們，要自由，還須得付出很多的代價去爭取。因為四項諾言，已經被狼吃掉了！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原題《記者節》

## 民主主義的劍

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發表了一篇《歐洲的地下報紙》，在上面冠了一行標題道：“在那裏（歐洲），筆就是民主主義的劍”。

自然，這是說現在歐洲淪陷區的地下報紙正在百折不撓地為自由與民主而戰鬥，一支筆的威力等於一把劍，甚至等於無數的劍。然而廣泛地說起來，使用於報紙的筆等於民主的劍，這個比喻又何止是適用於歐洲的淪陷區？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的報紙，用在這些報紙上的筆，何嘗不應當是“民主主義的劍”呢？

而且報紙的筆不僅應當是“民主的劍”，也應當是民主的測量器、試金石。在這個劍鋒上，民主與非民主、正義與非正義應當是黑白分明、不能夠絲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陽光下，這支劍光芒四射、森然凜然；在非民主的氛圍中，這支劍光彩盡斂毫無生色。民主與否，就以這劍光的顯與隱為斷。

我們報人掌握著這樣一把光華萬丈的“民主之劍”，這是一種光榮。怎樣來發揚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陽光下能夠及鋒而試，這又是一種責任。我們請以此自勉，亦以此與同業自勉。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2日短評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

• 何思敬 •

有兩種出版法：一、保障以及發揚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殘以及毀滅文明之出版法。我們中國需要哪一種？我們中國要不要走上文明國之大道，與其他文明國一起，在世界舞臺上並駕齊驅？

文明國之道路就在於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標，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衆多而自豪。英國如此，美國如此，法國如此，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檢查制度或禁止採用檢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成為文明的母胎。

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近代文明的創造需要每一個民族都能貢獻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國人民的個性才智得到啓蒙與解放，得到自由發展，使各國人民都睜開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與內心，注意自然與精神，注意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這樣一條道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我們能希望一個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發展嗎？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專論 《出版法之修正》

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政府為了統治思想，報紙已經成了清一色，對於出版業也要來這一套。貼補政策下的黨營書業，政府予以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免除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價的原料，可以飛機“復員”，可以到收復區“接收”房產、印刷廠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書，當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頌德；虧完了本，當然可以報銷。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異己；正當的出版業，還有什麼活路？可惜不爭氣的強項作家，雖然用盡威脅利誘的方法，不肯與他們合夥；明眼的讀者，不要看他們的書，於是乎放寬尺度，凡屬低級趣味的荒誕無稽的，甚而至於淫穢無恥的書，隨便可以流行市上；無聊的文人和書賈，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只好走這條路了。一方面把學生的功課加緊、管束嚴密，沒有工夫看別的書。教科書要部編的，當然不會含有“不正”的思想。窮人根本不必想讀書、識字，大學生用公費來籠絡，還得加進特務來監視。思想不穩的教師隨時可以失蹤。青年人還讀什麼書？夠了，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當的出版業和讀書人，都被一網打盡在黑暗的地獄中，沒有人敢喊一聲冤。趁著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時候，我們要戳穿這一套戲法。自然，每個人每個事業都有他的黑暗面，而為他人所不知的。我們希望儘量的發表出來，讓有心人來救救我們。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日

以出版自由繁榮出版業：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凡是常到各書店的門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報紙上的書業廣告的人，都能發現，目前出版業中表現著極不正常的現象。無數的讀者正渴望著讀到能夠幫助人認識現實解決問題的出版物，可是新書新雜誌都顯著地減少。許多曾經每日出版若干本書的書店，現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幾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書了。在這出版業衰頹的情形下，大量地繼續不斷地印出來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報”式的書刊。前者以迎合低級趣味和麻痹讀者為目的而到處泛濫；後者的出版對他們自己是“報銷”，對讀者是蒙蔽欺騙，雖然並沒有人歡迎，也源源不斷地向市場傾銷。於是出現了很多賣弄風情、搔首弄姿的所謂“作品”，甚至《玉梨魂》《情書一束》也翻印重版；於是甚至有些官方的雜誌書籍大量印出來後，卻堆在棧房裏，任其黴爛。這些書本來只是糟蹋紙張油墨，並無什麼人閱讀。——透過這種種反常的現象，我們可以聽到讀者的歎氣、民營出版的訴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讀者在艱難生活中本已對書價搖頭，但縱然出高價，也有無書可購之苦。正當的民營出版業已奄奄一息，陷於絕境。許多作家能夠也願意供給為多數讀者所歡迎的新作，然而終於只能擱筆或寫些不關痛癢的東西。

看了這種種現象，怎能不使人憂怨、使人憤慨？一個國家的出版業情況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情況、民主程度的最正確的測驗器。目前出版業中的反常現象實在是嚴重的危機。中國人民在精神食糧上也如在物質食糧上同樣有匱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著接受腐爛不堪的精神食糧，或甚至以砒霜來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勝利，要使中國不再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這種現象絕不能繼續存在。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人民一定能夠自由地得到合於他們需要的讀物，也就是一定有一個自由的繁榮發展的出版業。或者說，以繁榮的出版業來供養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糧是自由的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幟。——由這裏我們就可以解釋目前民營出版業困窘、出版物在質與量上都顯著衰頹的現象產生的原因。

抗戰打開了人民的頭腦。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各種書籍。抗戰開始的一年內出版業繁榮的現象即由此而來。假如出版家能夠不受任何障礙，繼續自由地供應合於需要的書籍，廣大讀者自然會全力支援他們。縱然物價高漲、百業艱難，但只要出版物銷數多，定價仍可不至狂漲過甚，自由的出版業也決不至於不能維持。

同時，在自由的市場上，不合現實需要、不受讀者歡迎的出版物自然會淘汰，出版物在質上也就一定能不斷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分人傾向於低級趣味、喜歡無聊色情作品，這其實是在過去任何時期都有的，不過當正當的出版業繁榮之時，投機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數，它們的讀者也有可能被引導向正當讀物。只是因為現實的苦惱既助長了人們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當的出版業又萎縮不堪，才使色情書籍能夠泛濫一時，幾乎成為出版業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為此扼腕歎息，但未始沒有人在暗中竊笑，以為得計。正本清源，要克服這種危機，也非使正當出版業自由發展、正當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還必須在紙張、印刷、交通運輸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後方紙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如何發展紙業生產，而不是統制紙張。在紙的統制下，平價紙的不均等的供應更加速了民營出版業的末運。再加上多數印刷所被控制、郵寄運輸上的重重限制，書刊未出之前先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既出後仍有被停止發賣的危險，把民營出版業逼得一籌莫展。這許多實際情況不改變，出版業衰頹的現象是絕對無法挽回的。

最近有三十家出版業聯名發表緊急呼籲，他們沈痛地說，他們將“被迫從出版崗位上總撤退”，要求當局給以紙張、印刷、郵寄、資金周轉上的便利。我們以為他們的要求是極端正當的。這些出版業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崗位至今，是值得讚揚的。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堅持，全國作家和廣大讀者，一定都會支援他們的主張，來要求解除對於出版業的一切束縛，要求給出版業以自由和繁榮發展的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原題《出版業的危機》

.....

學術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受非法干涉。反對學術自由的人，常把學術自由看做是“隨便”說話，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獸。這還了得？然而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駁。學術自由是有益國家民族的，特別是對於現在的中國。歐美民主國家的學者也一向是維護學術自由的，他們的這種鬥爭是和反法西斯的戰爭相互聯繫著的。

只有在法西斯的國家才會把學術自由當做是洪水猛獸！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權以後，首先便焚毀了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僅在柏林一地，就消滅了一萬餘科學書籍和古典文藝書籍。一切知名的學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殺。過去的德國在科學上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現在卻只剩下了一輩假借“遺傳學”、“優生學”、“人種改良學”的偽科學家。從此，德國便陷入反科學的黑暗時代。

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文化的意義上，就是要維護學術自由，反對摧殘人類的精神遺產——文化。

中國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中國需要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極豐富的內容，如選舉，如黜官，如結社，如演講。而學術自由就是民主精神與民主習慣中的最要緊的東西。我已經讀過張申府先生的《友聲與民主》，他說：“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兩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習慣或民主精神。一狹一廣。二者當然相關，是互相制約、互為因果的。沒有民主政治，民主習慣大概不能普遍；沒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實現。因此才所以特別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團體盡可能的培養些民主精神，養成些民主習慣，以開創風氣，以為天下先，以為後世訓”（《新華日報》1942年9月27日）。這話我完全同意。我還要說：在大學裏提倡學術自由，就是為了培養民主精神或民主習慣，而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

干涉學術自由是不當的。自古以來，凡能提倡自由的時代，其學術必能昌盛。周秦時代學術最發達；到宋朝，私人講學之風甚盛，天下學子，聞風景從。到了清初，乾嘉諸老不聞政治，於是脫離現實，專門從事古代經典之訓釋與考證；自由講學風氣，不復得見。

民初的北京大學，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時提倡學術自由，蔚為風氣，影響全國，收效後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相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而近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發育在此了”。有這種精神，文化才能發展、國家才能進步。

我們再說說外國的情形。譬如英國的牛津大學，一向以古老著稱，學生教授還穿著中世紀僧侶式的黑袍，並且還保持了許多過時的習俗與環境。然而牛津當局對於學生的求學，卻是採取極端放任主義的。幾年前曾來中國的世界學聯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畢業生。他曾對我說：“牛津的風氣已經變了，什麼思想都有，什麼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競爭，但絕不超越一定的範圍。”這是很好的。牛津絕沒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學生當做政爭的工具，教授更不問學生的黨派。提倡教育獨立，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

歐美民主國家尚且如此，我們中國是要超越歐美的民主政治的。國父考察了歐美民主政治以後，認為還有很多缺點，所以才創造了國父的民權主義。那麼，在中國，要有更大限度的學術自由，是絕對應該的。

.....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1日

#### 獎勵自由研究

人類歷史上的前進運動，常常和思想自由的開展是分不開的。因為如果思想運動不能自由開展，如果讓陳腐的、不合理的獨斷教義支配著人們的意識，如果不容許人們擺脫既成的死的教條的束縛，

而依據社會發展之新的要求，來從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於在現實前面把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黑幕，使他們不可能看清當前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不可能辨別什麼是應該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麼是應該打倒的黑暗勢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對黑暗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不可能正確地推動革命運動。不論中外古今，每當革命轉變的偉大時代，常常隨伴著一個文化上的啓蒙運動，開展自由研究的風氣，打倒不合時代的因襲權威，剝斥現實中的黑暗事物，啓發新的時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識……。

在今天的抗日戰爭過程裏，我們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革命運動。在這偉大的鬥爭洪流中，我們需要對於客觀現實的各方面的正確知識，作為前進的引路明燈。我們需要關於自己本國的社會歷史的知識，也需要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世界各國的社會歷史知識。在我們決定鬥爭的戰略策略的時候，這一切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對我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我們也需要關於自然界的各種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在我們進行經濟建設以克服長期戰爭中的物質困難時，也是不可少的。我們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學術上理論上的知識，以便從各方面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但要能掌握這些知識，就必須一方面積極地號召各種專家及知識份子，幫助和鼓勵他們從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提倡勇於追求真理而不顧忌一切因襲教條的作風，就必須提倡自由獨立的研究作風。

抗戰初期，全國的文化界曾表現出一時的蓬勃高漲的氣象。隨著政治的進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論的自由，得到了開展的機會。然而不久以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策動了投降反共的陰謀，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動也就隨伴著投降分裂危機的發展，在大後方許多地區擡起頭來。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論遭受禁止，而讀經誦古的運動卻強迫推行……。

但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在的各抗日根據地區，卻一直沿著抗戰、團結、進步的路線向前邁進。在政治經濟方面，固然有了飛躍的發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時在不斷進步。當著大後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於工作，甚至於不能工作的今天，在邊區，特別是延安，卻聚集了很多的全國有名的藝術家、理論家、科學家，以及大批的知識份子；學術研究的空氣，一天比一天高漲。

中共邊區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綱領裏，特別明白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一項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只要他們能認真地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能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這些貢獻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

必須把自由研究的風氣大大的開展起來，不但在陝甘寧邊區要這樣，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據地也要這樣，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必須號召全國人士，特別是文化界以及知識份子，起來反對大後方束縛言論思想自由的倒退現象。這是與反對妥協投降危機分不開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報》社論 1941 年 6 月 7 日

## 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 潘梓年① •

關於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近來各方人士頗多論列。一般的講，大家是認為學術思想應當自由，大都認為這種自由是民主國家重要表徵之一。間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論調的，但已甚少從正面來加以反對，他們只能從側面來反對，說這種自由不能是絕對的，總或多或少地應當加以某些限制。這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沒有人能夠過分違逆它。

我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須弄清楚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要從政治上來提出，來討論；要把它當做具體問題來處理，不能把它當做抽象的東西看。就是說，主張學術思想應有自由，是說學術思想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不是說學術思想應象野馬行雲那樣，漫無規律地亂闖亂撞。例如有些反對思想自由的人說，若思想絕無規矩準繩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殺，說，某一種限制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發展。他問：思想若不受邏輯的限制，則不合邏輯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則不道德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國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等等。這種反對論就是有意把問題弄混亂了，好來混水摸魚，就是先把別人所提的具體問題拖到玄虛之中去，再對它鞭打一陣的辦法。目前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誰也不會認為不合邏輯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們只是認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邏輯，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學術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應讓學術思想自己來解決，不應由外力來干涉，由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就拿邏輯來講吧，沒有了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這種思想來，也不能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棄，更不要說這種思想能否算是一種學術了。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憤怒，一經發現，大家就要起來加以猛烈的攻擊。試問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衛之流妥協投降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思想推薦到大後方來嗎？果然有人這樣來推薦的話，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的嗎？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更是如此。在抗戰建國時期，妥協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著發點國難財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這些思想，儘管會在有些人的腦子內縈回奔騰，卻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提到論壇上來；儘管會有些人不聲不響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樣做，卻沒有人敢於公然提出那樣的主張來。為什麼？就是因為思想界斷然不會容許這種思想出頭露面的緣故。所以我們說，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主張思想自由的人，是認為思想的是非曲直，應讓它在自由發展中自己來解決，不要用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來主張思想自由，把思想當做漫無規律的東西。這一點，是談思想自由問題時，首先就要弄清楚的。

進一步來討論，所以要主張思想自由，正是為的要來加強思想自身的規律，要讓這個規律在思想的自由開展、自由發展之中壯健起來，堅強起來。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種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於公然提到論壇上來的固然不會有，但很可能穿著偽裝來出現，或彎彎曲曲來偷運，或強詞奪理地來武斷，或甚至憑藉某種優越的勢位來欺凌。遇有這樣的情形時，在思想自由的社會裏就自然會有人出來加以剖析，揭露，勾微，發隱，使它鬚眉畢現，無所遁形；或群起而攻，使它特強難逞。否則趙高指鹿為馬，也無人敢加指斥，那就連是非曲直也不會有，還講什麼道德，講什麼國家民族的利益呢？至於邏輯，更要明顯，真理因愈辯而愈明，邏輯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規律是蘊藏於思想自身，正如身體的康強蘊藏於身體自身一樣。要求得身體的康強，必須首先解除有礙於身體的自由生長的一切束縛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規律的壯健與堅強，必須首先解脫障礙思想自由發展的一切束縛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

從這一點上來看，目前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可以說就是要來把人類的思想自由從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來，民主國家所以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它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兇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層，蒙巴頓將軍就曾指點得異常明確，他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臺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又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這樣說話的確是非常明智的，卻也是非常平凡的。我們所以對法西斯誓不兩立，所以對於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生死以之，對這戰爭看做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是因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佔我領土，掠奪我財產，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靈，而且也是因為它還要剝奪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滅我文化，毀壞我文明。那麼，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沒有的事嗎？

也有人這樣說，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戰時又當別論，因為戰爭須要力量集中，從而須要意志集中，從而須要思想集中，從而思想就不能講自由。這種說法，真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在這一

問題上，美副總統華萊士曾提供我們一個很賢明的意見。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周年時向中國廣播，其中有一段說：“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殷鑒，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華萊士這話還說得不明白嗎？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不但沒有戰後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連目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也沒有勝利可言。

華萊士這一段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要以為不過是那麼說說而已，事實上並不見得是如此，那麼就請看看事實吧。試問我們到底憑什麼來和法西斯強盜作戰呢？我們憑什麼能夠確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軍事工業發達嗎？是的，這一些自然在必要條件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這些條件遠比敵人差，為什麼我們竟敢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且堅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呢？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這些條件上仍然還是劣勢，為什麼我們的勝利信心仍然還是屹立不搖？蘇聯在這些條件上，至少在對德抗戰之初並不見得比德國為優，為什麼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蘇聯必勝，而且現在蘇聯確已大捷頻傳，快把敵人完全逐出國境了呢？沒有別的，這裏有一個關鍵，就是民主，蘇聯的人民向來保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民主國家所以要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統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國家的戰鬥力是要從人民身上獲得的。只有廣大的人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時，國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則就算你僥倖取得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高度現代化的軍事工業，也終於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則是蘇聯。後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國。蘇聯就因為他每一個公民都已有了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權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能夠泉湧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餘年之中，把貧窮愚昧的帝俄一變而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蘇聯，所以能在抗德戰爭之中生產突飛猛揚，戰術精進，兵源泉湧，戰士的英勇和犧牲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誠，使全世界都為之驚歎不置。因此，我們可以明瞭，華萊士那種說法，確乎完全是從事實中探究出來的真理，絲毫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華萊士所指出的這個真理，對於我們中國，特別值得珍視。我們所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正多，需要人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評的思想正殷，需要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能戰勝法西斯日寇，為了要能和同盟諸民主國家並駕齊驅，也同樣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在武裝、戰術、軍事工業等等條件上，使我們的對敵劣勢有所改進，更是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學術思想的自由，決不是和作戰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於作戰能力的提高的。

還有一層，學術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學來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哲學等一切學術思想來說的。目前一般人士，對自然科學可說已開始重視。不過實際上的重視的還是偏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對於自然科學理論，科學思想，科學態度等等，還未免重視得很不夠，還是讓少數自然科學家在四向呼籲。至於社會科學，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這實在是莫大的缺陷。這兩種科學實是同樣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說對目前中國不能不有個輕重緩急的話，那麼，社會科學暫時有比自然科學更值得被人重視的理由。因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必須首先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能夠找到解決的途徑——正確的解決途徑，作為基礎才行。同樣的自然科學，在有些先進國家就發展得遲慢以至於停滯，在蘇聯等民主國家就發展得非常之快；同樣的自然科學，在蘇聯等民主國家發展起來就真正成為國利民福，在法西斯國家發展起來就適足以禍國殃民；這裏的差別，正就在於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都能正確地解決了，另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則還沒有能夠解決，或沒有能夠正確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需乎社會科學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科學，對於目前的中國是迫切需要的。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社會科學也比對自然科學更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爭論，要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繁複得多。爭論愈多，愈複雜，它所需要的自由發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為是非是愈爭愈分明，真理是愈辯愈深透，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學術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講，是指一切學術來說的，特殊一點來講，尤其要指社會科學來說。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3月26日

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就是從思想上徹底打垮和消滅法西斯主義。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戰勝侵略我國的日本法西斯強盜，使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貫徹到底，取得最後勝利。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分清敵我，不容絲毫含糊，不容在我們的抗戰陣營之內還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不但這樣，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為了將來的建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國。或類似法西斯的中國。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反對一種誤國害民的思想毒素，這種毒素就是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要與這種誤國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絲毫含糊。只有在思想界肅清了這種毒素，才能達到“抗戰必勝，抗戰必成”的目的。因此，這個任務，是中國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務。

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同盟各國現在正與法西斯進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戰鬥，中國是進行這個戰鬥的最早一國。六年來的鬥爭，證明法西斯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徹底消滅這個敵人的。

為了徹底消滅這個敵人，不但需要武裝鬥爭，而且需要思想的鬥爭，這就是對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鬥爭。

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核心，就是假裝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都向他們國內的人民宣傳他們的所謂民族主義，但是這與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是毫無相同之點的。

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愛他們的民族。

希特勒毀滅了德國，墨索里尼毀滅了義大利，日本軍閥毀滅了日本——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使大多數的德國人、義大利人、日本人陷於貧窮、破產、饑餓，剝奪他們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後又把他們拋入反動的戰爭的深淵——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在他們的人民中間宣傳復古、倒退、迷信、盲從、墮落、野蠻、無理性、神秘主義，破壞了德國、義大利、日本原有的進步和文明——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

法西斯的所謂民主主義，就是摧殘民族、掠奪民族、強姦民族的主義。

法西斯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一夥強盜，他們強姦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頭，並且繼續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這夥強盜說，他們是最愛這個民族，他們是為這個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如果這個被蹂躪的民族起來要求自己的生路，他們就說她是“叛逆”，說她是“分裂”了國家的“統一”。

法西斯主義者所代表的，乃是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他們公開壟斷了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這種壟斷比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壞百倍。但是他們卻假仁假義地攻擊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不要臉地宣佈他們所代表的乃是“全體”，他們的經濟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

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的利益不代表全體的利益，一個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體的利益，這就是法西斯的數學。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向一個人要求生存的權利，叫做“煽動階級鬥爭”，一個人剝削迫害九十九個人，反而叫做“階級合作”，這就是法西斯的邏輯。

法西斯最後只有不要邏輯，用極端的唯心論和唯心史觀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直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他引到個人的提高，是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對旁的民族的蹂躪就更不用說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宣揚的“王道”，我們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忘記。

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已經來了。我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現在所進行的戰爭，就是滅絕法西斯的戰爭。我們叫做民主陣線，因為我們不但現在反對法西斯，將來更反對法西斯，我們流了這麼多的血，就是為要實現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將來的中國和將來的世界，一定不允許有無論什麼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絲毫存在。

這個思想，在大西洋憲章裏已經有了確定的表現。大西洋憲章第六條規定“待納粹的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以後羅斯福和邱吉爾又都再三發揮了這個論點。

我們中國不但在擁護大西洋憲章的華盛頓公約上簽了字，並且還有孫中山先生全部反對法西斯的遺教。

法西斯主義是否認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公開發傳非亞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並且公開侮辱了中國：“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和中國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個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做德國人。這就是我們的種族開始不純正。”但是孫中山先生卻再三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破民族間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國“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坐到“中國境內民族一律平等”。

法西斯主義是冒民族之名來壓迫剝削本國人民的。墨索里尼說：“法西斯革命（？）創造力的根源就是組合的國家，即經濟力量完全劃一於調和（？）的國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其中是根絕了的。”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卻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孫中山先生批評辛亥革命的根本失敗，“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

法西斯主義既然要“根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也就是要“根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西斯主義認為民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認為人民不應該有什麼自由和權利。希特勒說：“大多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少數人可以決定。”但是孫中山先生卻主張少數人不得決定，只有大多數可以決定，主張“以人民為主人，以官吏為奴隸”；主張“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孫先生不但堅持現在是“民權時代”，並且預言民權主義“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發達”；中國只應該比法美更進步，造成俄國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國”。在經濟上希特勒黨的政策大綱明白規定著“國家統治一切社會化的企業，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齊亞諾等也就在這樣的“統制”“劃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財閥。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卻是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論上反對法西斯，而且在行動上反對法西斯。中國這樣的民族，本是只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但是還在民國十三年，居然就有個買辦資本家陳廉伯，為了破壞孫先生在廣東的革命根據地，陰謀要求廣州成立什麼“法西斯蒂的政府”，孫先生不顧某些外國人的壓力，毅然決然地反對了陳廉伯，這就是有名的商團事件。孫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國和全世界反對法西斯的急先鋒之一。

為了反對法西斯，為了貫徹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中國一切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來加強抗日戰爭的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的力量。加強全國人民為光明的將來而鬥爭的信心和熱情。

在這個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中，三民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應該是親密的戰友，因為無論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是與法西斯主義不能並存的。

“五四”和“五卅”是中國民主思想的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根據地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二十二周年紀念日。這三個紀念日這樣巧妙地聯合在一起，應該是思想界反對法西斯大聯合的一個象徵吧。



中國抗日戰爭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萬歲！  
中國思想界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及其勝利萬歲！

——《解放日報》社論 1943 年 5 月 5 日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 力 民 •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衊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只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 論選舉權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象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幾千萬裏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裏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奸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只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於哪個黨派、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只是漢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漢奸，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假使我們對漢奸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于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物件。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

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2 月 2 日

## 競 選

街頭的議論界熱鬧起來了，大選在村民們的心裏，好象坡裏黃黃的麥穗一樣，一天一天成熟了。六月一日婦女會召開了會員大會，討論後提出婦女的候選人。“咱婦女會員要當選村長，張大媽做公事認真、負責任，真正擋上擋下的人才。保證每月開個檢計會，拉一回清單，保證減租交息……”。會員都喊道：“對呀！咱去宣傳，公民小組開會，咱一定要提出來對大夥說說”。各種團體開會完畢之後，競賽開始了！大會嚴肅、緊張。上任村長報告一年村政工作並檢討了自己，當他報告檢討完了徵求大家意見的時候，人叢中幾個人自言自語：“你都檢討出來了，咱沒的說了”。

接著討論通過候選人，會場頓時寂靜了。青年李××說：“××前年大掃蕩，他歡迎了鬼子，不夠候選人資格”，張大嫂也說：“我也看見他歡迎鬼子來著，俺娘兒躲在小溝裏，看見他打小白旗，迎著大路走去……”會場立刻應和起來：“對呀！沒有資格”。舉手表決後，選委會從黑板上擦去了××的名字！牆腳兩個老大娘在議論：“活這麼大年紀還才看到村長是自己選呢！”“是呀！這二十一個人是從大夥中用篩子篩出來的，象蘿面似的，越蘿越細，你看張大媽多能幹呀！咱們的代表”。這時，又有人站起來發言：“我介紹李大嫂做候選人，今年春荒，人家滿鍋清水，還是一天到晚東跑西奔的辦公事”。

二十一個候選人通過了。馬上就要投票，張大娘嚷著：“慢點，你再多念幾遍，我記不得。”大家挑選著物件，一邊挑一邊批評。會場熱鬧極了。監票人李××，最後把票包起來，很重的用指頭蘸上封了包。他對人說：“咱活了這麼一把年紀，第一次嘗嘗民主的味道。”

在開票前，村民們在坡裏互相詢問著：“你投了誰的票呵？”“又不太離兒，還是張大媽幹吧！”

晚飯後，公民們急忙走向會場去，當票開完，被選人各階層人數相等，會場異常靜肅了。

第二天，公民們都說：“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這些才是當家人呢”！

——《新華日報》1944 年 1 月 16 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 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近年來，很多大中學校中有“民主牆”的設置，這是一個好現象。但假如只有在這一堵牆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牆的精神應該發揚，使整個學校，每一個學校都成為民主的堡壘。

說學校要成為民主的堡壘，這就牽涉到學校是否要和政治牽連，學生是否要過問政治的老問題。但這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並不是要把學校捲進政治的漩渦，讓學生成天去做政

治的活動。恰恰相反，假如辦學校的人及教師和學生不一起努力來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結果就使得學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壞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學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學。這幾年大後方學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證明。據說，有一個大學的負責人自負為“以辦黨的精神辦學，以招兵的辦法招生”。又有人說，有的學校拿了國庫的經費，卻只在培養“升官、發財、造謠、生事”的人才。這話也許言之過分，然有著這種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並不是沒有認真辦學的人，但是他們被當做教育官署的下屬，經常要應付各方面來的公函訓令，一會兒要注意那幾個教員，一會兒要嚴防那一些學生，試問如何能叫他安心辦學？也不是沒有認真教書的教師，更不是沒有認真讀書的學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惡狠狠的面孔高壓著他們，監視著他們，威脅著他們，叫他們如何能安心的教書讀書？在這種情形下，不學無術的官僚可以主持學校，靠面子有後臺的人可以當教授，挂起手槍橫行不法的學生可以坐享公費。這簡直可以說是斯文掃地。假如不改變這種情形，恢復學府的尊嚴，後患何堪設想！

很多人慨歎近年來學校國文程度的低落。其實何止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程度的低落。學生試卷上暴露出的對於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無知，那決不應該做為笑話來傳述。應該使人痛心地感到黨化教育的貽害。中國現在已進入和平建國時期，沒有千千萬萬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做中堅，談不到建國。學校的任務太重要。中等學校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初級人才，大學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高級人才。國家要建設，必須要安定；學校要培養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意思就是要使學校的內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擾亂和破壞，讓辦學的人能安心辦學，教書的人安心教書，學習的人安心學習。

和平建國綱領中在教育項內規定“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又規定，“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教學內容”。這規定很切要，也就是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使學校能負起培養建國人才的辦法。能夠做到這樣，學校就成了莊嚴的民主堡壘。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後，學校應該讓真心從事教育事業的學者去辦，西南聯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長成為委任職的官員，是極壞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此後，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在黨化精神下所訂的各級學校課程標準應該征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學校內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現行的統一招考，教育官署審定教授教員資格等制度也是變相的干涉學校行政，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氣就能有安心教學的環境，就能促進科學和藝術的進步發展。學校內部情況的變革固有賴於外面的政治社會的進步，但學校是應該做移風易俗的先導的。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夠給中國帶來民主與科學的福音，首先使學校變成民主的堡壘。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2月6日

## 斥“人格教育”

• 舒 蕪 •

士氣怎樣敗壞，“人格教育”怎樣重要，這些呼聲，不知由於什麼一種觸發，近來又常常出現在時論中了。人們引證“經商易得、人師難求”的古訓，對於今之教員，深致其不滿，責備他們只作知識的販賣，而不會建樹人格的儀型。似乎有一種企圖，要從這些呼叫中把整個教育引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這裏面包含了一種陰謀，而這“新的”方向其實是舊的，完全陳舊的。

教育，是社會的、階級的武器。沒有一個社會、一個階級，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國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數到現在，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餘年古國古”，倘要說清末以前就沒有教育，那可說不通。我們這些習慣於新式教育的人，對於以前的教育，總覺得格格不納，總覺得那仿佛是全然相異的別一回事。不客氣的說，就簡直覺得那並非教育。太學國學，以及州郡府縣學之類，不必說了，就是常為論史者所嘖嘖稱羨的書院，倘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過去，也會感到陰森窒息，一

點也沒有所謂“春風化雨”的風光。好在眼前就還有什麼“複性書院”之類，只要去參觀參觀，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這是本質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從的；民主教育則是建基於理智主義之上，要啓發自由的思考，鼓勵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於受教者的實踐，但在怎樣使之實踐的關鍵上，就有了決定的分歧。

柏拉圖說：知識即道德。實在的，凡與知識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來闡明、經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說，沒有理智主義的基礎的“道德”，都不過是僵死的教義的武斷，陳腐的習俗的盲從，統治者打造出來的精神的桎梏。反過來，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聖。因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鬥爭之路，這個路必需深湛剛強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現在說，新式教育錯在注重智育，應該轉而注重德育了。這話就表明了那所謂道德，是在理智之外，與理智不相容，就證明了那“道德”其實是什麼東西。

不過，空言不如實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應當有一個能實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體的儀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許會這樣解釋的吧。只要不是機械論者，當然不會否認，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這人格也應當是一個合理的存在，也應當能被理智所闡明；第二、效法這儀型，也應當通過深徹的瞭解，不能只是盲目的習慣的跟從；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體的儀型，究竟還是社會生活，不是這個或那個的個別的人。而社會生活又就並非不要理智所能認識清楚的。

今天的社會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不必在這裏說。姑且借用一句老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大體上還是如此。據說這種荒淫無恥，大大的引誘了青年人，他們看到這條穩當便捷的路，覺得平日接受的知識、所指示的路都迂遠艱難，就紛紛的就彼而舍此。於是，陰謀者也就趁機站出來，說道：由此可見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識無用了，有些知識也適足以濟惡了。就這個情形來說，知識可以說是無用的。但絕對不是說一切的知識，而是說今天一般學校裏所傳授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僵死的，脫離了社會生活；不但不能說明社會生活的真相，反而會掩蔽它的。社會生活的全面，是莊嚴與荒淫、光明與黑暗、新生與沒落的交織。今天學校裏所傳授的知識，當然不會公開歌頌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無意的，卻嚴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這個時代的通向光明，爲了光明的努力、爭戰、進行，新生的東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視作洪水猛獸，不許在黑板上或講義上透露分毫。新生的東西又究竟比較的不甚顯著，不如荒淫無恥之彰彰在人耳目。這樣，青年人之易於被荒淫無恥所引誘，當然就是當然之勢；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於“智育”的加強，以有用的知識代替無用的知識，以現實的知識代替迂遠的知識，以知識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輸，以社會生活的全面說明代替歪曲的描繪；絕不在於廢棄知識、絕滅文化——這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我們的民主主義的、理智主義的教育傳統，是可珍貴的；儘管它曾經被封建主義的殘餘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滯，更曾被東方法西斯主義所強姦，卻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貴的，在青年的啓導、鬥爭的組織、文化的促進這些巨大的任務上，我們的教育起過什麼樣的無可估價的作用，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加以抹煞。別有用心的，拚命的誇張著“教育破產”，想藉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靜坐觀心、踱方步、記功過、灑掃應時進退：這些，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知識即道德，愚蠢即罪惡。人格，決不是反理智的東西。

——《新華日報》1946年7月30日

紀念“五四”，貫徹爲民主自由的鬥爭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紀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運動，在反帝、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之下，曾經猛烈地反對舊政治、舊文化、舊禮教，實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開闢了民族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紀元。從“五四”以後，在

中國表現得如此的明顯：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眾政治運動，以中國工人階級爲首，在艱難困苦鬥爭中，在曲折崎嶇的道路上發展起來；另一方面，舊的政治與文化在被群眾強烈的打擊之後，買辦官僚的代表又從東西洋運進一些法西斯主義的貨物，在舊專制主義的基礎上，再加上那種法西斯主義，以繼續壓迫人民，戕害青年，並企圖從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國民黨右派舉行法西斯政變以來，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戰士及青年爲之而捐軀的數目，在中外古今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八年抗戰，在國民黨一黨統治區域，爲愛國與民主而奮鬥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殺，依然是無數的。在那裏一切講學、讀書、出版、發行的自由，被殘酷地摧殘。復古成爲時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學校中，秘密偵探、欺詐迫害、武裝威脅、金錢收買的特務作風，盛極一時，教育與學術的尊嚴，掃地以盡。一切知識份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無論在街上家內，好好的一個人會被突然抓去。集中營裏至今還關禁著數萬無辜的青年。然而同時，中國的光明也畢竟在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湧現出來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從敵人的魔手下奪回來，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保證了文化方面的徹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發展和大衆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沒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愛國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設的蓬勃發展，青年思想的活潑發展。這一個對照，已經最好地說明了一切。

它說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爲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爲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爲富強。

它說明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科學，與自由思想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人。萬惡的納粹黨徒戈培爾說過一句法西斯主義的格言：“當誰在我的面前講起智力的問題，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槍來。”這句話，實際也正是爲中國的法西斯派所從來信守的格言。因爲法西斯主義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統治。所以它們在政治上、文化上極端仇恨思想與理智，而極端歌頌野蠻、獨斷與盲從。中國法西斯派有一條獨斷的根本教條，叫做“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規矩：大家一聽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個領袖”，就必須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表示願在這“一個領袖”的叱吒之下；只要是少數買辦官僚寡頭的利益，就要無條件服從，視之爲“民族的利益”。多少年來，中國法西斯派拼命把這種罪惡的教條灌輸給純潔的青年，一切不接受這種法西斯主義特製的思想模型的，都是異端，都被認爲該殺。拿著槍桿對著中國人民的腦袋，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的政治與所謂“文化”。

“五四”已過去二十七年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仍然是輝煌的。完全推翻中國法西斯派的壓迫，爭取全國的民主，打碎思想統制，使得中國完全新生，這是一切民主人士、進步人士的嚴重任務。

今天，中國人民爲民主自由的鬥爭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也處在一個嚴重的歷史關頭。從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無所顧忌地犯下了一連串的血污罪行。這一連串的青年被殺被捕的事件，是和當前中國的和平與內戰、民主與獨裁之爭聯結在一起的。歷史證明：中國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來，他們反抗外來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國內的法西斯壓迫者，站在英勇鬥爭的最前線，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中國青年更要再接再勵起來。

中國青年紀念這“五四”的偉大歷史日子，應該更進一步地用毛澤東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來武裝自己的思想，應該用毛澤東這個偉大的人生觀來充實“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口號，使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獲得更堅實的新內容，更明確的新目標。我們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們追求的科學，就是爲人民服務的科學。中國青年必須培養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才能真正成爲民主與科學的戰士。

各解放區的青年要爲人民服務，把中國和平民主堡壘的解放區建設得更好！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要爲人民服務，堅決打擊中國法西斯派的進攻！全國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在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下，消滅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貫徹爲民主自由的鬥爭，向著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的目標前進呵！

——《解放日報》社論 1946 年 5 月 4 日

## 民主和自由新論

• 黃元真 •

某大學的一位院長在紀念周上公開講演“民主”，說“校長為政府之代表，有資格談民主；教授為校長所聘，可以稍談一點民主；至於學生則根本不能談民主。”

可惜無法親聆那位院長先生的“高論”，不知他所說的詳細理由是什麼。但從這簡單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也不難推論一些出來。能夠代表政府的校長（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長並沒算在內），當然“有資格談民主”，而且只要能夠代表政府而決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資格，某院長本人即為實例。因為他們這類的先生們所談的不過是括弧內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政府主”或“××主”，與人民利不相關而害相連，大談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們的言論不一定都能夠代表政府，有的談到民主就要認真起來（這是每個愛好真理的學者所必有的態度），這樣會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過他們到底還是校長聘的，雙方都應該顧及到一點情面，只要在不妨礙校長以及校長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談一點民主”的。至於學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賦有特殊使命來挂名讀書的人們，都是年少氣盛，遇事更其認真，說起話來，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顧忌，若讓他們來談民主，就會要真正的徹底的來談一下，這是與校長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談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們就“根本不能談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訓青年的文章中，我們又看到這類的話，要我們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來貢獻給國家和革命。乍看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麼？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麼？頭一個問題暫且不去討論它，只就第二個來說。要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就來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麼樣的自由可拿出來貢獻和犧牲的。今天青年有集會結社、讀書閱報的自由麼？完全沒有。有談話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麼？也完全沒有。也許可以說，青年不是還有失學、失業、饑餓和死亡的自由麼（目前這樣的“自由人”真太多了！）？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樂於“犧牲”而唯恐“犧牲”不掉的，試問教訓青年要犧牲的先生有辦法讓他們“犧牲”這些自由麼？否則叫青年貢獻什麼和如何貢獻給國家和革命？說到平等，青年並沒有和一切別的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許多等級的不平等，沒有什麼可以拿來做犧牲品的。至於所謂“個人的平等”，在我這個笨人看來真太難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對自己還有什麼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發生，自然更想不到還有“個人的平等”是應該貢獻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裏可以轉回來，我們不要罵那位院長所說的都是屁話，而應該說他所說的正是實情；也不要以為這位名人對青年的要求太過分，其實這也不算什麼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實”。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雖然有時也要牽著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們來唱唱“愛自由、愛民主”的歌調（但緊接在後面的總要露出那些什麼第一什麼集中之類的狐狸原腔來），那不過是為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 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世界學生日獻辭

今天是第五屆世界學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殺布拉格大學學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學生也遭受到機槍掃射、毆辱和監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國學生代表在華盛頓集會追悼，並決定每年的今天為世界學生日，全世界學生應舉行紀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時激勵全世界學生，永遠不忘團結起來與反動勢力作鬥爭，共同為一個和平、民主、進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為什麼要屠殺學生呢？這沒有別的，只是因為不甘做法西斯奴隸的學生是每個被侵略國家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鬥爭的先鋒。因此，學生總是法西斯的眼中釘，而法西斯

也是學生和文化的死敵。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殺的殘暴手段，把學生的反抗鎮壓下去的。捷克學生終究保衛了他們的祖國，而德國法西斯匪徒卻被世界人民的聯合力量打敗了！

象反法西斯各國的學生一樣，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敵人投降之後，美國卻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內戰和獨裁的路線，中國學生又被擲入沒有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們既過著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學生天天有絕糧之虞，京滬及其他各地學生因為繳不起學費和物價過高而紛紛退學。在校學生多因營養不足而面黃肌瘦，精神頹唐。學校設備簡陋，教師待遇菲薄，致使教學無法順利進行。至於言論、集會、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殘。任何人都還記得：復旦大學學生因壁報言論觸犯忌諱，既被特務抓來罰跪毆打，又被學校當局加以處罰；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在校內集會，竟被關麟征指揮軍警開槍干涉，甚至又派兵士沖入學校，用手榴彈打死學生四人，重傷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慘案。此外，迫害學生思想自由、人身權利的事件，真是不勝枚舉。在解放區，學生們雖然沒有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直接摧殘，但，由於國民黨飛機到處轟炸，國民黨軍隊四出侵擾，使得他們不能安坐讀書。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擊敗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中國學生的報酬。

不僅這樣，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賣國，使抗日勝利後的中國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國憲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槍擊中國學生；比“二十一條”還要喪失權益的《中美商約》，更重重地打擊了中國學生對於民族獨立的願望！特別是在國民黨當局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扶助，而片面召開一黨國大製造分裂的局勢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機又尖銳地提出在中國學生面前了。

中國學生不能馴服他，做法西斯統治者的奴隸，也不甘受帝國主義者的踐踏，儘管國民黨當局為了禁止學生反對他們的賣國、內戰、獨裁政策，用盡一切方法來愚弄、鎮壓、欺騙中國學生，但是中國學生的積極戰鬥性是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的，它是嚇不到壓不了的！壓力愈大，反抗愈大。

“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國民黨當局不但倒行逆施，壓迫人民，摧殘青年，還更狡猾地，喜歡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進步的唇膏，裝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動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壞政協決議，大打內戰；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個禦用國大來制定一部偽憲法，以使他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同樣，他一方面，殘害青年學生；另一方面，卻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視“世界學生日”，其實還要假裝說點愛護青年、反對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話，以把他打扮成爲一個“進步”的“民主”戰士！這種兩面手法是反動派的慣技。但是在反動派摧殘青年、屠殺學生事實的對照之下，它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看著已經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鐵蹄下得到徹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學生們，看著全世界許多過著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學生們，中國學生應該再接再勵，擊退最後這一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爭取中國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11 月 17 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運動是促成抗日戰爭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先鋒，這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光榮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紀念日，新的學生運動又在蓬勃生長。雖然十年前和現在，各方情況都已不同，學生運動的內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中國青年抱著清醒的頭腦和燃燒的熱情而參與愛國運動的表現。

這次昆明的學生運動遭受到有佈置的武力摧殘，和有計劃的誣陷和恐嚇，但他們始終是方針明確，態度堅定。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是他們的主張，並不因任何誣衊刺激而有所動搖。在一切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陰謀下，他們始終保持著內部的團結一致，保持著行動步驟的穩重，為死者



要求懲凶，為生者要求人權的保障。今日青年的這種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動，表現了他們無愧於“一二·九”的後繼者，的確是真誠愛國的青年。因此他們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和回應。雲大教授七十一人聯名聲明，對學生表示同情，聯大全體教授罷教一星期以回應，更是過去任何一次學生運動中所未曾有過的。這正是因為昆明學生們的呼聲與行動，不僅可以代表全國的愛國學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他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意；他們不畏強暴，堅持鬥爭的精神，表現著全國人民的力量。

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道路，還是一個艱難的鬥爭過程。從這次的昆明的學生運動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慘案已經過了一星期，當局對於學生、教授和社會各方面的呼籲還是置之不顧，他們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開審訊聯大手榴彈事件”的醜劇與捏造出荒誕離奇的人物和故事來遮掩他們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們又動員了純官方的輿論，向反對內戰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們的人進行無恥的誹謗和惡毒的中傷。照理，無論怎樣頑固的人，聽到千萬愛國青年一致的呼聲，至少總該有一點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鋒下，總該有一點心悸，但這些殺人的罪犯毫不動心，他們只是把帶血的刀暫時藏在懷裏，繼續用花言巧語來否認內戰存在的事實，又用殺氣騰騰的口氣來宣傳“武力戡亂”的必要。因為他們就是製造內戰的罪魁，所以他們不敢承認內戰；因為他們口頭所說的和平解決不過是個幌子，所以他們要用全力來壓迫愛國青年和愛國人民的反內戰運動。

在“一二·九”時，北平學生有一句痛語是：偌大一個華北，竟沒有一塊乾淨土擺在我們的書桌。十年前，國民黨當局的親日外交斷送了華北，使學生有書讀不成，現在，假如聽任內戰陰謀家繼續活動下去，那就無法使學生安心讀書，也會使全國同胞長期陷落在饑餓流離死亡的苦惱生活和不自自由的奴隸狀態中。國民黨宣傳員竭力用捏造和附會的伎倆，想來證明這次學潮是由於共產黨的挑撥，這完全是徒勞無功的。既然你們自己所作所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們對於和平與民主事業，還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繼續採取敷衍、延宕、欺騙的態度，繼續堅持反人民的內戰和反民主的政策，那麼廣大人民在超過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後，到底還會做出些什麼事來，那不僅共產黨無法保證，誰也不能為你們保證的啊！

從來反動統治者都把學生運動說成是一群學生的搗亂。但實際上，學生運動總是反映著一個時期的人民的政治鬥爭。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有教授參加，有廣大社會的回應，這固然不只是一個什麼“手榴彈”案，也不只是一次罷課的“學潮”。政府對於這次屠殺學生的慘案，假如立即實行一些能令人民滿意的善後辦法，懲辦真正的兇手和負責當局，保證不再武力干涉學生自由，那麼我們相信，學生是可以而且也願意複課的。但是內戰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中國青年繼承了從“五·四”到“一二·九”的光榮傳統，一定要和廣大人民團結在一起，為和平民主的實現和鞏固而鬥爭到底。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睽睽衆目豈容狡辯 屠殺學生罪責難逃  
(輿論輯要)·

重慶輿論界，對昆明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一致同情學生。

當雲南省府改組後，就有人預言似的說：“人們卻更擔心作為民主運動的堡壘的昆明，怕也抵擋不了特務的恐怖手段”(見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慶風雨”)。“一二·一”慘案，證實了人們的擔心。當局為了掩飾其罪過，已極盡其造謠誣衊的能事，但所得結果，卻是更使正義人士憤慨。到目前為止，已經見於重慶報紙的公開聲援，已有八十餘個團體，個別捐款慰問的人更難統計。本市輿論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與純官方言論恰好成一鮮明的對照。

對學生運動的估價——反動者蔑視青年。



對此次昆明學生反內戰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和平日報認為是青年的“盲目自殺”（見本月一日該報）；恰好相反，時事新報卻將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學生運動，並且問道：“假使沒有自五四以來的歷次青年運動，誰能說中國今日是個什麼局面？八年的抗戰有沒有支援下去的精神力量？”（見四日該報）。七日大公報雖根據與事實不符的報告來說明這件事情，但也從歷史上的學生運動來說明“學生的愛國運動，都有其光榮的功績”。商務日報（六日）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歷史的推動力量”，認為在“某種政治條件存在”之下，“則這一性質的運動”，今日固可產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煥發和蔓延於全國各個地方。”新蜀報（五日）說：“每一次學生運動，都是為了國事，實際上都是一種政潮，……昆明慘劇正是一種以學生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當局“應重溫過去學生運動的歷史教訓”，這就是說：歷史上哪一次學生運動是被武力壓得了的！？

#### “一二·一”慘案的責任——反動者諉過共產黨

反動者企圖以“共黨煽動”（見中央社電及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社論），輕輕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是七日的新民報說：“學生罷課反對內戰，當地軍警出動鎮壓……，在這情形中誰是誰非，幾乎不待判斷”，“看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政府當局亟須反省”。國民公報在七日社論中，也指出：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以殘殺，“雲南省地方當局之未能慎為處理應該負責”。

#### 青年有發表政見的自由，反動者卻怕青年過問國事。

青年應不應過問國事，應不應反對內戰呢？大公報七日社論說：“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其中就有學聯會的代表，可見學生是可以對國事發言的”。只有從來就蔑視中山先生主張的人，才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無意義的，不正確的”（見五日中央日報社論）。內戰是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也只有想以內戰“統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內戰”，才有“反對內戰”便是“助長內亂”的奇妙邏輯（見一日和平日報）。新民報（六日）說：“學生們只不過是‘不要內戰’，而陰謀分子卻‘不許’學生‘不要內戰，豈不是證明這些人要內戰的麼’”？七日該報又說：“僅僅反對內戰就受到這樣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夠過問國事？……這是測驗政府究竟願否讓國民關心國事批評政治，也可以測驗政府對於人民所作的諾言，有沒有兌現的勇氣”。這些話不知那些自稱為最“保障青年們讀書、討論、開會、講演、學術研究上的自由”（見六日和平日報）的人們聽見沒有？商務日報簡捷的說：要人民不反對內戰，只有事實上不從事內戰，就是老老實實的“實現民主憲政”（見該報六日社論）。如果“國事紛亂，民不聊生，而青年學生猶漠然無動於中，依舊渾渾噩噩，這可說教育已根本失敗，而這個國家的生機也幾乎絕矣”（四日時事新報）。“何必惶惶然如臨大敵，以致引起更多的糾紛？”（同前）七日的國民公報指出這次昆明學生運動，“正是今日青年對國內政治煩悶的部份暴露”，“試問世界勝利了，我們的勝利在那裏？國際和平了，國內的和平又在那裏？”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為了國家的生存與青年的前途，還不該多說幾句話麼？不當提出自己的意見麼？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動者才不敢正視青年的苦痛與要求，硬栽汗青年是“受了利用”、“誘惑”，說那“不是代表大多數學生的運動”（五日中央日報社論），他們把昆明學生反對內戰運動歪曲為“反美”（見中央報五日，和平日報一日），欲以離間中美人民之間的友情。這種陰謀詭計是騙不了人的。“我們相信同學們反對內戰是出於忠誠，決非一二流言所能誣蔑”（見雲大教授告各界書）。名教授張東蓀先生也說：“對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學生難免要鬧起來，但這種鬧，是出於愛國同胞的赤誠，結果竟發生慘劇，是十分遺憾的”（見七日國民公報）。“近日官方電訊，對學潮事實，竟任扭曲，顛倒黑白，似在擴大政治糾紛，使問題無法解決”（見民主同盟發言人談話）。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謊言與滑稽“把戲”，也掩不了血寫的醜行！

#### 對青年應有民主態度——不可強加誣蔑，動用武力

統治者于屠殺青年之余，還沒有悔過的表示，但輿論界幾乎一致（除極少官報）主張政治應民主，特別對青年，千萬不應以武力對付，並當保障其身體、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報說：“今天是民主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治，正應該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

要多數人民關心國事，參與國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壓制人民關心國事”。時事新報也認為，對待青年“不當心存忌怕”；“不可強行壓制”，更“不可強加誣衊……指為某黨某派”。新民報（四日）說：“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實在無動用武力之必要”，“我們主張在學校以內應當讓我們的學生儘量自由，……我們以為青年們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不應躲避隔絕，而應多研究，多辯論，以期真正瞭解，我們政府正在實施‘民主’，我們以為這一點思想學術的自由是應當有保證的”。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1日

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 茅 盾 • •

“一二·九”的劊子手用大刀水龍頭對付青年學生，現在昆明慘案的劊子手卻用機槍和手榴彈了。這難道就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麼？

“一二·九”的北平學生為了“救國”在大街上慘遭屠殺，現在的昆明學生為了“反對內戰”卻在校內被“進攻”而“圍殲”了。

這大概也正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吧？

劊子手們混賴罪名的方法，最早為掩耳盜鈴的扯謊，例如“碰傷”，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後則為誣賴，為含血噴人，例如“受人利用”，“別有背景”；但這次昆明慘案除了這兩套老調以外，竟還跳出三個自承如何被“收買”的兇手來了。

這不用說也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了！

我雖然不曾親自看見昆明街上以及聯大校舍內血肉橫飛的慘狀，然而讀了昆明各校罷聯及教職員的各項文告，我對於劊子手的按語是殘酷而又卑劣。這樣的殘酷和卑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不但禽獸中絕無僅有，即在人類中也是少見的，更不用說“民主”的假面具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學生的血，自來是不能白流的，讓我們後死者咽住熱淚，沈著地踏著死者的鮮血前進吧！

——選自《昆明“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編，原題為《為“一二·一”慘案而作》

為死難學生呼籲

昆明大中學學生為反對內戰，竟遭軍警便衣屠殺毆打，死傷達數十人之多，這件事情本身的嚴重已不容我們來多贅一辭了。誰無子女，誰無兄弟，當有良心的人看到手無寸鐵的一群純潔愛國的青年，遭受當局用如此野蠻殘暴手段對付的時候，心裏會是多麼沈痛與憤慨！

昆明的學生們喊出了反對內戰，這是全國廣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學生們這一爭取和平民主的行動正是表現他們的赤誠愛國，除非是別具肺肝的人，誰能忍心加以污蔑？誰更忍心用炸彈槍枝來加以摧殘屠殺？！但是很不幸，昆明學生們這種爭取和平民主的愛國運動竟遭到軍警的屠殺，不能不令人非常憤慨！慘案發生後，那些屠殺青年的兇手們，又企圖誣罪別人，想含血噴人的把責任加在中共的頭上，但事實俱在，絕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

我們謹對昆明學生這次純潔愛國的行動，表示極大的崇敬，對他們今天所遭受的摧殘，表示極大的關懷，希望全國正義人士給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當局迅速懲辦造成慘案的兇手，並立即停止內戰，使昆明學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國能早日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4日

原題為《為昆明死難學生呼籲》

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黨徒爲了消滅德國人民的力量，樹立法西斯獨裁，玩了一個毒辣的陰謀，就是縱火把德國國會燒了，而把縱火的責任推在德國共產黨身上。好了，現在紐倫堡的戰犯法庭，證明了主使這個陰謀的就是納粹元兇之一的戈林。德國國會縱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現在，戈林自己在盟國審判之下也沒有話說了。

其實，“嫁禍”的陰謀詭計，在我們中國，幾乎成了反動派的家常便飯。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慘案。明明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鎮壓昆明學生的愛國運動而一手造成的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武裝屠殺，卻妄想抄襲嫁禍慣技；自己屠殺了青年學生，毆打了教授之後，硬把責任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以爲這樣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兇殘罪行，偽飾自己的猙獰面目了。

讓反動派聽聽紐倫堡的聲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沒國會縱火案的真實案情，難道任何捏造的謊話，能夠掩蔽用血寫成的昆明慘劇的事實嗎？！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騙不了的

昆明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不感到無限的悲憤，連日各界捐款慰問，寫信聲援，有如潮湧。足以證明昆明學生的愛國行爲和他們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國普遍的同情和支援；同時也反襯出國民黨反動派嘴臉的醜惡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本來，這件慘案的事理至爲清楚，責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學生只不過激于愛國熱忱，憑了赤手空拳，起來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究有何罪？而國民黨反動派竟採取殘暴手段，慘加屠戮，並在屠戮之後，爲了“嫁禍”起見，還不惜含血噴人，肆意誣蔑，居心惡毒以至於此，真是史無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國民黨反動派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徒見其日益心勞力拙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7日

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任憑你有怎樣偷天換日的本領，任憑你有怎樣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終究敵不過血寫的事實，血寫的歷史。

真的，這些年來，人民的眼睛已經給萬重的苦難磨煉得異常尖銳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間引起了深刻而廣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間引起了悲痛的回憶：他們想起了“劉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時代，想起了民國以來一連串黑暗的日子。

當人民能夠回憶歷史的時候，也就能夠從歷史中取得教訓，更能夠從教訓中生長起力量和信心，人民豈是可以輕侮的麼？

反動派也應該想一想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成都各大學學生爲聲援昆明愛國學生運動，於九日召開追悼昆明遇難師生大會，並在會後舉行遊行，經過情形，已見昨日本報成都通訊。

這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反對人民的任何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在昆明，採取了“嫁禍”陰謀，製造出一個莫須有的“董凱”，把屠殺學生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說共產黨“指示暴動和學潮”，又說民主同盟如何如何，這樣地把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爲國民黨反動派擴展其摧殘壓迫一切爲爭民主的黨派和人民的“根據”。這種陰謀

的一演再演，這種陰謀的毒辣陰狠，對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萬分！這種陰謀，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兇惡面目。

我們曾經一再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有一套荒謬的邏輯，就是把所有反內戰爭民主的人士都指為共產黨，而把反內戰爭取民主的任何行動都誣為共產黨的“陰謀”。他們企圖造成“合法”藉口，來實現自己假“戡亂”之名進行內戰之實的反動政策。他們不惜用流血的手段來對付昆明手無寸鐵的學生，就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套邏輯完全揭穿了。現在為了準備又一次用流血手段來對付成都的學生和一切主張民主的人士，所以，他們就又祭起這套從希特勒那裏學來的法寶了。真是卑劣無恥到了極點！

奉勸國民黨反動派們：希特勒是學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贓嫁禍”的法寶，已經到了收起來的時候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4日

#### 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節錄)

編者按：我們訪問了好幾位青年的前輩，提出幾個關於青年教育的問題，請他們發表一點意見。但因為時間和交通的困難，有許多受我國青年敬愛的前輩，還未來得及去訪問。現在就我們所採訪到手的，發表出來作青年讀者和國際青年友人的參考(本期文章編者以收到先後為序)。

一、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起碼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統一，因而決定實行嚴厲的思想統制(如象法西斯國家那樣的)，他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嗎？

三、領導青年的思想，最好是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辦法？

郭沫若：

對於國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認為至少必須具備著這幾個特點：

“1. 人民本位。為最大多數謀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變相的帝王本位，犧牲大多數人的幸福以謀少數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後者是訓練奴隸。

2. 國民教育普及。作為一個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識，即初中以下的教育，應使全民享受。

3. 高級教育保護。高級教育應因材施教，杜絕一切特權，不使貧苦者被拒、而富者濫竽。

4. 學術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儘量闡發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盡力打擊的自由。以真善美為目標，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虛偽、歪曲、變態的箝束。

5. 尊重學者，保衛師資。

6. 國際協調。與進步的民主國家保持協調的步驟，肅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類的和平”。

郭先生更認為法西斯的思想統制政策是可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德國和日本便是絕好的證明。但這並不是“統一思想”，而是“消滅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為害於人民，更為害於世界。”“使這一次的世界大戰，為爭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幾千萬人的血，而且在戰爭結束後，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肅清，還要費很長遠的歲月的”。郭先生更很沈痛的指出：“滿清入關後統制思想，使中國退化了三百年，現在卻還在受著它的餘痛”。

談到青年思想的領導問題，郭先生說：

“青年思想的領導，最好是啟發式的、感應式的、培養式的。

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都要顧到。有健全的身體，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個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則，養成自由研究的習慣，發揮自由創造的精神。

給以豐富的養料、美好的環境、高尚的師資。

廢除剪削繩束的盆栽主義。

廢除腳帶腰纏的畸形主義。

廢除髻首閹割的奴才主義。

一句話歸宗，讓青年自由自在的發展便是最好的領導”。

陶行知：

(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甲．天下爲公，教育爲公，不以教育爲一黨一派及任何小集團謀利益。

乙．尊師重道，不以偵探作教員，不使教員兼偵探。

丙．使師生之間，沒有隔閡。

丁．使學生打開眼睛看事實。

戊．關於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學生有閱讀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

己．學校內團體生活，要有民主的組織使學生在民主生活中學習更進步之民主。

庚．動員廣大群眾，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學習民主。

(二)三民主義一開始就說：“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發生思想，思想貫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統制”與“思想貫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兩方面說。那不得已而受統制的人是越弄越沒有追求真理的興趣，結果不是思想統一而是思想消滅、智慧消滅，統一於愚；那不甘心受統制的敵人，一部分倒會突破千磨萬擊，而發展出更高的思想與更大的智慧。

(三)領導一二人，可用豆油燈；領導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領導一國之衆及全世界就要太陽，至少要月亮那樣的光明。統而言之，無論領導多少人，總是要拿著真理之光，照著人向那正確的道路走去。如果領導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隨的人的眼睛閉了看不見光，或者甚至把他們的嘴也封起來了，連路上遇著危險也不能喊，那領導的人們不但是費力不討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難免會出岔子。

夏 衍：

一、起碼要承認青年學生是一個有人格有人權的人。尊重他們的人權，讓他們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頭腦來想的自由。

二、假如這樣的思想統制能夠收效的話，那不僅希特勒可以永遠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會二世就亡國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現代化技術的龐大機構，在德國人民中散佈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現在，對蘇聯的侵略戰爭失敗之後，德國人民不就開始用同樣現代化的機構在反對法西斯主義麼？

三、我以爲最好是培養青年人的客觀態度。——讓青年人和現實社會接觸，讓他們自由地感覺、自由地思索，然後讓他們根據自己實際所感和所想得來的一切，來自由地判斷。

茅 盾：

家庭是一個圈子，學校是一個圈子，這兩個圈子外邊又有社會這個大圈子。這是個比喻。這比喻好象有點機械。但我們姑且這樣假設(當然事實上這三個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響，而且這三個圈子在什麼線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們也暫時不談)，一個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塗的家庭，除了賭和吃，便整天想些損人利己的勾當，甚至損人而並不利己的勾當，他所見的社會又是以貪污爲能幹、以強橫爲威風、以欺詐爲德行，那麼，即使他進了個好的學校，結果他會被教成個什麼呢？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此所謂好的學校只是設備差、尚能灌給他一點知識，那麼，有了知識的他，將來要貪污、欺詐、強橫的時候，其作惡的能力和 method 也會大些。然則這“好”學校給人的知識適足以濟惡而已。我們又設想：如果這所謂好的學校是不但有設備、好教師，還有好學風；教師不但教得好，還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麼，該青年將來的結果，大概是三條路罷：一是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完全抵消了學校中所給他的影響。二是他覺悟了，且有勇氣反對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悶，悲觀厭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夠教育出配作民主國家的公民，教育設施之必須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會上必須真有民主，即國家真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外表與內容不合，決無好結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國家即一套思想統制的辦法，乃至領導青年的辦法，自然都是不應當有的。而領導青年姑不談威脅利誘等手段，單是自己不檢而且以言語欺騙，其結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設想、便是適得其反的。

沈志遠：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現為極端對立的姿態。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論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罷、褐色也吧，或其他任何顏色也吧，都沒有兩樣)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當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則充當著耍木偶戲的人；他兩手拉住一群木偶頭上的線，就可為所欲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係，是主與奴的關係。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應當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樣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獨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們的人格，讓他們儘量去發揮他們的天才，而自己居於從旁輔導的地位。兩者的關係是兄弟般朋友般的關係。教育者對受教育者不但絕對不能為所欲為，且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極善的)，而只有用說服、解釋、理喻的方法。主與奴的關係，在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域內都絕無存在餘地，何況乎在神聖的教育園地內？其次，和前一點相連帶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對於受教育的青年們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誘，一隻手手槍(或者棍棒)，一隻手鈔票(或者地位)，根本談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足十足的奴才教育。極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針恰恰是要發展人格教育，培養青年的獨立人格，因而他們的教育方法是因勢利導、循循善誘，依照最新的集體主義民主制的原則，教育者並且應該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來檢討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機關內，那種一手手槍、一手鈔票的卑鄙勾當，是絕對沒有存在餘地的！至於“蓋世太保”之類的東西，更不許其混迹于神聖潔白的教育園地之內！

極端相反的，民主主義的教育，卻以培養和鼓勵青年大眾的自由自覺精神為其神聖的基本方針。它不要青年盲從，而偏要青年懷疑：遇事要問一問為什麼？怎麼樣？以及怎麼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當作木偶、當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動(包括學術研究、生活訓練，以及各種集體活動之自由)，培養他們成為高度自覺、精神活潑、極富於自動創造力的一批國家社會之自覺的棟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將隨法西斯本身之總崩潰走進墳墓；民主主義的教育必將隨民主主義在全世界上的總凱旋而得到進一步的昂揚。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夢想者啊，趕快讓給進步的民主主義吧，不然你們的墳墓也不會比納粹們遠一點的！

黃炎培：

我認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覺後知”。既然如此，年長者應該儘量將自己的知識去告訴後輩。但是有兩點應該認識，一是人類的思想和天賦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實驗過，以同樣一句話，某甲的反應與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場最好要因材施教，對甲應用適合甲的方法，對乙應該用適合乙的方法，決不能籠統用一種方法。其次，青年天賦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各色人材。為青年本身想，應懂得他們天賦的不同；從社會需要想，也不應教以同。

講政治與教育不同，政治應有政策、方針，應該同。把政治意義施之教育，應該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統一目標提出，讓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達到這目標。具體說，一個國家生存要有民族國家的觀念，這是最高統一要求，不能放鬆；又如教人知道應該為人服務不自私，這是基本做人道理，這都要說得透徹；至於怎樣去做，那就讓每個人自定辦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個框子，叫別人進入我的框子，這樣一定失敗。須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許他服從，但絕對不及讓他自己選擇一條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啟發，使他很瞭解這條路最好、最適當，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贊：

翦先生首先說明一國的教育政策，與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英美蘇聯等國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進青年思想自由地發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國家的教育政策，則是反民主的，對青年思想是統制的，是屠滅文化思想的。“用武裝築成一條文化思想的狹路，在狹路的這端，寫著智識分子從此入口；在狹路的那端，寫著智識分子在此領取官吏的委任狀。因而一切智識分子為了升官發財，都擠滿了這條唯一的狹路。這就是法西斯統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這樣說。

談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達到他們統制思想的效果時，翦先生就說：

“中國有句古話，‘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強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這又何異強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莊子說了一個笑話，他說，人有惡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趨而影亦隨之，終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會的陰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質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陰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這和莊子所說的笑話同樣是一個笑話。”

“除非永遠站在黑暗之中，則一個人總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還是存在的。不過淡薄一點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頭髮，也有他的影子。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統制是徒勞而無益的事情。”

最後翦先生說：

“一個皇帝和一個乞丐，他們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統一不起來的。因為皇帝所想的，是國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飯。我們既無法要皇帝擔心明天的早飯，也就無法要乞丐擔心國家大事。所以還是讓他們各人想各人的。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以為領導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讓他想他自己所願意的，研究他自己所願研究的。這樣，他們的天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是要從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鎖；換言之，要求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 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衆國成立的時候，馬上就認識了全體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國政治制度的人們很早就開始瞭解，如果政府的基本決策須由人民通過自己所選的代表們來決定，那麼人民就必須握有瞭解問題的手段。因此，美國現在實施著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約在兩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建立了。原則雖然很快就被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體人民可以獲得基本知識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來的過程，是長久而緩慢的。雖然使全美國青年都受初級教育這一目標已經大部分實現了，確立教育制度的過程卻還在繼續中。民主國家的教育制度必須經常改變和改進，目前戰爭環境對於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說明這一點。

不論在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聯合國家今天正在取得勝利，主要地是因為英美的教育制度優於軸心國家的教育制度。那結果，可以在許多方面看到。由於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國就能夠很快地重新組織全國的生活，從平時生活轉入戰時生活，美國就可能生產已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難於置信的大量的軍需物品，練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戰鬥的力量之一的部隊。要沒有民主的民衆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為可能，因為在美國的學校裏，青年人不但學到基本的語文和科學，學到各國的政治和歷史，而且學習如何思想，如何去發現真的和假的，如何組織自己，實行合作的團體活動。美國青年在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學習如何負責任，如何獨立思考。不論在課程中，在學校生活中，教的都是這些東西。在美國現代化的小學中，教學的進行，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有趣的合作事業。學生學到和自己切身有關的一切材料，這樣就對於學習發生興趣。在教授各科中，經常使用問題法，把學生必須解決的問題放在學生的面前。問題的解決，也許需要參考圖書館裏的書本裏的一些材料，也許學生們不得不去請教鎮市上的某一個商人，才有辦法；這之後，也許還得運用自己的數學知識，計算一下。最後，教師和全體學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彙合攏來，開會自由討論，在會上，判斷了各人所得的事實和知識之後，才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美國學校裏的教師們幫助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諸如此類的經驗。

這種教育的結果，使美國人民具有十分熟練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注重個人和別人合作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這些本領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美國參戰後的二年半中，受訓練學習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萬以上。美國工廠裏今天有好幾百萬人是在短短的幾個月以前還沒有夢想到會在工廠裏作工的人。現在美國武裝部隊有一千二百余萬人。兩年以前，這些人之中大多數還不知道如何使用現代化武器。但現在，他們都學會了。他們都明白為什麼要學習作戰所需要的新的技術。他們在學校裏所學到的能力已經救了國家。

這種教育制度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小學和中學是戰時許多社會活動的中心。美國小學生已經收集了幾百萬噸的廢鐵、廢橡皮，廢紙和廢油脂。學校對戰爭盡了很多的力量，而且賣出戰爭郵票和公債票，募集了鉅額的款項。中學的課程已經改動了，改得更適合於美國青年進入軍隊或工廠服務。美國青年滿了十八歲的，差不多全部進軍隊服役。專科學校和大學，沒有一所是象平時一樣照常開課的。美國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時期內作這些變革，因為它是由負責的和受過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學生的知識和品性的發展，成為民族的力量真正的工具。

的確，美國民主的基礎是自由和民衆化的教育。這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正在勝利，因為民主國家不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體公民。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目前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經停頓很久的復旦師生合組的憲政研究會召開了第七次的座談會，座談的題目是“青年與憲政運動”，同時，並由周穀城教授講演“青年運動在歷史中的地位”。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這是周先生全篇演說的結論。在結論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決條件。有政治民主，才有經濟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從事民族解放的戰爭，“所以”，周先生強調的說：“中國青年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政治民主。”……

在說到國內政治方面的情形時，周先生表示他不願多說。但是他說：我們現在連政治民主的起碼條件如人身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都還沒有，距離“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僕”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遙遠得很了。

周先生的話講完以後，就有一個同學起來發言，提出中國青年應做的兩件反省工作：肅清自己的奴才性和為新中國的需要而努力。另一個同學則指出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說：“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這天到會的除周穀城先生外，還有張志讓先生，陳望道先生，張孟聞先生等以及同學近千人。那位同學的話剛一講完，校長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結論，把這成千熱誠關心國事的同學散了。

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誰輕輕的說了一句：“嘉陵江月為誰明！”黑壓壓的一股人流，靜靜的向校門外流去。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重視青年

今日的報上，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舉行青年大會，生動而熱烈；一是英國商務部大臣達爾頓氏的演說，對英國政治有所評述，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蓋居高位者，老年人過多，青年人則殊缺乏展其抱負之機會”，他要求能重視青年。

達氏這種由熱愛祖國所指出的批評，我們讀了很感動。平常有些人也都說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寶貴的力量，然而實際上卻未能積極使青年的純潔進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發展，這實在是一大損失。這情形實在並不限於某一國。



## 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

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

抗戰勝利迄今十個月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切經濟措施，不獨未能幫助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在物價波動，通貨膨脹，交通阻塞，外貨湧入，以及不合理的外匯關稅政策與官僚資本壟斷諸方面，給予民族工業以打擊，造成民族工業極其嚴重的危機。……說明了今天要在國民黨獨裁政府統治下來挽救民族工業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廣大解放區所採取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措施，才會給我們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一條新道路。

沒有去過解放區的人們，往往誤信那些頑固分子的惡意造謠，認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放區的經濟措施，不是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破壞資本主義。理由是共產黨的理想和目標，應該是實現社會主義，怎能是發展資本主義？其實，這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說：

“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的，我們的資本主義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發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理論上，主張在目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實上，在一萬萬以上人口的廣大解放區內，採取了一切措施，促進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向上發展。在這裏不必引證許多老解放區私人資本發展的事例，只舉幾個新解放區，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後的數位來看罷。例如張家口在日寇佔領時，該市兩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閉，解放後，僅僅兩個多月，不僅舊的商號紛紛複業，而且有新的商號開張，並比戰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該市現在繁榮起來的商行，已達二千七百餘家。河南的安陽、焦作等地的煤礦產量，比敵偽統治時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臺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後都相繼複業，四萬失業工人，盡都有了職業。……從這些零星數位中，我們看出了解放區工商業發展的特點，就是在勝利後，不僅過去倒閉的全部複了業，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廠與商號增設，這正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工廠倒閉、商號停業，成為一個相反的對照。

我們再引兩個美國記者的報道來證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記者實丁在訪問張家口後發表談話說：

“張市為八路軍解放後，雖只兩個月，而社會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員，他們所做的是，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許多工廠都很快地復工了，真引起我的欽佩”。又如勝利後特往解放區作五個月旅行的美國記者博樂報道解放區的經濟實況時說：“在解放區：（一）私人生產企業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勵；（二）地主經營仍舊，所不同者，只是過高的田租由佃農要求減低而已；（三）外來的中外資金極為解放區所歡迎；（四）解放區的政府除對敵偽的產業外，並無沒收任何財產的企圖”。博樂並且報導在解放區不論資本家、地主也一樣熱心工作的情況說：“在解放區從事工商業的資本家也很熱心。我和許多商人、地主、製造商談天，發覺他們熱心是有理由的，因為共產黨人雖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為目標，但同時，他們也給地主和製造商以利益”。

這些引證，還說了解放區工商業的發展，並不等於一般的通常發展，而是具有迅速發展的趨勢。

然其所以能夠這樣發展，又是有深遠的原因的。這就是：

第一，因為解放區首先有民主的政權，實行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使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了農村廣大群眾的購買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

第二，因為解放區民主政府還積極地實行了各種正確的經濟措施，例如實行貿易自由政策，廢除了敵偽統治時的種種統制、配給等對貿易發展的限制；又實行合理稅收，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大大

減輕了工商業的負擔；更實行發放貸款，解決了工商業家的資金困難，同時還注意運輸事業……來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見，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必需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時刻為人民服務，處處為人民打算，並能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個條件，正是解放區已經做到、並且還要繼續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說來，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確實是很明顯的了。

——《新華日報》1946年6月14日

戰爭結束後，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答根舍·斯坦因問

戰爭結束後，恰當地對待資本是一件互利的東西。這不但適用於中國資本，而且也適用於外國資本。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我們需要發展工業。我們要用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原則，去取代日本使中國殖民化的原則。我們應該用發展現代工業，提高農民生產力和增加購買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業發展、惡化農民生活條件，以至導致他們對發展生產失掉興趣的政策。用工業進步代替工業落後，（這是指國民黨現在執行的經濟政策）我們預期，取得土地以後的農民，對提高生產會更加關心。

——《美亞文件》第690～717頁

“中國人民都不準備實行社會主義，談論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試圖付之實行就是自取滅亡”——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國人民實際上是農村人口，是農民。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當中，農民至少有三億六千萬。知識份子、高級職員、商人和資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層。農民就是中國。

像中國這麼幅員遼闊而又落後的國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必然是農業佔優勢。

因此，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中國將來的基本問題。中國除非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基礎，否則是不能成功地實現工業化的，因為農民必須要為這種工業化的產品提供真正的市場。

我們以日本為例，由於它是在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去謀求工業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隨帝國主義和向外侵略。它沒有從解決本國的土地問題入手。

華萊士和其他一些美國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中國農民》這篇文章的布魯克斯·阿特金）對中國的這一基本事實表示出一種清楚的認識。

中國農民的基本要求是從封建的租佃關係中解放出來，不再依賴地主資本家貸款和收購他們的產品。這就要進行土地改革，還要實行民主。農民必須獨立自主，有權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

從總體上看，農民和全中國人民都不準備實現社會主義，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也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國民黨與中國人口中的廣大農民群眾沒有任何聯繫，它是一個由軍人和地主集團組成的政黨，這些集團通過一種保守而又毫無創見的官僚主義實行統治。國民黨對於根本改善農民的狀況，實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殘餘這樣一些事情，過去無所作為，將來也不會有所作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為這樣做了就會侵犯國民黨主要支持者的權力基礎。

國民黨由於懼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這樣，它就成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體。這就是國民黨不能從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徵。

國民黨不願解決土地問題，藉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來作為工業化的基礎，它就轉而採取硬性規定的、國家支配和控制工業發展的原則。因此，它在國內的政權方面，或在國外同俄國和其他鄰國的

合作和友好關係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個牢固的基礎，它就傾其全力發展“國防工業”，並迷戀於權力政治的危險遊戲。

可以預料，在這些政策當中埋伏著未來的國內和國外的衝突。如果它堅持這種政策，那麼這種預料一定會成為現實。在這些政策指導下，國民黨不能解決中國國內的基本問題，不能引導國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為遠東的一種穩定力量。而這些政策如果沒有國民黨內部的一場革命，沒有一個全新的領導集團，是不可能改變的。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則是一個代表中國農民利益的政黨。它制定的綱領是要使農民問題得到民主的解決：減租減息，實行累進稅，扶助生產，促進合作化，從根本上實行民主政治。在這一基礎上，隨著各階層人民在團結的而不是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資本主義企業，中國共產黨就將成為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健全的工業化的促進力量。這些就是實現和平和穩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證。

正如在中國的前途上不能忽視農民一樣，也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想要忽視它，但是它的槍炮不能給它帶來勝利。總之，絕大多數戰士象中國人民一樣都是農民。因為我們是為了人民，而且來自人民，所以我們是代表中國人民說話的。人民從我們的經歷中認識了這一點。

……

召集國民大會，這是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美國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將關閉和平的大門。一旦召開國民大會，則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們將進行戰鬥，因為我們不僅為目前解放區一億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而且為全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戰鬥。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  
《黨史通訊》1983 年第 20-21 期

##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 一 不民主的經濟和政治：

中國現在既需要經濟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事，因為沒有一定形態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而沒有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也將無從保障一定形態政治民主的。——這並不是“畢其功於一役”論。因為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人並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麼形態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去認真檢討現實的情況，從現實出發來提出問題，卻從社會主義的空論來自娛，以為實現經濟民主就是意味著實行社會主義。

但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來看問題。

從實際上看，我們只能斷言說，我們現在無論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民主。我們處於比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更落後的情況中。

從經濟上看，現在的廣大人民毫無私有財產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好的命運。他們的產業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權官僚資本的排擠和統制下面，談不到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料被控制，市場被壟斷，自由的民族資本家的企業，要按照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發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中，有一個就其本身範圍而言是公平的法則，誰能提高生產力，提高產品的質量，誰就能在自由的市場中取勝，這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競爭，因此它在一定時期能有促成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當腐敗的官僚資本挾著國家權力而猖獗的時候，就不會有公平的競爭，於是正規的民營企業只能破產。自由資產階級要正當的由企業經營中來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積蓄資本是不可能的。結果也就必然造成生產力停滯甚至降低的現象。

由此可見，經濟的不民主，既有害於工人，也有害於一切小私有財產者(包括農民)，同樣有害於自由資產階級，而只是有利於寄生在農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國主義勢力的買辦和那操縱著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由此就產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關係就是以不民主的經濟關係為基礎，而其目的也就是為了鞏固不民主的經濟關係。

反映到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樣表現著極端落後的不民主的狀態，廣大人民群眾在實際的生活苦難中，沒有過文化生活的可能。他們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們的一切知能都集中於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這一件事上。特權者不承認勞動人民有獨立的人格，以為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個人的個性；而勞動人民在同樣的苦難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縛著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發揚其心意和才知。這種個性被壓死的狀態，決不能產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獨立的經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的。封建時代很少有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就是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給於統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膽的人才會有反對權威的思想。縱至現在，社會上真正的自由職業者（甚至於教授）很難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發揚自然是受盡摧殘。廣大的人民憑自己勞力，所得到的一點最卑微的財產都沒有保障的時候，那種把個人的一切都歸於命運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這各方面都極端表現著不民主的落後性的時候，中國要進一步，就必需實現政治民主，又必需實現經濟民主，那是斷然無疑的事。就整個社會說，實現政治民主，還是為了實現經濟民主以求社會生產力解脫封建性的束縛，而能加速提高；就廣大人民的要求說，假如政治民主並不能保證每一個人能夠過自由的經濟生活並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沒有經濟民主，則政治民主將只是空洞的東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力量的支援。

但和“畢其功於一役”論者不同，我們必須由認真地考察現實而指出現階段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 二 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為什麼現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

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並不意味著一時的讓步，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積極政策。這正是因為現實條件下，廣大人民的私產並沒有保障。農民沒有享受耕種的收穫的保障，工人沒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保障，自由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合法的利潤的保障。實行種種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財產的保障，那難道不是一個極大的進步麼？

拿古代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來看，固然在那時代也有私有財產，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實際上，全國的一切財富其實都屬於專制統治者所有。在國家的名義下，人民的任何產業都可以被剝削甚至被剝奪。所謂“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就是侵蝕人民的私有財產權的最通常的辦法。只有皇帝、貴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以一切手段來吞併人民的財產而過其不事生產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會的條件而前進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護私有財產這一個問題。

不同於獨佔資本主義時期，在那時期，由於生產力已因生產過程的高度社會化而提高，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獨佔資本家的手裏，因此就不能夠提出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倘若使社會財富（主要是生產手段）分散給眾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會生產力。所以這時就必須提出社會財富的社會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但在封建社會條件下，生產過程一般地還是私人性的，少數特權者用強制力量來併吞社會財富，所以社會公有制不可能實行；而使財富分散為多數人所分有，那正是促進社會生產力前進的唯一方法。

所以實行種種措施以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那是在現實條件下所必須爭取實現的經濟民主。

——必須消滅利用特權勢力以侵襲人民財產權利的活動，所以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府”，“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必須切實地保障農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障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息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

——必須使民營企業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對他們的障礙，所以“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與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與推銷產品的便利。”

——也必須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也就是要“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均引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實行了這一切措施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範圍，但是使得人民不至於擔心自己的財產橫遭摧殘和剝奪，使得農人能夠享受其自己的勞動收穫，使得工人解脫超經濟的剝削，逐漸提高生活水準，使得民營企業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競爭”下被扼殺，這不是經濟民主麼？

要徹底實現這樣的經濟民主，沒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國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須能夠認真實施這一切經濟民產的做法。假如是單獨由自由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那也還不可能認真照顧到工人農民的利益，而且中國自由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也將使他們不能夠撇開工農力量，單獨完成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任務。所以中國的必須實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也就是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實現了這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一定能夠“為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對於這，我們是否害怕呢？一點也不。相反的，保護私有財產，扶植私人資本，正是對中國有利的事。

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徹底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必然的後果。固然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資本主義，但那是買辦性的。並且和封建剝削勢力相勾結著的資本主義，是憑藉強制權力以掠奪人民大眾，損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反對這種資本主義，但不反對在以解除封建壓迫與民族壓迫為前提而生長起來的自由的私人資本主義。在這兩重壓迫去除後，就產生了私人資本能夠獨立自由地生長的可能，解放了並且漸漸富庶了的農村更是為資本主義開闢了廣大的市場。

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不是維持獨佔資本主義而是鼓勵自由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非常薄弱，並無力實行經濟上的獨佔，除非寄託在買辦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獨佔上。在取消了這種政治獨佔後，資本主義就會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還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提高了生產力一樣。

更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是既要保障私人資本，又要保障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小私有制也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不過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不斷地犧牲這些小私有者而進行的。在中國，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一時還薄弱，不能在全部國民經濟占絕對支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初步條件後，將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組織起來，提高其生產力。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所將實現的經濟民主，雖不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和歐美各國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將按照民主主義原則逐步地完成徹底的解決——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剝削的封建殘餘將徹底消除，不象歐美的許多國家中那樣，在這問題上半途而廢。勞動人民的小私有制將在經濟上獲得發展的便利與在政治上獲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歐美許多國家中那樣被犧牲了作為獨佔資本主義生長的肥料。這是對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經濟民主，和那以人民大眾為基礎的政治民主相輔而行。由此我們也就不必擔心，由廣大發展私人資本將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形成對人民不利的獨佔資本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倒可預見，當人民的私有財產一般的受到保護和自由的資本主義擴大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必能加速地增長；在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化完成的時候，就會產生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可能。

### 三 “畢其功於一役”論的真象：

社會主義不是讓人們在口頭上空談的。能實行社會主義不能由主觀願望來決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來決定，而要根據客觀現實，根據廣大人民實際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來決定。廣大人民現在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苦於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兩層束縛，他們苦於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農民要求減輕負擔，要求土地；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這些要求都沒有包含社會主義的內容。只有在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時，人民才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在現在的條件下，“畢其功於一役”論不過是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話而已。

但我們要知道，“畢其功於一役”論者其實並不都是認真想在現在實行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說這種空話往往不過是掩飾其不肯和不敢認真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任務而努力。譬如，為了避免觸及最現實不過的減租減息的問題，他們就空談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為了使自由的私人資本不能充分發展，他們就空談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實質上是前

資本主義性質的獨佔壟斷，卻自命為比自由資本主義更進步，以此為藉口來圖謀扼殺民營企業。——這就是許多“畢其功於一役”論者的真象。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脆弱，他們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傾向於“畢其功於一役”的說法。他們不提出正面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害怕遭遇無產階級的反對。其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為從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下解放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那是既對資產階級有好處也對無產階級有好處，所以階級矛盾是可以調節的，要使之調節，卻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資本主義里加上一點社會主義。只要私人資本保持著他的獨立自由，並且使其生產事業適應於人民的需要，更照顧工人的經濟權利與自由權利，那麼它的廣大發展決不會遭受人民的反對。假如怕人民，空談社會主義為點綴，實際上卻投到了封建買辦性的獨佔資本的懷抱中，那說是自己走向了絕路了。

——《群眾》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為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為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發表“對於當前經濟問題的意見”書，全國工業協會亦於日前舉行座談，提出很多極其實貝的主張，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實在是一件使人十分興奮之事！

今天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並不是偶然的。抗戰打了八年，後方的生產事業是在沈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縛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掙扎著。勝利到來了，一些碩果僅存的工廠，不但未曾複醒，反而在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遇到更嚴重的災難。中小工業不要說，就連中國興業公司、渝鑫鋼鐵廠等十餘家規模較大的工廠，亦在這個時候，頹然倒下了。政府對於這個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購生產的貸款，變為收購機器和設備的貸款。這種辦法意味著當局所著重的，不是怎樣為工業界打開一條出路，而是樂於為他們送終！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強大的外國資本可以來中國投資；中國的民間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居高臨下與外國獨佔資本結不解之緣的官僚資本可以在各重要生產部門勃興起來。在當局的這種打算之下，中國民族產業的生存自然發生問題，也就使他們不能不起來抗爭了。“苦幹不問外事的作風走不通了（李燭塵先生語）。 ”

今天的中國經濟的確使人擔心的。官僚資本和外國的獨佔資本貪婪地進行無情的襲擊。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原來是以輕工業為依據的，但現在收復區中的棉毛絲麻等，幾乎全部國營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謂國營，其實就是官僚資本的“官營”。因此，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工業將來會變成日本那個樣子，全國的經濟命脈由幾個大財閥所獨佔。這種看法自有其中肯之處，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戰前的日本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個大財閥並未成為另一個國家的獨佔資本的附庸。中國的情形，恰恰與此相反，如果離開外國獨佔資本之支援，則中國的官僚資本是不容易發展到支配與操縱地位的。所以假如繼續在買辦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國經濟就可能變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體。

中國將要走什麼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對不民主或假民主的鬥爭，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自由的國民經濟對官僚資本和外國獨佔資本所壟斷的半殖民地經濟的鬥爭。中國的人民大眾（連民族企業家在內）爭取前一條路，而少數反民主的買辦官僚，則想把中國拉回去走後一條路。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一心一意和中國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經營三者組成的”。二個月前，周恩來同志在星五聚餐會上亦指出：在這三種資本中仍然是私人資本占多數，今後中國必然要經過一段保護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我們要反對的是官僚資本、壟斷資本與侵略資本。（反對侵略資本並不就是反對利用外資，我們是在不妨害中國主權之下，歡迎外資的）我們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的態度，是和全國經濟界（特別是民族工業家）一致的。

或許有人把我們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的主張，當作在野黨的宣傳吧，過去數十年的教訓，特別是當局這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訓是這樣的，誠然使人民對任何人不敢輕信。我們的確確認定中國必須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我們的政

策處處著眼這一點。在陝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中，新的富農經濟是在農村中發展起來了；一些地主的資金轉移向工業投資了，中小型工業大量地在每一個角落長大起來了。我們在民主的解放區中已經這樣做，我們決心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國其他各地去。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的內戰與封鎖的話，我們是歡迎後方與收復區的經濟界人士，去參觀，去看一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做的。

正如政治一樣，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一個轉扭的關頭。我們歡迎產業界的代表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為經濟民主而鬥爭；我們歡迎全國經濟界的人士在會外在各地為這個問題而努力。在這裏我們和你們的見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個政治民主的中國不能不是一個經濟民主的中國。我們將同心協力為中國政治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新華日報》社論 1945 年 12 月 31 日

## 天賦人權 不可侵犯

### 切實保障人民權利

從來的革命運動都是人民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衆，給不給民衆以民主自由。對於英勇鬥爭中的中國，民主始終是團結與進步的基礎，因為離開了民主就不能團結全國人民起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沒有民主也就沒有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這是為什麼邊區施政綱領明確的規定：“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責成當選為行政人員的共產黨員應堅決執行之，並指出“人民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國主義借戰爭的掩護把人民從多年鬥爭中獲得的民主權利剝削殆盡的時候，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實行高壓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財產、自由沒有一點保障的時候，在陝甘寧邊區從過去的民主傳統向新民主主義的路程前進的時候，這樣的尊重民主自由與保證它的徹底實現，是具有怎樣偉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對犯過錯誤而願走向光明的份子採取寬大的態度，禁止不經過法定手續來逮捕、審問、處罰任何人，反對把人拖到卑鄙無恥的道路上去，用這些事實來使得人權得到充分保證。我們決不空談保障政權，而是真心誠意地要人民起來參加政權的管理，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機關的職權與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並實行三三制，保證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中的人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我們決不空談保障財權，而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做到保護私有財產，獎勵私人企業，嚴禁隨意動員徵發，實行合理的統一累進稅收制度，維護農民從過去土地革命中獲得的利益，保證佃農債戶向地主與債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樂業。這樣就不只是給人民帶來了美麗的希望，還真正地要他們享受到新民主主義的果實。

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邊區過去早已注意保護，今後仍當循此前進。只要是抗日的有利於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言論與出版物，無論是出自任何抗日黨派與團體個人，都有發表與出版的自由，政府還給予使用會場與印刷機器的便利條件。在這裏，不會有思想的統制，我們鼓勵自由研究，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歡迎邊區境外願做抗戰工作人士來此開辦學校，設立出版機關，組織文化團體，並且給予必要的幫助。人民不僅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還有武裝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怕人民的組織與活動，只怕他們不能積極動員起來。我們要保障的居住與遷徙的自由不是消極的，因此我們幫助外來移民解決他們各種困難，保護因革命行動被迫來到邊區居住的人民，救濟流亡學生與災民難民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自由地生活，還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這樣，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權利。讓全國人民看到我們高舉起來的民主旗幟，是飄揚著多麼鮮明的色彩！



僅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夠的，公務人員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還是不夠的，必須人民自己珍貴這種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才能獲得的權利，要求它在邊區得到切實的保障，並把它推到全國的範圍裏去。

當廣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權利時，它不僅成為物質的力量，還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 保障人權

“除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處罰……”。這是二屆參議會通過，經邊區政府命令公佈的“保證人權財權條例”規定得極明白的。但是，在延安，卻發生了不幸的“學療人命案”：學療的總務科長、秘書和管理員，竟然把運輸員劉世有捆綁起來，以致釀成人命大案。

從這事件裏，我們看出，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碼條件；還不曉得，隨便捆人押人是應該肅清的“遊擊作風”之一。

這類違法事情，在邊區恐怕不只這一件。我們願意喚起社會人士嚴重注意它的揭發與糾正。讓我們共同努力於革命秩序的建立與鞏固！

——《解放日報》1942年1月27日

#### 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 李 新

聯合國憲章裏規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國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實現蔣主席宣佈的四項自由。偏偏在這時候，有人高呼自由萬萬不可行。這種意見，顯然違反民意，志在維護國民黨一黨政府的現狀。

《和平日報》昨天的社論，說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聽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國家軍隊’與國家軍隊對立，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完全不合事實。這並沒有說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討論中，中共及其他黨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見，這裏不多討論。要說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國民黨黨治黨軍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請以事實來回答！看吧，“衣冠不整”的人，還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內戰；老百姓開會，特務就去搗亂，動不動就要拆草棚子。這類事情數不清。人民“安居”了嗎？大學教授逢場就去擺地攤、賣東西，工人時時會失業，失業後又不准要求救濟，還要抓代表；官辦工廠也拖欠工資，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樂業”了嗎？這是因為軍隊沒有國家化呢，還是因為人民的自由權利被國民黨一黨政府剝奪得乾乾淨淨呢？只要顧事實的人，都將異口同聲說一句，不能安居樂業，是因為沒有民主自由啊！

他們又說了，英美蘇都沒有實現民主理想，中國來實現，就“不切實際”了，更何況中國是在訓政和憲政之間呢？我們再來看看事實吧。英美蘇等民主國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利，中國不必“開風氣之先”。可是，曾否追隨“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之後了呢？他們又提到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匱乏”、“不受恐怖”兩大自由，都“不能便沒有疑問”。反對自由者的話，是夠露骨的了。在民主國家，罷工遊行示威，幾時未曾做到？舉美國為例，罷工不僅在發展，政府還根據康納利法案，承認罷工是合法的。遊行示威不但不能被禁止，還可以請政府派警察保護。至於教授治校，不受黨化，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現在的西南聯大，就是經過教授會議來處理校務，這與其說是理想倒不如說是教育上優良制度的確立。說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獨裁者外，倒還沒有聽見有人反對過。現在重慶還是第一次看見公然對“不虞匱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問。如此說來，人民只應有匱乏的自由了，窮人王正興必須賣兒子，陳



望道教授必須擺地攤，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匱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業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吳金山也只有被押起來了。特務橫行，便成了政府執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發表這些違背人民利益、維護獨裁專政的謬論的人們，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當局，匱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條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爭取四大自由，是沒有力量壓得下擋得住的。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sup>①</sup>前天在憲政座談會演講三種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他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並勸勉大家要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我們讀了孫哲生先生演詞，覺得語語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願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國廣大軍民都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對日抗戰，大家都認識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最主要的任務，也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說的：“這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這一認識，因之能在七年艱苦抗戰中流血流汗，曆盡艱辛困苦，總是極盡忍受能事。許多國際盟友，只要一度來華考察過的，莫不為我們軍民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這是最好的證明，中國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

但是民族自由與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是分不開的。過去對這一點，見解龐雜得很。孫哲生先生的演講，特別舉出總動員的例子，舉出盟邦募債成功的例子來說明：“要使人民力量動員起來，必須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進國家民族的自由”。這種見解儘管如孫哲生先生自己所說，被有些人所討厭，認為是“尾巴主義”，但是真理總是真理，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會舉起雙手來贊成……。

孫哲生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說：惟有我們的敵人日本和德國，才是只講一種自由的，他們的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會積極作戰。“有自由的國家不可侮，沒有自由的國家，雖暫時強大，最後還是要失敗。”這兩句話，更是不移之論，目前盟軍勝利的捷報，正在印證著這個真理。沒有問題，三種自由在今天，從其重要性說當然是民族自由為主；可是沒有政治經濟自由的配合，民族國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這種血肉相聯的作用，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抗戰七年的今天，還待孫哲生先生來闡揚其重要，真要不勝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從三種自由互相的關聯和作用，來說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時孫哲生先生從時間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經濟自由並不能一概推移到戰後去處理。他指出：英美過去有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所以雖在戰時，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擬戰後方案。這是別人的例子，說明雖在戰時也不推諉應該做的事情。其次從戰後環境說，大戰一旦結束，各國紛紛復員，積極振興；我們國土遭長期大戰破壞之餘，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時再談這些問題。這樣的說法，也正反映了事實的需要。

孫哲生先生這些意見，在這國際民主潮流和國內人民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提出，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他給每一個民主主義者指出了獲取自由目標的方法和道路。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社論

原題《孫哲生先生論三種自由》

① 孫哲生，即孫科(1891—1925)，廣東香山人，孫中山之子。時為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1949年退居臺灣。

自由不是專賣品

抗戰是爲了民族的自由，爲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專賣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業。誰也不能自由到說：這玩意是我的，高興給誰就給誰。更不能自由到說：“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1月22日 短評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尺規

昨天本報和別的幾家報紙都刊載了一段本市新聞，說是朝天門屠戶張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隊的幾個警士藉口捉賭，劫去錢財。事後張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個是保長)，反被拘押毒打。這十幾個警士是派駐民食供應處倉庫的庫警，依理根本沒有在夜間侵入民家捉賭的權利。出事時，當地保長簽署證明書，證明張家並未聚賭，且有衛戍總部稽查處水上檢查所人員到場目擊並無賭具，則捉賭之說，顯屬無稽，但縱然真是賭犯，也絕對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長一起關在警察局裏，毒打成招，而且還不准其家人探視，比對付江洋大盜還厲害！所以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無怪乎張德操的家屬和該街居民百余人要到衛戍總部王總司令公館門首伸冤，又攔截汽車、呈述冤狀了。

這樣的事也許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受冤屈，被栽誣，遭虐待，簡直已習以爲常了。但正因爲這類事情一向層出不窮，我們更不能不喚起社會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報》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裝店被一群也以抓賭爲名的軍人沖入，損失了數十萬元的消息。軍警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而沖入民家，人民有什麼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財產可以這樣地被劫掠，還有什麼私有財產的保障之可言？對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隨便，又有什麼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財產的自由權利，叫平民怎麼能安居樂業？

據說，這一案的被害人家屬現已聘請律師向法院起訴，衛戍總部王總司令對此事也極爲震怒，想來法院與當局對於這樣一件事，應該能很好的處理吧。由這一類事件，我們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舊布新實在不容稍緩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較有保障，又經常施以衛國愛民的教育，經常督責他們以愛護人民爲天責，就不至於發生這種騷擾民間的事情。在張德操家保安隊的一個隊長曾向到場的衛戍部人員說：“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大家不要爲難”（《商務日報》所記爲“我們軍警原是一條陣線”）。這話分明是把軍警看做是在一條陣線上共同對付老百姓，豈是衛國愛民的軍警說得出口的？又假如現在各方所主張的《損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頒佈，且根據此法，嚴辦幾次，則雖有不法之徒，也會有所忌憚，不敢胡作亂爲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佈的提審法已經實施，並且法院對平民訴冤給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爲保障平民而設，那麼雖有冤獄發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象張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紙提審狀，就可很好地處理了，何至於在今日的陪都街頭還要演出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擲輿告狀”？保障人權，嚴禁非法拘捕，實施提審法，改革司法，這都是在《和平建國綱領》中明白規定的，都該快快實現才好。

假如實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個個能安居樂業，免于強暴侵凌的危險，那麼民主還是落了空的。所以我們斷不能把張德操案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事件看做是無足重輕的社會小事。

——《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2月8日

保障人民自由的開端

國民政府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日，宣佈了《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四條，其中第一條就是關於保障人民自由的。這個宣佈深得各方面輿論的歡迎。不過我們也需要指出，政府當局在抗戰中和抗戰結束後宣佈保障人民的自由已經有好幾次了。遠的不說，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當局就曾頒佈過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條例，最近的是在三個月前的雙十會談紀要中，當局又一次表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但是政府當局這種諾言，並未兌現，其中道理何在，現在

我們也不必再來深究。無論如何，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國家中人民所應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權利，政府無論用什麼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國家中是總不能容許的事情。我們自然希望這回不再落空，當局如果真有與民更始的決心，就不應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條件，而應立即切實地做到。

政府當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其實是不難的事，無論如何，這比束縛人民的自由權利要容易得多。過去政府當局爲了限制和妨礙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殫精竭力，用盡了一切辦法。既訂立種種法令，使得人民動輒得咎；這還不夠，又另外想了許多辦法，設立許多機構，以補法令之不足。本來，在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都是“公僕”，這些“公僕”都應該爲人民服務，可是在中國竟有爲數很不少的“公僕”，專門以迫害人民爲本領，難道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不好麼？國家的財政一向都很困難，但在拮据的國庫中卻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卻用來殘害人民。譬如拿過去大後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聞檢查所和圖書雜誌審查處說吧，每一個這種機關中的人員，都比一個大報館的編輯部還多。現在這些“公務人員”又紛紛到“收復區”去辦同樣的事了。而在大後方各地，航空郵電檢查員至今還在忙於檢查和沒收。爲了控制紙張、印刷所、會場、出版所，當局所費的人力和財力更是不可勝計。官辦的出版所，雖然出版品不受歡迎，但仍無限度地賠錢，無所顧惜；官辦的團體，雖然得不到群眾擁護，仍大量地給以津貼，這都無非是出於包辦一念，要使人民的出版和人民團體活動困難。還有龐大的特務機關及其所屬的集中營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從國庫中開支多少經費。這一切經費從何而來，還不都是人民的完糧納稅的聚積麼？以人民的血汗來養活許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來創立許多壓迫人民自由的機關，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合理的事麼？

當局花了這許多人力財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結果只是證明了一句老話：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民到底是不會在強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進步意志究竟還是縛束不了的。現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轍的表示，那麼第一步做法就應該是立刻放棄一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爲了束縛人民自由而設的法律、辦法和機關。這是最不花錢，最不費力的事。只要當局有決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決不象束縛人民要費那麼多的手腳，花那麼多的人力財力。

蔣主席所宣佈的第一條關於“人民之自由”說：“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由此可見，政府當局也已承認蹂躪人權的特務機關不應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應再有效了。在這方面，人民也應該幫助當局來考慮，哪些法律條例、哪些措施、哪些機關都是殘害人民自由權利的，一一公開提出。事實上，人民已經這樣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現行出版法應該廢除，對收復區的民間出版事業的限制法令也應該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議的確有事實根據，符合民主的原則，政府就應立即採納，立即實行。取消過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鐐銬，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實的開端。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1 月 13 日

#### 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論張君勱先生的建議案

憲政實施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裏，通過了張君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爲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爲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爲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爲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

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除了上述三項外，包括選舉權、思想信仰自由等等在內。英美更有其議會等等。就是這樣，英美人民也還認為目前的民主制度缺點還多，還不廣泛、不充分，連羅福斯總統也主張在經濟民主的基礎上擴展政治民主，使民主制度帶更廣泛的人民的性質。我們在中國談民主政治，還是把它當作要建樹要實現的東西。而且，我們現在談實現民主政治，不是單純的因為人家如此，我們也要來搞一下，裝裝樣子。也不是單純的添為民主國家聯盟的成員之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強。主要的還是因為新的民主主義已成為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們不能實現民主政治，我們就不能充分的動員、積極的奮戰、親密的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我們該知道，一個國家在戰後世界民主大家庭裏的地位，是以戰時努力的程度來決定的。這裏說的戰時努力的程度，應該包括打仗的努力和民主的進步。所以，儘管還有人反對民主，民主已經和戰爭的勝利及戰後的和平分不開了。儘管中國的民主政治要根據實際情形、循著自己的道路發展，可是，人民必須有民主權利，民主必須以廣泛的人民為基礎，卻是不能改變的原則。這樣，人民必須獲得基本權利，並予以保障，難道還有懷疑和猶豫的餘地嗎？

為了抗戰勝利，為了戰後和平，為了政治的進步，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 2 月 1 日

#### 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

國防最高委員會在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廢止的三十八種法令中，屬於集會結社自由的，有十四種之多。其中應由國民政府明令廢止的有《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共三種，規定由原公佈機關廢止的還有十一種。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國府及各原公佈機關的廢止這些法令的明令。想來總該馬上能做到。讓我們來看看究竟為什麼這些法令要廢止，廢止了對人民有什麼好處。

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產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我們可以指出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首先，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制度的束縛。本來集會結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論性質，地點及參加者的職業性別如何，事前均無須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假如參加集會結社者有違犯普通刑法的行為，則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則，聽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國就與這完全兩樣：“各種人民團體組織之成立，無論下級團體或上級團體，均應先經政府之許可”（《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四條）。在《人民團體開會規則》第二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每次開會應於會期前將開會事由、時間、地點等呈請該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官署……”。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制，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准”，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為。可是，現在既然廢除了這些法令，那麼這種不合理的“特許”制度就不應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會結社，不受單行法令的束縛。

其次，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所謂《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就是在民國二十九年為此目的而設的。規定警察可以有權隨時命令一個集會一個人的演說中止。又如《非常時期團體組織綱領》第一條上規定：“各種人民團體，除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外……並受軍事機關之指揮”；同時也有“明令解散”之權。這樣，凡主管官署認為不適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難或解散。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時就根本沒有解散人民集會結社之權的，只有認為某種集會可能發生騷亂時，英國警察才可以稟准內政部，當場宣讀騷動法，使會眾自動解散；假如警察機關判斷錯誤，還須負一定責任。美國的法律亦大致如此。顯然地，兩相比較，英美是合理得多。

了，我國的作法是要不得的。這次政府當局既已通知過廢止，當然就是把所謂“主管官署”的這種權力取消了，不再給軍警機關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權利。

最後，由行政官署委派民衆團體中重要主持人員的制度，也是在這些法令中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比如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第十條確定：“各種職業團體應設書記一人，以曾經特種訓練合格之人員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職權是：“負推進各該團體各種活動之責任”。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衆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爲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什麼人民團體呢？這種制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了。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法令未廢止前，中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既受到特許制度的束縛，又隨時會受軍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經常會務也常爲官派人員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廢止了這些法令以後，一切束縛人民自由的行爲已失去法律的根據，那麼，人民就應該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運用起來。

我們希望，政府方面趕快把這些已決定要廢除的徹底廢除，並且繼續審查是否還有別的同類的法令也應廢止，在這次決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種是關於集會結社的。當局到底準備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佈，因爲這三種法令原文也有種種極不合理的定規。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中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請許可”（見該法第十條）。這和已決定廢止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中的規定也是一樣的，也應該廢除才好。又如工農組織團體，在《工會法》、《農會法》尚未廢除的今天，也照樣有法可憑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們希望徹底廢除這些法令的束縛；我們人民也儘量幫助政府，搜集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來，請求政府以明令廢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復了自由的時候，爲了運用這些自由，就應該充分運用起來，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種必要的團體會社，並且依法改造和充實原有的人民團體。過去的人民團體，內部的組織與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則的，不適合各該團體會員的要求，就可以根據各該團體會員的意志來加以改造過，使它成爲名符其實的人民團體。

集會結社自由的根本權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裏來了，我們應該好好的運用它，發展它，讓他在整個民主建設事業中，表現出更輝煌的成果來。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2 月 18 日

人民自由又遭損害，內政部頒限制遊行法

—— 在“呈報”、“審查”的一串

規定下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

本市消息 內政部公開頒行一種限制人民遊行自由法令，藉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據中央社訊，其要點如下：負責籌備遊行的人員，需于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遊行宗旨、集會地點、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呈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須事先送當地“治安主管機關”審查。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致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本市市政府業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有了這個“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更可以隨意于事先防止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了。

——《新華日報》1946 年 5 月 13 日

快釋放政治犯

政府早經明令公佈釋放全國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囚冤獄，未獲釋放；並且仍有成千上萬的無辜被囚的人，在遭受著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慘遭殺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憤！

杜重遠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聞得羊棗先生含冤歿世，中國呵，你的優秀的兒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戰勝利、和平建國開始，國家正在用人之時，他們卻竟屈死冤獄，怎能不叫人感到萬分痛心！成千成萬的學者、專家、教授、進步的青年，無故被捕入獄，受著非人的待遇。他們正是中華民族的精華，才高有能的優秀兒女，他們為國家為人民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不但不得國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獄，有些害民禍國的敗類，不但不遭誅戮，反而冠戴優加，橫行不法。這樣下去，民心怎能得乎？

我大聲呼籲：立即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嚴懲虐待犯人、毒殺犯人的兇手！未獲釋放的政治犯應切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為。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

## 法治與人權

### 一 立法必須依據人民的公意創制

衡陽《大剛報》：“……一般對法治往往有所誤解，以為法治之極，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實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無，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別，是在於這所謂法，是否最後淵源于民主的公意？這所謂守法，是否執法機關的本身行為也須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極，則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執法機關的政府本身的一舉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義，不在人民是否有法為‘守’，而在政府官員之是否依法為‘治’。然則怎樣才算真正的法治？從政治學的一般的觀點看來，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法治狀態下的所謂法，最後必依據於人民的公意而創制，故法治必須以民主為其內涵，倘法律最後決定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思，則一切依法，便成為毫無意義……。（三）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進行的公私行為，非依法律，絕對不能變更之。因為法治的起碼要求，在於建立合法的社會秩序，合法的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於一切合法的行為，受到法律的保障”。

### 二 真法治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雲南《正義報》：“所謂法治，即建立一個健全的法度，這個法度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議決的，也就是全國上下，都要在這個法度的規範之內行動，任何人不得違反，任何人不得加以變更”。“我們認為今天問題的關鍵，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問題，而是要哪一種法治的問題。因為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這是我們不能不加以分別清楚的。什麼是假法治呢？我們且看封建時代，同樣有一套法律，可是這個法律是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設的，皇帝及其特權階級是站在這個法律之上的，他們可以執行法律，也可以拋棄法律；他們可以創造法律，也可以毀滅法律。換言之，法律的執行是他們束縛人民的工具，而他們本身則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什麼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築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而作為民主政治之表現形態的法治，它必須具有這幾個特徵：第一、國家必須有一個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憲法；而從這個根本法所派生出來的一切法律，也為全國上下所一體共守……，第二、憲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權利，而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濫用權力。故國父中山先生說：‘憲法者，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在這種原則之下，誠如中山先生所說，政府只是人民的公僕，它沒有無限制運用法律的權力，它必須受憲法的支配。同時，在憲法的規範之內，它必須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得侵犯。第三、選擇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權、修改權及廢止權，應當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諸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同時，政府當局不僅要受人民的監督，而且人民應有選舉及罷免之權。一名話，要認真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要行使直接民權，使人民獲有選舉、複決、罷免、創制之權。”

### 三 應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陣中日報》：“厲行法治，先要養成守法的觀念及具備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瞭解法律的重要，然後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夠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為真正有價值的法律”。“中國歷史輾轉於封建專制的束縛之下，政治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時代，‘天下一家’，帝王為一切人的主上，即區區一個縣官，也號稱‘民之父母’；‘聖旨’便是法律，‘憲諭’盡成典章。民國以來，諸法紛立，可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至今沒有正式產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則于逐漸養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憲法決不能不早日具備”。“抑法治和治法互為因果，不是說法律產生於先，法治即必然興起於後，須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條文，非另有一種制度，即法治和實行法治所寄託的根本——憲政實行以後，法律固難以發生充分的實效。”“官吏的敢於違法，人民莫從檢舉，就政治的角度視之，又為法治制度的根本——憲政沒有實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誠為實施憲法的張本。但最後完成法治，仍有賴於憲政的實現。二者互為結果。也互為前提。”

###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無私

成都《華西日報》：“要想國民虔謹奉法，必須對於立法與執法的各個方面，均須詳為考慮，乃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論，應當以‘立德’作基礎。所謂‘立德’也者，一種法令精神，應當以最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出發，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時還應當切實體檢國民之實際生活環境，勿使法令有任何地格難通之處。”“其次談到執法，政府當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貫徹，某甲可以逍遙法外，而某乙卻又盡法懲治；或者今日之諾言，明日即成廢話，而不能使人民發生堅強之信賴，則人民之玩法惡習，必難根除”。

### 先決的問題是保障人權

成都《新中國日報》：“要變憲政、談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權；要人權得到保障，則必須有一定的法紀，所謂法治軌道是也……。”“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行得徹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幾番條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違法者有所畏懼”。“要法軌和人權被尊重，必須人民自己起來監督官吏，必須實現民主的監察制度。人民一日沒有權來監察政府、特別是下級機關的行動，則人民身體自由的保障，雖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話”。“要建立法軌、保障人權，必須先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違法犯紀的事無論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筆直書，把他宣佈於報紙，則貪頑之徒，不啻得著了保障，而社會輿論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開的，我們希望言法軌與人權者同時加以注意”。

——《新華日報》1944年7月20日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打開我國的地圖，睜開眼睛一看，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地區，哪里沒有災荒？單就報紙上發表的材料來看，可以看出災荒是異常嚴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江蘇、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陝、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災，尤其是湖南等地，實在是慘不忍聞。

固然，大部分災區是經過敵偽佔領的地區，但有許多地區都是從來沒有淪陷過的。現在的嚴重現象，是耕地荒蕪，副業凋落，耕牛盡失，農具俱毀，疾病蔓延，難民流離失所。總之一句話，農村的生產幾乎已完全破產，農民的生活已陷於絕境。舉例來說，湖南本是產米之區，現在卻以草根樹皮為食；衡陽附近，每家餓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縣，遭敵偽破壞，至今損失糧食八百多萬擔，房屋三百多萬間，牲畜三十多萬頭，農具七千多萬件。養蠶本為副業，但是飼養用具損失了一半以

上。安徽全省六十餘縣中，受災縣份竟達五十多，損失耕牛近百萬頭，農具三百多萬件。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情形相似。至於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難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沒有統計，也無法統計。即以廣西一省而言，難民就有三百十四萬四千人，傷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萬餘人。江西傷病的三百五十萬，流離失所的達一百六十多萬。至於川、陝、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風、蝗、雹等災，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農立國”的中國，立在這樣的農村大破產當中，還說中國沒有經濟危機，簡直是騙人，那只是國民黨一黨領導毫無辦法解決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麼會有這樣嚴重的災荒呢？敵偽破壞固是一個重大原因；然而，為什麼抗戰期中，沒有能夠阻遏敵寇的前進；這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應該負責的嗎？敵寇投降以後，至今已有七個多月，災荒卻還在擴大和嚴重化起來，這又是誰負責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樹皮草根，卻還有十一萬日本俘虜“卻吃著從老百姓那裏‘征’來的米”，這種情形又何止湖南？現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著老百姓的米，而且還在受“優待”嗎？而且像山西閻錫山那裏，不是還有收編了的日軍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麥嗎？此外，不是還有待遣返的日僑三百萬人，也在吃米，遲遲不遣送日俘日僑回國，好好供奉著他們的，不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其次，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並沒有立即真正進行整軍復員，還繼續保存許多正規部隊和各種名目的隊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慶取締“衣冠不整，拉去當兵”的事情發生。這些也都是只有消費民糧，絲毫也不從事生產的。由於上述原因，更由於日寇投降以後，內戰再起，至今反動派的內戰陰謀仍熾；內戰的進行，以東北為尤烈，所以征軍糧始終未減未停。以已經破產之農村，負無法負擔的軍糧；加之原有苛雜，原封未動，而物價高漲，竟達無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災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號，到處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賑濟，並豁免攤派，緩徵軍糧二百八十萬袋”，提出“應停止攤派軍糧，並速調撤別動隊及遣派俘虜”。湖北人士呼籲：“軍糧俘糧負擔太重，縣鄉兩級人員隨意建立名目，苛擾人民，望當局趕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請減免軍糧等，都是身受其苦而發出的衷心呼籲。這也證明災荒之原因，實在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人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一面否認經濟危機之存在；一面對救災則完全依靠外國，本身卻什麼也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人民沒有事實證明政府是真能為人民的，救災如救火，決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過。現在，應該趕快從治標治本兩方面入手。趕快進行賑濟，免征軍糧俘糧，抑制物價等，以稍紓民困；同時，卻須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僑，整編軍隊，並用一切辦法使災區災民能夠開始從事生產，安定生活。老實說，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及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 1946 年 3 月 30 日

## 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解放日報》1941 年 10 月 28 日  
標題為編者所加



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什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複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制；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根據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當前的政治局勢，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民主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還政於民，就是把人民應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真正交還給人民。如果離開這四種人民權利，甚至任何人民應有權利都不交給人民，而高唱實施民主憲政，還政於民，那就未免是空談了。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佈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至於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廣大的解放區，已經建立了人民選舉的政權，組織了服務於人民的軍隊，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與教育，就是說，人民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已實現了充分的民主，在這些地方，問題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認和保障。只有這樣才能顯出還政於民的誠意。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選舉政府，有權決定法律。合於這正軌的就是民主，不合於這正軌的就是不民主。前者應該得到發揚光大，而後者應該立即改途易撤，真正還政於民，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麼？然而有些不願意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不願意中國從落後進展到民主進步的人，他們空談實現民主，卻不把任何一點自由交給人民；不但如此，對於人民已經得到自由權利的地方，他們還要加以取消，說是取消了這些民主，才能夠實現民主。這樣一來，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選，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選舉的政府，人民決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論出版集會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碼條件，但他們認為要求這些條件，是阻撓民主。沒有黨派的合法地位，沒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組織，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但他們認為提出這些要求，就是反對還政於民。在他們的世界裏，簡直一切都是顛倒的了。

民主的正軌是人民有權，人民作主，這是全國人民無不知曉的事。抗戰八年來，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應得的權利。邊區和解放區一萬萬以上的人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應該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後方和敵佔區人民是沒有得到民主的，現在應該得到，如果不讓他們得到，就是阻撓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國也應該是民主的中國；在民主的中國，取消民主和阻撓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那樣的共產黨，不會模仿蘇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1944年毛澤東與福爾曼的談話

在延安，毛恰巧並不是一個難以接近的預言家，不是一切智慧與指導的源泉，他的話也不是毫無問題的法律。當然，毛澤東的觀點與建議在形成政策上，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它只拿來當為討論的一個基礎，而由該黨各領袖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作最後通過，這些領袖們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圖章，因

此毛所宣傳的演說，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來，再由他的黨中同志整理過，最後的形式，因此是黨委員會的混合表現，而並非純粹是毛自己的觀點。

.....

他對我說，“第一，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更其願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為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為封建社會桎梏著的奴隸。80%以上的我們的人口是依賴小塊土地生活的農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屬於窮奢極侈的大地主的。由於近 80%的佃農，須以他們生產品 50%-80%償付地租，它等於實際奴隸所償付的。

.....

“不過為設法解放這幾億人民與用土地改革來改進農民生計，我們不想象蘇聯那樣趨於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於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但在 1937 年 9 月 22 日，和國民黨與政府締結協定後，我們放棄了這種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個勸告地主減租達到合理的數位，而同時向他們保證這些減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戶正常地交給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我們也和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並且在一互利的協定之下，我們要准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我們自然要做。但有著好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我們將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流進來，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因此對於外國投資十分需要。

“講到政府——象你曉得的一樣——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採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國民黨所實行的那種情形。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裏面，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在今天的蘇聯，卻是沒有地主、沒有商人、沒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我要求說明，“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他的答復是，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所說的話，”他說，“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那末為什麼，”我堅持著說，“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名稱——任何共產主義以外的名稱呢？”

他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對於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如果我們是突然改了別的名稱，在今天的中國——以及外國也是一樣——就會有那些人利用它來作資本，要指斥我們想隱蔽某些事實。不，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該改換名稱。我們也無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 哈裏森·福爾曼著《西行漫記》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產黨員只有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一切壟斷一切的權利”

• 毛澤東 •

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

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爲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的道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針對著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凌人，以爲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煉，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和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瞭解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隻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辭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地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2日

原題《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在共產黨裏，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裏，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

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 毛澤東 •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裏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爲了什麼呢？是爲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

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麼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要堅決地徹底地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有絲毫留情。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剛才吳老同志的話，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說是“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佈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鬥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什麼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裏一套，手裏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第四個是馮國璋，第五個是徐世昌，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什麼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

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挂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挂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定，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佈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塗了。事情決不是這麼容易的。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的困難，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什麼？憲政的困難，就是因為頑固分子作怪；但是頑固分子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

比方汪精衛，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裏去了。比方張國燾，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鬥爭會。七鬥八鬥，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鬥，七鬥八鬥，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

總之，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發通電，並且要在五臺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地做下去，做他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 原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第 689-698 頁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

• 劉少奇 •

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則上，採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組織成功。這也是領導中國抗戰與革命到最後勝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沒有這種政權的建立，沒有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大鞏固和擴大，不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以上這一點瞭解得很清楚。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我們不會不盡忠於自己的職責。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有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也就不能長期堅持敵後抗戰，最有力地打擊敵人，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

這個政權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權利，如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居住、營業、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沒有勾結敵寇和漢奸的行爲，沒有破壞與反對抗日軍隊的行動，沒有違犯政府法令的行爲，不論他是屬於何黨何派，屬於哪一階級、階層，政府一律保護。一切黨派只要抗日、不反對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這種政權，今天還只在部分的敵後地區建立。在全國，由於國民黨不願意結束“一黨專政”，不願意“還政於民”，這種政權仍然還是不能建立，仍然還只是宣傳的口號。因此，這種部分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只是地方政府。它應該屬於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並依照敵後情形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時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頒佈該地區的單行法令。

敵後的抗日民主政府還沒有爲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因此有人說：這種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這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問：什麼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抗日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全國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則。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應該是爲著保護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勝利。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礎。那末，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實行的，是不合法的。違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日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的，是違法的。大多數人民承認的，選舉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數人民不承認的，反對的，自己把持霸佔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權由人民選舉，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就應該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府，並以它作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認，只能證明中央政府人員的違法，違反了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這個法律基礎。中央政府不“還政於民”，不改組爲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違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國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審判這類案件的，在中國還沒有過這種審判。但這不是中國就沒有這種事情，是有許多這種事情，只是沒有人敢於過問罷了。所以，在敵後建立的這種抗日民主政府，在實質上是最合法的。由於國民黨中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暫時恐還難於實現。但是，在中國一部分地區，則已實行民主化。這種民主化的地區，應該是新的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在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可能要經過長期的奮鬥過程。因此，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有著推動全國民主化的重大的模範作用，它實行的結果之好或壞，將給全國以好的或壞的重大的影響。這種政權，今天雖還只在敵後一部分地區建立，但它有著全國的普遍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爲民主的勢力，願意爲大多數人民、爲老百姓服務，爲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如果能夠建立政權的話，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爲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末，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所以共產黨很願意一切抗日的黨派、團體和公正的人士來參加抗日民主政權，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數的人民都積極起來參政，積極擔負政府的工作，並積極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時候，抗日民主政權才能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能推翻，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實現。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全國極大多數人民共同的目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172—177 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標題爲編者所加

中國共產黨徹底實踐堅持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諾言

我們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麼實際工作呢？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這在上段已經講過了。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了人權與財權。人權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機關依照合法手續不能任意逮捕，並且必須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式予以審判和處置。財權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保障人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凡是及齡公民，不分階級、性別、信仰和財產，都有這項權利。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不論在政府與參議會之中，都實行了“三三制”。什麼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參議會代表也好，各級參議會選舉出來的各級政府委員也好，中國共產黨自己規定，共產黨名額都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選舉出來的代表或委員，共產黨員超過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請辭職，讓給次多數的非共產黨人士。這個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中國共產黨是主張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從共產黨本身起，就不做一黨包辦或專政的事。

以上種種措施，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保證政府是民主的政府。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 摘自《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見《董必武選集》第 110—112 頁

### 三三制的實質：政權共用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就主張聯合民主政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是人家不要他，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內戰時他沒主張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主張革命的統一戰線政權。廿五年的八一宣言、廿五年十二月的決議都是說明：一切反日反賣國賊的份子，不論他代表那一階級，那一政治派別，那一社會團體，那一武裝隊伍，都可以加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抗日開始以後，這類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澤東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說：

“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既統一戰線的政權。共產黨人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採取我黨中央會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不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有存在與活動之權。”

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上說明：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拿共產黨在政權上的主張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比較，完全一致，共產黨也和孫中山先生一樣這樣說就這樣做：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都已實行了三三制。因為他深切知道沒有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權，不能發揚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勝利。如果某黨派佔優勢政權就歸某黨獨霸，那是違反歷史規律，背叛民眾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敗。

除有長久革命歷史的國共兩黨外，幾十年來屢仆屢起的，包括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至其他階層的民主運動，遠之如“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國會”“民主政團”以及某些較小的黨派。他們的綱領，都是要求“選賢與能”，要求政權大家有份。他們不贊成“一黨專政”，更反對把他們當“阿斗”。

三三制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制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爲甚麼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

\*\*\*

舊社會遺傳下的劣性：

一，“自以爲是”。不管人是否“以爲是”而強人是我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無窮的。“自以爲是”即令有幾分是而未必能成爲天下之公是，而常流爲所謂“成見”。二，“惟我獨專”。這是權利欲或領袖欲的表現。生怕人來爭權利或者分權，於是排斥、忌刻，甚至屠殺隨之發生。三，“以小失大”，個別利益，包在全體；各階級黨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會。然而人們往往見不及此，既然“外禦其侮”仍要“內鬩於牆”。四，“互不信任”。由於上述三者，造成各黨派階級間深刻的裂痕，你懷疑我，我懷疑你，人家是人，無端疑之爲鬼；疑人爲鬼自己也變爲鬼，鬼道橫行，“特務成爲國是”。他不知道，揭開一看，原來不過如此，小的異完全可以統一於大的同。

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須克服。然後三三制才能實行、才能有實際。

\* \* \*

政權是人民的，黨是人民中前進部分，替全體人民爭取政權的。孫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爲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四萬萬人找出路，不是爲若干國民黨員升官發財。共產黨也是一樣，一切爲著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參加政府工作”。

\* \* \*

什麼叫領導？“領導是帶路的意思”（毛澤東語），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他知道跟著我黨來有好處；其次，黨員很積極，有信義，站在一切政治鬥爭的前頭，他知道跟著我們黨員走不會吃虧。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在後面跟著，從沒有帶路人要比跟著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強迫人家跟著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

\* \* \*

有些無黨無派的人士特別是從來就屏在政治之外的農民，對於參政不很積極。因而有些人說：不是不要他來，而是他不肯來；不是我要把持而是他們不提意見，或提的離題太遠，然而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從來沒過三三制即民主政治的結果。歷史經驗告訴人民的：要人民對參加政權有興趣，只有當權的黨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權公開的事實擺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運用政權，也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權與民意機關中練習。如果說“訓政”尚有某種意義的話，那末三三制就是訓政的最好辦法。

——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27日

全民民主優於階級民主：以三三制爲例

三三制的民主，比階級民主的內容更豐富，要有包涵同中之異的度量，和發現異中之同的見解，要有駕禦一切的遠見，才能取得一切的贊成。然而一切都歸宗於一點：民主習慣，遵守決議，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風的養成，共產黨員應爲首導，一，是共產黨員有實力的區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須約束自己。別人對的，虛心採取；自己不對的，馬上改革。追求真理，沒有成見。其次，共產黨人要知道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不是和共產黨人一樣，否則會使他們感到不滿與不安。第三，要有誠懇說服的態度，要知道有槍的人一句話不謹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著覺，而勉強使人服自己，常常使人氣破肚子。如果說階級民主今天這樣明天仍是這樣，甚至後退；那末，三三制民主，必然



是使政治一天賽過一天。因為三三制內包有階級黨派的矛盾，矛盾是推進機；不進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復存在。

前進的綱領與建議，前進的工作效率和徹底執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營養劑。比如共產黨西北局的五一政綱，二屆參議會中某些決議和某些提議，不管提出的是誰，而因為恰合於大多數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而見諸實施。於是三三制就更有力量了。因此參加三三制各階級各黨派必須力求進步，否則不會在政權和民意機關中出色，尤其有實力的黨派，更應提高自己，以黨的卓越的政策和黨員的模範，行動加上“開誠佈公”，才能保持住與提高其領導地位。

—— 摘自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27日

### 三三制：一黨專政的天敵

老百姓在解放區做了主人，就是說，解放區實行了民主。解放區實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區實行的民主有好幾方面，比如今天要說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的一種辦法，一種制度，用這種辦法、這種制度，好讓各階級、各黨派大家都有機會來參加政府、管理國事。

要知道什麼叫三三制政策，我們看一看解放區的老大哥——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個大概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完全是由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民主選舉出來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稱他林主席，林主席本來是老同盟會員，革命幾十年，現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銘，大家稱他李副主席，李副主席曾經服務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國醫，是陝北的公正紳士，不是共產黨員。邊區政府的廳長，比如教育廳長柳·，是救國會派人士；比如教育廳副廳長霍連果，還有建設廳副廳長霍子樂，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產黨員。政府委員會，十八個人中間，只有六個人是共產黨員。

在陝甘寧邊區，除去邊區政府有非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縣長、科長，以及鄉長、鄉文書以上的各級行政人員，也有很多是非共產黨員，統計起來，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參加經濟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與其他黨派、無黨無派的人在一起辦事，互相商量問題，實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設邊區，大家一樣，在政府中間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見在討論的時候，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那就能夠實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開始，陝甘寧實行“精簡政策”，最初提出這個政策的，還是非共產黨員李副主席。

邊區政府是由邊區參議會，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邊區參議員，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地主紳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數民族的代表等等，他們又是從邊區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黨派，以及各種不同信仰的人民當中，經過由下而上的普選運動，選舉出來的。在參議會上，參議員們和衷共濟，不僅批評政府的工作，並且通過了許多議案，交給政府去做，還選舉出參議會常駐委員，在參議會閉會的時候來監督政府。常駐委員有九個人，其中只有三個人是共產黨員。

各位聽眾！十八個政府委員當中，只有六個是共產黨員，參議會九個常駐委員當中，只有三個是共產黨員，可見得，共產黨員在裏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為什麼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呢？這就是因為實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這個政策規定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好讓更多的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參加到政府裏面來。

過去，解放區裏的老百姓熟悉共產黨，常常選出許多共產黨員來為他們管事，自從共產黨規或無黨無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產黨員當選的不夠三分之一，怎麼辦呢？那當然是選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區為什麼採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共產黨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廣大人民及愛國黨派、民主人士都來管理政權。中國人口很多，共產黨員占一小部分，為了要使黨外的廣大人民

都有他們的代表來共同管理國事，所以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權機關裏，自己約束人數，不超過三分之一。

中國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反對象國民黨那樣，由一個黨的少數人來包辦政府，主張各黨派、各階級都有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人民，現在都在努力爭取實現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現在，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政府還沒有實現，只有解放區實行了三三制政府，這就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解放日報》1945年12月7日

### 政權開放才有利於黨的領導

讓我們設想，有這樣三個不同的縣參議會和縣政府：其一、縣政府和縣參議會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其二、議會議員、政府委員會中，黨外人士都在半數以下；其三、真正實行了三三制。這三種縣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風上，會有什麼差異呢？在共產黨員思想意識的鍛煉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麼不同呢？

先讓我們看第一種。

議會、縣府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黨員的第一個任務是服從組織決定，因此當一個任務到來時，他們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這一個任務？”關於這一任務本身的政治意義在那裏？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一個根本問題，卻不會發生爭論。對於黨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這一問題也很少考慮，因此對於政策的理解也就不會深刻，甚至對於政策的研究與把握失掉興趣。大家統都以“完成任務”為滿足，逐漸發展的結果，是政治上的遲鈍，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極容易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一方面議會和政府不能發揮其獨立的機能，在人民面前減低了它們的威信，同時也使黨委紛忙於日常的政務，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領導。大家都是黨員，做的是一件事情，討論的是一個題目，又何必挪移三個地方（縣黨委、縣議會、縣政府）開三次同樣的會？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為對於黨外少瞭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對於領導群眾也常應用黨內的領導方式，強迫命令偏偏多於解釋說服；而黨員或幹部在群眾間起的“模範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強或過於突出。

結果是：黨的政策不能變為廣大人民的主張，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負擔；縣委、參議會、縣政府、以至群眾團體的負責人，在人民眼裏多變成了“公家人”，不再是與他們血肉相關的“自家人”。

第二種怎樣呢？

因為縣議會、縣政府都只有少數的黨外人士，黨外人士來時勉強，進門不敢講話，或少講話，辦事則敷衍表面。因而我們也就容易不把黨外人士當數，或誤以黨外人士當真沒有跟我們不同的意見，於是多數人已經討論決定了的東西，回頭來再特為少數人開一次會，把原案照樣通過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煩。黨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懶得參加這種黨政不分的會議了。於是一切事情仍舊習慣的進行起來：照樣地不研究政策，照樣地沒有解論，照樣的“完成任務”……。我們主觀上也許當真想跟黨外人士合作，但是實際上變成了“請客”，黨外人士也許當真打算到議會裏來發抒他們的意見，到政府裏來施展他的抱負，但實際上卻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這種情形，對於共產黨員毫無好處；對於縣黨委的工作，依舊是個累贅，而縣議會則容易變成一個空洞的形式——甚至連形式也很難得保持。

在第三種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黨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講話，他們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們的主張，或者是同意我們的主張而不贊同我們的辦法，或者同意主張辦法，而反對我們提出來的人選。在這種情形下面，共產黨員——首先是被選到議會裏和政府裏去的共產黨員，就不能不細心的、深入的去研究並把握黨的政策，如果依舊是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別人的立場和意見，而想出種種的對策，使別人接受我們的意見，同時也接受人家意見的好處。如果依舊是自高自大，

目無旁人，他們就會被孤立、受打擊，以至一事無成了。同時，他們也就不能不時時刻刻記憶自己是共產黨員，牢固的站穩自己的立場，為抗戰和革命打先鋒、做模範。如果再馬馬虎虎、吊兒郎當，連群眾都會公開指責你不配做共產黨員了。

於是黨的政策當更為廣大人民所理解，黨員行動當更為廣大人民所擁護，這便是革命勝利的保證。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實行轉變了。黨已經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張與辦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慮通過政治領導爭取大多數以實現黨的主張的辦法，關於實際政務上的瑣細專案，它就只好放棄、也不能不放棄了。議會裏既然有了不同意見的辯駁和鬥爭，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形式；即使我們每一項主張能夠在議會上毫無異議的全體通過，這些主張本質上和以前也已經根本上有了差異，因為它們已由黨的主張變為人民的主張了。縣政府再根據議會的決定，負責制定詳細的、具體的執行方案和步驟，縣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責任和獨立的工作。

只有黨與政在工作上的明確分開，才適合於民主制度的體例；也只有各自獨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潑辣、更有生氣的實現對於廣大人民的領導。

最後，在新的情況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個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不從頭到尾來個徹底轉變了：關著的門，必須打開；別人的意見，必須傾聽，強迫命令，必須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謂掌握與貫徹黨的政策，所謂瞭解情況，學習並運用策略，只有跟黨外的主張與黨外的人士相接觸、相比較時，才有其實際的意義；所謂黨政分開，所謂改變作風，也只有在議會裏、政府裏當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黨外人士時，才更容易實現這一個轉變。

三三制不僅是符合於全體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權形式，三三制還是鍛煉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黨的組織，使之真正成為全體抗日人民、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為引導他們走向勝利之路的帶路人的必須的途徑。

我們一定要堅決的、毫無猶豫地實行三三制！

——《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談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

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權機關，它必須真正有權，而黨是領導政府工作的。我在這裏想談一談黨與政府的正常關係問題。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黨的構成分子——黨員，在政府機關中工作，同時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一員。黨和政府這樣就發生了有機的聯繫。黨在政府中來實現它的政策，是經過和依靠著在政府內工作的黨員和黨團。黨只能直接命令它的黨員和黨團在政府中做某種活動，起某種作用，決不能駕乎政府之上來直接指揮命令政府。這是我們同志應當清楚瞭解的。

政府在黨領導下所頒行的法令，所公佈的布告，所提出的號召，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首先應當服從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回應那些號召，成為群眾中愛護政府的模範。

黨包辦政府工作是極端不利的。政府有名無實，法令就不會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權。過去有些同志以為黨領導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揮政府，這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董必武選集》第 54—55 頁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政黨本身不是權力機關，不能凌駕於群眾和政府之上

• 徐特立 •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

政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領導，第二是組織上的領導。前者的任務，第一是政治理論的建立，第二是政綱的制定，第三政策的決定，第四是正確領導方式的確立。它應當因此而得到群眾團體和政府深刻的認識和自動的執行，而不含任何的強迫與命令，這便是平常所說的黨的領導權。黨是沒有強迫執行命令的權力的，所以它沒有武裝，沒有監獄，也沒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個權力機關，只能靠它的黨員在政府機關中，群眾團體中普遍的發生核心作用。

政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忠實於國家，忠實於民族，忠實於黨的政綱和政策的執行，在群眾中成為一個最前進的模範人物，然後能在群眾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黨的威信，然後能使群眾團聚於黨的周圍，這就是所謂“起核心作用”。但這裏並不是用拉夫式強迫群眾擁護黨，群眾擁護黨是出於他們的內心作用。因此，我們領導群眾是要靠政綱政策的正確，在事實上要成為廣大群眾生活意識所反映的要求。黨在群眾的意識中要能夠使群眾認為黨是民族的，國家的及自己的救星，這才是真正的領導權。

至於普通所謂爭領導權並不是爭取政權，而是爭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綱政策的實現。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用黨來代替議會，也不是以黨來代替政府，包辦一切政治，成為黨的專政。把領導作用與政權混合起來，這在實際上便等於取消了黨。

其次，黨的領導作用不單純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張去取得群眾的接受，卻是經過各種組織而使它實現起來。因此，除經過黨的本身的核心組織之外，還要經過政府的組織（當權的黨）及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假若政府的組織及群眾團體的組織不健全，雖然有黨的組織，也就徒然成為一個空洞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在組織方面必須有政府、政黨及群眾團體三種組織。

黨的任務是在領導；政府的任務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眾團體的任務是在使群眾自治。三者的任務各有差別和範圍，而且互相聯繫著，缺一不可，兩兩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強迫作用，拿孔子的話來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強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深入群眾的內心，卻是今日正黨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級官階之分，對於群眾有官民之分，這裏便含著名分的差別。可是在黨內，一切黨員都是同志，無所謂官階，也無所謂名分，更無所謂同鄉和同姓，一致統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下，沒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說服：就是黨內的處罰也只有勸告與警告，到了開除黨籍已是無以復加了，同時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黨。因為黨不是權力機關，而只是領導機關，用通俗的話來說，假若我們認為政府是父親的話，那末，黨卻便是母親。

黨的專政只能說是黨的政治主張透過政府而達到實現，並不是用黨來代替政府執行政權。而透過政府也是由自己的黨員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黨對政府下命令和強迫政府執行。更不是政黨駕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別的獨立機關，各有各的上下級關係。即黨被群眾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認為黨是他們的上級，在組織應該服從，而是為著黨綱及政策的正確，是一種救國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張，同時黨員也是群眾所推崇的模範；因此黨的“黨德”和黨的政綱不是在群眾和政府機關之上。倘若認為“黨”是組織上在群眾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會走到強迫群眾和命令群眾的路上去，而使一個國家形成兩重政府的形態。如果黨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則成為屋上架屋；如果黨的命令與政府的命令是歧異的，則群眾無所適從。故此政黨必須集中精神於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而決定正確的政綱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執行一切政務。

政黨以政治為它的生命，每一個時期的政治轉變，必須竭盡全力發動全黨來迎接這一轉變，把國家社會乃至把整個國際轉危為安。在這種嚴重潮流之中，某一個政黨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麼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誰也不願意推翻它，同時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還會擁護它。因此，稍有歷史的政黨，不會把爭權奪利去代替救國救民的任務，也不會把黨的專政看做是黨的權利，而不看做是黨的義務。如果以爭權利來代替專政，那麼，就會使黨員變成黨官，政治家變為政客，政黨變為政客的集團。專政的意義弄錯了，結果國家遭到滅亡，自己的黨也會被敵人毀滅。同時一切政黨都應該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但是只見近利而不見遠利，及只見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朋友的利益，也是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以黨專政的口號下，變為以黨專利，更為嚴重。因為他不顧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幫助，孤軍獨戰，結果就變為此路不通。例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馬克思是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共產黨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同時另一處地方又說：“共產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產，而不是廢止小農民的財產和小職工的財產”。列寧也是共產黨的首領，他認為農民大眾和殖民地國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殖民地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利益，間接就等於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進攻時，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熱中，如果離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狹隘的階級利益上，使得國家滅亡，而自己的階級也會同歸於盡。在這種情況之下，還不愛惜朋友，幫助朋友，以致犧牲了朋友的利益，結果犧牲了整個民族利益，也就是等於犧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目前法國及中國的天主教也和共產黨合作，因為他們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敵人是世界的侵略陣線，威脅了一切人類。這並不是說，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絕對相等，但是在一定範圍內，共同的利益是絕對相等的。因為政黨自己本身不是等於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併為一黨，也不能夠隨便拉朋友進自己的黨裏來。黨的專政是保證政綱政策的實現，而實現的是大多數的朋友，卻不是單純的自己的黨員，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黨員來執行，那就無須要領導了。所謂“領導”也就是政黨對友軍起核心作用。怎樣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幫助友軍，使友軍健全起來，以便達到共同的目的。蘇聯只有一個政黨，而政府中負責人不一定全是共產黨員；一九三〇年，蘇聯聯邦中的日爾曼共和國的勞動部長便不是黨員。而蘇維埃的代表，只能保證黨員占多數；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時教育部就有許多非共產黨員，其中科長如賴子玉君，馮觀潮君都不是黨員，師範學校校長羅欣然也不是黨員。目前邊區政府柯柏年任編審科長，董純才任科員，均不是黨員。不久以前，孫銘勳由邊區政府主席團委任他為教育委員，而孫是延安師範的教員，亦非黨員（延安師範是西安省政府辦的）。社會教育科長楊其華，同樣不是黨員。因為有許多人才，有專門學識和經驗，他們自己不願意加入黨，卻願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條件不夠入黨，但在政府負責卻有餘；因為政黨和政府不是完全無差別的。如果行政人員不問他們願意不願意而強迫他們加入黨，那末，黨的組織就會不能鞏固起來。如果沒有入黨資格的人就不許在政府負責，那麼就要遺棄許多有用的人才。在過去蘇聯紅軍中的軍長師長，不一定是黨員，但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必須是黨員。因為司令員是由政府委任指揮軍隊的，政治委員是由黨委任指揮黨員，保證黨和政府決議案執行的。現在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有許多非國民黨員，可見以黨“專政”不是政府機關都用黨員，而只有保證黨的政策和政綱能夠實現。怎樣實現是要經過廣泛非黨員的群眾，而自己的黨員，只是群眾的核心。

在一個國家內的組織力量，是政黨政府及群眾團體。政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盡領導責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眾。政府用他的最高權力在黨的領導下保衛國家，他的威權是用來對敵人，而不是用來對友邦及對自己的群眾。群眾團體擁護政府，擁護當權的黨，在不妨礙整個社會利益，國

家利益條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權利。以上三種組織互相爲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則天下無敵，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滅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題《政黨與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版

## 論延安學校中支部對群眾團體的關係

在群眾性學校中，黨的支部與群眾團體，是並行的。假如說支部是從黨的系統來保證教育計劃的完成，則群眾團體是以群眾組織的力量來進行學生自治，各種課外活動及文化娛樂等輔助教育使教育內容更豐富更生動。（如果我們不把教育僅限於書本上的知識的話）因此在完成教育作業的意義上，支部與群眾團體是沒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應該鼓勵黨員積極參加群眾團體的活動，同時對這些團體必須採取團結、幫助和提攜的方針，只要這些團體是符合於抗戰、團結、進步的原則並向學校履行一定的手續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眾性學校的學生，是來自各階層各地域的知識份子，一般的說，除抗日救亡的目標是比較一致外，其觀點其立場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眾團體，也在某種程度內各懷有不同的動機。唯其如此，他們對民主作風格外重視，支部工作者應該掌握住這一特點，不僅宣佈而且實際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學術研究的自由，和作風上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

爲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因爲延安是共產黨員佔優勢的地方，學校裏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須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寬容的器度，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得住廣大的青年知識份子。黨中央曾有正確的對群眾團體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執行不善、手法拘謹，也會影響到這種民主作風的實質的。所以黨員在群眾團體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辯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去求得各種不同意見之漸趨於一致，性急也是沒用的。

黨內同志一方面尊重別人批評的權利，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要闡明自己的信仰與理想，批評別人錯誤的意見，二者不可缺一。在黨外同志來說，批評別人，被別人批評，這不等思想上壓迫。在黨內同志來說，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則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遠不會把錯誤的意見領導到正確方向上去。只有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在紛紜龐雜的意見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確，這才看出領導的必要與黨的意義。

但是上面所說的領導，自然不是支部對群眾團體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組織上的把持，而是要通過黨員提出積極的意見，使黨的主張貫徹到這些團體中去。領導的中心環節，就在於主張正確與別人相信這些主張的正確。而不是倚恃人多勢大。這裏的區別，就是“以德服人”與“以力假人”的區別。

過去學校中由於個別黨內同志存在狹隘的觀點和拘謹的手法，致死黨員與黨外同志之間，塗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而某些黨外同志也固執于自己是“群眾”因此對某些黨員有過高的要求。後來黨內同志和黨外同志一齊積極參加與自己興趣所近的群眾組織，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關係，這不惟沖淡彼此間存在著的隔閡，而且在團結上起了組織的作用。“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同志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這就是黨員對黨外同志所採取的原則。

學校中支部對群眾的問題，就是現實的青年知識份子的統一戰線問題。因爲來延安的青年有各階層各政黨的前進分子，有不同的社會關係，有不同的政治認識，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在群眾團體的選舉上，必須廣泛的容納這些人。就是說這些團體的組成分子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與這團體的領導部門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應成正比例。這就是說，假如組成分子中黨員占百分之三十，則領導部門中黨員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後者歲前者的變動而變動。這可使保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領導機構中去。這對這些團體是有好處的……

假如黨員被選到領導機構中，則民主作風，寬宏氣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個工作上問題的決定，盡可能經過協商、傾聽黨外同志的意見，取決於多數，明知解決問題失策，亦須以解釋說

服的辦法糾正。剛愎自用，盛氣凌人，自以爲是等不良習慣，都應該反對。萬一有原則上的分歧，解釋無效，則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見，迨將來事實證明看。假如黨外同志被選到領導機關，則黨員須自覺的忠實於自己的工作，以減少領導者的困難。並進而設法協助領導者解決其發生的疑難問題，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全校性的人數較多的團體中的黨員加以適當的組織，由支部領導使其多少具有黨團的形式，這在延安的學校中還是必要。

因爲黨員重視其所參加的群眾團體，遠不如重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這組織的任務應該著重在督促這些團體中的黨員執行決議、遵守紀律、積極工作以保證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顯然這與一般的黨團是有區別的。

爲要加強支部與群眾團體間之聯繫，支部有關會議歡迎這些團體的代表參加互相交換意見，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緊密。

教育計劃的完成，在學校範圍說來是很大的組織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學生中半數的黨外同志團結起來，步調一致，這對教育工作將是很大的損失！從此目的出發，則團結群眾團體，團結黨外同志，應當作爲支部“保證學校教育計劃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報》1942年8月2日

政府的權威，不是建築在群眾的畏懼上，而是建築在群眾的信任上

政府有權，要爲群眾做事，爲群眾謀幸福，不應該妨害群眾、壓迫群眾。邊區個別地方政府有脫離群眾的現象，這是政府工作中很嚴重的病態。

邊區政府權源出於群眾，政府負責人是群眾代表選舉出來的，這已表明政府和群眾關係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權，已深入到社會的基層。政府要傾聽群眾的呼聲，採納群眾的意見，瞭解群眾的生活，保護群眾的利益，但這還不夠，還要使群眾敢於批評政府，敢於監督政府，一直到敢於撤換他們不滿意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樣，群眾才感覺到政權是他們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群眾對政府的批評也許有錯誤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有時爲群眾所不瞭解，因而發生誤會。這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向群眾解釋，說服群眾，切不可打擊他們，更不應當對他們藉故報復。我們要相信群眾是可以說服的。

至於那些敵探、漢奸、托匪及專心破壞政府威信、妨害政府工作的壞傢伙，政府決不能放縱他們，但必須在群眾中揭穿那些害蟲的罪惡，用群眾的力量來懲治他們，而不是政府簡單地判罪了事。

政府的權威，不是建築在群眾的畏懼上，而是建築在群眾的信任上。群眾一經信任政府是他們自己政府的時候，政府在當地就有無上的權威。

——《董必武選集》第55-56頁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

邊區政府是我們黨領導群眾建立起來的，政府也在黨領導下工作。政府所頒佈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們黨員應當無條件地服從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們公共生活所必須，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經過了一定的手續才制定出來的，秩序是經過一定的時間才形成起來的。在制定和形成時已經滲透了我們黨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和活動。我們如果違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壞了社會的秩序，我們自己必須負責，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

我聽說我們邊區有些黨員同志犯了法，因爲他自以爲是黨員，想不受政府的審判和處罰；而有些地方黨組織也覺得黨員犯法，是黨內的事，讓他逃避政府的審判和處罰。這都是不對的。國民黨在全

中國範圍內因為它的黨員不遵守它領導的政府所頒佈的法令而遭受到國人的痛惡，這是我們應當拿來作為鑒戒的。黨員應當自覺地遵守黨所領導的政府的法令。如果違犯了這樣的法令，除受到黨紀制裁外，應比群眾犯法加等治罪。為什麼呢？因為群眾犯法有可能是出於無知，而我們黨員是群眾中的覺悟分子，覺悟分子犯罪是決不能寬恕的，是應當加重處罰的。不然的話，就不能服人。從前封建時代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傳說，從這傳說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難道說我們共產黨不應當主張比封建時代傳說下來的一點法律上的平等更前進一步嗎？

我請求邊區黨通過一個決議，警告我們黨員必須遵守邊區政府的法令。黨員犯法，加等治罪。這不是表示我們黨的嚴酷，而是表示我們黨的大公無私。黨決不包庇罪人，黨決不容許在社會上有特權階級。黨員毫無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這更表示黨所要求於黨員的比起非黨員的要嚴格得多。

——《董必武選集》第 58-59 頁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

中國人民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將近二十年的長期專政中，中國的混亂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十年，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內戰。結果，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在抗戰的八年中，越到後來，國民黨反動派越是抗戰消極、反共反人民積極。日本一投降，他們就把他們在抗日戰爭中保存的實力大量派出，全國大打。……

長期的災難折磨著中國的人民，但同時也教育了他們。從二十年來的歷史事實，他們深深地懂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專政不改變，中國就永遠不可能安定，中國人民就永遠不可能有好日子。這個真理，不但中國的人民懂得，而且許多遠隔重洋的外國人，也都逐漸清楚地瞭解了。現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來養肥自己的奴才們，才還在那裏厚顏無恥地講他們那個臭不可聞的“法統”。而三國會議的決議，卻不但要國民黨停止內戰，並且要它放棄一黨專政、放棄它那個“法統”。

然而站在人民的頭上、吸人民的血過活的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是輕易地就放棄他們的專政的。恰相反，他們要用各種方法來繼續維持他們的專政。內戰是一種方法，製造暴行與血案也是一種方法。今天，中國還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要變不要亂”。仿佛誰要把中國變得更亂似的。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其實，“要變又要亂”的人是沒有的。中國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實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而且知道只有變方能止亂。與這相反，“要亂不要變”的人卻是有的，那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企圖“以亂止變”，他們正在用各種可怕的亂來阻止他們的專政被改變。自然，他們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安定”就是全中國人民的禍亂，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全中國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少數人的“安定”也不過是主觀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們殺不完，他們抓不完，他們關不完，因此他們就難於“安定”。他們最恨共產黨，說什麼共產黨一天不消滅，他們就死不瞑目。他們大概認為是共產黨破壞了他們專制獨裁的“美”夢。其實，就是沒有共產黨，他們的夢也是不能實現的。袁世凱時代，中國沒有共產黨，但是袁世凱的專制寶座還是沒有坐穩。滿清時代，中國更沒有共產黨，但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萬世不變。

自然，今天中國人民有了共產黨，而且是這樣成熟與強大的共產黨，對於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個重大的阻力。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就象保護自己的眼珠子一樣，這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神聖的天職。……英美盟邦記者在親身訪問了解放區之後，或者說：“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



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格爾德：《關於中國的近況》)；或者說：“在各個遊擊區和邊區裏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費爾特：《中國內部的危機》)。這些神奇的創造不是由於別的，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無時無地不是在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奮鬥。中國共產黨人的這種特點，這種精神，就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沒有飯吃，他們情願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設，他們替人民建設；遇有艱難危險的事情，他們能夠為人民的先鋒”。而對於國民黨人，則蔣介石先生也不得不這樣承認，即：“在我個人感覺到，我們什麼都不行，如果有點行，我們的國就不會如此。我們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為人民的表率，所以我們的黨員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並且受人民的厭惡……”(以上均見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總理紀念周講演詞》)。這的確是兩黨的根本差別點。這也同時是兩黨許多爭論的分歧點。一個(共產黨)，一切為人民；一個(國民黨，主要是其統治集團)，它的目的卻是為了維持少數人的獨裁，因此它的政策與辦法，就是內戰、特務、屠殺、逮捕、抓壯丁、加重賦稅、濫發鈔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國極端混亂，它使人民極端痛苦。

國民黨的論客們，你們說你們是真的希望全中國的安定嗎？那麼你們為什麼要東拉西扯，信口胡說，不敢把真正的亂之源說出來呢？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麼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

取消特務

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略有刪節

合法的罪惡

• 門 納 •

有史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沒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變以至於今日，雖然有了若干次的鬥爭，但依然還是沒有一部“人民的憲法”出現。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會有什麼權利與方便，而青年學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誣蔑屠殺的義務。

中山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的時候，標明了聯俄聯共擁護農工的三大政策，認真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當時國民黨所統治的地區之內，一切愛護蘇聯、愛護共產黨、愛護農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語行動，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檢討了若干年來革命失敗的教訓，又接受了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所以要建立黨軍，因而開辦黃埔，號召青年入學，培植革命的軍事幹部，雖然中山先生不久就與人間別離了，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血液，還不會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排泄出去。中間經過五卅慘案，洶湧於全國各大都市的罷課罷市罷工的愛國運動，只有香港和廣州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支援，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撓破壞摧殘。所以當時一般的青年，都視黃埔為革命聖地。尤其是兩次東征，青年們用熱血頭顱打陳楊劉，鞏固了革命的根據地以後，風聲所播，全國各地青年，湧出了奔赴黃埔的浪潮，當時的黃埔當局，對於這些青年，也可以說是“來者不拒”。以後的北伐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也就是得力於這些青年的踴躍犧牲。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輝煌殿堂，可以說是用這些青年們的頭顱來建築成的。

可是，那時廣東的國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國的廣大地區，是被認為不合法的。因為國民黨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封建軍閥，當然不會承認它為合法，在那時非國民黨統治區青年，要想到黃埔去，也實在是困難而危險的，稍一不慎而被發覺了，就會走上被拘禁或屠殺的惡運。封建軍閥當然認為他自己的這種行動是合法的，因為他自己是被帝國主義者承認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當時的青年們要從死裏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們的熱血頭顱來求得民族與人民的生，在他們的踴躍犧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謂合法的封建軍閥們，不久之後，一齊都望風披靡。而從前所謂不合法的廣東國民政府，現在也屹立於紫金山前，一變而為合法的了。

這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呢？一方面，是這些不惜為國家民族而灑熱血拋頭顱的青年們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炮轟下關，血洗濟南，他不敢反抗；散佈在各地的封建軍閥官僚，只要旗幟一換，就可以加官晉爵。他是跪在帝國主義胯下，伏在封建勢力的懷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從前在廣東時認為合法的青年們的種種言語行動，如今又轉變為不合法的了。如果這些青年還不識相，還要保存著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還要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話，那就會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大屠殺，枉死城裏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萬。靠青年起家的黃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龍庭上，發出猙獰的狂笑了。

可是，算盤又還打得並不怎麼如意。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隊伍，又在江西開闢了根據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閻馮之流，又隨時要設法分庭抗禮，“天下”還沒有完全成為“一家”，又靠什麼去替他征討撻伐呢？當然又還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現在的號召青年，並不象從前在廣東時那樣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術了。

從黃埔演變而來的軍事學校，四面八方的去開展，用種種方法引誘大量的青年進入這座學校，灌注一些“命令重於生命”的迷魂湯之後，再替他到沙場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學校中，則黨義、軍訓、紀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劑。周考、月考、期考、會考、文憑，就是重重枷鎖。黨權高於一切，服從領袖，聽到“領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個天真活潑的青年，受了這樣黨化的幾年教育之後，就會變成死板板的沒有靈魂的奴才。如果有不願意替他做炮灰、或不願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現了一點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誣蔑為“共產黨”。被加上這一名詞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說，自從黃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龍庭以後，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國青年，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為奴才，便要被誣蔑屠殺而成為冤鬼，當中沒有別的路，如果還有別的路的話，那就是死裏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

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踏步向中國前進，國亡無日，全國青年奮勇起來的愛國浪潮，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愛國有罪”。木棍、石塊、水龍頭，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們的禮物。“攘外必先安內”，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區域內的“安內”的良方，而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為合法的。

經過西安事變的當頭一棒到蘆溝橋的炮聲，全國青年如瘋如狂地湧上抗戰前線，參加了各種抗戰工作，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氣，認為“自由”來到了。然而，曇花一現，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他不曾負擔起他應該負擔的團結全國青年的神聖任務，反而造成了使全國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當特務，同學如寇仇，製造摩擦，釀成慘案，不一而足。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與支援下，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執行嚴肅工作而使他們看不順眼的人們，都被認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營。集中營如雨後春筍地建立起來，成為大規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這就是高坐在重慶小龍庭的帝王在抗戰期內對青年們所樹的德政。

日寇投降後，這個合法政府已經無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來進行“安內”的工作。在抗日戰場上望風披靡的英雄們，現在一變而成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魯門赫爾利馬歇爾等的助紂為虐，內戰英雄們得意忘形。然而全國青年是不甘心讓這些英雄們置民族國家於死地，一齊怒吼起來了。從昆明的“一二一”慘案到重慶的“二五”、“二八”慘案，中間經過不知多少洶湧澎湃的浪潮，在所謂合法政府的心目中，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從黃埔出身的關麟徵杜聿明，在“你們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開槍的自由”的黨義下，進行了合法的殺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佈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民不畏死  
．黎 望．

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學人、誨人不倦的長者、堅貞不屈的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在李公僕先生的血迹未幹、全國人民創痛猶新的時候，又被法西斯特務反動派暗殺死了。

這是中國反動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無恥最卑劣的暴行；這是反動派千百種罪惡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惡。這樣一位千百萬人民愛慕的長者，這樣一位學行優異的學者，僅僅是爲了執著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就不能見容於中國法西斯反動派。最後是出於這種最卑劣、最險狠的暗殺行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反動派對於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難想見。

由於李公僕、聞一多先生之被暗殺，已經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務猙獰險凶的面目，已經使全中國的人民警覺到，反動派已經不惜與全國人民爲敵，要實施血腥的屠殺政策！

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鉢，已經反動派一手繼承下來；一切專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國的法西斯反動派已經完全做了。反動派已經集了一切橫暴、險狠、卑劣、無恥的大成。

反動派也許在得意的癡笑吧：可是，別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個李公僕，是一個聞一多，然而繼續起的將是千千萬萬的李公僕、聞一多，千千萬萬爭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鎮壓不了、也是屠殺不了的；要不，一切暴君的統治就該永不會動搖了。米蘭街頭墨索里尼的屍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屍灰，該就是殷鑒不遠的。

在反動派的眼裏看來，大概以爲這種血腥的恐怖政策，將會鎮壓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運動，封堵住一切人民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切專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爲，最終是逃不掉滅頂的命運的。要想這樣來屠殺盡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夢想。人民的力量正如象勒納湖裏的水蛇樣，是會在切夫頭的頸上，重新生長起一個頭來的。至於反動派這種自絕於國人的行爲，正如象漢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說：“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

反動派要想用這樣的屠殺來恐嚇、來鎮壓住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中國人民在這種血腥的暴行前，對於橫逆的忍受到了極度的時候，中國人民將會表示自己的意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反動派也就會臨到入墓的時候了。

在生者的創傷、死者的血痕前，雖然會使一些善良者歎息、劫懦者卻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猶疑者堅定腳步，而千千萬萬被死者的血浸漬的戰士，將會跨過死者的血迹，奮然前行。

七·一六晨五時欲哭無淚中寫成

——《新華日報》1946年7月18日

## 人權和觀瞻

中國人的人權，直到今天，還沒有一點保障。抗戰以前，成千累萬的愛國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緝；現在政府也感到這樣明目張膽地幹，會引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抗，同時也有礙“國際觀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學生、教師、工人……各種愛國分子的名字都寫上了特務機關的黑名單，讓他們“自行失蹤”，暗暗被殺死，永遠沒有人曉得。

但是公開的逮捕，還是一樣毫無顧忌。重慶市不到一月之內，就有幾乎上萬的人被抓去，送到師管區，沒有拘票，不根據任何法律，高興抓到就抓了關起，稍不順從，就開槍打；還製造了一個只有政府當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爲了“國際觀瞻。”

暗逮明捕，既然都是爲了觀瞻；那末在黑名單沒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沒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沒有釋放之前，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政府宣佈的“保障人權”，不是爲了“觀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 論無恥主義

• 舒 蕪 •

搶劫、放火、搗毀、暗殺，肆無忌憚地做著這一切，然後又掩飾、推諉，儘量地把種種美名歸於自己，把種種惡名歸於別人，這是一年以來我們見慣了的現象。

也許有人想，這究竟還算知恥。

不，不是，這正是充分的無恥，是無恥主義的基本原則。

無恥而成爲一種主義，成爲一種體系，就不是簡單的東西。在那個體系裏，貫串了一個無恥的方向，一切都統一於這個方向之下，一切都是無恥的。

他們取美名而避惡名，這並不是尊重美惡的標準，承認美惡的分別。在他們，這乃是對於客觀真理的侮蔑、對於人類良心的玩弄；正是利用客觀真理，騙取人類良心，以保證他們的無恥的存在與進行。

當然，“墨寫的謊話，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他們也未嘗不知道。人類良心之終於不會被騙去，他們自己比別人更清楚。然而，他們的謊話還是要說下去、謠言還是要造下去。所以，連騙人的效果，他們甚至也並不企圖；他們乾脆覺得騙人都不必要，胡說一遍，僅僅是對於人類良心、對於這世界上的一切道德力量與精神價值的最卑污的嘲弄。

做了那些事之後，如果還真有一點知恥，該是聽到那些美名都不好意思起來、更不敢從自己的口中說出的吧！然而，迎新送舊的妓女說著堅貞、出賣人肉的販子說著義氣，當這種時候，這“堅貞”與“義氣”，又究竟被變成什麼東西了呢？

無恥主義者如果也有哲學，那就是徹底的人類憎惡、人文的滅絕。在這一點上，恰與正宗的法西斯主義息息相通。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一切美好高貴的東西，都是他們所憎惡的。惟其憎惡。所以不僅在行動上要摧毀它，而且在口頭上還要玩弄它。

自從希特勒的國會放火案以來，這衣鉢傳承不輟，由西而東，變本加厲。騙，是沒有一個人被騙到的。一幕一幕，只足以證明他們愈變愈成爲非人類，愈來愈沒有任何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援。換句話說，也就是證明了他們的存在究竟應該在什麼地方，究竟在不在這個人類的世界。

那麼，也不必嘲笑他們的宣傳技術的拙劣了。在他們，是只能這樣、也只要這樣的。

——《新華日報》1946年8月22日

## 風氣・秩序・容忍

讀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報的《風氣與秩序》的社論後，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風氣與秩序來。

這大半年以來，從一二一昆明的“國軍”用機關槍、手榴彈，殺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學生與教師起，一直到最近暗殺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東，又由東到南，數不清的打與殺，以及每天都有的貪污作惡，在中央日報的社論作者看來，算是什麼風氣與秩序呢？

由於老百姓對那種風氣與秩序不能“容忍”，向政府要求過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統治者就認爲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就認爲是必須“戡”的“亂”；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黨專政，而被稱做“中共的尾巴”，並且暗殺其領袖；社會賢達不能容忍，贊助了中共與民盟的主張，而被誣爲“受利用”，列入黑名單；國民黨內的開明者不能容忍，贊成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即被視爲“不穩分子”。

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而反動派則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禦用的“民意”機關，發出“請求政府戡亂”的通電。於是凡是不容忍反動派那種壞風氣，壞秩序的老百姓、共產黨、民盟、社會賢達，乃至國民黨內的開明者，都在被殺、被捕、被戡、被排除之列了。

曾經有人向中國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這就是叫中國人民永遠作反動派的奴隸的意思。這是多麼如意的算盤啊！

——《新華日報》1946年8月20日

“黑名單”

• 紀 懿 •

最近有人偶爾看見了一份後方各大學的“黑名單”，印得很精緻，硬殼，封面是全黑色，裏面的字，當然也是黑的了。

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據說很少，每個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樣，推其意，大概是“共產黨”、“民主同盟”之謂。可見這份“黑名單”不但印得精緻，在他們做“調檢工作”的時候，也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可惜的是，它雖精緻卻不精確，據說依看見的人所知來斷，被列入的大都是無黨派的純潔青年。只是他們平時也關心時事，希望和平民主。於是紅帽子一頂就給硬帶在他們頭上了。

民主同盟原是國共兩黨之外的黨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組織，因為主張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產黨的週邊組織”的“榮冠”。共產黨是“赤”，那麼，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紅”的了。於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改組政府的，就一律歸劃“左傾份子”，非“赤”即“紅”，非“共產黨”即“民主同盟”了。

黑名單上的“共”、“民”小注，想來他們也找不出真憑實據來。只不過把不順眼的、不跟著自己搖尾狂吠的人古腦兒寫上去，再照“不順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順眼的當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們這樣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並非幹拿津貼，於是就煞有介事似的來了一個分別。

黑名單“史”的考證，無法做到；因非“個中”人，不明“個中”事。可是記得離打國仗前還很久，就聽到這個在小孩子聽來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辭了。抗戰前列入黑名單的是為了他們要求“抗日”、要求“救國”。抗戰中列入的是為了要求“民主”、要求“堅持抗戰”，勝利後列入的是為了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民主”。這樣看來，戰前不肯抗日救國、抗戰中實施一手獨裁打算跟敵人妥協，勝利後要繼續獨裁下去打內戰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單、要一手殺盡“黑名人物”的人們了。

十八年來。被壓死在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計數，黑名單也不知燒毀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無數優秀青年的性命，就在這“燒毀”與“新制”之間被兒戲般地斷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槍殺、被毒害、被活埋卻象死了又復活一樣，永遠殺不盡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黑色象徵死亡，可是它也是“鐵”的表像。“黑名人物”正是錘煉中的黑鐵，這些鐵塊，將要在千錘百煉中成為堅韌的純鋼，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單的製造者，終歸要被層疊高堆的黑名單壓死。不見俄國的沙皇？又不見希特勒正在忙著印黑名單的時候，自己首先垮了下來？

——《新華日報》1946年7月2日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復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什麼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

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短評

### “守法精神不夠”論

• 磊 落 •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報》載：“市政府鑒於各階層人士守法精神不夠，擬於最近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研究‘守法運動’具體辦法……。”

打風在重慶流行，實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夠了，但這些違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麼人呢？檢查一下：一連串殺人行兇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槍桿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負維持治安責任的人幹出來的？幹了之後，個個都逍遙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夠的不是別人！正是這批踏在人民頭上為非作歹的傢夥！

要誰守法呢？請老爺們說明白點！

——《新華日報》1946年5月26日

### 奴才見解

• 田家英 •

讀史記《秦始皇本紀》，覺得奴才的見解常有其獨特的地方。

秦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於是忙煞了一批幫閒、幫兇、走狗之類，浩浩蕩蕩。除了三呼“陛下神靈聖明，”揚著鞭子，監督奴隸刻石歌頌功德，這些唯唯諾諾或者噉噉的奴才，便忙著“使天下無異議”，策劃“安寧之術”，改官制，嚴刑罰，強化特務基層活動，運用嚶羅監察網。這裏，最有名的自然是“焚書”與“坑儒”。

焚書，這在中國“書缺有簡”算是最早了吧，非秦書，皆燒之，詩書百家語欽定不准讀，准讀的是醫藥蔔筮種樹之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讀核准的書，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過，雖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豈非顯出奴才身份並不高貴了麼？所以站在奴才立場最好的不是奴化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當掘一個大坑，推他下去。

於是便有異議了，秦時當有言論，可惜不及詳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張，那宏文是：

……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諸生不是所謂“真儒”，而是當時干犯禁令的人，所謂禁令現在雖無當時什麼《出版法》或《檢察條例》可資考證，但“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必然是“亂黨和反動分子”，亂黨和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綱紀嗎？

進一步來講，所謂“儒”……應該是明大勢，識大體——瞭解始皇從分割中求統一之心，最少是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不造謠言攻勢“宣傳反動思想”……（《民意》一六八期）

這篇話，給我們活畫出橫眉怒目，一張吃人血口，這些“亂黨和反動分子”為什麼不“明大勢，識大體”呢？我們看到一種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們仰視光明，要掙扎，不安于眼看淪為奴隸。

這種奴才在秦始皇當時是很多的。單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鑄，棄市，戮車裂，抽脅，磔等等二十餘種，應有盡有，污蔑人類的刑罰，獸性與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類天性了嗎？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鳴鞭自傲的奴才，他會覺得殘酷就是道德，諂媚就是學問，屠殺是他的

本能，沒有人供他們殺戮，他們會失業的。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著他人血迹，使自己發肥的總管。

然而站在主子立場又不盡是這樣。殺一人而安天下，統治者自然要為，但是屠戮淨盡誰又來作奴隸呢？所以主要的辦法還需別來一套，這樣，另一種奴才就大搖大擺地走出來了。

李斯就是一個。“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這是一種隻知助虐固寵、毫無原則的人，他的辦法不同的，“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呂、金人十二”，對於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現代話說是“整飭學風”，方法是：統制教授“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特務橫行，暗探林立，有言詩書百家語者“隨時報請撤懲”，“士學習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學生干涉行政之風”。總之一切設施不過為著使諸生與真理相遠，與現實相離，將來，理想社會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師今而學古”，戀著過去也為法令不容，“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諸生為要多少“知”一點去想呢？當然不准。同時還準備著一套萬一要想，也得依著自己的邏輯，避免想出毛病來。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這就用著第一種奴才作為補充，開除，思想測驗，失蹤，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始皇用著這兩種奴才，是成功了的，諸生在欺騙、壓制之下，觸不到新的現實，聽不到新的聲音，‘由聾而啞’，緘口結舌，最多也不過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類征服下來了。

但是李斯之流卻沒有看到另外還有力量。

這決不是國治天下不平了。事實的功德圓滿卻是與原意相反，統制是為了“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可是還來不及“把‘諸生’改為新的名詞”，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焚書，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卻並不是儒——亭長，走卒，翁牖繩樞之子，田亡隸之徒，根本不讀詩書的人。沒有武器，他們會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若問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為什麼被一批烏合之眾，一群死囚，幾根木竿，亂者四應，秦的政權摧枯拉朽，統治立摧？

賈誼說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仁義不施”：防制異己，壓迫文化，束縛思想，箝制輿論，以刑殺為威，以收括為務，踐踏，奴役，納賄，貪婪……天下大亂，更加甚的常常是這些謀籌劃策，唯唯諾諾，或者嘖嘖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報》 1941年12月8日

今與昔

• 田家英 •

“能懺悔的人”，據說“精神是極其崇高的”。最透底的懺悔是從新的做人，斬犯綁赴刑場，為了表示不甘屈服，總得大叫幾聲“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快刀從頭頸飛過，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長，二十年後依舊是鋼筋鐵骨，依舊是一條好漢。

這方法在中國，流傳是頗廣的，而且越來越高明。不甘落後的人加以研究，覺得二十年畢竟太長，麻煩得很，於是另有新法：趕緊“貸款”，趕緊入黨，趕緊做好漢。

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漢們，也自有其內心的苦悶在。“反動”已經變為“革命”，舊英雄已經裝成新英雄，“名缰利鎖之中”，“鼓舞喧鬧之境”，耍猴兒戲的最怕人揭開面具，望著他毛茸茸的臉皮，問起如何前後不符，直弄到騰挪不得，觸及隱處，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當今天的看”。

這就是今與昔的差異。

自然，消極地表白終究不算善法，一來爲了體面尊嚴，一來爲了證明自己從“不知道‘轉變’”，聰明人往往就會把過去說得含混模糊，或者把舊帳陳迹扮飾得雪白瑩淨，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這類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單看每臨紀念，報紙期刊上總常有許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過領餉作事的編輯，訴說他一直就爲新文化戰鬥，但彎子一繞，又在另起爐竈，從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幾位教授文人在作“光榮的回憶”。甚至連鄭學稼、梁實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遊行示威，宣傳講演，制旗幟，貼標語”，使用過“喚醒沈醉的大衆的手段”！結論如何？不過從“五四”證明“學風”的亟待整頓，學生不應過問政治。（引文均見《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這裏躲閃不開。戰士闖將與吃肉吸血的幫閒之間隔一條多寬的鴻溝，但事情卻偏會作弄，在同一個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與昔有著如此的差異。

“覺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這精神是不錯的。但卻必須是大體上能明是非，辯黑白，至少也本著良心奔赴去路，倘若僅隨勢力旋轉，爲了津貼領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兩下嘴巴，淌幾滴眼淚，用歪曲來證明內心的忠誠，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險惡的構陷，把世事塗飾得漆黑一團，以之騙人，兼騙自己，這就比之簡單抹煞歷史，更卑劣得多。

不過，這卑劣中卻仍然存有點“古道”在，因爲究竟還承認有過那篇帳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來愈爲精進，恐將不久，好漢們連“改帳”也嫌麻煩，乾脆算盤一響，帳簿一翻，就把兩眉一橫：“那是我？——我一直就在這邊。”

在好漢們身上，今與昔是難於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鷹，作蟲類。

——《解放日報》1942年7月10日·

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

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新聞自由——人權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載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報》），對戰後世界的言論，特別是新聞自由的問題，抒發了更深一層的探討，提出了更具體的方案。雖然他認爲“宣傳造成了希特勒”一點，還有值得討論之餘地，但是他說當時國際間缺少一種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新聞服從於統制”的事實，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國的例子來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衆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衆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於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裏，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分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裏面。

威爾斯先生真知灼見地指出：這種“新聞統制”和毒品貿易人口販賣同樣的是一種有關全體人類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企圖行使這種法西斯制度的時候，正象我們不能聽任一個國家用鴉片毒品來荼毒其餘各國人民幸福一樣，除了用國際道德輿論遣責之外，還該有一種集體的國際機構的力量，來制止和消滅這種罪惡的滋長。他強調地指出：只有這種國際機構的具體的明文規定和實力制裁，才能保證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論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再度生長，而這種國際規定，絕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對派”所叫囂的所謂內政干涉。正如國際機構切實調查和制止一個國家的販賣吸食鴉片毒藥不能算是內政干涉一樣，戰後國際機構經常不斷地調查和阻止“新聞統制”正是保障國際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樂斯氏具體地建議：“規定一個國家必須能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其已予其國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為人民不可動搖的權利。”當然，單單憲法文字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國際機構要求每個政府都能以實踐這種規定作為參加國際機構的條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剝奪了人民的各種自由而提出控訴，這樣的問題應當由國際組織的國際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個政府觸犯了它加入國際機構當時所作的諾言，破壞了它應當履行的義務，那它就顯然再沒有資格被認為國際社會的優秀分子，並應當受到國際機構憲章可能規定的制裁與懲處。”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德黑蘭會議莊嚴地宣言，我們要創造一種“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的和平，這是沒有“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的“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好感，而企圖剝奪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自由的分子將會沒有資格跨進“民主大家庭”的大門，因為在這大家庭的門上已經挂出了一條家法：

“剝削言論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內。”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社論  
原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 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不要分割

羅斯福總統在其致美國第七十八屆國會咨文中，提到了美國國內右派反動分子的問題。他說：“真的，如果這種反動發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們又回到一九二〇年後的所謂‘正常’時代，那麼，我們敢斷定，我們縱然在國外戰場上克服敵人，但在國內也必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羅斯福總統在這裏不但為美國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而且為其他許多國家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

我們敢說：許多重要國家國內的右派反動問題，決不止於是一個國內問題，這必然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由於一個國家在國內屈服於法西斯主義之下，因而它在國際間也必然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支柱，而不能為民主主義的支柱。以故目前講求國際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講求國內的民主。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因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懼的東西就是法西斯主義。羅斯福總統主張免除恐懼的自由，應當首先解釋為把法西斯的威脅和恐怖加以徹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國家國內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徹底免除，那就等於整個國際間關於法西斯的恐懼，沒有解除。

無論國內的民主也好，國際的民主也好，都要從本質上表現，形式是次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民主就是人權。人權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權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權利。人民無法行使權力，也就無法享受權利。目前測量民主的程度，不僅是拿享受權利來做標準，而且是拿行使權力來做標準。我們不要以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僅僅是一個權利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權力問題。只有實際行使這種權力；才能叫做享受權利。

在這次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在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民都感覺到他們國內的民主非常不夠。羅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認一個《第二人權宣言》。在保障人權方面，我們中國更應當與我們的偉大盟邦——美國——競賽。

再者，民主與和平是密切聯繫的。這就是說，國內的民主與國內的和平是密切聯繫著。同時，任何國家內的民主與和平又與國際的民主與和平密切聯繫著。我們中國今天與英美兩大盟邦比肩作戰。……因此，也就是為了國際的民主與和平而鬥爭。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社論

## 言論思想自由和國際文化交流

近來，各地方談論言論自由的很多，這現象該值得興奮和鼓勵的吧?!這無論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這樣的需要，都認識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訪英團回國之後，王雲五先生談到過英國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我們已經評論過了。那天在國民參政會上，訪英團也作了報告。其中說到：“英國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各地報紙向來很發達。”這句話在我們讀了之後，真是感慨頗多。原來報紙發達，是以言論自由為前提；言論自由有促進報紙的發達，又由訪英團加以證明了。輿論沒法蓬蓬勃勃的發展，這對輿論界是件苦事，對政治卻是個損失。

這些話本來都是老生常談了，可是談到言論自由就總會聯繫到。問題還不只此。訪英團還提到英國文化界希望加強中英文化聯繫，特別注意交換教授學生及圖書等事。這是很重要的。正象訪英團所說：“雙方應即積極推動。”英國既“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學術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麼，交換而來的教授和學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出來的。他們的思想是沒有受過任何限制的，言論在戰時所受的拘束是也與平時差不多的，這也就是說他們只看得慣過得慣這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歡迎他們來，是歡迎他們到一個民主國家來，在他們想象中是和他們本國一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怎樣才能讓他們證實這種想象呢？怎樣才能使他們有“和在家裏一樣”的感覺呢？反過來說，英國既認中國是民主國家，一定希望中國的交換教授和學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現出中國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這些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須有民主自由，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進，才有意義。寫到這裏，可以舉一件小事情，說明沒有民主自由，是阻礙國際文化合作的。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國留學生監督控制學生思想的辦法廢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學生到美國大學和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因為思想言論自由是美國的民主傳統，特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民主國家親密團結的時候，不能不對違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議。雖然這項要求，政府是否接受，還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來，各國就該嚴重注意了。這實際上是要求把國際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則，就是說，這種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義為共同的出發點和基礎，民主國家只能幫助民主國家，也只能向民主國家獲得幫助。

從國內人民要求、國際潮流所趨看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趕快從原則的討論，走上切實的現實了。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0日社論

## 《歷史的先聲》網上衝擊波

由於傳統媒體被管制得滴水不漏，管制力量相對薄弱的互聯網，便在事實上構成了言論特區。體制內找不到出口的聲音，紛紛向互聯網彙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雖遭大陸當局暗箱封殺，但它在互聯網上的巨大衝擊波，卻是當局鞭長莫及的。1999年至2000年近兩年中，有著“中華第一壇”之稱的人民日報強國論壇，幾乎每天都有網友自發上貼該書文章，最初數月更維持日上貼量數十篇到數百篇的高記錄。其他中文政治論壇的反響同樣強烈，如億龍網站BBS“西祠胡同”的主力板塊“銳思評論”，就曾約請著名作家戴晴領銜展開專題討論。收錄該書的中文網站亦達數十家之多。該書在互聯網上傳播之廣、影響之深遠，大陸出版界無一書可出其右。

謹從人民日報強國論壇和億龍網站BBS“西祠胡同”擇錄數篇論戰文章，以饗讀者。

中國共產黨在新華日報上沒有食言  
文章作者：[數學]

從去年開始，我就發現一些人非常得意地摘引出當年中國共產黨在重慶新華日報的文章，因為那些文章鼓吹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於是這些人理直氣壯地指責共產黨食言，共產黨不道德，怎麼當初鼓吹的東西自己掌權後就不實現了呢？說明共產黨是大壞蛋。]

但對於這種論調我從去年開始就做了解釋或者回擊。那麼，如果是一種學術討論的態度，就應當針對我的解釋再做回應，這樣的討論才能夠不斷深入。如果我錯了，我無理，那麼我承認錯誤改了就是，沒有人能夠不犯錯誤。

但是我發現這些搞宣傳鼓動的人根本是不理睬這種解釋和攻擊的，他們只是得意洋洋地把早已經駁倒的謬論貼了又貼，用來糊弄中國的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因此我只能認為這是一場有組織的而非個人的意在推翻共產黨制度的顛覆活動。

首先，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在全人類實共產主義，關於這一點共產黨從來就沒有隱瞞或者掩飾過。而實現的過程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人類社會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直到共產主義社會實現。

而共產黨的短期革命目標則和它所處在的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形態的不同而不同。如果這個國家正處於封建社會，那麼革命的目標則是推翻封建階級的統治，建立資本主義社會，這叫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中國的四九年革命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新，是因為它是受共產黨這樣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的領導。但如果所在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則還要看這個國家是獨裁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如果是獨裁政體，則舉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起義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是民主政體，則共產黨放棄暴力革命，採用議會鬥爭的形式揭露資產階級的面目，最後通過非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

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社會被馬克思主義定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因此革命的短期目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建立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統治或者說議會民主。這正是共產黨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實現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原因。如果當時國民黨確實開放黨禁，把軍隊國家化，那麼共產黨也就把軍隊國家化，然後放棄武裝鬥爭，實現議會鬥爭。這時中國將進入一個議會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

但很可惜蔣介石拒絕這麼做，而是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那麼共產黨唯有以戰爭對戰爭，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取得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49年革命成功後的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但這種社會有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手裏，而不是象一般的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裏。最後，共產黨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這裏馬克思主義在學術上可能有的錯誤是，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建立得太早了？是不是還是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實際上戰後的一系列社會變化給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實際上任何科學都永遠有不知道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也有可能出錯。

但是，如果指責共產黨食言，那就沒有任何道理，從上面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可以知道，共產黨從來就是按照科學理論進行社會變革的，當初支援建立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目的是為了借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階級統治，而封建階級統治被推翻之後接著推翻這種虛假的實際上是有錢人說了算的議會民主。這個過程共產黨從來就沒有隱瞞過，毛澤東在四九年之前寫的文章也從來就沒有隱瞞過這種革命的步驟，根本就談不上欺騙。當時的共產黨軍隊，還有解放區人民，都知道中國將來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這個新中國，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沒有人剝削人壓迫人，還要開上拖拉機（當時一說拖拉機耕地是覺得很新鮮的事），無數革命先烈就是為了這個理想而獻出自己的生命，董存瑞在捨身炸碉堡時喊道“為了新中國，沖啊！”想的就是社會主義新中國。

再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統治工具，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統治組織。正如林彪所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所有的制度都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政權都是專制的或者專政的（專制和專政的英文翻譯

一樣），即使是在美國，如果一夜之間美國的軍隊警察監獄消失得乾乾淨淨，那美國決無可能維持議會民主。而歷史上人類社會步入有階級社會之後，所有的國家政權都是向著富人階級的，是富人階級對窮人階級的統治。即使是農民起義奪取政權也是一樣，這是因為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沒有出現。而只有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階段之後，勞動人民才有機會奪取政權，建立窮人的專制，也叫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或者專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制度，最後一個不自由的制度，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顛覆，鎮壓國內富人階級的反抗。對富人的鎮壓就是對窮人的民主，無需什麼多黨制，無須什麼選舉。在這個專制制度結束後，共產黨就應當消亡，國家這種依賴於暴力工具而存在的機器也就消亡，民主也就消亡，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是沒有國家機器的基於人們自願的組合和管理，被馬克思稱為“自由聯合體”，也就根本無須什麼多黨制議會民主這樣騙人的東西。那麼，也可能你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可能你認為這一切都是胡說八道，只有美國的議會民主才是人類的最美妙。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但決不要說共產黨食言，因為共產黨從來就沒有宣佈過要背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象一些人傻裏瓜幾地問某某人有沒有看過新華日報的文章，實在是傻得可愛。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我看當年的新華日報——與數學先生商榷  
文章作者：[一九八四]

把新華日報上的幾篇文章當成中共的民主承諾的先生們，你們是得著雞毛當令箭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誰承諾了就實現的了。民主的實現從來都是人民為自己的權力而鬥爭的成果。民主制度不會憑空降臨，它需要我們為之付出鮮血、眼淚和汗水。數學先生認為，當年中共讚美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好於中國當時的封建統治。這個理由不成立。如果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共一個較大的無產階級政黨，這麼說是有道理的：沒有一種現實的經驗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好。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時已經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了，那就是蘇聯。按照數學先生的理論，蘇聯的新民主主義要比資產階級的美國民主不知要強上多少倍了，那麼新華日報為什麼還要為一種腐朽的制度唱讚歌呢？

數學先生認為，“‘說過的就必須做到’作為一條道德原理，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科學精神”。我非常同意。但是說過的等於沒說，是否就符合馬克思主義，符合科學精神呢？新華日報當年是一份影響很大的報紙，對於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它就是共產黨形象的代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是無所畏懼的嗎？當年的社論，說過的話，難道能不承認嗎？當年共產黨說過什麼現在還怕人民知道嗎？如果當時說過的話是對的，現在重複也不減中共一絲一毫的光輝偉大；如果當時講錯了，現在就應當勇於承認錯誤，告訴人民錯在何處，這樣才不會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與其讓人用在“宣傳戰”上，不如我們自己先說嘛。

至於數學先生把新華日報的新年社論等同於民主人士的文章，就不免有“誤導”之嫌了。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再談當年新華日報之事  
文章作者：[數學]

大約是從前年開始，或者更早，海外民運就發現中國共產黨原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它在蔣管區的重慶辦的報紙新華日報，曾經在二戰中的同盟國節節勝利，法西斯節節敗退的時候，很寫了幾篇讚美美式多黨制民主的文章。這下子他們可逮著理了，神氣活現地把這幾篇文章找出來，在網上

登了又登，然後又著腰大罵共產黨，你們怎麼不兌現你們的承諾啊？因此共產黨說話不算話，共產黨差勁，就表現在大家面前。這種宣傳手法的確起到了相當的效果。那麼本文就專門再來談談此事。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任何國家政權都是暴力工具，都是爲了鎮壓而存在的，是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此看一個國家是什麼性質就看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什麼。但除了制度以外還是有政體的，同樣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政體上又個人獨裁和多黨爭權這麼兩種，後者被稱爲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而共產黨的鬥爭路線是這樣：

如果一個國家正處於封建社會，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麼就要在這個國家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但因爲是由共產黨領導而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如果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就叫做舊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目的都是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發展開通道路。而如果一個國家正處於資本主義社會，那麼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聯合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如果是獨裁政體，那麼就要爭取實現民主政體。如果是民主政體，則要積極進行合法鬥爭，積極進行議會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專政的虛偽性，使人民看出這種政權的真面目，到一定時候，伺機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專門鎮壓資產階級的專政，也就是人民民主政權。在這個政權下，大力發展生產力，到一定程度，國家和政黨消亡，暴力工具消失，共產主義無階級社會實現。

因此在共產黨看來，資產階級獨裁制度要優於封建制度，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要優於資產階級獨裁制度，而新民主主義制度，也就是現在所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制度，要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將優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制度，當然最後是共產主義實現，那時候國家消亡，民主消亡，完全無需什麼投票，因爲大家都成立自由聯合體，如果你不高興在一個聯合體內呆，到另一個聯合體去，或者自己成立一個聯合體。

因此，在中國社會尚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情況下，首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當然就要讚美美國的制度，而共產黨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又比美國的制度不知要先進多少倍。

這本來是常識，是屬於馬克思主義 ABC 的東西，共產黨從未隱瞞自己的觀點（不過最近是開始隱瞞或者遮蓋了，不敢提階級鬥爭了，就顯得尤其無理，象什麼共產黨員要講政治，吞吞吐吐地不象個樣子，什麼叫講政治？政黨本來就要講政治，就如同進了飯館就要講吃飯一樣，其實就是共產黨員要講階級鬥爭嘛），共產黨從未宣佈過自己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未宣佈過不以共產主義理想作爲奮鬥目標，談何食言呢？那麼我注意到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貼這些東西，本以爲是這些人不懂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寫了一個“馬克思主義 ABC”來教教他們，結果出乎我的意料，這些人不光懂得 ABC，還懂得 XYZ，看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比我還多，還出來糾正我的錯誤。那麼，也就是說這些人明知道共產黨當初讚美資產階級民主的用意，而有意向廣大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網友們隱瞞這一點，欺負一般的網友不知道這一點，從而達到某種宣傳目的。而這就背離了學術討論的範圍，成了一種宣傳戰，而且是有意混淆視聽的宣傳戰。

作爲學術討論的目的，已經解決了的問題，除非你有新的證據，否則就不應再談。可是如果硬要談，就成了宣傳戰。

另一方面，“說過的就必須做到”作爲一條道德原理，也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科學精神的。作爲一個科學家，他的態度就是應當服從真理，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昨天說過的話，今天發現錯了，就可以改正，並不是一定要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說過的話如果說得不對，當然就可以不做到。比如說，中國共產黨曾經承諾每隔七八年就要來一次文革，而現在看來文革的作法不對，當然可以取消這種承諾，怎麼就沒有看到有人得意洋洋地又著腰要求共產黨實現它的承諾再來一次文革呢？再比如說，共產黨在改革的過程中也有認識過程，先是堅持計劃經濟，然後是以計劃經濟爲主導的商品經濟，最後完全拋棄計劃經濟而進入商品經濟，這都是一個認識過程，談不上要一條道走到黑。搞社會主義就和搞其他的科學研究一樣，是要試的，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再者，新華日報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機關報。拿今天的情況來打比方，如果人民日報登了社論，或者評論員文章，可以看作是共產黨中央的意見，相信這些社會或者文章一定是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批准的。我們還知道在香港共產黨辦了一個文匯報，那麼文匯報的文章就不一定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每一篇文章，包括社論，就不可能篇篇都送到北京由中央政治局審查。

因此根據香港文匯報來向共產黨發難說你們在文匯報上承諾過什麼什麼，就非常無理。而當時共產黨中央的報紙是辦在它邊區裏的報紙，重慶的新華日報還必須接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經常地開天窗，根本無可能全面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當時的通信條件也差，每篇文章也無可能都送到延安審查後再送回重慶。而且新華日報還經常發表各民主黨派人士的文章，把這樣的報紙上的文章稱為共產黨的承諾，也是無理的。即使是現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辦的報紙，雖然已經無須經國民黨審查，可是觀點也經常有所不同，更有可能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打個比方說，當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意思是先從深圳特區報的評論員文章發出的，而這就和當時的人民日報的意思就不同。因此，除非是中共的中央全會公報，否則根本不能拿共產黨的報紙的宣傳材料來作為某種承諾。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與數學先生談《歷史的先聲》的常識問題  
文章作者：[天馬馨空]

關於民主問題，見仁見智，這裏不談。但有兩個基本事實，必須澄清。

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社論重見天日，並非海外民運的功勞。而是國內某高校教師笑蜀在1993年獨立編輯。找了幾十家出版社，無一家敢接手。1998年笑蜀學會上網，在出版無望的情況下，將全書內容在網上推出。首先在哇塞中文論壇，其次在強國。初上強國，社論頻頻被刪，當時的斑竹aiai、呼籲等都有記憶，可以佐證。

另一個基本事實是，社論集收的不只是新華日報社論，而是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兩報文章。看過歷史的先聲一書的網友都知道，解放日報還排在新華日報之前。解放日報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這點常識不知數學懂不懂。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跳出中國國情的局限——讀《歷史的先聲》有感  
文章作者：[真事隱假語存]

我讀過京東山人《我反對三權分立》之後，對唯國情論頗不以為然。以國情特殊抗拒政改在目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這種觀點看上去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謬論。筆者不自量力，對此駁斥如下：首先，國情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國情完全可能面目全非。泥于國情，無異於刻舟求劍。過去，我們一貫聲稱自己地大物博，但現在卻出現人口爆炸，資源虧乏。地大物博再也不能作為我們自我吹噓的資本！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幾千年來一直處於極度封閉狀態，現在整個地球都要變成一個村子了。適者生存，這不僅是生物界的規律，而且也完全適用於人類社會。作為個人，我們必須適應社會環境，因為我們不能改變大環境，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調整自己來適應環境。儘管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完全一樣，但不管你願意與否，是否主動，我們只能適應社會環境，而不能讓社會環境來適應我們自己的特殊情況。作為一個國家，在全球性大潮流面前，難道不是一樣嗎？我們的國情不管有多麼特殊，世界性大環境也不可能按照我們的意志來改變，讓世界來適應我們特殊的國情。即使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我們畢竟只是世界一百六十餘個國家之一，只是國際大家庭裏的一員，除非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封鎖起來，自外於國際社會大環境，否則，不是主動去適應它，那就得被動去適應它。當然，被動適應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到底是心甘情願地放下歷史包袱，敞開胸懷勇敢迎接呢，還是被歷史潮流逼得走投無路，衝擊得遍體鱗傷之後，才會明白任何的抗拒都是多麼徒勞！國情特殊是小道理，世界潮流是大道理，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而不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其次，如果一切從國情出發，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幾乎沒有任何外來干擾因素，歷代王朝可謂純而又純的從國情出發，為什麼總是搞不好呢？而且最終都難逃滅亡的厄運呢？這些王朝興衰更替又該如何解釋呢？按照國情論的邏輯，中國五千年來一直都是帝王獨裁體制，莫非現在需要重新恢復帝制不成？顯然，國情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治亂迴圈是一種不可能自愈的頑症。如果不能向特殊的國情說不，我們還準備在中國歷史的怪圈中循環往復到何時？國情論不是什麼新鮮論調，幾乎總和頑固保守甚至倒退密不可分。大清晚期難道不是被這種論調弄得刀兵四起，國破家亡嗎？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後，倒行逆施復辟帝制的理論依據不也是共和體制不合國情嗎？在三四十年代，國民黨蔣介石不也是由於藉口中國國情特殊抗拒民主政改而被共產黨推翻的嗎？而共產黨高舉民主自由旗幟，就對國民黨的國情謬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歷史的先聲》就是當年共產黨的民主改革主張的原封不動的照抄照搬，五十年過去了，我們不僅沒有取得重大進步，甚至連以前的正確主張也不敢再提了，甚至重新把自己曾經明確反對過的謬論拿來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實在是莫名其妙。實際上，那些關於民主自由政改的主張恰恰就是共產黨起家的本錢和成功的關鍵。

三，臺灣民主化道路的成功，證實了唯國情論的再次破產。實踐證實，不是中國不能政改，不能實行三權分立，而是我們到底願意政改與否，我們到底是爭取主動，還是爭取被動的問題。任何人突然置身於不同環境中都難免有或大或小的不適應，但是人是可以改變的，可以由不適應到適應，到完全適應。入鄉隨俗，到西方去的中國人大多不也很快就適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嗎？其實，中國人是最善於適應不同的環境的，因為他們不僅具有高度的原則性，也同時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中國人固然習慣了在專制下苟且偷生，但不能依此斷定民主就是西方人的特權和專利，中國人就應該繼續被專制和奴役。也有人會提出，我們並不一味排斥民主，而是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的民主，其實這仍然是一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國情論。嚴格說來，民主並非舶來品，所謂中國式的民主，並不是現在就有，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著名的民主思想。況且，帝王獨裁體制本身也需要一種制約機制，並不絕對排斥臣民的諫議。更早的記載是在三皇五帝時代，就有在交通要道樹立華表，並允許臣民對國家大事進行討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政治相對清明時代，只要不危及帝王的統治秩序，帝王一般是允許臣民百官議論朝政的，並非一切事情都是皇帝一人說了算。中國過去實行的是帝王專制，這些與帝王專制相互制約並符合國情的“民主”算不算中國式的民主哪？當然，相對於真正的民主，這只能是一種被閹割的民主。即使蔣介石當年也是高喊民主，只是以國情為由，企圖掩蓋自己的獨裁，拒絕實行徹底的民主改革，《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發文駁斥國民黨的所謂“民主”：“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受盡了欺騙。如果將來其他文獻統統失傳，只剩下堂皇的官報，則無話可說。如其不然，那末，我們的後代一定會不懂，為什麼我們這樣容易受欺騙？我們不能再忍受那種欺騙了。現在既然連政府也口口聲聲說‘民主’，那麼，我們就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我們不要假民主。……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令，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當今世界沒有人完全排斥民主，而且幾乎都宣稱只有自己實行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究竟實行什麼樣式的民主卻是另當別論的，好比同樣的商品，其質量好壞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民主制度，其公認的尺規就是國家領導人是否民選產生，這可以說是真正民主與否的試金石。這是民主與否的分水嶺，而不僅僅只是民主的形式問題。如果連起碼的形式都沒有，怎麼可能會有貨真價實的真正民主？我們無法否認實行總統直選的國家是民主國家，也同樣無法肯定一個僅僅只能直選村長的國家就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毫無疑問，任何民主都不是絕對的，不是無法無天。民主和法治是相輔相成，而不是說，實行民主就不再需要政府和法律。不是健全的法治社會，也難以形成健全的民主制定。完善的民主制度離不開健全的法治，而健全的法治應該促進民主的充分實現，而不是阻礙或犧牲民主制度。民主是文明和理性的集中體現，而不是動亂的原因，恰恰相反，專制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實現民主決不意味著必然產生社會動亂，真正民主的社會才能真正把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因此，民主是一種社會安定劑，是社會長治久安的根基。我們也不追求絕對完美的民主，不奢望超越有缺陷的民主，一步就跨入想象中的民主的高級階段，也不需要絕對完美的民主，就目前人類的發展階段來看，也不存在絕對完美的民主。雖然民主不是完美無缺的，民主也有不足，但這和專制相比，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不管專制的衛道士如何別有用心地醜化民主，誇大民主的缺陷，但是人民對民主的渴望和追求是不可能被完全和長期誤導的。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民主，除了適應，實在也是別無選擇！一個大國不可能長期孤立于滾滾向前的民主潮流之外！而且世界發展前進的潮流決不會因為中國的國情特殊而不進反退！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從《歷史的先聲》看互聯網文化  
文章作者：[楊 渡]

筆者曾寫過一篇報導，談大陸禁書《歷史的先聲》，發表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中國時報》上，隔天，大陸的一個網站就轉載了。它也被轉來轉去，在知識份子圈子裏，用 E-MAIL 互相告知禁書的消息。這種流傳速度與廣度，是以前收聽短波收音機的時代不可比擬的。

舉凡查禁的書、知識界的醜聞、文化界的爭論，乃至於兩岸發展的最新狀況，都會以最快的速度傳播開來。原本中共最擅長的意識型態控制手法是：由媒體宣傳下手。而管制媒體的方法則由人事下手。舉凡媒體內容出問題，就由黨政部門去施壓，或者乾脆撤換媒體主管。如此一來，媒體就形成一套自動檢查系統，誰也不敢犯禁。

但網路的興起，讓中共難以追查。第一個原因，網路公司有許多是登記在國外（是《com》，而非《com.cn》），不屬於中共的管轄範圍，根本無從處罰。除非中共築起防火牆，逐一檢查，否則禁不勝禁。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衆就是有辦法繞過防火牆，在網路世界玩一大圈，再去看他心目中的網站，像中國時報就可能轉過 yahoo 看到，而香港一些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網站也一樣。

再其次，網路上可公開發表意見的特性、可以隨意貼上自己文章的設計，讓中共無法徹底檢查、過濾後再刊登。即使是黨報如人民日報的網站，也不時出現政治觀點激烈的文章。主管網站的人只能小心防範。更何況網路已經吃慣了辛辣口味，整個網站如果太平淡，太沒看頭，還真的沒什人上。現在商業競爭如此激烈，網站只有儘量符合讀者口味，找刺激的議題了。

萬一真的出現問題，怎辦？網路主持者只要兩手一推，說是不知誰貼上去的，然後很乖順的及時取下該篇文章，官方主管當局也沒有懲罰的理由。即使某一個網路版面特別有政治色彩，但網路公司投資如此之大，一時間也很難要它關閉，至多就是關閉某一個敏感的欄目，或者取下某一個人的專欄，如此而已。但能如此處罰的，也只有掛在中國區域的網站（cn），對大多數掛在國外的異議色彩濃厚的網站，因是 dotCom，中共也起不了作用。

最大的問題是：新興網站不斷出現，幾個人就自己弄一個新站，而且大家都學乖了，不是掛在中國大陸（即後面不是 dotcn），而是在美國註冊，則大陸的官方要追查也不可能。這就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文章的發表，開創無限寬廣的全新空間。

——選自《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戴 晴：讀《歷史的先聲》隨感

發表日期：2000-09-03 07:57:43 返回《銳思評論》 快速返回

不知編者和出版者為什麼沒有以《莊嚴的承諾》作為這本書的正標題。“歷史的先聲”太抽象，給人以不知其所雲的感覺，再加上封面上被宣傳機構用到濫的偉人揮巨手的照片，弄到一本絕



好的書——無論當嚴肅或消閒的閱讀，還是作為手邊隨時查閱的資料——賣得平平，書評界也是一片寂然。當然，也許這正是出版者出於自保而追求的效果：今天中國的事是越來越波譎雲詭了。

說它好，是因為這本在世紀末的非常時刻，即當局對不軌出版物實施越來越嚴厲打壓的時刻冒出來的老《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選，從頭至尾沒有一句對當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靜氣地、有根有據地將半個世紀前（確切地說是 1942-1949）暫時處於在野地位的共產黨、包括它公開的與秘密的盟友們，為取得民衆（特別是知識人和所謂民主人士）擁戴，所說的漂亮話，一一開列出來而已。

說是平靜開列，實有幾分欺心，因為對任何稍有歷史感的讀者而言，都無法避開對照所引發的強烈效果。所謂對照，就是看那發話者當日所說與今日所為。於是乎，那當初承諾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氣壯，其盜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顯彰了。不信，只看這順手拈出的幾處：

“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1944。按：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 2000 年 3 月 9 日說：‘人大常委會在工作中始終要自覺接受中共的領導。’）

“實行憲政……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周恩來，1944）

“英國對於反對黨的討論、辯論和評論，非常重視，所以由國庫撥款成立反對黨，使之評論政府。”（《新華日報》轉引渥太華雜誌，1944）

“……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其）記者，是專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陸定一，1946。按：請參照自半個世紀來共產黨黨報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其文明批評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鏡。”（《新華日報》專論，1944。按：共產黨建制 50 年，至今不見《出版法》出臺）

“紀念‘九一’記者節，全國記者們和同胞們，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解放日報》社論，1943。按：而今這三個“一”是“穩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人民代表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作投票的工具罷了。”（《新華日報》1944。按：中國的選舉究竟代表幾分民意，只看關心國事如筆者輩，只在 19 歲時懵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願浪費時間當猴耍即可知。至於直到 1980 年代末才開始試行的村民直選村長，其主管官員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經蓬勃一時的村民直選如今已附上“村黨支部書記須由上級選派”）

“統治者于屠殺青年之余，還沒有悔過的表示，但輿論界幾乎一致主張政治應民主，特別對於青年，萬不應以武力對付。……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實在無動用武力之必要。”（《新華日報》，1945）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和污蔑。共產黨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也是包辦不了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劉少奇，1940）

這後兩則，套用一句魯迅的話：“無話可說”。

回應人：安替 發表日期：2000-09-03 08:18:39

歷史是鏡子，有的時候這面鏡子竟然照得人心驚肉跳。我看戴晴的這篇評論竟然也看得心驚肉跳，全然沒有當年共產黨員的勇氣。

作為紅色家族成員的戴晴雖然已經過 60，但依然在為中國可能的進步而奔走。最近出席 PNTR 美國國會聽證會，呼籲美國給予中國 PNTR。

雖然我很年輕，雖然銳思是我起的名字，但是我已經失去了戴晴能把實話說得這麼坦白的銳氣。但是我依然努力著。希望銳思成為西祠最能坦白地實話實說的地方。當然，沒有必要把自己陷入一個不安全的處境，個中把握，各位掂量。該繞彎子的，我只能繞彎子，因為我不出色。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3 08:52:59

戴罵共產黨不是一天兩天的，  
現在身處 1999 年的美國  
說這些批評中共的話  
又需要多大的勇氣？  
戴所表達的觀點  
不過是一些人盡皆知的  
陳詞濫調了無新意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該實踐這些原則  
比如安替這個口口聲聲立志推進民主政治的  
是如何做到對 XICI 的獨裁專制體制  
視而不見？  
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原則  
在人情利益及當權派的合作上，  
哪個更重要？  
不痛不癢地坐而論道是容易的  
一個虛偽的口頭革命派  
是永遠不敢面對現實。

回應人：poplu 發表日期：2000-09-03 10:56:21

逃跑者和投降者絕不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關係！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3 14:15:52

聽不懂，  
你是否暗示安替是逃跑者或是投降者？

回應人：半部論語 發表日期：2000-09-03 18:28:46

是陳詞濫調嗎？每有批評之聲就有人跳出來說向前看，難道還有比共產黨的陳詞濫調還要猛的人和事嗎？我們罵得太少，還不許別人罵不成？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3 22:53:38

你就罵吧，你就口水愛國吧。  
罵族呀，  
你是托起 XICI 明日的太陽

回應人：笑之 發表日期：2000-09-04 08:36:23

由戴晴觀點來看，歷史與現實的強烈對照，已經明白無誤的指出了誰在欺世盜名，以及其醜惡的嘴臉。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野時，爲了獲得最廣泛的支援，怎么吸引最大量的民衆，自然就要怎么說；在朝時，實際的情況容不得些許的浪漫，必須實際起來，實際的有時都有點殘酷。

安替曾給冷茶的一個回帖中說道“對事不對人。雖然有些殘酷，但是只要冷茶要繼續做下去，這種殘酷是應當接受的。”一個小小討論版的斑竹，在維護自己的一片領地的時候，尚要扮演殘酷的面孔，何況治理一個國家？現在的民主鬥士們，如果現在被賦予了權利，若干年後，再有一個笑蜀編一本《\*\*的先聲》的時候，恐怕還會再有一個戴晴來做如此的評論。

中國獨特的人文傳統（我不是很明白哦，就事實來說點而已），每逢政權的更疊、權利的交接，腥風血雨總是如期而至。對於玩弄權利的當然不算回事，但對於老百姓來說，就是將面臨悲慘的命運。

千年前就有人發出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喟歎，時至今日，又有多少變化？

別怪我這麼說，誰讓我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個呢，而且又是在最下層的。無論怎樣的民主，老百姓能安安穩穩的過好日子，就是最好的民主。在此時，我寧可做太平犬，也不願做離亂人！

民主的聲音永恒——讀《歷史的先聲》有感

作者：動感 發表日期：2000-09-05 21:35:15 返回《銳思評論》 快速返回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首先要感謝《銳思評論》和《思想的境界》這兩個版塊給我提供了這樣一本好書。

很遺憾這樣一本好書，我沒有及早的閱讀到。說遺憾是因爲《歷史的先聲》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太重要了。六十年前的民主呼聲，竟然如此的強烈和理性。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國人沒有要求民主解放的歷史和意識，這就是中國的希望，一個還不算遙遠的希望！

雖然這本書中的一些內容，我以前也有機會讀到過，但資料如此的詳盡和充實，卻讓我有更多的理由和時間去體會書中的問題。我不得不佩服該書作者“讓歷史站出來說話”的偉大構思。

該書分很多章節，看看那些標題就可以讓我們感到歷史的力量，“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主義的利刃”；“讓思想衝破牢籠”；“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天賦人權不可侵犯”；“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於中國”。讀這些文章我發現，在任何時候，歷史是最公正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才是真相，什麼才是真理！

在這本書裏，我最喜歡讀的就是《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刊登的《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這篇文章；一個講述“民主不會從天降”的好文章。“現在我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爲了自身的

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瞭解真相，……這些我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衆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裏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來未用過的。”。這樣的文字和思想不僅僅在半個世紀前對中國有意義，對今天的中國一樣有巨大的意義！民衆的民主意識是實現真民主的前提！

讀《歷史的先聲》，我一點沒有懷疑當年中國的歷史爲什麼會被“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改寫，一個呼喚民主、呼喚自由、承諾實現民主和自由的政黨，不贏得戰爭誰贏得戰爭！不得到人民的擁護誰會得到擁護！

歷史的聲音是永恒的，讓我們用茅盾先生在 1946 年 2 月 1 日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痛斥當時賣國的國民黨政府的文章爲歷史的先聲沈思：“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受盡了欺騙。如果將來其他文獻統統失傳，只剩下堂皇的官報，則無話可說。如其不然，那麼，我們的後代一定會不懂，爲什麼我們那麼容易受欺騙？我們不能再忍受欺騙了。現在既然連政府也口口聲聲說“民主”，那麼，我們就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

歷史的先聲，不應該消失，也不可能消失！

回應人：半部論語 發表日期：2000-09-05 22:25:00

可憐的歷史，一直在不停地重復。

回應人：安替 發表日期：2000-09-06 00:05:42

很好，所以說愚民的第一步就是掩蓋歷史和封鎖資訊。當歷史揭開了，資訊打通了，專制就會破產。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6 10:45:15

沒錯可憐的歷史一直在重復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愚昧落後的思想一直沒變。  
自以爲是 SB 兮兮的人總是那麼多。

回應人：京冀特產 發表日期：2000-09-06 18:09:28

草草翻了一下發現民主的口號喊了 60 年  
民主的夢想做了六十年  
但現在比 60 年前進步了多少？  
我不想否認共產黨的功績  
但在這方面它要負很大的責任  
如果當初這批寫文章的還活著，不知他們會怎麼想

回應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發表日期：2000-09-07 11:35:15

我想說的話就是我的名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這意識在上在下者都應該有。  
民主也罷平等也好，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權利要靠自己爭取自己捍衛的。

畢竟是政客！——讀《歷史的心聲》有感

作者：一隻狗 發表日期：2000-09-05 21:38:06 返回《銳思評論》 快速返回

我今天通過下載讀了《歷史的先聲》，在揚州好象沒有看到印刷版的，在電腦上讀好象很吃力。我並沒有通篇全讀，看了幾篇我就明白了當局為什麼要禁止這本書的出版。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中共為了能夠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推翻國民政府時說了多少所謂追求民主的話！現在呢？五十年過去了，好象一句也沒有承諾，這不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嗎？而且本書的出版也會使公眾認為中共是一個出爾反爾的政黨，畢竟大多數人以前並沒有看到過如上的材料，現在的人，至少有我，並沒有想過中共還利用了民主這面大旗來拉攏人心？怪不得解放時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留了下來。

然而中共說到底只是一個政黨，當時還是一個在野力量，他在爭奪政權時不是通過和平的方法，而是血和劍，況且當時的國內和國際環境都適合中共的上臺。為了上臺而開出空頭支票的承諾，中共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古今中外都有。我不喜歡政治的原因就在此。

美國要大選了，共和和民主之間的候選人開了多少支票？當年布希賣給臺灣飛機，還不是為了上臺，拉攏一些個反華勢力的人心，好象還是讓當時在宣傳時更反華的小克上了台，結果小克還不是照樣要和中國搞好關係。為了上臺你可以做出任何承諾，可以吹的天花亂墜，當你達到目的做穩之後誰敢拿著那支票和你去兌現。現在民主的國家和專制的國家唯一的區別是民主的國家內你領導人在一個任期內不能兌現要下臺，讓另外一個其實也不怎麼能兌現承諾的人上去，如此迴圈，專制的國家就不同了，只要他上了台，人民就吃苦吧，呵呵，除非暴動哦！

再說了，在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不也是這樣嗎？暴動時口號是多麼的響亮，耕者有其田之類的，一旦起義成功，就算是當時說過“苟富貴，勿相忘”的兄弟，也是殺殺殺！更何況是你這被當作棋子利用的草民呢？這也難怪 57 年有那麼多的“右派”出現，他們太天真了！以為民主的春天已經到來，其實那不過也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斑竹看了不行就刪啊！！呵呵

回應人：半部論語 發表日期：2000-09-05 22:16:32

老鄉，如果寫得再嚴厲一點斑竹就捨不得刪了。

回應人：磚家拳威 發表日期：2000-09-05 23:30:13

想起了林達先生所著的《近距離看美國》一書所言，執政前儘管大呼民主自由，順應民心；掌權後自認真理到手，還需要什麼民主自由？——所以言論自由實在與真理無關啊！

回應人：京冀特產 發表日期：2000-09-05 23:39:18

在哪下載  
我怎麼找不到？

回應人：安替 發表日期：2000-09-06 02:49:35

這篇文章我捨不得刪。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6 10:54:07

所謂歷史的先聲，  
有什麼值得看？  
自由亞洲電臺早連載過了，  
炒冷飯。  
在某些人的眼裏面，民主，不過是個動聽的旗幟，  
甚至還是根打人的棍子。口口聲聲指責別人缺乏民主精神，  
連反對意見都不允許發表。  
如此言行不一，卻又心安理得。  
當我們指責別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該反省自己？  
當我們大聲疾呼罵別人玩弄民主的時候，也許正在罵自己。

勇敢的知識份子 幼稚的知識份子

作者：呆狗 發表日期：2000-09-04 01:53:02 返回《銳思評論》 快速返回

在西祠，現在很難聽到共產黨員的聲音，以致於有人說：“如今很多共產黨員不願意翻開這本書了，甚至現在也沒有人敢寫這種文章了。”文筆很曖昧，不知道“很多的共產黨員”與“一部分民主鬥士”有什麼區別？“有一些共產黨員看過這本書”和“有一些民主鬥士沒有看過這本書”又有什麼區別。總之，很“美國之音”化的語調。

現在切入正題，談談中國的知識份子。

與很多的民主鬥士的看法恰恰相反，呆狗在多數民主鬥士之前發現了這本書，並且仔細地閱讀了其中的幾篇選文。我這個人看書一向看其精義，不及其餘，所以全文沒有通讀，希望民主鬥士不要以此為依據，說呆狗你全文都沒有通讀一遍，又有什麼權利來說三道四。

印象之一：勇敢的知識份子

《歷史的先聲》是笑蜀先生的作品，說他是笑蜀的大作其實是擡舉他，因為說穿了這是一篇文章選編。我很驚歎於笑蜀擁有的資料，能夠一篇一篇地摘出 50 年前有關於民主的文章，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無論他的動機如何，這確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看了這本書，在我腦海中閃現出來的第一個形象是康有為的形象。康有為經過 1888 年第一次上書失敗，吸取了教訓，正面強攻，人微言輕，顯然不行，他不得不另辟路徑。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先後刊行，把自己變法維新所要宣傳的理論主張、改制思考，統統挂上孔聖人的招牌，拿孔子來對抗孔子，以減輕非聖無法的壓力，達到由古入今、托古改制的目的。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把孔子裝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為變法改制張本。他甚至將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議院、內閣等政治制度也都附會到孔子名下，說是中國古代早已有之。

由此，我推定，《歷史的先聲》只是當今知識份子追求民主一種外化表現，說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是假，要在當今的中國推行“民主化”是真。只可惜笑蜀畢竟是笑蜀，他畢竟比之當年的康有為遜色極多，通篇書只是文章的摘錄，而無他自己的觀點。

笑蜀是勇敢的，因為他提出了問題，民主的問題。

## 印象之二：幼稚的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有的是臭脾氣，有的是呆脾氣，臭的時候如同呆狗的狗屁，呆的時候如果放屁的呆狗。最近銳思版就頗有幾個人罵呆狗整天放屁，也沒見安版豬鐵面無私，刪去口水貼子，想來是有原因的罷。閒話不說，切入正題。

知識份子的剛強是有名的，如老舍，如馬寅初。我們不能不沈重于文革給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帶來的世紀之傷。知識份子的剛強，是我們民族堅強脊梁的一個部分，這一部分最有張力，最顯智慧光彩。那麼，剛強的進一步是什麼？是倔強。

在學界頗有幾個朋友，也看慣了學界的明爭暗鬥，潮起潮落。知識份子當今的中國最好鬥的一群，每個人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他們可以躲在自己的城堡中向外發射明槍暗箭。反正別人對自己的一塊不是很懂，我的學術我說了算。這就產生了問題的另外一方面，在他不懂的區域往往會自以為是，自作聰明。笑蜀先生很懂得寫文章，作考證，不知道他對當今中國的現實瞭解多少。中國現今走民主化的道路，是應該一蹴而就還是應該按部就班，中國的民主應該走的是什麼樣的道路？這些不知笑蜀可有大計。

也許有人要說了，書中不是有麼？有先輩們的話，照著做就是了。那請不要忘記書的副題：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是一個莊嚴的承諾，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如何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我們需要走的路還是很長。

所以說，笑蜀又是幼稚的。中國當今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民主的問題。不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為外象所迷惑。

其實關於建國之初的民主實現，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況，至於後來政局的變遷，呆狗我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或者說我也很懶得去理一個頭緒。因為在這樣的夜，抽時間寫這樣的文章，本非是我的願望。我只是希望大家看了我這篇文章，能夠認真想一下我們所應該關心的方向，是繼續爭論要不要民主，還是討論應該如何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知識份子永遠是勇敢的，知識份子往往是幼稚的，知識份子經常不會是實幹家。

回應人：在水中 發表日期：2000-09-04 02:38:39

呆狗的邏輯有問題，但也許是呆狗的知識準備有問題。“知識份子”的原義，在法文和俄文中，與“實幹家”是根本不搭界的。

回應人：呆狗 發表日期：2000-09-04 02:41:52

在水中的實踐準備有問題，在中國，實幹家與知識份子本就有重疊的地方。李大釗是北大的教授，也直接參與了北方共產黨組織的創立。

回應人：在水中 發表日期：2000-09-04 03:23:03

要說中國的知識份子麼？如果非要把這詞的含義中國化，那麼我覺得中國的知識份子就象婊子，一個巴掌扇過去，她低頭嚶嚶地哭泣了，然而過一會兒她又來獻媚了。

回應人：poplu 發表日期：2000-09-04 07:25:18

也有的不是一一打擊面太廣

回應人：MrQueen 發表日期：2000-09-04 07:26:45

吹牛到底不用上稅，有人看書不看全部就能“只看其精義”，這種第 N 感很牛。

回應人：笑之 發表日期：2000-09-04 08:24:11

《歷史的先聲》我還沒有讀到，就先看到了這兩篇評論。  
無論從立意還是從學術（小子妄談學術，諸位還請見諒）價值看，這兩篇評論都可以做讀《歷史的先聲》的一個導讀。只是如此讀書，未免進了先入為主的誤區。  
《歷史的先聲》我已經下載到了硬碟，並且在信箱中也做了備份。我現在是不打算讀的。因為這兩篇評論多少已經讓我有了先入為主的情形，而且，多少也對該書有了個大致的瞭解。  
直到，能有其他的聲音把這兩篇評論駁的一文不值的時候，影響了我的判斷的時候，我一定會去看看這本書，去找找引起這麼的分歧的所在。我相信，在那時，我會很仔細很仔細的看這本書的，並且是帶著問題去看的。  
關於呆狗的評論，我沒什麼可說的了。中國知識份子所固有的特色，只不過被呆狗用新的證據又證明了一遍，也不算新鮮了。:)

回應人：郎心似鐵 發表日期：2000-09-04 09:13:41

沒辦法，是人就有個左中右  
像郎心似鐵這樣意志堅定，勇敢無畏，邏輯嚴密的知識份子  
永遠是一幫人渣打擊嫉妒的物件。  
如魯迅所說，大漢民族從來不缺少埋頭苦幹，拚命硬幹，捨生取義的勇士。  
漢民族，文人大夫的硬骨頭精神，  
在郎心似鐵這裏面碩果僅存啦  
哈哈哈哈哈

回應人：njroute 發表日期：2000-09-04 13:55:10

彪下不知道知識份子的確切定義是什麼？  
統一了以後再討論。

回應人：武大浪 發表日期：2000-09-04 18:59:44

知識份子注定是為統治階層服務的！  
“學而優則仕”  
呆狗你學問如何？  
不過你只是小吏而已！  
婊子一說，也太……

中國知識份子確實有些不務實！所謂“清流”，清末翁同和就是一例！  
不過青年一代要好的多！



佚名：收穫的，不僅是感動

收在《歷史的先聲》一書中的社論和評論，多取自四十年代周恩來在國統區領導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這些非同尋常的文字，有些出自優秀的報人，有些出自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穀城、吳晗等著名學者，有些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老一輩革命家……

以新聞理論從業人員的身份來看半個世紀前的社論、評論，聞聽先輩發出的歷史先聲，真是心潮起伏，思緒難平。當硝煙散盡，前輩的理想已部分化作現實，歷史的腳步匆匆邁過半個世紀以後，重新審視這些紙頁發黃的文字，傾聽振聾發聵的歷史回聲，我們收穫的不僅是感動，更是感慨、感歎和無盡的思索。

收在本書中的社論和評論，多取自四十年代周恩來在國統區領導的《新華日報》和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可以說，這些浸透先輩理想和血淚的文字，是本世紀中國文字中最為雄渾激越、慷慨悲壯的歷史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著民族的解放英勇奮鬥、威武不屈的歷史見證。當年輕的共和國步履蹣跚地走進知天命之年，當我們眼中噙滿淚水恭祝祖國 50 壽辰的時候，先輩浴血奮戰的身影仿佛還在眼前閃現，為民主解放的沖天吶喊，似乎還在耳邊回響。這些充滿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文字，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未免粗糙淺陋。然而一想到它們完成於風雨如晦的抗戰歲月，完成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就不能不使我們心潮激蕩、肅然起敬。

這些非同尋常的文字，有些出自優秀的報人，有些出自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穀城、吳晗等著名學者，有些乾脆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等老一輩革命家。它不僅是學者思想的記錄，更是中國革命思想文化層面的歷史再現。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使命、特殊的情懷，造就了這些至今激動人心的特殊文字。從字裏行間，我們看不出絲毫的猶疑和彷徨，看不出些許的怯懦和回避。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在民族解放的莊嚴旗幟下，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智慧和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的文化智慧，高度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煥發出不可阻擋的驚天偉力，成就了中華民族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壯麗輝煌。

不妨打開書頁，看一看那些經世不衰、歷久彌新的文字吧！毛澤東說：“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周恩來引述孫中山先生的話說：“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董必武同志主張“黨員犯法應加重治罪”；《新華日報》1944 年 5 月 16 日社論的題目是《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該報同年 9 月 11 日發表英國人普裏斯萊的文章，題為《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而 1946 年 1 月 11 日陸定一同志為《新華日報》創刊 8 周年撰寫的文章，題目就是《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這些完成於半個世紀前的充滿戰鬥精神的錦繡文字，今天讀來依然振奮人心，使人心緒難平。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民主已從美好的思想化作今天的現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正以嶄新的姿態迎接她的 50 歲華誕。此時此刻，我們忘不了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英勇獻身的無數先烈，忘不了那些在敵人的鐵蹄之下爭取民主的偉大鬥士。

然而對先烈的最好紀念，莫過於繼承先烈的遺志，將他們未竟的事業世代代傳之下去。中國共產黨人從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爭取民主的鬥爭雖然早已取得歷史性的勝利，但從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桎梏中徹底解脫出來，真正樹立起屬於當今時代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鄧小平同志說過：“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肅清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對廣大幹部和群眾來說，是一種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為了解放思想，提高覺悟，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努力為人民作貢獻，為社會作貢獻，為人類作貢獻。”

——選自汕頭市圖書館網站“書評天地”

\*\*\*\*\*  
\*\*\*\*\*  
\*\*\*\*\*  
\*\*\*\*\*  
\*\*\*\*\*

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堵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

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

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制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2 月 6 日

## 斥“人格教育”

• 舒 芜 •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而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羨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

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

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

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

“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

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

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

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厉起来。

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

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

的目标前进呵！

——《解放日报》社论 1946 年 5 月 4 日

民主和自由新论

• 黄元真 • •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

“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話，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作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

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是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

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克屠杀布拉格大学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

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后，美国却又取日本的位置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面黄肌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



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

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面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

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厉，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11 月 17 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

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继

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

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

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

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

“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合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

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 茅 盾 • •

“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枪和手榴弹了。

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

“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而“围歼”了。

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

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

“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老调以外，竟还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买”的凶手来了。

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

我虽然不曾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

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于刽子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

——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原题为《为“一二·一”惨案而作》

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

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爱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

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

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 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国会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现在纽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纳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国国会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下也没有话说了。

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一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技；自己屠杀了青年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后，硬把责任推在

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残罪行，伪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

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回忆：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么？

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

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

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

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个特点：

“1. 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



2. 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
3. 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
4. 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
5. 尊重学者，保卫师资。
6. 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平”。

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

“满清入关后统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

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

“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

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

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

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

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

废除髻首阉割的奴才主义。

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

(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甲. 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

乙. 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

丙. 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

丁. 使学生睁开眼睛看事实。

戊.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

己. 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

庚. 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

(二)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

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敌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

(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 衍：

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

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

三、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断。

茅 盾：

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以欺诈为德行，那么，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的设备、好教师，还有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沈志远：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为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

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

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怎么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

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

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同。

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

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毁灭文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知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知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知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

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

“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已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

“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

最后翦先生说：

“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原则虽然很快就被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

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斗的力量之一的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

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千二百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役。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的力量真正的工具。

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与宪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论。在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

件。有政治民主，才会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以”，周先生强调的说：“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

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出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这天到会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完，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关心国事的同学散了。

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了一句：“嘉陵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股人流，静静的向校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 重视青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一是英国商务大臣达尔顿氏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盖居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负之机会”，他要求能重视青年。

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国。

——《新华日报》短评 1942年10月20日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  
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

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

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指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

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是，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如胜利后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



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

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

第一，因为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  
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717页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  
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

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 1944 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外国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

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  
《党史通讯》1983 年第 20-21 期

##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 一 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

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更落后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断，自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的

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争，因此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后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欲望被遏制，他们的一切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件事上。特权者不承认劳动人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同样的苦难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绑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其心意和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会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至于教授)很难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力，所得到的一点最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运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后性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提高；就广大人民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 二 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么现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

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的保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么？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实际，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产业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侵蚀人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手段来吞并人民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前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会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来并吞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等”(均引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工人解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竞争”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么？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

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本，正是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必然的后果。固然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力相勾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后，就产生了私人资本能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独占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后，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发展，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不过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后，将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组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将按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劳动人民的小私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就不必担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扩大发

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完成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可能。

### 三 “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

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而要根据客观现实，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苦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农民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他们就空谈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断，却自命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功于一役”论者的真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所以阶级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里加上一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么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对。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年8月25日

.

—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

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保障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关，组织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



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 保 障 人 权

“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这是二届参议会通过，经边区政府命令公布的“保证人权财权条例”规定得极明白的。

但是，在延安，却发生了不幸的“学疗人命案”：学疗的总务科长、秘书和管理员，竟然把运输员刘世有捆绑起来，以致酿成人命大案。

从这事件里，我们看出，我们有的同志还不懂得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起码条件；还不晓得，随便捆人押人是应该肃清的“游击作风”之一。这类违法事情，在边区恐怕不只这一件。我们愿意唤起社会人士严重注意它的揭发与纠正。让我们共同努力于革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

##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昨天本报和别的几家报纸都刊载了一段本市新闻，说是朝天门屠户张德操家在本月四日被保安队的几个警士借口捉赌，劫去钱财。事后张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个是保长)，反被拘押毒打。这十几个警士是派驻民食供应处仓库的库警，依理根本没有在夜间侵入民家捉赌的权利。出事时，当地保长签署证明书，证明张家并未聚赌，且有卫戍总部稽查处水上检查所人员到场目击并无赌具，则捉赌之说，显属无稽，但纵然真是赌犯，也绝对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长一起关在警察局里，毒打成招，而且还不准其家人探视，比对付江洋大盗还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无怪乎张德操的家属和该街居民百余人要到卫戍总部王总司令公馆门首伸冤，又拦截汽车、呈述冤状了。这样的事也许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受

冤屈，被栽诬，遭虐待，简直已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这类事情一向层出不穷，我们更不能不唤起社会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报》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装店被一群也以抓赌为名的军人冲入，损失了数十万元的消息。军警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冲入民家，人民有什么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财产可以这样地被劫掠，还有什么私有财产的保障之可言？对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随便，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财产的自由权利，叫平民怎么能安居乐业？

据说，这一案的被害人家属现已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卫戍总部王总司令对此事也极为震怒，想来法院与当局对于这样一件事，应该能很好的处理吧。由这一类事件，我们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旧布新实在不容稍缓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较有保障，又经常施以卫国爱民的教育，经常督责他们以爱护人民为天责，就不至于发生这种骚扰民间的事情。在张德操家保安队的一个队长曾向到场的卫戍部人员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大家不要为难”（《商务日报》所记为“我们军警原是一条阵线”）。这话分明是把军警看做是在一条阵线上共同对付老百姓，岂是卫国爱民的军警说得出口的？又假如现在各方所主张的《损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颁布，且根据此法，严办几次，则虽有不法之徒，也会有所忌惮，不敢胡作乱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布的提审法已经实施，并且法院对平民诉冤给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为保障平民而设，那么虽有冤狱发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象张德操等五人的被拘押案，只要向法院要求出一纸提审状，就可很好地处理了，何至于在今日的陪都街头还要演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掷舆告状”？保障人权，严禁非法拘捕，实施提审法，改革司法，这都是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都该快快实现才好。

假如实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个个能安居乐业，免于强暴欺凌的危险，那么民主还是落了空的。所以我们断不能把张德操案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件看做是无足轻重的社会小事。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2 月 8 日

###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国民政府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日，宣布了《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保障人民自由的。这个宣布深得各方面舆论的欢迎。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政府当局在抗战中和抗战结束后宣布保障人民的自由已经有好几次了。远的不说，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当局就曾颁布过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条例，最近的是在三个月前的双十会谈纪要中，当局又一次表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

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但是政府当局这种诺言，并未兑现，其中道理何在，现在也不必再来深究。无论如何，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国家中人民所应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无论用什么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国家中是总不能容许的事情。我们自然希望这回不再落空，当局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不应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条件，而应立即切实地做到。

政府当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其实是不难的事，无论如何，这比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利要容易得多。过去政府当局为了限制和妨碍人民的自由，真可说殚精竭力，用尽了一切办法。既订立种种法令，使得人民动辄得咎；这还不够，又另外想了许多办法，设立许多机构，以补法令之不足。本来，在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都是“公仆”，这些“公仆”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竟有为数很不少的“公仆”，专门以迫害人民为本领，难道真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好么？国家的财政一向都很困难，但在拮据的国库中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却用来残害人民。譬如拿过去大后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闻检查所和图书杂志审查处说吧，每一个这种机关中的人员，都比一个大报馆的编辑部还多。现在这些“公务人员”又纷纷到“收复区”去办同样的事了。而在大后方各地，航空邮电检查员至今还在忙于检查和没收。为了控制纸张、印刷所、会场、出版所，当局所费的人力和财力更是不可胜计。官办的出版所，虽然出版品不受欢迎，但仍无限度地赔钱，无所顾惜；官办的团体，虽然得不到群众拥护，仍大量地给以津贴，这都无非是出于包办一念，要使人民的出版和人民团体活动困难。还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及其所属的集中营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从国库中开支多少经费。这一切经费从何而来，还不都是人民的完粮纳税的聚积么？以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许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来创立许多压迫人民自由的机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么？

当局花了这许多人力财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结果只是证明了一句老话：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到底是不会在强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进步意志究竟还是束缚不了的。现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辙的表示，那么第一步做法就应该是立刻放弃一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为了束缚人民自由而设的法律、办法和机关。这是最不花钱，最不费力的事。只要当局有决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决不象束缚人民要费那么多的手脚，花那么多的人力财力。

蒋主席所宣布的第一条关于“人民之自由”说：“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由此可见，政府当局也已承认蹂躏人权的特务机关不应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应再有效了。在这方面，人民也应该帮助当局来考虑，哪些法律条

例、哪些措施、哪些机关都是残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一一公开提出。事实上，人民已经这样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现行出版法应该废除，对收复区的民间出版事业的限制法令也应该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议的确有事实根据，符合民主的原则，政府就应立即采纳，立即实行。取消过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镣铐，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实的开端。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1 月 13 日

##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论张君勱先生的建议案·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除了上述三项外，包括选举权、思想信仰自由等等在内。英美更有其议会等等。就是这样，英美人民也还认为目前的民主制度缺点还多，还不广泛、不充分，连罗福斯总统也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扩展政治民主，使民主制度带更广泛的人民的性质。我们在中国谈民主政治，还是把它当作要建树要实现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谈实现民主政治，不是单纯的因为人家如此，我们也要来搞一下，装装样子。也不是单纯的添为民主国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不能不急起直追，以便列身四强。主要的还是因为新的民主主义已成为世界政局的主流。如果我们不能实现民主政治，我们就不能充分的动员、积极的奋战、亲密的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该知道，一个国家在战后世界民主大家庭里的地位，是以战时努力的程度来决定的。这里说的战时努力的程度，应该包括打仗的努力和民主的进步。所以，尽

管还有人反对民主，民主已经和战争的胜利及战后的和平分不开了。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要根据实际情形、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可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权利，民主必须以广泛的人民为基础，却是不能改变的原则。这样，人民必须获得基本权利，并予以保障，难道还有怀疑和犹豫的余地吗？

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战后和平，为了政治的进步，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 1944 年 2 月 1 日

###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日通过废止的三十八种法令中，属于集会结社自由的，有十四种之多。其中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废止的有《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共三种，规定由原公布机关废止的还有十一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府及各原公布机关的废止这些法令的明令。想来总该马上能做到。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些法令要废止，废止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废除不可的。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首先，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本来集会结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论性质，地点及参加者的职业性别如何，事前均无须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假如参加集会结社者有违犯普通刑法的行为，则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则，听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国就与这完全两样；“各种人民团体组织之成立，无论下级团体或上级团体，均应先经政府之许可”（《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四条）。在《人民团体开会规则》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每次开会应于会期前将开会事由、时间、地点等呈请该主管官署及目的事业主管官署……”。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可是，现在既然废除了这些法令，那么这种不合理的“特许”制度就不应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会结社，不受单行法令的束缚。

其次，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所谓《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就是在民国二十九年为此目的而设的。规定警察

可以有权随时命令一个集会一个人的演说中止。又如《非常时期团体组织纲领》第一条上规定：“各种人民团体，除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外……并受军事机关之指挥”；同时也有“明令解散”之权。这样，凡主管官署认为不适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难或解散。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时就根本没有解散人民集会结社之权的，只有认为某种集会可能发生骚乱时，英国警察才可以禀准内政部，当场宣读骚动法，使会众自动解散；假如警察机关判断错误，还须负一定责任。美国的法律亦大致如此。显然地，两相比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我国的作法是要不得的。这次政府当局既已通知过废止，当然就是把所谓“主管官署”的这种权力取消了，不再给军警机关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权利。

最后，由行政官署委派民众团体中重要主持人员的制度，也是在这些法令中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和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比如在《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十条确定：

“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职权是：“负推进各该团体各种活动之责任”。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了。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法令未废止前，中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既受到特许制度的束缚，又随时会受军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经常会务也常为官派人员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废止了这些法令以后，一切束缚人民自由的行为已失去法律的根据，那么，人民就应该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运用起来。

我们希望，政府方面赶快把这些已决定要废除的彻底废除，并且继续审查是否还有别的同类的法令也应废止，在这次决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三种是关于集会结社的。当局到底准备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布，因为这三种法令原文也有种种极不合理的定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中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见该法第十条）。这和已决定废止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中的规定也是一样的，也应该废除才好。又如工农组织团体，在《工会法》、《农会法》尚未废除的今天，也照样有法可凭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们希望彻底废除这些法令的束缚；我们人民也尽量帮助政府，搜集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来，请求政府以明令废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为了运用这些自由，就应该充分运用起来，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种必要的团体会社，并且依法改造和充实原有的人民团体。过去的人民

团体，内部的组织与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则的，不适合各该团体会员的要求，就可以根据各该团体会员的意志来加以改造过，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团体。集会结社自由的根本权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来了，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发展它，让他在整个民主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更辉煌的成果来。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2 月 18 日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 在“呈报”、“审查”的一串  
规定下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

本市消息 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 年 5 月 13 日

## 快释放政治犯

政府早经明令公布释放全国政治犯，但直到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囚冤狱，未获释放；并且仍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被囚的人，在遭受着非法的毒刑拷打，甚至暗地惨遭杀害。今日何日，人民仍受此荼毒？啊，死者不得瞑目，生者能不刺心痛愤！

杜重远先生不明不白的死了，今又闻得羊枣先生含冤歿世，中国呵，你的优秀的儿女究竟犯了何罪？抗战胜利、和平建国开始，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他们却竟屈死冤狱，怎能不叫人感到万分痛心！成千成万的学者、专家、教授、进步的青年，无故被捕入狱，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才高有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不但不得国家的敬重，反而治罪下狱，有些害民祸国的败类，不但不遭诛戮，反而冠戴优加，横行不法。这样下去，民心怎能得乎？

我大声呼吁：立即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

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 法治与人权

### 一 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无意义……。（三）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障”。

### 二 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度，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就是全国上下，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不得加以变更”。“我们认为今天问题的关键，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律，可是这个法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可以创造法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们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

“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



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之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名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创制之权。”

### 三 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后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有价值的法律”。“中国历史辗转于封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旨’便是法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则于逐渐养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宪法决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是说法律产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法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治的角度视之，又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后完成法治，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 四 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令精神，应当以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使法令有任何扞格难通之处。”“其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贯彻，某甲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日即成废话，而不能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恶习，必难根除”。

### 五 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

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的法纪，所谓法治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自己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则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事无论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则贪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希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

——《新华日报》1944年7月20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

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芜，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百六十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

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十一万日本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不从事生产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军粮二百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3 月 30 日

###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

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  
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

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 毛泽东 • •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顾着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

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  
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 毛泽东 • •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没有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

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宪政。

.....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定，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



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为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 刘少奇 •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

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

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

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于民”，不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地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2—177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  
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见《董必武选集》第 110—112 页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他成立的日子起，一直就主张联合民主政权。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是人家不要他，而不是他不肯和人家合作。内战时他没主张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主张革命的统一战线政权。廿五年的八一宣言、廿五年十二月决议都是说明：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份子，不论他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抗日开始以后，这类文件更多了。廿九年毛泽东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说：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既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

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不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有存在与活动之权。”

三十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上说明：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拿共产党在政权上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比较，完全一致，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先生一样这样说就这样做：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已实行了三三制。因为他深切知道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政权，不能发扬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如果某党派占优势政权就归某党独霸，那是违反历史规律，背叛民众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败。

除有长久革命历史的国共两党外，几十年来屡仆屡起的，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以至其他阶层的民主运动，远之如“好人政府派”近之如“救国会”“民主政团”以及某些较小的党派。他们的纲领，都是要求“选贤与能”，要求政权大家有份。他们不赞成“一党专政”，更反对把他们当“阿斗”。

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

\*\*\*

旧社会遗传下的劣性：

一，“自以为是”。不管人是否“以为是”而强人是我之是。他不知道世上的道理，是多方面的人才也是无穷的。

“自以为是”即令有几分是而未必能成为天下之公是，而常流为所谓“成见”。二，“惟我独专”。这是权利欲或领袖欲的表现。生怕人来争权利或者分权，于是排斥、忌刻，甚至屠杀随之发生。三，“以小失大”，个别利益，包在全体；各阶级党派的利益，包在全民族社会。然而人们往往见不及此，既然“外御其侮”仍要“内阅于墙”。四，“互不信任”。由于上述三者，造成各党派阶级间深刻的裂痕，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人家是人，无端疑之为鬼；疑人为鬼自己也变为鬼，鬼道横行，“特务成为国是”。他不知道，揭开一看，原来不过如此，小的异完全可以统一于大的同。

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必须克服。然后三三制才能实行、才能有实际。

\* \* \*

政权是人民的，党是人民中前进部分，替全体人民争取政权的。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为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四万万人找出路，不是为若干国民党党员升官发财。共产党也是一样，一切为着使“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 \* \*

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党员很积极，有信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

\* \* \*

有些无党无派的人士特别是从来就屏在政治之外的农民，对于参政不很积极。因而有些人说：不是不要他来，而是他不肯来；不是我要把持而是他们不提意见，或提的离题太远，然而这，不是不能施行三三制的原因，而是从来没过三三制即民主政治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人民的：要人民对参加政权有兴趣，只有当权的党一次又一次地把政权公开的事实摆在人民的面前，要人民知道，运用政权，也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政权与民意机关中练习。如果说“训政”尚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末三三制就是训政的最好办法。

——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

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要有驾御一切的远见，才能取得一切的赞成。然而一切都归宗于一点：民主习惯，遵守决议，不以私害公。

目前民主作风的养成，共产党员应为首导，一，是共产党员有实力的区域，易使人畏；所以他首先须约束自己。别人对的，虚心采取；自己不对的，马上改革。追求真理，没有成见。其次，共产党人要知道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不是和共产党人一样，否则会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第三，要有诚恳说服的态度，要知道有枪的人一句话不谨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着觉，而勉强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气破肚子。如果说阶级民主今天这样明天仍是这样，甚至后退；那末，三三制民主，必然是使政治一天赛过一天。因为三三制内包有阶级党派的矛盾，矛盾是推进机；不进必然是矛盾爆裂或者窒息，而三三制也就不复存在。

前进的纲领与建议，前进的工作效率和彻底执行——言行一致，上下一致，是三三制的营养剂。比如共产党西北局的五一政纲，二届参议会中某些决议和某些提议，不管提出的是谁，而因为恰合于大多数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而见诸实施。于是三三制就更有力了。因此参加三三制各阶级各党派必须力求进步，否则不会在政权和民意机关中出色，尤其有实力的党派，更应提高自己，以党的卓越的政策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加上“开诚布公”，才能保持住与提高其领导地位。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27日

###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

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席，李副主席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长柳·，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十八个人中间，只有六个人是共产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

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

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九个人，其中只有三个人是共产党员。

各位听众！十八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六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九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定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让我们看第一种。

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



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

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

第二种怎样呢？

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的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解论，照样的“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

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面，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的、深入的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忆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的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

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的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

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的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

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

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董必武选集》第 54—55 页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 徐特立 •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

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

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歧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

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用党员，而只有保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心。

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题《政党与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版

###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

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还政于民的诚意。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途易辙，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民主，才能够实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

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挠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政府有权，要为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幸福，不应该妨害群众、压迫群众。边区个别地方政府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是政府工作中很严重的病态。

边区政府权源出于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这已表明政府和群众关系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权，已深入到社会的基层。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群众才感觉到政权是他们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群众对政府的批评也许有错误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有时为群众所不了解，因而发生误会。这时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切不可打击他们，更不应当对他们借故报复。我们要相信群众是可以说服的。

至于那些敌探、汉奸、托匪及专心破坏政府威信、妨害政府工作的坏家伙，政府决不能放纵他们，但必须在群众中揭穿那些害虫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惩治他们，而不是政府简单地判罪了事。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上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群众一经信任政府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政府在当地就有无上的权威。

——《董必武选集》第 55-56 页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边区政府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在党领导下工作。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须，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我听说我们边区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拿来作为鉴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如果违犯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为什么呢？因为群众犯法有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我们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从前封建时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说，从这传说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不应当主张比封建时代传说下来的一点法律上的平等更前进一



步吗？

我请求边区党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党员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

——《董必武选集》第 58-59 页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中国人民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近二十年的长期专政中，中国的混乱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十年，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内战。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在抗战的八年中，越到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是抗战消极、反共反人民积极。日本一投降，他们就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保存的实力大量派出，全国大打。……

长期的灾难折磨着中国的人民，但同时也教育了他们。

从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他们深深地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能有好日子。这个真理，不但中国的人民懂得，而且许多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都逐渐清楚地了解了。现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来养肥自己的奴才们，才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讲他们那个臭不可闻的“法统”。而三国会议的决议，却不但要国民党停止内战，并且要它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它那个“法统”。

然而站在人民的头上、吸人民的血过活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轻易地就放弃他们的专政的。恰相反，他们要用各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的专政。内战是一种方法，制造暴行与血案也是一种方法。今天，中国还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要变不要乱”。仿佛谁要把中国变得更乱似的。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

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

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问了解放区之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者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的创造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刻不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点，这种精神，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

“在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理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两党许多争论的分歧点。一个（共产党），一切为人民；一个（国民党，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独裁，因此它的政策与办法，就是内战、特务、屠杀、逮捕、抓壮丁、加重赋税、滥发钞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国极端混乱，它使人民极端痛苦。

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

停止内战！

取消特务

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略有删节

## 合法的罪恶

• 门 纳 •

有史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没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变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了若干次的斗争，但依然还是没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出现。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会有什么权利与方便，而青年学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诬蔑屠杀的义务。

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标明了联俄联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当时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之内，一切爱护苏联、爱护共产党、爱护农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语行动，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检讨了若干年来革命失败的教训，又接受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所以要建立党军，因而开办黄埔，号召青年入学，培植革命的军事干部，虽然中山先生不久就与人间别离了，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血液，还不会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排泄出去。中间经过五卅惨案，汹涌于全国各大都市的罢课罢市罢工的爱国运动，只有香港和广州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挠破坏摧残。所以当时一般的青年，都视黄埔为革命圣地。尤其是两次东征，青年们用热血头颅打陈杨刘，巩固了革命的根据地以后，风声所播，全国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黄埔的浪潮，当时的黄埔当局，对于这些青年，也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以后的北伐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这些青年的踊跃牺牲。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辉煌殿堂，可以说是用这些青年们的头颅来建筑成的。

可是，那时广东的国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是被认为不合法的。因为国民党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军阀，当然不会承认它为合法，在那时非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要想到黄埔去，也实在是困难而危险的，稍一不慎而被发觉了，就会走上被拘禁或屠杀的恶运。封建军阀当然认为他自己的这种行动是合法的，因为他自己是被帝国主义者承认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当时的青年们要从死里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来求得民族与人民的生，在他们的踊跃牺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谓合法的封建军阀们，不久之后，一齐都望风披靡。而从前所谓不合法的广东国民政府，现在也屹立于紫金山前，一变而为合法的了。这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样一个转变过程呢？一方面，是这些不惜为国家民族而洒热血抛头颅的青年们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炮轰下关，血洗济南，他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军阀官僚，只要旗帜一换，就可以加官晋爵。他是跪在帝国主义胯下，伏在封建势

力的怀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从前在广东时认为合法的青年们的种种言语行动，如今又转变为不合法的了。如果这些青年还不识相，还要保存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还要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话，那就会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大屠杀，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万。靠青年起家的黄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龙庭上，发出狰狞的狂笑了。

可是，算盘又还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队伍，又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阎冯之流，又随时要设法分庭抗礼，“天下”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讨挾伐呢？当然又还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现在的号召青年，并不象从前在广东时那样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术了。

从黄埔演变而来的军事学校，四面八方的去开展，用种种方法引诱大量的青年进入这座学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生命”的迷魂汤之后，再替他到沙场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学校中，则党义、军训、纪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剂。周考、月考、期考、会考、文凭，就是重重枷锁。党权高于一切，服从领袖，听到“领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受了这样党化的几年教育之后，就会变成死板板的没有灵魂的奴才。如果有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现了一点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诬蔑为“共产党”。被加上这一名词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说，自从黄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龙庭以后，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国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为奴才，便要被他诬蔑屠杀而成为冤鬼，当中没有别的路，如果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

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大踏步向中国前进，国亡无日，全国青年奋勇起来的爱国浪潮，在这个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爱国有罪”。木棍、石块、水龙头，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们的礼物。“攘外必先安内”，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区域内的“安内”的良方，而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为合法的。

经过西安事变的当头一棒到芦沟桥的炮声，全国青年如疯如狂地涌上抗战前线，参加了各种抗战工作，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气，认为“自由”来到了。然而，昙花一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不曾负担起他应该负担的团结全国青年的神圣任务，反而造成了使全国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当特务，同学如寇仇，制造摩擦，酿成惨案，不一而足。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执行严肃工作而使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们，都被认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营。集中营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成为大规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这就是高坐在重庆小龙庭的帝王在抗战期内对青年们所树的德政。

日寇投降后，这个合法政府已经无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来进行“安内”的工作。在抗日战场上望风披靡的英雄们，现在一变而成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鲁门赫尔利马歇尔等的助纣为虐，内战英雄们得意忘形。然而全国青年是不甘心让这些英雄们置民族国家于死地，一齐怒吼起来了。从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到重庆的“二五”、“二八”惨案，中间经过不知多少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所谓合法政府的心目中，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从黄埔出身的关麟徵杜聿明，在“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的党义下，进行了合法的杀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民不畏死  
黎望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学人、诲人不倦的长者、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血迹未干、全国人民创痛犹新的时候，又被法西斯特务反动派暗杀死了。这是中国反动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无耻最卑劣的暴行；这是反动派千百种罪恶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恶。这样一位千百万人民爱慕的长者，这样一位学行优异的学者，仅仅是为了执着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就不能见容于中国法西斯反动派。最后是出于这种最卑劣、最险狠的暗杀行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动派对于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难想见。

由于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之被暗杀，已经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务狰狞险凶的面目，已经使全中国的人民警觉到，反动派已经不惜与全国人民为敌，要实施血腥的屠杀政策！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钵，已经反动派一手继承下来；一切专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国的法西斯反动派已经完全做了。反动派已经集了一切横暴、险狠、卑劣、无耻的大成。反动派也许在得意的狞笑吧：可是，别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个李公朴，是一个闻一多，然而继续起的将是千千万万的李公朴、闻一多，千千万万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镇压不了、也是屠杀不了的；要不，一切暴君的统治就该永不会动摇了。米兰街头墨索里尼的尸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尸灰，该就是殷鉴不远的。

在反动派的眼里看来，大概以为这种血腥的恐怖政策，将会镇压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运动，封堵住一切人民的

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切专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为，最终是逃不掉灭顶的命运。要想这样来屠杀尽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梦想。人民的力量正如象勒纳湖里的水蛇样，是会在切夫头的颈上，重新生长起一个头来的。至于反动派这种自绝于国人的行为，正如象汉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说：“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

反动派要想用这样的屠杀来恐吓、来镇压住人民吧，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中国人民在这种血腥的暴行前，对于横逆的忍受到了极度的时候，中国人民将会表示自己的意志：“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反动派也就会临到入墓的时候了。

在生者的创伤、死者的血痕前，虽然会使一些善良者叹息、劫懦者却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犹疑者坚定脚步，而千千万万被死者的血浸渍的战士，将会跨过死者的血迹，奋然前行。

七·一六晨五时欲哭无泪中写成

——《新华日报》1946年7月18日

#### 人权和观瞻

中国人的人权，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点保障。抗战以前，成千累万的爱国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缉；现在政府也感到这样明目张胆地干，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有碍“国际观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学生、教师、工人……各种爱国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特务机关的黑名单，让他们“自行失踪”，暗暗被杀死，永远没有人晓得。

但是公开的逮捕，还是一样毫无顾忌。重庆市不到一月之内，就有几乎上万的人被抓去，送到师管区，没有拘票，不根据任何法律，高兴抓到就抓了关起，稍不顺从，就开枪打；还制造了一个只有政府当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为了“国际观瞻。”

暗逮明捕，既然都是为了观瞻；那未在黑名单没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没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没有释放之前，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宣布的“保障人权”，不是为了“观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 论无耻主义

·舒 芜·

抢劫、放火、捣毁、暗杀，肆无忌惮地做着这一切，然后又掩饰、推诿，尽量地把种种美名归于自己，把种种恶名归于别人，这是一年以来我们见惯了的現象。

也许有人想，这究竟还算知耻。

不，不是，这正是充分的无耻，是无耻主义的基本原则。

无耻而成为一种主义，成为一种体系，就不是简单的东西。在那个体系里，贯串了一个无耻的方向，一切都统一于这个方向之下，一切都是无耻的。

他们取美名而避恶名，这并不是尊重美恶的标准，承认美恶的分别。在他们，这乃是对于客观真理的侮蔑、对于人类良心的玩弄；正是利用客观真理，骗取人类良心，以保证他们的无耻的存在与进行。

当然，“墨写的谎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他们也未尝不知道。人类良心之终于不会被骗去，他们自己比别人更清楚。然而，他们的谎话还是要说下去、谣言还是要造下去。所以，连骗人的效果，他们甚至也并不企图；他们干脆觉得骗人都不必要，胡说一遍，仅仅是对于人类良心、对于这世界上的一切道德力量与精神价值的最卑污的嘲弄。

做了那些事之后，如果还真有一点知耻，该是听到那些美名都不好意思起来、更不敢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吧！然而，迎新送旧的妓女说着坚贞、出卖人肉的贩子说着义气，当这种时候，这“坚贞”与“义气”，又究竟被变成什么东西了呢？

无耻主义者如果也有哲学，那就是彻底的人类憎恶、人文的灭绝。在这一点上，恰与正宗的法西斯主义息息相通。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是他们所憎恶的。惟其憎恶。所以不仅在行动上要摧毁它，而且在口头上还要玩弄它。

自从希特勒的国会放火案以来，这衣钵传承不辍，由西而东，变本加厉。骗，是没有一个人被骗到的。一幕一幕，只足以证明他们愈变愈成为非人类，愈来愈没有任何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证明了他们的存在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不在这个人类的世界。

那么，也不必嘲笑他们的宣传技术的拙劣了。在他们，是只能这样、也只要这样的。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2日

### 风气·秩序·容忍

读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报的《风气与秩序》的社论后，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风气与秩序来。

这大半年以来，从一二一昆明的“国军”用机关枪、手榴弹，杀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与教师起，一直到最近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东，又由东到南，数不清的打与杀，以及每天都有的贪污作恶，在中央日报的社论作者看来，算是什么风气与秩序呢？

由于老百姓对那种风气与秩序不能“容忍”，向政府要求过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统治者就认为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就认为是必须“戡”的“乱”；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而被称做“中共的尾巴”，并且暗杀其领袖；社会贤达不能容忍，赞助了中共与民盟的主张，而被诬为“受利用”，列入黑名单；国民党内的开明者不能容忍，赞成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即被视为“不稳分子”。

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而反动派则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御用的“民意”机关，发出“请求政府戡乱”的通电。于是凡是不容忍反动派那种坏风气，坏秩序的老百姓、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乃至国民党内的开明者，都在被杀、被捕、被戡、被排除之列了。曾经有人向中国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这就是叫中国人民永远作反动派的奴隶的意思。这是多么如意的算盘啊！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0日

#### “黑名单”

• 纪 懿 •

最近有人偶尔看见了一份后方各大学的“黑名单”，印得很精致，硬壳，封面是全黑色，里面的字，当然也是黑的了。

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据说很少，每个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样，推其意，大概是“共产党”、“民主同盟”之谓。可见这份“黑名单”不但印得精致，在他们做“调检工作”的时候，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可惜的是，它虽精致却不精确，据说依看见的人所知来断，被列入的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只是他们平时也关心时事，希望和平民主。于是红帽子一项就给硬带在他们头上了。

民主同盟原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组织，因为主张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荣冠”。共产党是“赤”，那么，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红”的了。于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改组政府的，就一律归划“左倾份子”，非“赤”即“红”，非“共产党”即“民主同盟”了。

黑名单上的“共”、“民”小注，想来他们也找不出真凭实据来。只不过把不顺眼的、不跟着自己摇尾狂吠的人古脑儿写上去，再照“不顺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顺眼的当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们这样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并非干拿津贴，于是就煞有介事似的来了一个分别。

黑名单“史”的考证，无法做到；因非“个中”人，不明“个中”事。可是记得离打国仗前还很久，就听到这个在



小孩子听来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辞了。抗战前列入黑名单的是为了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救国”。抗战中列入的是为了要求“民主”、要求“坚持抗战”，胜利后列入的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民主”。这样看来，战前不肯抗日救国、抗战中实施一手独裁打算跟敌人妥协，胜利后要继续独裁下去打内战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单、要一手杀尽“黑名人物”的人们了。

十八年来。被压死在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计数，黑名单也不知烧毁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无数优秀青年的性命，就在这“烧毁”与“新制”之间被儿戏般地断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枪杀、被毒害、被活埋却象死了又复活一样，永远杀不尽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人物”正是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单的制造者，终归要被层垒高堆的黑名单压死。不见俄国的沙皇？又不见希特勒正在忙着印黑名单的时候，自己首先垮了下来？

——《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

####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 “守法精神不够”论 · 磊 落 · ·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报》载：“市政府鉴于各阶层人士守法精神不够，拟于最近召集各有关机关商讨，研究‘守法

运动’具体办法……。”

打风在重庆流行，实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够了，但这些违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检查一下：一连串杀人行凶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枪杆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负维持治安责任的人干出来的？干了之后，个个都逍遥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批踏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家伙！

要谁守法呢？请老爷们说明白点！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6日

奴才见解

• 田家英 •

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觉得奴才的见解常有其独特的地方。

秦并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于是忙煞了一批帮闲、帮凶、走狗之类，浩浩荡荡。除了三呼“陛下神灵圣明，”扬着鞭子，监督奴隶刻石歌颂功德，这些唯唯诺诺或者噤噤喳喳的奴才，便忙着“使天下无异议”，策划“安宁之术”，改官制，严刑罚，强化特务基层活动，运用喽罗监察网。这里，最有名的自然是“焚书”与“坑儒”。

焚书，这在中国“书缺有简”算是最早了吧，非秦书，皆烧之，诗书百家语钦定不准读，准读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读核准的书，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过，虽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岂非显出奴才身份并不高贵了么？所以站在奴才立场最好的不是奴化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当掘一个大坑，推他下去。于是便有异议了，秦时当有言论，可惜不及详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张，那宏文是：

……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诸生不是所谓“真儒”，而是当时干犯禁令的人，所谓禁令现在虽无当时什么《出版法》或《检察条例》可资考证，但“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必然是“乱党和反动分子”，乱党和反动分子不坑，那还有国家纲纪吗？

进一步来讲，所谓“儒”……应该是明大势，识大体——了解始皇从分割中求统一之心，最少是洁身自爱，奉公守法，不造谣言攻势“宣传反动思想”……（《民意》一六八期）

这篇话，给我们活画出横眉怒目，一张吃人血口，这些“乱党和反动分子”为什么不“明大势，识大体”呢？我们看到一种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们仰视光明，要挣扎，不安于眼看沦为奴隶。

这种奴才在秦始皇当时是很多的。单看秦的刑名就有榜

掠，鬼薪，谪，弃市，戮车裂，抽胁，磔等等二十余种，应有尽有，污蔑人类的刑罚，兽性与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类天性了吗？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然而站在主子立场又不尽是这样。杀一人而安天下，统治者自然要为，但是屠戮净尽谁又来作奴隶呢？所以主要的办法还需别来一套，这样，另一种奴才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李斯就是一个。“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这是一种只知助虐固宠、毫无原则的人，他的办法不同的，“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吕、金人十二”，对于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现代话说是“整饬学风”，方法是：统制教授“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特务横行，暗探林立，有言诗书百家语者“随时报请撤惩”，“士学习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学生干涉行政之风”。总之一切设施不过为着使诸生与真理相远，与现实相离，将来，理想社会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师今而学古”，恋着过去也为法令不容，“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诸生为要多少“知”一点去想呢？当然不准。同时还准备着一套万一要想，也得依着自己的逻辑，避免想出毛病来。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这就用着第一种奴才作为补充，开除，思想测验，失踪，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用着这两种奴才，是成功了的，诸生在欺骗、压制之下，触不到新的现实，听不到新的声音，‘由聋而哑’，缄口结舌，最多也不过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类征服下来了。但是李斯之流却没有看到另外还有力量。

这决不是国治天下不平了。事实的功德圆满却是与原意相反，统制是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还来不及“把‘诸生’改为新的名词”，偏偏二世即亡。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若问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为什么被一批乌合之众，一群死囚，几根木竿，乱者四应，秦的政权摧枯拉朽，统治立摧？

贾谊说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不施”：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报》 1941 年 12 月 8 日

今 与 昔  
• 田家英 • •

“能忏悔的人”，据说“精神是极其崇高的”。最透底的忏悔是从新的做人，斩犯绑赴刑场，为了表示不甘屈服，总得大叫几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快刀从头颈飞过，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长，二十年后依旧是钢筋铁骨，依旧是一条好汉。

这方法在中国，流传是颇广的，而且越来越高明。不甘落后的人加以研究，觉得二十年毕竟太长，麻烦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赶紧“贷款”，赶紧入党，赶紧做好汉。

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汉们，也自有其内心的苦闷在。

“反动”已经变为“革命”，旧英雄已经装成新英雄，“名缰利锁之中”，“鼓舞喧闹之境”，耍猴儿戏的最怕人揭开面具，望着他毛茸茸的脸皮，问起如何前后不符，直弄到腾挪不得，触及隐处，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当今天的看”。

这就是今与昔的差异。

自然，消极地表白终究不算善法，一来为了体面尊严，一来为了证明自己从“不知道‘转变’”，聪明人往往就会把过去说得含混模糊，或者把旧帐陈迹扮饰得雪白莹净，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这类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单看每临纪念，报纸期刊上总常有许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过领饷作事的编辑，诉说他一直就为新文化战斗，但弯子一绕，又在另起炉灶，从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几位教授文人在作“光荣的回忆”。甚至连郑学稼、梁实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制旗帜，贴标语”，使用过“唤醒沉醉的大众的手段”！结论如何？不过从“五四”证明“学风”的亟待整顿，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引文均见《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这里躲闪不开。战士闯将与吃肉吸血的帮闲之间隔一条多宽的鸿沟，但事情却偏会作弄，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与昔有着如此的差异。

“觉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这精神是不错的。但却必须是大体上能明是非，辩黑白，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去路，倘若仅随势力旋转，为了津贴领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两下嘴巴，淌几滴眼泪，用歪曲来证明内心的忠诚，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险恶的构陷，把世事涂饰得漆黑一团，以之骗人，兼骗自己，这就比之简单抹煞历史，更卑劣得多。

不过，这卑劣中却仍然存有点“古道”在，因为究竟还承认有过那篇帐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来愈为精进，恐将不久，好汉们连“改帐”也嫌麻烦，干脆算盘一

响，帐簿一翻，就把两眉一横：“那是我？——我一直就在这边。”

在好汉们身上，今与昔是难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鹰，作虫类。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适用于中国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黠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象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谴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尔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

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社论

原题《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罗斯福总统在其致美国第七十八届国会咨文中，提到了美国国内右派反动分子的问题。他说：“真的，如果这种反动发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们又回到一九二〇年后的所谓‘正常’时代，那么，我们敢断定，我们纵然在国外战场上克服敌人，但在国内也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罗斯福总统在这里不但为美国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而且为其他许多国家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

我们敢说：许多重要国家国内的右派反动问题，决不止于是一个国内问题，这必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由于一个国家在国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因而它在国际间也必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不能为民主主义的支柱。以故目前讲求国际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讲求国内的民主。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因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主张免除恐惧的自由，应当首先解释为把法西斯的威胁和恐怖加以彻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国内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彻底免除，那就等于整个国际间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解除。

无论国内的民主也好，国际的民主也好，都要从本质上表现，形式是次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民主就是人权。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人民无法行

使权力，也就无法享受权利。目前测量民主的程度，不仅是拿享受权利来做标准，而且是拿行使权力来做标准。我们不要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只有实际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叫做享受权利。

在这次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在英美两大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民都感觉到他们国内的民主非常不够。罗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认一个《第二人权宣言》。在保障人权方面，我们中国更应当与我们的伟大盟邦——美国——竞赛。

再者，民主与和平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说，国内的民主与国内的和平是密切联系着。同时，任何国家内的民主与和平又与国际的民主与和平密切联系着。我们中国今天与英美两大盟邦比肩作战。……因此，也就是为了国际的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社论

####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近来，各地方谈论言论自由的很多，这现象该值得兴奋和鼓励的吧？！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这样的需要，都认识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访英团回国之后，王云五先生谈到过英国的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已经评论过了。那天在国民参政会上，访英团也作了报告。其中说到：“英国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各地报纸向来很发达。”这句话在我们读了之后，真是感慨颇多。原来报纸发达，是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言论自由有促进报纸的发达，又由访英团加以证明了。舆论没法蓬蓬勃勃的发展，这对舆论界是件苦事，对政治却是个损失。

这些话本来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是谈到言论自由就总会联系到。

问题还不只此。访英团还提到英国文化界希望加强中英文化联系，特别注意交换教授学生及图书等事。这是很重要的。正象访英团所说：“双方应即积极推动。”英国既“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么，交换而来的教授和学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受过任何限制的，言论在战时所受的拘束是也与平时差不多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得惯过得惯这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欢迎他们来，是欢迎他们到一个民主国家来，在他们想象中是和他们本国一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怎样才能让他们证实这种想象呢？怎样才能使他们有“和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呢？反过来说，英国既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一定希望中国的交换教授和学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现出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这些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须有

民主自由，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进，才有意义。写到这里，可以举一件小事情，说明没有民主自由，是阻碍国际文化合作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国留学生监督控制学生思想的办法废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和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因为思想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民主传统，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国家亲密团结的时候，不能不对违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议。虽然这项要求，政府是否接受，还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各国就该严重注意了。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国际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则，就是说，这种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义为共同的出发点和基础，民主国家只能帮助民主国家，也只能向民主国家获得帮助。

从国内人民要求、国际潮流所趋看来，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赶快从原则的讨论，走上切实的现实了。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社论·

## 美国国庆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日——独立纪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国人民发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独立宣言》，从此展开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独立战争。

为《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国人民，历尽困难挫折，奋战八年，终于赢得了民族革命战争，如列宁所说的，是“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独立宣言并昭示我们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不可分离的真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消灭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杰佛逊，黑奴解放者、穷木工的儿子林肯，领导美国反法西斯战争、倡导四大自由的罗斯福，就是代表这一独立宣言历史传统的美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人民羡慕美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传统。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折不挠地为自己的独立民主自由英勇奋斗，并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抗日战争。由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与一百七十年前美国的环境不同，在中国人前面，不仅有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斗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没有能够向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迅速实现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人民正在呻吟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虐政之下。这个政府，正如美时代杂志记者所称呼的，是一个“恶政府”。引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一贯地追求同一目标的一连串的虐政和篡窃，证明有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的阴谋。”《独立宣言》中说：“推翻这样的恶政府，并为人民的日后安全设立新的保障，就成为人民的权利和天职。”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宽大的。今天中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恶政府”，并不运用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推



翻”它的“人民的权利和天职”，而只是要求它放弃“绝对专制”，经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方式，把现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仁至义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发动大规模内战，就是加强特务恐怖，就是血腥镇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就是不惜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它的“绝对专制”。

对于中国这样也“恶政府”，美国当局方面采取了什么政策呢？谁都知道，美国当局今天的政策，是无条件地以强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有恃无恐地坚持独裁内战，陷中国于内战、恐怖和贫困的惨境。美国当局，除了已经进行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如以大量物资供给、装备、训练、运输蒋军，替蒋军护路、筑路、保护港口、长期在华驻军等方式助蒋内战）以外，还向美国国会提出军事援蒋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将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而且将使蒋军完全成为外国的附庸，将使中国变为菲律宾第二。这就是说，美国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企图使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尝受殖民地奴隶的滋味。这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美国人民是不难了解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立场的。他们一定会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受另外一个外国的统治，继续殖民地的生活，那么美国人民能不能忍受呢？显而易见的，美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几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当奴隶主。”但是在今天美国，却有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妄图做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奴隶主”。无疑的，曾经饱尝过殖民地压迫并从这个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向具有热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恶政府”所统治，那么中国不会有和平，世界也不会有和平，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对美国人民的灾难。因此，美国人民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想做“奴隶主”的企图是痛恨的。美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对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正在增长；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宣言、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纽约分会的反对使美国陆军训练中国军队的决议和德拉西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际兹美国国庆，我们除向美国人民致热烈的庆贺外，并号召他们发扬独立宣言的光荣传统，一致起来制止当局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军火，要求当局立即撤回在中国领土上的海路空军，要求政府和国会撤销军事援华法案，迅速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这样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不断增进，中国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能够在平等互惠原则下日益发展。

我们中国人民坚信：我们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斗争，必然获得美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有力的声援，正如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战争中获得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的声援而阻止了英国当局的干涉一样。中国人民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国人民运动的声援下，不管还有许多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摆在我们

面前，我们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们的正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7 月 4 日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

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

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

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

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

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灾黎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丧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

综上所述，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

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

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息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

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 1943 年 9 月 1 日

##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全国工业协会亦于日前举行座谈，提出很多极其宝贝的主张，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之事！

今天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并不是偶然的。抗战打了八年，后方的生产事业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缚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挣扎着。胜利到来了，一些硕果仅存的工厂，不但未曾复醒，反而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遇到更严重的灾难。中小工业不要说，就连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工

厂，亦在这个时候，颓然倒下了。政府对于这个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购生产的贷款，变为收购机器和设备的贷款。这种办法意味着当局所着重，不是怎样为工业界打开一条出路，而是乐于为他们送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不要紧，有强大的外国资本可以来中国投资；中国的民间工业垮了不要紧，有居高临下与外国独占资本结不解之缘的官僚资本可以在各重要生产部门勃兴起来。在当局的这种打算之下，中国民族产业的生存自然发生问题，也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抗争了。“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了（李烛尘先生语）。 ”

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使人担心的。官僚资本和外国的独占资本贪婪地进行无情的袭击。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原来是以轻工业为依据的，但现在收复区中的棉毛丝麻等，几乎全部国营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因此，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工业将来会变成日本那个样子，全国的经济命脉由几个大财阀所独占。这种看法自有其中肯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战前的日本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个大财阀并未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独占资本的附庸。中国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外国独占资本之支持，则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不容易发展到支配与操纵地位的。所以假如继续在买办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国经济就可能变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体。

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二个月前，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亦指出：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要反对的是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与侵略资本。（反对侵略资本并不就是反对利用外资，我们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迎外资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

或许有人把我们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的主张，当作在野党的宣传吧，过去数十年的教训，特别是当局这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训是这样的，诚然使人民对任何人不敢轻信。我们的的确确认定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处处着眼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广大的解放区中，新的富农经济是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了；一些地主的资金转移向工业投资了，中小型工业大量地在每一个角落长大起来了。我们在民主的解放区中已经这样做，我们决心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各地去。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内战与封锁的话，我们是欢迎后方与收复区的经济界人士，去参观，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

正如政治一样，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转扭的关头。我们欢迎产业界的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经济民主而斗争；我们欢迎

全国经济界的人士在会外在各地为这个问题而努力。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政治民主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中国。我们将同心协力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新华日报>社论 1945 年 12 月 31 日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

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

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共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一三”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

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

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

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

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

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社论 1943 年 3 月 14 日

###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

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在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入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几点意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



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以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地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些毫成见的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错误的措置。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据。

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的风气起来。

——《新华日报》社论 1943 年 9 月 22 日

## 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创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形，不断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

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的反对过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的选举出来的。

国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断的采取了很好的政策，从对内到对外，从国民党的改组和与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结合，以及与革命政党的联合，到确立对外政策，着重中、

苏亲密邦交。国父为了他的这些主张曾经以他的伟大辩才折服那些怀疑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斗争精神，责斥了一部分反对的人。国父的主张终于是胜利了！事实也证明了国父是完全正确的。

国父是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是中国认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灯。现在，我们应再对国父的遗教，作进一步的研究。

国父对人民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曾经不惮烦的说了又说，解释了又解释。他问：“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为基础。”“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是以人民为主。”这就是说，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谈建设则已，要谈建设，就一定要“以人民为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国父曾经这样尖锐的提出人民为主的问题：“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见国父演讲＜释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这样的民主思想，是贯澈在国父的每次演讲和手拟的每个文件中的。解释什么是政治时是如此，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为一切平民所公有时，也是如此。所以，国父对民主政治总说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总千叮万嘱的说：“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和求其实现的。

国父对民主政治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所以他对人民参加中华民国的建设具有莫大的热烈的希望。国父不怕人民，不疏远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动员人民。而国父在对政党问题上，也有其民主的独到的见解。国父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时，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国父主张多党并存，并确定了在野党的监督地位和纠正的义务，协助的责任。同时，更对什么是“良政治”“良政党”有这样的指示：

“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党乃为良政党”。而国父对政党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视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又是以谋国家之进步国民之幸福为唯一中心。国父说：“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其他则为私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其他则为私争。“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以上均见国父所撰＜国民月刊出世辞＞）国父在这里，用极简单的话，把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运用，阐述得很具体而深刻了。在这个原则之下，国父还曾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指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体系之不同时很明白的。然而两者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定的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这些问题，在今天来重新恭读国父遗教，是更有实际意义了。

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

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

民主原则

• 张申府 •

差不多很象桃乐娣·汤普孙女史新近所说“有一种绝对的逻辑在历史上”，几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当然在这些道理是什么，有多少。一切学问，自哲学以致科学，所从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这些道理发掘出来，而且弄个清楚，说个明白。同样，也象尤里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说的“达尔文拿他不多的几条原理把人与所有别的生物都联络在一个必然与变化的共同之纲中”一样，世界随时都有个大势所趋，为任谁所不能逃。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

这些年来，对于民主虽然有种种看法，种种论调，但现在联合国方面却公认为这次之战争是争自由与民主之战。所谓法西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与自由民主整整敌对的，都是与自由与民主势不两立的。而且凡是压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讲理性的东西，不管有多少样的方式，都可归入法西斯的畴类。法西斯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同时是极端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这也是今日所有进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认。

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么？

这也不是的。

现在所求的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进步，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发展。

现在许多人都晓得了：要想安全，必须进步；要想稳定，必须向前发展。

叮衡全局，观察世论，很可以看出，有好几点是现在世界许多人都同意的了，或认为无可如何的了：

第一．现在是正过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人民的革命的时代。或者甚至说，这种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个阶级的。

第二．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如经济上社会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决不等于代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

第三．“经济人”要代以“社会人”，经济人的时代要继以社会人的时代。社会必须是有机的；必须不是各自为富，而是共同谋福的。因此有人还说，今日的民主必须是“有机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为人类关系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生为界说，那么，道路不管还要怎样曲折辽远崎岖，人类社会究已在向之而趋。这一层是与前层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种情形。

第四. 社会各方面, 特别象经济方面, 科学方面, 设计或计划化 Pranuig 必大流行, 必不得不大流行。这也可说是与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设计或计划化其实并不违反自由民主, 宁可说是自由民主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 或更好说, 设计或计划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圆满地具体实现。当然, 要圆满作到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 也有它少不了的条件。

第五. 战后必要有一种国际组织。有的且说, 最好即以今日的联合国为基础。关于战后永久和平的计划, 近年真是甚嚣尘上。连带地, 为从一种根本克服过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连锁的国际大学, 也正为世人所注意。只是关于那种国际组织的如何构成, 如何产生, 尚是众说纷纭, 难衷一是。与我最同心而非开玩笑的罗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逻辑切实周到的大文<战后世界的若干问题>里曾郑重地说: “开始的国际权力机关应由合众国, 大英共和国, 苏联, 与中国而成。它们四国应结成一个随时可以邀请别的国家加入的联盟。”读来最足令人兴奋。总之, 仍沿旧日的此疆彼界, 国际无政府状态, 是不行了。不能各自为战。各自为治也明白是不行了。民主必须兼是国际的。

凡此种种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势所趋的一种意义的根本方面。本来, 纵然今日全世界真觉悟的人还不太多, 就是许多觉悟的人觉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数人都已觉悟到了几千年前已经揭穿的一种情实。那就是: 人与人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长的高一些, 看得远一点, 早一点。有的看得早一点, 也就说得早一点, 因此常会招出横祸来。有的则有知也有养, 虽看到了也不说。现在许多人都觉悟到了: 将相本无种, 舜时任, 予也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 只许“由”不许“知”么?

而且人与人虽有差而不多, 不但是中国的古调, 尤其具有现代科学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形下谁竟还要我智自雄、唯我独尊? 致落得枉费心机, 徒劳无补。

法西斯的种族论固久已被世界的人类学者与生物学者驳得体无完肤了。

举一个绝重大的东西, 当然是众擎易举。对着一个明非个力所能胜任的东西, 也一定不会有人偏偏要独力支撑, 而不虞举鼎折髀……

众力成城, 众口铄金; 耕常问“奴”, 织当问“婢”, 本也是流传至今犹可记取的中国古训。

说到中国, 民主几乎成了今日的万应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致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 在客观上, 中国的民主前途, 已绝对可以断言, 而完全无可怀疑了。

中国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 就是抗战反攻上, 经济财政上, 以及教育文化上, 乃至社会别的许多方面, 实在无一不需要民主, 无一样没有民主能够解决其困难。

国家有困难, 当然应有全体国民来担当。但如使其与闻一旦有关情形, 使其对一切有关事情都有置喙之机遇, 都有尽力之机会, 纵令担当困难, 忍受痛苦, 也当可以心甘情愿。

人总是对于自己有权过问的事才最起劲。而况是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事。

民主决不会就妨碍集中领导。反过来说，也一样。

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应实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缘由，本是为的民族，本是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难。本是为的实现最圆满的民族统一。而具体言之，实在尤在为的动员，尤在为的发动一切人力以及物力。

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对症药，也就是主要因为这个。

实际上，今日国内有些地方试行民主，传说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战上、经济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会关系、人民生活上，据传都有不少的成绩，至少大部分也当是由于这个。

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动员了民力；弄机会使大多数人民都自觉了的缘故。

去年十一月英伦名流、学算习律出身的经济学家、牛津大学院长贝维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轰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计划，所谓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他本认为应该祛除或攻击的巨恶共有五项：穷、病、愚、脏、闲。这五恶在中国岂不更要用力来扫除。

以贝维里治博士特认为根本的末项，闲，而论，试问在中国今日这样需要人力的时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当，以致许多时间精神，都白费了！

汰太（或汰汰）与废费（或说废废），实在同属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不要闲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经济！

但这决不是一般所谓做官或出仕的问题，且也不仅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问题。实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发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

使一切人潜藏的才干可能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这就是今日所谓民主的根本精义之所在。

用另一个说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两字）。

假使，根本上，没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

但所谓自由并不只是让人人随便，解脱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贝维里治的五巨恶，以及忧愁，危险，或如罗斯福所说的匮乏与恐惧，等等。而且更要给人人以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尽量地发展发挥发皇其才其力其业。——推到极处，两层本也并无二致。

也可以说，民主的出发点就是集体，就是与人为善，也就是认人人都可以为善，也使人人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养，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身，一货委弃于地，一贤一能不见选，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

那么，在今日中国，谁，什么党派，怎样作法，在原则上，最有使中国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根本的条件。

第一：必须是中国。——这些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中国

化”的呼声。似乎直到今日为止，在这方面并没有很走上轨道。但是如果在中国，对中国事，而不由中国人以中国为第一位；所采取的办法不扎根在中国的本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必不免多少隔阂。如此，要想把中国整好？究竟是事实上难以置信的事。文明犹如酿得好的酒，文化则如多年的陈酿。一种文明几千年蕴集下来的气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杀。不过，中国的优良处究竟是些什么？虽还不无有待于理董，有待于表扬，但关根本总目，倘有虽流行而实不伦不类、不合中国真正传统与时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矫而正之。消纳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属绝对的必要而分当。

第二：必须是独立的。要想国家（民族）独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与全世界进步的人类携手而作自己应作的独立贡献，那就中国三四百年来先有异族窃国继有帝国主义侵略所强迫铸成一切奴性或依赖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的，都须立即廓而清之。中国的民主必须以中国为本位而行之；中国的民主也必须不依赖它国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罢）。

第三：必须是民主的。——这就是说，号召民主的必须在自己可能范围之内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办法。庶几可收以身作则，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则纵然不是教猱生木，却等于缘木求鱼，等于抱薪救火。

中国今日是处处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关人都得过问有关事，人人都有贡献其知识能力的机会，并有看见其贡献被采纳实行的自由；也不得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以为一种进行事情的途术。但是，当然，在一个意义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国，也可以说，尤为根本。必须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径，然后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后的情形，才有肃清的希望。

不过，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尝不需要别的方面配合。如必由别的区处多培养些有益民主的精神习惯，也未尝不可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进行。

这，特别就在哲学与科学上。

哲学是讲可能的学问，是根本原则的学问，本以体与辩为方法，而以通为归宿。因此，哲学对于人生特别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处远处，使人养成大量的习惯，而不拘于狭隘的小圈，强作物我之别。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够有理性：能够由前提推到结论，由结论回溯前提；能分别，有分寸，重分明，于异见同，更于同察异；能够作面面观，如实观，平等观，也能容纳多方面，重视种种不同的它方面。这都是充实民主所必需。

至于科学，更是实在的学问，是朴实实验踏实认真的学问，更可以帮着人养成踏实认真、实事求是、正视事实、注重证据的习惯。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货真价实，冒充一定不行。尤其型式科学中的算学，常弄乃可以培养人的谨严精审周密不苟的作风。有了这种风气，实也大有助于真实民主的实践。

今日要想实践民主，发展民主，是必须变得有了理性，是必须与哲学的大量精神，与科学的踏实习惯，与算学的谨严精审的作风，密切结合的。

是的，实践民主，发展民主，使民主进步，实现社会一切方

面的民主设计，以便全人类适应生物进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实着实的坦荡大道，这乃是今日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任何人不能违抗之，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办法，如是因此大势而利导之，必会成功，不这样子，必都失败。以上所说，不过原则。至那有关今日全世界的、进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体的办法，那就尤愿合全世界有心有脑的人共同商讨，分别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实现。

——<新华日报>1943年10月8

###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中国思想界所以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并把它作为中心任务，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战胜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使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分清敌我，不容丝毫含糊，不容在我们的抗战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不但这样，中国思想界所以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并把它作为中心任务，其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将来的建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国。或类似法西斯的中国。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反对一种误国害民的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要与这种误国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丝毫含糊。只有在思想界肃清了这种毒素，才能达到“抗战必胜，抗战必成”的目的。因此，这个任务，是中国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务。

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同盟各国现在正与法西斯进行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战斗，中国是进行这个战斗的最早一国。六年来的斗争，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彻底消灭这个敌人的。

为了彻底消灭这个敌人，不但需要武装斗争，而且需要思想的斗争，这就是对一切法西斯欺骗宣传的斗争。

一切法西斯欺骗宣传的核心，就是假装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都向他们国内的人民宣传他们的所谓民族主义，但是这与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是毫无相同之点的。

法西斯主义者并不爱他们的民族。

希特勒毁灭了德国，墨索里尼毁灭了意大利，日本军阀毁灭了日本——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吗？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使大多数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陷于贫穷、破产、饥饿，剥夺他们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后又把他们抛入反动的战争的深渊——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吗？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在他们的人民中间宣传复古、倒退、迷信、盲从、堕落、野蛮、无理性、神秘主义，破坏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原有的进步和文明——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

吗？

法西斯的所谓民主主义，就是摧残民族、掠夺民族、强奸民族的主义。

法西斯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一伙强盗，他们强奸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头，并且继续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这伙强盗说，他们是最爱这个民族，他们是为这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如果这个被蹂躏的民族起来要求自己的生路，他们就说她是“叛逆”，说她是“分裂”了国家的“统一”。

法西斯主义者所代表的，乃是少数的大金融资本家，他们公开垄断了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这种垄断比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坏百倍。但是他们却假仁假义地攻击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们不要脸地宣布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全体”，他们的经济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

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人的利益不代表全体的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体的利益，这就是法西斯的数学。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人向一个人要求生存的权利，叫做“煽动阶级斗争”，一个人剥削迫害九十九个人，反而叫做“阶级合作”，这就是法西斯的逻辑。

法西斯最后只有不要逻辑，用极端的唯心论和唯心史观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的概念，人们把握它不是用内在的直觉的报告的观点，而是依据至高无上的信条的观点，用客观意志的观点。他引到个人的提高，是他自觉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员。”

法西斯主义者对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对旁的民族的蹂躏就更不用说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宣扬的“王道”，我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了。我们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就是灭绝法西斯的战争。我们叫做民主阵线，因为我们不但现在反对法西斯，将来更反对法西斯，我们流了这么多的血，就是为实现民主的中国，民主的世界。将来的中国和将来的世界，一定不允许有无论什么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丝毫存在。

这个思想，在大西洋宪章里已经有了确定的表现。大西洋宪章第六条规定“待纳粹的专制宣告最后的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又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论点。

我们中国不但在拥护大西洋宪章的华盛顿公约上签了字，并且还有孙中山先生全部反对法西斯的遗教。

法西斯主义是否认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宣传非亚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并且公开侮辱了中国：“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为一个黑人和中国人因为学过德文，预备终身用德语说话，及为某个德国政党投票，就可以变做德国人。这就是我们的种族开始不纯正。”但是孙中山先生却再三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破民族间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国“同现在列强处在平等地位”，坐到“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



法西斯主义是冒民族之名来压迫剥削本国人民的。墨索里尼说：“法西斯革命（？）创造力的根源就是组合的国家，即经济力量完全划一于调和（？）的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其中是根绝了的。”但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却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密切结合而不可分离，所以孙中山先生批评辛亥革命的根本失败，“就是由于当日同志仅仅知道注重民族主义，忽略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过错”。

法西斯主义既然要“根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是要“根绝”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法西斯主义认为民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为人民不应该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希特勒说：“大多数人不得决定，只有少数人可以决定。”但是孙中山先生却主张少数人不得决定，只有大多数可以决定，主张“以人民为主人，以官吏为奴隶”；主张“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孙先生不但坚持现在是“民权时代”，并且预言民权主义“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发达”；中国只应该比法美更进步，造成俄国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希特勒党的政策大纲明白规定着“国家统治一切社会化的企业，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齐亚诺等也就在这样的“统治”“划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财阀。但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却是要“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论上反对法西斯，而且在行动上反对法西斯。中国这样的民族，本是只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但是还在民国十三年，居然就有个买办资本家陈廉伯，为了破坏孙先生在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阴谋要求广州成立什么“法西斯蒂的政府”，孙先生不顾某些外国人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反对了陈廉伯，这就是有名的商团事件。孙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国和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急先锋之一。

为了反对法西斯，为了贯彻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中国一切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应该联合起来，来加强抗日战争的力量，加强民族团结的力量。加强全国人民为光明的将来而斗争的信心和热情。

在这个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中，三民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亲密的战友，因为无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与法西斯主义不能并存的。

“五四”和“五五”是中国民主思想的二十四周年纪念日，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根据地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二十二周年纪念日。这三个纪念日这样巧妙地联合在一起，应该是思想界反对法西斯大联合的一个象征吧。

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国思想界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及其胜利万岁！

即便战时状态也必须实行民主

中国抗战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和动员全民族的人民，参加抗战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说，它决定了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民主权利，就失去了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抗战的必要条件，就使这全民族全面的抗战，失去了偌大的力量。总括一句话，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武装抗敌的权利，就不能动员全国的人民参加抗战，就不能使民主政治逐步的全部实现。抗战以来，我国政治生活已向民主制度进了一步，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显然是其初步的开端。但是，我们如果问，在这一初步开端之后，继续进展的程度怎样？全国上下一定会不自隐讳地说：在某些地方，显然没有继续努力将政治生活推向进一步的民主的道路上去。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事。

毛泽东陈绍禹等七同志，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明确的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务，中心目的，正在于实行战时民主。从这一意见中，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根本主张，是一贯的坚决的把全国政治生活逐步的推向民主政治。共产党反对一切政治上向后倒退的言行。因为这是对抗战有害的，对民族不利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共产党在抗战这一个历史时期，所主张所坚持的民主政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完满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必须的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族的每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发动和坚强每个人的坚持抗战的意志、培养和组织每个人的坚决抗战的力量为前提的。而这些一切，都以民主权利为起点、民主政治为归宿。

有些人以为：抗战时期，民主是不必要的，并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政府为例。这是根本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战争，亦即为人民所反对的战争时，它们是不愿意有民主的，是要大大的限制民主的。而在中国进行全民族的反侵略的战争，这一战争为全民所拥护，更非有全民参加，不能获得胜利，因此，在抗战时期我们就应该实施民主政治。

有些人以为：抗战时期，无谈民主宪政的必要，尽有约法可遵循，有抗战建国纲领可遵循。但是，抗战所需要的民主，应随抗战之坚持而充实其内容，在保障民权（就是这一项，也还需要最大的努力去切实实行）外，还要注意到整个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使政治有认真的进步，才能适应抗战的发展。

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在于“加强战时政府，统一军政领导，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在于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各抗日党派合法存在的保证。

在抗战的现阶段，敌寇正尽全力进行政治诱降，挑拨离间，破坏我国抗战。我们一定要加紧团结，加强抗战力量，为了这个目的，舍实施民主政治，力求政治进步，反对一切倒退，别无他径可循！汪逆精卫正在高喊“虚伪的民主政治”，“在日寇刺刀下的民主政治”，我们正要实现战时的民主以揭破汪逆的虚伪面孔。这时候，既不是空谈无民主政治之必要所可逃避，也不是斤

斤于参加政府所可解决。唯一的道路，就是集中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将政治认真的推向民主。

——<新华日报>社论 1939 年 9 月 16 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 团结与民主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集中人材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关切。

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命运的办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

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的造成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什么是“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

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

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一样的被珍视爱护，受着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

###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 (节选)

目前，太平洋战争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而希特勒又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此形势下，民主国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民主国家伟大的物质力量，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和尽量利用这些力量呢？

“政治重于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是政治，发动战争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战争是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与反侵略的民主主义两大阵线间的斗争。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建立在进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发动战争力量的推进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民主国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里呢？

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民族就非给民众以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

意志与发动和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机，而最后则以民主政治为归宿。

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阵线与民主争战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白指示：“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

“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的条件，而民族团结又必须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

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显明的。

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

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国必须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民地以民主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年我国国民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

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力量的有机联系。大家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的民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国会中和舆论方面引起了英国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分阁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适当的，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部“举国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坦白地发表了辩论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如云“此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处，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求国会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即系怠忽职务”等等。正由于丘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度，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 1943年3月6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

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

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

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死党员与党外同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有过高的要求。后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

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的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岁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

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迨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党员须自觉的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

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 1942年8月2日

###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现在如果再问民主国家同盟和法西斯主义集团的不同处在哪里？简直是一个笑话。可是，原则容易谈，道理容易说，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现出民主国家是在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战，是在为消灭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战。

最近报纸上登载的两条新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西里居民的广播。他说：“……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肃清占领区内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律宣传将被禁止”。“盟方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以中止西西里岛一切歧视种族与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则将维持，在无碍于军事行动范围内，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将恢复，盟国又将采取步骤，以迅速释放政治犯。”另一条是法国议会议员庞德氏对记者的谈话。他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略）“压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国人民党’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号，这显著的在人民之中树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众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



肃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

为什么盟国要采取上述各项办法？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

“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明证。这些原则都是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

很显然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是反对自由，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是坚持自由主义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既然这样，就要在行动上以此为绳。凡是民主国家，都要以最坚决彻底的抗战，来消灭侵略，消灭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制度和宣传，并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主义，都要团结国内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彻底消灭敌人的第五纵队，肃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传。

蒋委员长常说我国要精诚团结，他又曾在纽约先锋论坛报所主持的广播中，说到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发挥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不同。

（被略）

我们应时刻记住“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原则，时刻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认真实现而斗争！

——〈新华日报〉 1943年7月26日

## 建立宪政规模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伟大收获，除了更坚决的确定抗战到底的国策，粉碎敌人汪派汉奸的鬼蜮阴谋之外，对于抗战建国最具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中，受到大部分参政员的关心注意。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的提高民权加强国本的要求，是如何热烈地在第四次参政会中反映出来了。因此，详加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有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正确地指出：“敌寇正百计进攻，我自不丝毫自满。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陷，皆须填补；本会同入详加审议之结果，以为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

二年来的抗战，处处证明要打退敌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个国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为国家来贡献。”更具体地说，只有容纳个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的效能；只有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只有走上这条实行战时民主的道路，中国的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为着这种主张而努力，在这一届参政会闭幕前夕，毛陈等七参政员，就在他们的意见书中，历历提出这几端了。

诚如论者所说，宪政之性质，不在乎条文，而是在乎事实。

但是，我们要晓得：有利于抗战建国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

本大法上规定起来，则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种种名义，进行破坏。张一 参议员在其对议长的答词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党政军各级人员，对于民众运动，往往有所歧视。道路传闻，尚有假借取缔与指导名义，摧残合法组织，钳制正当言论，拘捕热血青年”的事实，是使人不得不悚然的。制定宪法的目的是要使这种现象能够根本消灭。但是为着召集国民大会来制定宪法，必须在现在就给各党派合法保证，以便在国民大会前各种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

有一些人，以为战时军事高于一切，不应有民主；以为战时全国上下之经历，应完全集中于对外，而不当转移其目标于制宪问题，这些意见，通通被这一次参政会的决议，打得粉碎了。实施宪政可以发扬一切力量；可以加强军事之胜利，可以提高对外的力量。上面所举的一些说法，都不以发挥抗战力量为出发点的。

我们诚恳地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决议，但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要切实地执行参政会这一决议，要不然，决议只成为纸上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的大业，是不能有实际的贡献的。

——<新华日报>1939年9月21日